

作者近影

火 星 南 碗

一 說

建康老道志

建後紀略

邱曉元

元

皖南星火
永放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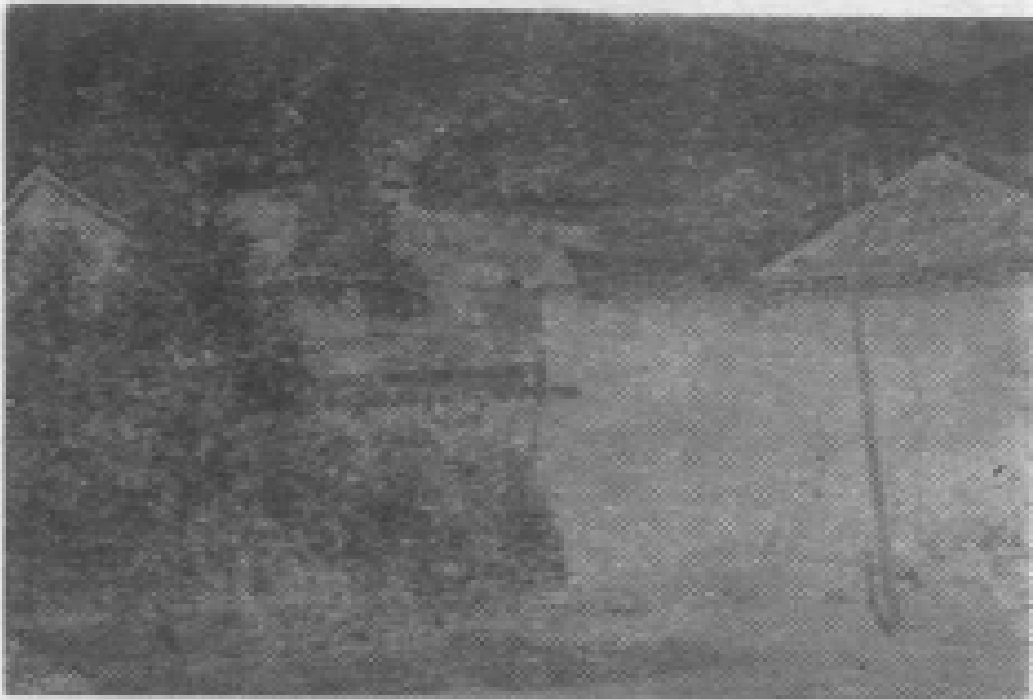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二年十月

四



新四军军部旧址

尹建生 摄



第一集团军第一师旧址

尹建生 摄



服务团演出《黄花曲》

208/22

目 录

第一章	东进抗日	(1)
第二章	皖南突围	(22)
第三章	重返皖南	(44)
第四章	深入敌后	(139)
第五章	转战皖赣	(217)
第六章	迎接渡江	(237)
编后记	(257)

第一章 东进抗日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一声炮响，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芦沟桥的隆隆炮声，震撼着祖国大地，华北怒吼了！整个中华民族怒吼了！这一消息也象长空霹雳，很快传到了粤东，传到了我的家乡——韩江之滨的大埔县百侯镇。

百侯是一座较大的集镇，有二、三百间两层楼房的商店，每间商店门口，有两根大水泥柱子架起的凉棚，不怕炎日和雨打，这是南方城镇的特点。整条街道都是水泥路。镇子上有一所容纳百十来人的中学。这里长期受到进步思想影响，革命的群众运动时有发生，并不断发展，大批青年从这里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可以说，广东是南方革命的摇篮，而粤东又是广东最早革命根据地之一，粤东地区投身革命的青年，最多的则首推百侯。在战争年代和建国以后，从百侯出去的大批青年成为职业革命家，许多都在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百侯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记得在我童年时代，就常常

听到这里流传的许多斗争故事：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三元里的反英斗争，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直到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无数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深深打动着。当大革命烈火在全国熊熊燃烧时，我的家乡也撒下了革命火种，百侯中学开始有了党的组织，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刊物在学生中竞相传阅，革命的进步思想在学生中传播。八一南昌起义失败，朱德同志率领一支突围部队，在江西会昌给尾追的国民党军的嫡系钱大钧部一个重创，后起义军折向瑞金，沿汀江南下，经闽西上杭、永定，进入粤东大埔、百侯，直下潮汕。钱大钧部得到补充紧追不舍。起义军为了潮汕部队的安全，曾在三河坝设下埋伏，痛击追敌。三河战役是朱德指挥的，以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为主力，配合第九军教导团，战斗打了三天三夜。一开始，敌人以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用木船强渡韩江。朱德则以东文门（韩江东岸）的笔枝山为阵地，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术，待敌人木船行进江中，起义军迫击炮密集猛轰，敌人木船有的中弹沉没，有的失去主宰在中流打转，许多目击的群众说：磨豆腐。但由于敌人不断增援，潮汕部队先行失利，设伏的起义部队又伤亡惨重，便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凌晨，乘大雾撤退。

起义军虽然失败，但他们所到的地方，散传单，贴标语，宣传我党革命主张，传播马列主义真理。我的同房本家杨平的洋楼屋墙上写下了每个字约有一人高的标语：“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数里外也清晰可见，这条标语历经十几个春秋，仍依然留在墙上，它象一盏明灯似的把穷人心头照亮。百侯的三次革命暴动都是在这一革命浪潮推动下举行的。

一、二两次暴动均取得局部性胜利，但因反动势力强大，革命力量受到挫折或者失败。第三次暴动，是在南昌起义军失败之后举行的。大埔反动势力组织清党委员会，组织白色民团，开列黑名单，企图在全县范围内对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进行屠杀和摧残。百侯以杨竹史为首的土豪劣绅也跃跃欲试，四出派人购买枪支弹药，招聘兵痞到百侯，准备成立白色民团，杨竹史是他们内定的民团团长。他在上街头开了一座中药药材店——“德生堂”药房，又兼任百侯中学的董事长，阴谋镇压革命师生。一九二八年阴历三月十三日，原是他们白色民团预定成立日期，地下党决定，在民团成立之前，一举消灭他们。这天凌晨，在由朱德留下的一百多支步枪组织的李明光独立第十五团配合下，四乡农会会员、手工业工会会员以及百侯中学革命师生，秘密集中到百侯街道边沿，待到天麻麻亮，向镇上发起突然袭击，包围了杨竹史的药房，抓住了杨竹史，当众处以死刑。同时，还杀死了几个刚从外地请来的民团头目和一名专放高利贷、奸淫妇女的恶棍杨大目，放火烧毁了国民党区署和杨竹史的“德生堂”药房，人民群众见了无不吐气扬眉。我的几位堂哥和我大伯女儿都在这时先后参加了革命部队。我当时还是个少年，但目睹这一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内心激动不已。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流亡内地的东北同胞控诉日寇暴行，揭露亲日派势力不抵抗主义，让祖国大好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丧权辱国消息传来，群情激怒，校园内广大师生喊出“打倒日寇，还我河山”的口号，唱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抗日救亡歌曲。我因家境贫寒，无力续读，已辍学在家种田。一九三六年秋，我们与班失学青年受到抗日救亡影响，在同

年七、八月间组织起失学青年自学会，由杨启元、杨兆京等为发起人，自学会一开始就受党的秘密领导，有许多人参加民族先锋队，成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公开任务是组织失学青年自学，实际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传播革命真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自学会下设组织股、宣传股、民教股，具体搞一些识字运动，做一些社会调查，并有意引导青年同学讨论个人出路、人生前途和国家危亡等问题，一谈论起来，总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主张以农为乐，有的打算去南洋谋生，更多人则立志报国，振兴中华。就在这时，芦沟桥炮声一响，抗战爆发，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更是积愤难平，怒火中烧，决心报效国家，立志救民族于危难，驱日寇出中华。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韩江特委李白山派张令福和曹金华来百侯，通过杨启元，建立埔东工委，百侯中学也恢复了党的支部。经杨启元、丘鸿耀两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恢复了第一个百侯支部，我在支部任宣传干事。此后，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新四军在南昌宣告成立。大埔县委动员大批青年党员参军，决定我去了。那时，罗明担任百侯中学校长。他到闽西找到张鼎丞，回来后说，去闽粤边区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他便给我写了封信，要我假装去报考龙岩师范的，实际是去找林映雪先生。这时龙岩已成立新四军办事处，同去的还有杨国峰同学，我们两人全是囊中空空，分文全无。杨国峰父亲在镇上开了一座赌博店，颇有钱财。临行时，他回家把钱柜打开，抓了一把银元，又见柜里还有一支手枪，他也放在收音机盒子里，准备一起带走。我情途中生出是非，劝他把手枪丢下了。

我和国峰两人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早晨，离开了家乡，开始上路了。我怕母亲依恋难舍，没敢当面讲明，留下一张字条放在吃饭桌子的抽屉里，以表达惜别之情。东方渐渐明亮，我们涉过清澈透底的韩江水，迎着朝霞，踏上了一条陌生的然而又洒满阳光的革命大道。

(二)

春风得意，吹绽百花。韩江水急，奔腾向前。几只百灵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鸣叫，我和国峰以羡慕的目光，仰望那翱翔于长空的飞鸟，充满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欣喜心情，顺着江岸疾步行进。约行二十多华里，来到松柏坑后山约有三百多米高的山顶，上边有座山神庙，我们进得庙里稍事休息，抬头见神龛上摆着一只签筒，国峰忽然心血来潮，上去抽出一签，只见上面写着“化险为夷贵人扶”七言四句诗一首，俩人相视一笑，又继续赶路。越莒村，达茶阳，当晚宿于大埔客棧，一天辛劳，很快入梦。

第二天，我们改乘小轮去丰市，在那里，将乘汽车取道永安，再到龙岩。由于江水湍急，顺流而下的轮船，行驶快速。我俩登上船舷，放眼望去，两岸青山，飞一样地向后移动。我们饱览大自然的壮丽风光，心胸分外宽畅，两人谈着前途和未来，不免带上几分幻想的色彩。这时，发现一位身着学生装的青年蹲在一旁，沉默无语，似有心思。我和国峰主动过去和那位青年攀谈起来。经过一阵交谈，他情绪渐好，讲出了自己的姓名和情况。原来他是潮州人，名叫王立强，他有个姐夫在龙岩汽车总站当董事长，他哥哥王立雄在

总站当售票员。他去那里，想谋个职业。当天，我们在丰市转乘汽车，抵永安车站，晚上住宿在群众草棚子里。王立强有他姐夫的介绍信，当晚住在车站里。

经两天行程，顺利到达了龙岩。天已黑了，只好待明天去龙岩师范学校寻林映雪先生接头，想不到，当天晚上住宿时遇上—件意外事故。根据组织上的交代，我和国峰住进三星旅社。晚九点钟时分，国民党龙岩师管区几个武装人员闯进查房，发现旅客登记簿上只填杨国峰的姓名，竟把我给遗漏了。他们抓住这一点，认为形迹可疑，不容分说，将我俩拘留起来。我和国峰分开关在两个房屋，他在我对面，从棚门看得很清楚。同他关在一起的有个疯女人，忽哭忽笑，喜怒无常。和我同房间的是个刚从师管区逃跑的新兵连长，他蛮不在乎，劝我不要发愁，只要不乱说，到时能出去。天明，有个勤务兵从棚门走过，我细一辨认，原来是在百侯民团里当过小鬼的杨佛宋。我们很熟悉，未待我喊叫，他已认出我来。他走到我面前，问：“你怎么关在这里？”我随意编造几句作答。他说：“你在这里有熟人吗？”我说：“谈不上熟人，汽车总站的王立雄先生是老乡。”他说：“你可写封信，要他保出，我可以为你送去。”他随即把钢笔给我，我撕一块糊纸，挥笔疾书，大意是：王立雄先生，我因住三星旅社，登记不慎，两人住一房间，只登记一人，现被师管区拘留，请速来—见。不一会，王立雄果真来了，他问：“你来龙岩干什么？找谁？”我说：“我是报考龙岩师范学校，找林映雪先生的。”他听了林映雪名字，马上会意，连忙说：“不要说了，等—会，我回去就来。”很快，王立雄同他的姐夫到师管区找到旅部副官，说我和国峰是他同乡。那副官

很客气地问我丢了什么东西没有，我说没有。那位副官对王立雄的姐夫说，你可以把他们带回去了。后来我才知道，王立雄的姐夫常替他们运物资、运兵，彼此混得很熟，关系非常好。

王立雄领着我们，一直向前走去。瞬间，他停下脚步，用手指指说：“喏，到了！”我们抬头一看，只见墙上一块醒目的字牌：新四军龙岩办事处。啊，终于找到了！这时我们想：从被拘留受了一场虚惊，如今找到了组织，真是困祸得福哩。杨国峰和我开玩笑说：看来签上的话应验了。是的，我们遇上“贵人”了，这贵人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亲爱的党！

龙岩是闽西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早在一九三二年，毛泽东、聂荣臻等率领红军东路军“直下龙岩上杭”，在龙岩全歼敌张桢部主力，写下了光辉的战斗篇章。自国共两党合作，坚持闽西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当时二支队司令部设在白土。前几天，二支队司令部召集军民数千人，开了东进抗日誓师大会，接着向江西和皖南方向开拔。在龙岩设立的新四军办事处，实际上是留守性质，专做接待和联络工作。这时，我们才知道，王立雄是在车站做地下工作的。他领着我们到汽车总站，黄礼源当时请了我们的客，在饭店吃尤鱼面条。我们都很饿，吃得格外香甜。回汽车总站后，王立雄带着我们去办事处，见到曾寿宁主任。曾主任看到我们就说：“我们每天都同师管区打交道，今天上午我还在那里，不知道你们发生这件事。组织上介绍你们来，本来先去下洋训练班学习，然后到部队。现在情况变化，学习班停办了。明天介绍你们去白土，可随军工作。”

他一再征求我们意见，我们都表示愿意随部队东进抗日。当晚就住在王立雄的宿舍里。第二天，王立雄派车让黄礼源送我们到白土。途中碰上了梁国斌，他背着东西去龙岩，接任新四军办事处主任。这是黄礼源告诉我们的。记得，在那里还遇见红小鬼叶洪章，以后我们都分在宣传队工作。

我们到了白土，由温仰春接见我们，在座的还有李桂英等。在白土休息两天，我和国峰跟随二支队的刘副官，乘上一辆卡车，尾追支队部，在古田赶上了。刘副官送我们到政治部报到后，政治部组织科长老蓝将我们介绍到宣传队。那时，队里的负责人是王直和彭冲。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一次长途旅行。按照行军方向，部队沿着福建的古田、新泉、朋口、河田、长汀、古城进入江西的瑞金、于都、赣州、万安、吉安、樟树一线，由浙江玉山、开化进入皖南。在宣传队里，我们每到一处，散传单，写标语，并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等，向群众宣传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红军为什么改编为新四军的道理。我们所到之处，沿途群众都来欢迎和慰劳我们，许多青年纷纷报名参军。部队经过赣州期间，蒋经国正在那里当专员，为了标榜他的政绩，内战时曾有“铜赣州铁止杭”之称。但我们在街上宣传抗日，书写标语，却有政府当局派来枪兵制止，我们据理力争，说抗日“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我们在中国土地上宣传抗战，难道不是正当权利吗？因此，我们根本不去理睬这些，白天顶着烈日写，晚上打着火把写，那一条条标语，仿佛是射向日本侵略者一发发炮弹！

我们进入皖南，春意正浓，正是“乡村四月闲人少”的

农村大忙季节，只见皖南群山，层峦迭嶂，郁郁葱葱，流油滴翠；空中布谷声声，田野秧歌阵阵，好一派男耕女织、军民同耕的欣欣向荣景象。我们刚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好象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皖南，这块英雄的土地，美丽的地方，自投入你的怀抱，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儿，我度过十二个春秋，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漫长历程。

(三)

我们到达皖南岩寺，其他几个支队也先后来此集中。我们在和各地来的同志交谈中，得悉全军一些组建情况。新四军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在南昌成立，经过和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李一氓为秘书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为加强党的领导，党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局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军分会，项英为东南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新四军当时编为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一、第二两团，共二千三百多人；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栗裕，辖第三、第四两团，共一千八百多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五、第六两团，共二千一百多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七、第八、第九三个团，共三千一百多人；军直属机关部队约千人，全军共一万零三百多人。

直到四月，除第四支队开赴皖中舒城地区集中外，第

一、二、三支队先后集中于歙县岩寺附近的潜口和西溪南村一带。四月四日，军部也由南昌移来岩寺；五月五日，移到太平县马村；二十六日移到南陵县土塘；七月一日，移到泾县云岭罗里村。军教导总队进驻中村。教导总队长由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总队政治委员由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任，教育长冯达飞。教导总队下设训练、政治、队列各处。训练处长赵希仲（皖南事变时叛变）、副处长薛慕桥，政治处主任余立金，队列处长张元寿。此时，军部指示，将第一、二、三支队的宣传队集中成立战地服务团，直属政治部领导，驻地在军部附近的新村。服务团团团长朱克清、副团长谢云辉，秘书长徐平羽，支书章蕴。服务团下设戏剧、音乐、宣传、民运等。由于服务团大多数成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还有菲律宾华侨战地服务团回祖国参战。如胡明、张伟烈、洪琪、沈柔坚、许寒冰、马廉芳、何士德、谭雨文、叶明、金涛、金文祥、邹少华、赵亚等等，有许多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受到锻炼和考验，后来成为我党出色的领导干部和各条战线的专家，但也有不少共产党员献出了年青的宝贵生命。根据上级要求，当时服务团的主要任务是：一、了解当地政治斗争和群众抗日救亡活动情况；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主张；三、组织、动员各界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服务团在活动时，多采用戏剧、歌唱、绘画等形式，生动活泼，别具特色，颇受群众欢迎，效果良好。

五月，正是皖南山花烂漫的季节。这时，我们服务团的部分成员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翻山越岭，晓行夜宿，沿着黄山山脉向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每到一个山村，大家自觉

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和贫苦农民促膝谈心，广交朋友，有的还帮助老百姓劈柴担水，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群众无不夸赞。走了好几天，登上了黄山。时值初夏，气候变幻莫测，一会万里晴空，骄阳如火；一会烟云密布，大雨如注。大家抓紧时间，洗了个温泉澡，还痛快地饱览了奇松、怪石、云海、温泉的黄山风光。面对祖国大好河山，大家增强了抗击日寇、保卫祖国的坚定信念。

我们在黄山作了短暂的逗留，便返回汤口驻地。有天我和服务团部分同志作为先遣队，为了防空作伪装，爬上一座陡峭的石壁上采摘竹叶。我由于攀折高处竹叶，用力过猛，手臂脱臼，一阵疼痛，无法下来。这时，屈再之几人走过来，说：“你们赶快下来，部队要开动了。”我要屈再之找来一根竹竿，用左手撑着竹竿，随时将竹竿往下抽。我忍着疼痛跳到公路上，又背起背包前进，到了谭家桥已走不动了。张伟烈、胡明是收容队的，他们走过来，问我：“你是先遣队的，怎么掉队了？”我说：“手臂痛得很。”胡明托起我的右手臂一看，说：“啊，脱臼了！”他连忙取下我的背包，放在石板上，让我坐着歇息一会。正巧，一辆上海煤建公司老板的汽车打面前经过，胡明把车拦住，要我乘车去太平县城。

太平县城是一座四面环山的小镇。我下车没走几步，即来到大街当中，正想去询问军政治部机关，这时迎面走来一位眉清目秀、戴着眼镜的干部，他见我手臂缠着绷带，便详细问了我的姓名以及受伤情形。他又鼓励我一番，掏笔写张字条，叫我赶快去五十军医院治疗。接过字条，这才辨认出，他就是袁国平主任。五十军原是川军，非国民党嫡系部队，

对我们新四军战士治病给予方便。我左手臂受伤期间，有机会得到袁国平等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教诲，确是意外收获啊！

不久，从上海、江西和菲律宾等地来的进步青年，全编入战地服务团，共有二百多人。军部领导同志十分重视这个服务团的作用，非常关心每个人的成长。我记忆中印象很深的，我们和李乐山在泾一区工作时，有次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通知李乐山和我，回军政治部汇报开展群众工作情况，李乐山当时讲了一些工作过程，流水帐式地叙述召开一些会的情况，又说人手不够，要求增加人员。邓子恢先是耐心听取汇报，忍着性子来回踱步。当李乐山汇报完毕后，邓子恢说：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抗日战争，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其主要力量源泉来自什么地方呢？毫无疑问，来自人民群众之中。群众力量是支持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保证。你们只知道开这个会，那个会，当然也有必要，但一切由你们自己包揽，这能行吗？你有几个李乐山？有一百个李乐山也不够用。希望你们眼睛向下，依靠群众，培养地方干部。只有这样，革命工作才能扎实而持续地开展下去。否则，你们这边打背包一走，那边工作就会垮下来。他的一席讲话，使我们顿开茅塞。后来，无怪人们都称赞邓子恢是群众运动专家。

从此，我们服务团成员陆续分到地方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东南局设在丁家山，由项英任书记，曾山为组织部长，陈丕显任青年部长，李坚贞任妇女部长，温仰春任秘书长。皖南特委，因谭启龙到延安学习，即由李步新任特委书记。泾县县委书记为方向明。从斗争策略考虑，党组织均未公开。

工作队队长金文萍、李乐山先后离开，我们仍在泾一区的田坊、孤峰、童家畷、下坊、上坊、风坑、蔡村、泾县县城一带开展活动。为便于工作，我带领工作队并兼任那里的分工委书记。工作队队部住在田坊，这村子很小，但交通方便，有条大路直通泾县县城。这对我们了解情况较为有利。工作队进入泾一区后，田坊一带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成立了农抗、工抗、青抗、妇抗各种群众组织，抗日运动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但在这时，工作队内部却发现问题。有次，军政治部要我们把泾一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情况作一详细调查，并用表格形式上报军部。当时，在下坊工作的队员陈潜自告奋勇担任这一任务。陈潜将那分复杂而详尽的表格划出填好后送交军政治部，经有关同志阅看，认为划出这种表格，如没有经过特种训练，是不可能制成和填写的。于是，便将陈潜夫妇调回服务团，经过审查，他俩原是一对假夫妇，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分子。军政治部很快将他俩遣送走了。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为了在泾县县城找个立足点，便于掌握动态，我们确实费了一番苦心。县城里人地生疏，难以插足，后经一段摸索，了解到风坑农抗会负责人王树森与泾县东亚印刷厂的老板很熟悉，他的弟弟是青抗会主任，当即派王树森的弟弟去印刷厂，接洽印刷各抗敌协会会员证，再见机行事。

王树森的弟弟没有推辞，陪我去东亚印刷厂。在一个漆黑的房子里，老王作了介绍，双方寒暄几句，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这次来印各群众团体会员证，想来做笔生意，不知你能接受吗？”

那位老板说：“我开的是印刷厂，只要是印刷业务，我都敢接！”

我拿出农抗、工抗胸章式样，指给老板说：“这个你敢印吗？”我边说边观察老板神态。

老板很高兴，笑着说：“你们是新四军，我不怕，我敢印！”

我们和印刷厂的老板一见如故，生意很快谈妥了。

后来，我们常去东亚印刷厂联系工作，往往还被留宿在厂子里。时间长了，我们谈话内容逐渐广泛，也很融洽。前些日子田坊一带散布攻击新四军的流言蜚语，从老板口中得知，其根源在于茂林动委会里少数国民党顽固分子派遣特务制造的谣言。国民政府给新四军全军的军饷共十三万元，而它在茂林的特务费用也有十三万元之多，可见，顽固派妄想把茂林建成为反共的大本营。

那时，泾县国民政府民政科长程本海，是绩溪人，曾在我的家乡百侯中学当过教师，过去我们就很熟悉。于是，我决定以看望母校老师的名义前去拜访，藉以摸摸底细，了解情况。我在县政府找到程本海时，他异常高兴，热情地让座看茶。未待我开口，他突然说：“你来正好，听说你在田坊一带工作开展得不错，本县王县长正想看看你哩。”

王县长四十开外年纪，有点道貌岸然，和我一见面就示意，他喉头有疾，不能言语，但能以书代言。开始，他让我向项英副军长和袁国平主任传达他的问候，接着他对田坊区抗日活动讲了赞扬的话，说我们是有为的青年，进而又恭维一番。我乘机回答说：“王县长过奖了。在大敌当前的时刻，我们在田坊做的事情，都是每个中国人应尽的爱国行

动，毋须挂齿。只是近日确有传闻，茂林动委会主任当众造谣，诬蔑新四军是苏联的走狗。不知县长阁下耳闻没有？对此又是如何看法？”

王县长连忙捂住喉头，故作惊讶之状。我接着说：“王县长，既然有人说新四军是苏联的走狗，那么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武器交给了谁呢？不是交给了国民党吗？今天，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而苏联站在正义立场上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如果按照顽固分子的逻辑，国民党不也是苏联的走狗吗？”王县长只是嗯嗯啊啊。我进一步提出：“县长阁下，对于顽固分子诬蔑新四军，破坏国共合作，请予以追究，严惩不贷！”

王县长显得有些不自在，终于开了腔：“不，这可能是误会，我一定追究，一定追究！”事后听说，那里的顽固分子一度确有收敛。以后又知道王某是叛徒。

然而不久，离田坊不到十华里的郎坑村竟发生了一起泾县国民兵团破坏群众抗日运动的严重事件。郎坑、田坊一带，农抗、工抗发动群众，开展借粮、罢工斗争，群众抗日活动蓬勃兴起。但是，当地土豪劣绅和乡长勾结县国民兵团，公然派兵干涉，甚至扬言要采取镇压措施。广大群众见此情景，愤起反抗，于是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这时，国民兵团一顽兵举枪向郎坑农抗主任郎长连射击，枪弹打穿郎的礼帽，险些丧命。群众见了，怒不可遏，一哄而上，包围了开枪的顽兵，缴下了两支驳壳枪。县国民兵团随即调来了援兵，驱散了群众，抓走了郎坑农抗会主任郎长连。双方斗争处于紧张时刻，我突然接到由林芳转来曾山的指示，要我火速赶到出事现场，平息事端，解决问题。当我赶到郎坑、田

坊，那里的农抗会正动员群众纷纷上山，准备同国民兵团决一死战。我按照上级指示，向群众指出，若与全副武装的国民兵团决斗，我们肯定会吃亏的，必须通过谈判去解决。随后，我奔县政府，寻找程本海，请他通告县长，出面谈判解决事端。

县政府也怕将事态闹大，不好收拾，立即制止了国民兵团的武力行动，并同意双方在田坊乡公所进行谈判。参加谈判的有国民兵团团长、田坊乡乡长，群众有郎坑、田坊的农抗会负责人。我作为军部派出的调解人主持双方谈判。但会谈还未开始，群众纷纷聚来，将乡公所围得水泄不通，口号震天价响，只听：“无条件释放农抗会主任郎长连！”“惩办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顽固派！”国民兵团团长见群众如此声威，面有惧色，要我先提出一个方案来。我征得双方同意后，即提出三条：一、立即释放农抗会主任郎长连；二、国民兵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破坏群众抗日活动的案件；三、农会缴去的枪支交还国民兵团。由于提出的条件合情合理，双方均无异议，谈判遂告成功。但是，当我将谈判条款正本呈送曾山时，却发现了问题。曾山指着条款，严肃地说：“老杨，这条款双方均未签字，日后不怕他们赖帐吗？”我一看果然不错，一阵脸红发烧，悔恨不已。第二天，我想个法子，到田坊召开了群众庆祝谈判成功大会，特别邀请国民兵团团长届时出席讲话。因为谈判成功是双方的事，他又不好拒绝，便由乡长陪同来了。我们摆出签到簿，让他们隔两页签字，他丝毫没有介意，果然同乡长一起签上自己的名字。会后，我们就将谈判条款写在签到簿签名的前面，自己和农会负责人也签上名字，料他们再也抵赖不掉了。事后回忆起来，

那时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这样做，也是件可笑的行为。

后来，我调到军部协理处工作，在那里有机会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知识。尤其是在云岭祠堂里听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宣教部长朱镜我讲联共党史，薛暮桥等讲解的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内容相当丰富，感到特别新鲜。革命真理象乳汁一般哺育我们这些年青战士健康成长！

一九三九年初，我和张祖尧奉命带着服务团第四队，深入日寇占领区的沿江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我那时在队里负责保卫工作。我们到了铜陵县的凤凰山，那里的许多房屋被日寇进攻时烧成废墟。当时，由张东和青抗会主任周坚凯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们说，敌占区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一经发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各抗日协会纷纷建立。他们采取各种合法的和非合法的斗争形式，同日寇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如减租减息，抗捐抗税，破坏交通，搜集情报，支援和配合新四军进行反侵略战争。还谈到新四军一团团部住铁丝网的情景。一九三八年冬，一团深入铜陵前线，傅秋涛指挥部队，经常向铜陵县的董家店、朱村、顺安一线的敌人据点进击。那时，朱村驻日军一个大队，几乎每天都派小分队向周围的杨家垄、埂塘、盛家桥、顺安等地扫荡。我一团经常派侦察部队袭击朱村，击毙敌哨兵，缴获枪弹，但敌人很狡猾，利用大树林，把哨棚搭在大树上。有一次我侦察战士摸哨，就是遭到敌人从树上射来的子弹击中，牺牲了几个战士。为了狠狠打击朱村敌人，一团派出小部队去袭击顺安，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在距离朱村不到五华里的杨家垄设伏，朱村日寇派

一个中队去增援顺安的途中，我突击连首先在杨家堑伏击圈内作短距离突袭，手榴弹一排一排地在敌人身边爆炸，顿时敌人死伤一片。时值冬日，日军都穿着黄大衣，恰是我们追击目标，战士们情绪高昂，“活捉鬼子”的呐喊声震撼山谷。有个日寇腹部打穿了，躺在地上装死。当部队前去搜索，他爬起来挣扎，但马上被涌上来的几个战士按倒，捆绑住送军部医院治疗，这是我一圈第二次活捉日寇。第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秋，一团侦察排长周长根，在王村活捉日寇分队长山本，一时传为佳话。

我们服务团一行，在了解一些情况后，我带了一个小队到下楼铺附近的姚家村，住农抗会主任家里。不久，我和小李去陈山冲刘永杰那里了解敌情，便在雁门萧村农抗会萧主任陪同下，化装到顺安镇去侦察。镇子上经过敌人洗劫，什室九空，满目萧条，许多房屋被敌人烧毁后，留下断垣残壁，还有被敌人奸淫过而遭杀害的妇女遗体。此情此景，令人无比悲愤。我们还没有离开镇子，长龙山的敌人据点又派巡逻队来镇上骚扰。萧主任是个天主教徒，他领我们躲进天主教堂，倒也安然无恙。午后返回姚家村，向大家叙述一下见到的惨状，激起了广大指战员满腔怒火。

那时，丹凤乡公所设在姚家祠堂，乡长就是农抗会姚主任的堂弟，此人反动，到处阻挠各抗日团体的抗日爱国活动。我们就发动群众，同顽乡长开展说理斗争，用群众力量制服他。从此，那里的减租减息、借粮斗争，才得到顺利开展。就在我返回部队不到一个星期，日寇纠集一个联队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团部铁丝坞进攻。我首先以小部队在郎坑一线阻击敌人，并在铁丝坞、陶村一带布下了袋形阵地，诱敌深

入，再行歼击。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三时，非常激烈。敌人还出动飞机助战，由于找不到目标，即向凤凰山周围丛林中盲目投弹。我们动员和协助一团非战斗人员和群众向何家湾撤退，我服务团人员也到新屋岭岭头止的一户人家休息，我亲自为大家做饭。同志们高唱战歌，坚信这一仗能取得胜利。下午三时许，前方传来捷报，击毙击伤敌人三百多人，缴获甚多。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声震大江南北，部队转到三条冲还开了祝捷大会。我随部队在三条冲、九榔庙一带活动一段时间，不久就调回军部协理处工作。

就在一团对敌战斗的捷报声中，在南陵丫山一带进行战斗的老三团一营也传来了胜利的消息。当日寇攻占川军五十军在陈家大山的阵地时，为了配合友军作战，我一营向青阳丁桥一线进攻的日寇猛烈袭击，敌军伤亡惨重，川军阵地失而复得。五十军对一营深表感谢。我们也因此与川军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后来一团调回军部附近的土坑、杨村、洋潭、左坑一带。铜青南一线由老三团接防，巫希权、萧须知等，均来到铜青南前线活动，与三支队在繁南铜地区联成一片。老三团在周桂生、黄火星等领导下，发展很快，在皖南事变前夕，扩大为两个团的建制。

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新四军三支队在谭震林指挥下，在日寇统治下的繁昌境内取得了七次保卫战的胜利。前三次，日寇于十一月七日、十三日、二十日，共集中三千多兵力，向我根据地和游击区进犯，并一度占领了繁昌县城。但遭我三支队五团、六团的阻击和伏击，经过峨山头搏斗、汤口坝血战，击毙击伤日军八百多人，收复繁昌县城，取得战斗的辉煌胜利。后四次，日寇于四月二十日

集结五千多兵力，由湾沚、黄墓渡沿青弋江攻占南陵，二十五团分兵二千侵犯三里店。一支队傅秋涛副司令员率一团，占领父子岭有利地形，埋伏袭击来犯之敌，经八小时激战，共杀敌五百多人，击溃敌之一部，敌另一部八百多人，翻汀潭，越小岭，侵占泾县县城，国军五十二师在泾县落荒溃逃。我军在叶挺军长指挥下，大败日军。当时，叶挺率领程业棠的警卫营，渡过青弋江，收复泾县城。与此同时，敌十七师团步骑兵四千多人，为配合侵犯泾县之敌，大举向繁昌、南陵攻击。我三支队五、六团指战员，于四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五月三日，分别以设伏、侧击等战术，多次反复冲杀，重创日寇，取得繁昌保卫战的七战七捷。新四军政治部编写了《繁昌之战》、《反扫荡》等抗战歌曲，吴强还创作了《繁昌之战》话剧，陈毅观看了话剧的演出，称赞不已。在繁昌中分村召开的数千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上，谭震林司令员和许多领导同志讲了话。

解放后，谭震林在他的回忆中曾经写道：“繁昌之战是我们新四军打的很硬的一仗。繁昌战役中主要是两仗，一是峨山头战役，一是汤口坝战役。日本人就凭他那个小炮，也不一定打得准。他打炮时你别动，等他的人上来的时候，你就用枪打，他在明处，你在暗处，很好打。……七战七捷的最后一仗，是叶挺同志亲自指挥打的。”谭震林最后赋诗一首：

抚今忆昔心潮涌，七战七捷记犹新。

繁昌人民立丰功，患难与共情谊深。

繁昌七次保卫战大捷，父子岭战斗的重大胜利，保卫了繁昌、保卫了泾县、保卫了皖南，粉碎了日寇侵占我根据地的罪恶计划，戳穿了顽固派制造的“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澜

言。事实说明，我军在皖南坚决执行抗日建国纲领，与日军浴血奋战，保卫东南半壁河山，尽了应尽的职责。这就提高了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威信，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那时间，根据地和游击区人民群众自发地杀猪宰羊，犒劳人民子弟兵，广大青年纷纷要求参军。而国民党政府为了限制我们发展，说什么壮丁是他们的，不准我们动员青年参军。我们根本不理那一套，许多同志看到青年抗战热情，便要求就地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但军部害怕国民党当局说我们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正规化”为借口，不敢放手扩军。当时，从前线溃逃的国民党军队士兵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也硬要送回国民党原部队，并指责正确执行党的建军路线为“人枪款主义”，致使不少同志感到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很是丧气。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指示中说：中央曾要你们在今后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丧失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直到后来才知道，这是项英违背中央发展十万人枪的指示，受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影响，犯了“精兵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新四军进入皖南后，没有尽可能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类学校，大批培养干部，因此没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样，当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推行他们“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公然杀向我新四军的时候，我们处于孤立的境地。

第二章 皖南突围

(一)

国民党顽固派头子经过长期谋划，一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发生了。皖南事变前，德、日、意三国于一九四〇年九月订立军事同盟，国际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变化。日寇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侵略行动，准备向太平洋扩张，以巩固其南进后方，便向国民党加紧诱降。而英、美帝国主义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得不增加援华贷款，力图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头子认为时机已到，遂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皓日），国民党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竟然诬蔑坚持华中抗战的我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我军在一个月內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妄图实现配合日寇消灭我军的毒辣阴谋。在这同时，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部等近三十万人马以及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正向华中和江南大举进攻。

我党中央针对以上情况，于十一月九日（佳日），以朱

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的名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历述了我军坚持抗战三年，深入前线、抗御众多敌军、收复广大失地的事实，以及顽军不断挑起磨擦和制造反共惨案的行径，驳斥了何、白皓电的反共诬蔑，并表明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我党也作了些让步，同意在适当时机，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到江北。

在当时的严重形势下，党中央又发出紧急指示，号召以自卫战斗粉碎反共军的进攻。为策应皖南部队北移，并命令华北再抽调兵力增援华中。同时，中原局、东南局合并，称为华中局，以加强和统一领导，应付突然事变。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要求新四军于本月底全部北移。但由于项英迟疑，以致坐失良机，蒋介石利用这个时间，阴谋布下了大包围圈，发出了“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不仅如此，顽固派还故意泄露我军北移路线，暗示并怂恿日寇，在铜陵、繁昌和无为之间的长江中增加封锁巡逻兵力。这样，反共阴霾笼罩着皖南的天空。

这时，北移的困难虽然增加了，但胜利转移的条件还是具备的。因为当时顽军中有川军、东北军等一些部队，与嫡系部队存在矛盾，特别是广大士兵对内战并不积极，敌顽矛盾依然存在，只要我军突入敌后，顽军即不敢深入，沿江两岸有良好的党群基础，江北、苏南均有我军接应，更主要的是，我近万人的皖南部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有与我们血肉相连的人民群众。但项英没有看到这些积极因素，在严重敌情面前，迷惘自乱，未能下定北移的决心，反而要求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复电中严厉批评项

英：“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当意外之事。……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在中央严厉批评以后，新四军军分会才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了行动的决定。

皖南部队北移路线是经中央同意过的，一条路线是，经过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到竹簧桥、水西地区（原江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到苏北。这条路线沿途设有兵站（马头镇为兵站第三派出所，孙家埠、毕家桥两地流动为第四派出所，竹簧桥附近为第五派出所），每个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事变前，我军有近两千名非战斗人员和大量物资，都是由此经苏南渡过长江，基本上安全到达，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问题。另一条路线是，从铜陵、繁昌之间，直接北渡长江到无为。这条路线，路程很近，地形熟悉，群众条件好，不经过国民党防区。长江以南主要是我三支队和三团的活动地区，长江以北无为地区有孙仲德领导的游击纵队和挺进团可以接应。十一月下旬，军部并派张元寿率领参谋张云龙、周绍昆、唐炎等同志先去无为找船，已经筹集几百条船只可供使用。但项英却不采

取上述两条路线，反而提出所谓“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命令我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于一月四日从现地出发经过茂林，然后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经十字铺，到苏南溧阳竹箐桥地区，待机北渡。显然，这条新的行动路线对我极为不利。向顽后方行动，无异授顽方以进攻的口实；向顽方重兵扼守的地区行动，则是自投罗网。

一场惨痛的流血事件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在皖南大地上发生了。

(二)

当时，皖南部队共九千多人，行动前进行了政治动员和战斗编组。除军直机关部队以外，各支队的番号改为纵队，共编成三个纵队。以老一团（团长熊应堂）、新一团（团长张钰秀、政委丁连章）约三千多人，为第一纵队，亦即左路纵队，纵队司令兼政委傅秋涛、副司令赵凌波（后叛变投敌）、参谋长赵希仲（后被俘叛变）、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前进方向为大康王、球岭线；以老五团（团长徐金树、政委林开风、参谋长樊金华、主任何志远）和军部特务团（团长刘别生、政委张闯初）约二千多人，为第三纵队，亦即右路纵队，纵队司令为张振坤、政委胡荣、参谋长黄序周、政治部主任吴溪如，前进方向为茂林、高岭线；以老三团（二、三两个营）、老三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主任阙中一）约二千多人，为第二纵队，亦即中路纵队，纵队司令周桂生（兼老三团团长）、政委黄火星兼老三团政委、副司令冯达飞、参谋长谢忠良、主任钟德胜，前进方向为凤村、高坦、丕岭、星潭。军直属队及

教导总队约一千多人，在二纵后面行进。

那时，我刚到老三团搞民运工作，北移时，我们编在中路纵队。记得在北移前，我们驻皖南的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组织联欢，亲切话别，发出《告皖南同胞书》，为了团结一致对外，拯救民族危亡，毅然决然地离开那风光绮丽的皖南和亲爱的皖南父老兄妹，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战场，同志们怀着无限依依之情，唱着雄壮的告别皖南的歌子：

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
子弹上膛，刺刀出鞘。
三年的皖南，别了！
目标扬子江头，黄河新道。

.....

我们一定胜利，
我们一定达到目标！

元旦刚过，四日的晚上，我们奉命从南陵与泾县交界的北贡里出发。那是个没有月色的夜晚。皖南山区的深冬格外寒冷，朔风凛冽，砭人肌肤，天上阴云密布，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坎坷不平，稍不留心，就要跌跤。翻过一座大山岭，到达云岭村（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时，队伍以急行军的速度从村旁插过。前面不时传来了“走快点，天要亮了！”“跟上，不要掉队！”的口令，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起伏的山峦向前疾走。天太黑了，谁也摸不清自己走的是什么方向。

天刚拂晓，东方泛起鱼肚白，大地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前面隐隐约约地现出一条大河，队伍停了下来。这时，我们

才知道是到了章家渡。看到同志们的身上都铺了一层白蒙蒙的霜，个个都成雪人儿了。

章家渡在青弋江的上游，因连日下雨，河水猛涨，这里河面变宽了，河水很深，水流湍急。天色已经大亮，后续部队陆续到达，纷纷聚集在河岸。指挥员下令迅速渡河。战士们用美孚煤油桶和木板搭成浮桥。由于过桥人多，浮桥很快就被压断，给河水冲垮了。这当儿，已经上桥的战士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不管气候怎样寒冷，河水多么汹涌，个个脱下棉衣，把弹药顶在头上，枪举在手里，争先恐后泅过河去。

部队迅速地渡过了河。五日的傍晚到达了茂林。

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已久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阴谋终于暴露了。国民党第三战区头子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纠集嫡系部队五十二师、四十师和东北军、四川军等，以后加上两个炮兵旅近十个师，七万多人，从四面八方堵住我军东进北上抗日进军的去路。在茂林南三十多里的铜山，国民党顽军向我先头部队打响了第一枪。

六日下午，军首长在潘村召集各纵队首长会议，决定我们二纵向丕岭进发，经过凤村、高坦、进入里潭仓。沿途重峦迭嶂，地形险要，只有一条狭窄的山路可走。我们二纵老三团三营是前锋部队，由谢参谋长率领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冒雨夜行军，到达丕岭山脚时，天已大亮，一眼向上望去，只见山峰耸入云天，悬崖峭壁，怪石嶙峋，地势十分险要。顽军四十师的一个前哨连盘踞在丕岭头上，构筑野战工事，依恃着险要的地势，封锁着山路的出口。顽军用五、六挺机枪猛然向我们扫射过来，子弹打得石片飞扬，烟尘漫天，使

我们很难前进一步。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达到东进抗日的目的，我们被迫投入战斗。我们三营八连分成两路，一路从正面沿着上山小路迅速猛冲，另一路则从两侧迂回绕上山顶，出其不意地插到敌人的后面，前后夹攻，痛击顽军，一举拿下了丕岭，顽四十师的一个连大部被歼，从而迅速打开了去路。

拿下丕岭后，部队随即往山下冲去。冲到山脚下，前面忽然出现了一条小河，河水向山下奔泻，冲击着两岸的崖石。河上有座木桥，桥下是深潭。对岸顽军沿着山崖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有一个营的兵力防守着。我们老三团三营担任强渡任务。吴营长一面指挥部队，用密集的炮火压制对岸顽军的火力，一面指挥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向桥上冲去。但是，对岸桥头堡内的顽军，用猛烈的炮火严密封锁住木桥，使队伍根本无法从桥上通过。这时，忽然听到对岸轰轰几声巨响，顽军的桥头堡被炸毁了，乌龟壳掀上了天。这是我们一个突击组在佯攻的炮火掩护下，泅到对岸，攀过悬崖，绕到顽军桥头堡的后面，袭击成功了。一阵烟雾弥漫，战士们迅速冲过河去，一举攻克了五百多米高的莲花山，占领了顽军的主峰阵地，打垮了顽四十师的一个团，顽兵纷纷向榔桥河一带逃窜。我们后续部队迅速过河，乘胜追击顽军，冲进了顽军的“心脏”——顽军的一个指挥所，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弹药。在激烈的战斗中，三营营长吴金辉和二营副营长罗爱民先后负了伤。

我们新三团和老三团三营分成两路追击，追了二十多里，一直追到星潭。星潭驻有四十军一二〇团的两个营，依着地形险要，各要道口都配有强火力严密封锁，各制高点也为顽军所

控制。七日中午，军部在丕岭到星潭之间的百户坑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项英主持，讨论如何夺取星潭。叶挺军长决心攻下星潭，继续向三溪、旌德方向前进，并申述只有夺取星潭才有出路的道理。星潭是通向旌德的必经之路。当时的情况是：我军先头部队在星潭受阻，北面顽军已向我逼来，左右纵队都已打响，四面受敌，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将有灭亡可能。我新三团接受了军首长交给的任务，在熊梦辉、张日清和阙中一等同志的指挥下，经过一夜的反复冲杀，八日拂晓前，就肃清了星潭外围顽军，一营首先攻进了星潭。

我占领星潭部队正在巩固阵地、准备继续前进时，突然听到了后撤的号声。起初，大家都不相信，但仔细一听，确实是撤军的军号。后来，我们才知道，我先头部队攻进星潭时，军部在百户坑召开的紧急会议还没有结束，会上争论很激烈。叶军长发言大意是：没有别的路，只有立即从星潭突出去！我是军长，我完全负责。现在，部队经不起拖了，再拖就要垮了！突出去，决不会全部被歼，以小的损失换取大的胜利。要是不突出去，你留在这里，怎样留法？人家不让你留，人家要消灭你！会议召开了六个小时，最后还是项英的意见，决定退回来，另找办法突围。

八日，部队又从丕岭向里潭仓、高坦方向折回。我们三团由前锋变为后卫。那时，我负责后梯队，仍在百户坑处理伤员转移。我三营钱营长看到我，忙喊，老杨你还不走，部队全撤了，我们是最后一批。我说，还有几个伤员找不到群众安置，怎么办？老钱马上叫九连战士把所有的伤员抬走。当部队返回里潭仓，向外潭仓、高坦顽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时，叶挺军长威武地出现在阵地面前。他精神抖擞，向军直属队、教

导总队和三团的干部、战士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人民的武装。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国民党顽固派卑鄙无耻，他们不打鬼子，反来打我们，阻止我们北渡长江。……同志们！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献身革命的时候了，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

叶军长慷慨激昂的讲话，激励着每个战士的心，尤其是他最后那句话，成了全体指战员向党、向人民的誓言。大家抱定一个意志：不管顽军如何毒辣，多么疯狂，我们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一弹，也要为部队东进北上抗日打出一条路来，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在里潭仓找到地下党员邓相成父子，动员群众迅速安置了伤员，接着从高坦冲进石井坑。奉上级命令，在这里固守待援。军长命令各团把守山头、岭口，掩护休整，并要各单位收容失散人员，要我们做好群众工作，购买猪、牛肉和粮食，使部队吃一次好饭。军长又怕士兵没有力气突围，命令把马宰了吃，首先命令宰他的马。这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又从浙赣线调来两个炮兵旅，包围圈愈来愈缩小，我们活动的范围被压缩在百多户的石井坑一带，方圆不到几华里的地面和山头。

从山顶上一眼望去，只见石井坑周围的村庄沉没在一片火海里，群众扶老携幼逃向深山密林，惨叫哀号，哭声震野……国民党顽固派效法日寇，灭绝人性地施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种罪行使全体指战员莫不义愤填胸。

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有时是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

斗。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候，连队的同志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大家把随身所带的银元，一齐拿出来，当国民党顽军向我们阵地进攻时，就将银元向顽军撒去。那些顽兵见到白花花的银元，一窝蜂拥上去抢。有的为了一块银元，竟没骂厮打起来。我们便乘机发起冲击，打垮了敌人，缴获了不少枪弹，补充自己。

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虽然情况非常紧张，但当地群众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不断地把埋藏在山里的粮食送到我们阵地上来，并忙着给我们烧水、做饭，把茶饭送进战壕。

十三日，上官云相命令顽军向我发动第三次全面总攻，东流山的战斗非常激烈，从茂林方面用大炮猛轰东流山，山上的树木燃烧，成了一片火海。这时，只有东面的阵地仍为我三团所控制。同志们英勇顽强与顽军展开肉搏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顽军的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东流山失守，东村岗、白山以及我主要阵地相继失守。在东流山战斗中，我工兵连的战士几乎全部牺牲。迫于这种形势，黄昏时，军首长决定各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经铜、繁到皖中。

晚间，全线开始突围了，天上乌云滚滚，狂风在谷山里怒吼。激战之前，一切都显得异常的寂静，阵地前偶尔传来一两声枪响。同志们都屏住呼吸等待着冲锋的号令。忽然叭叭两声枪响，接着四下的枪声如暴风骤雨一般震撼着大地。石井坑周围顿时火光冲天，蔚蓝色的曳光弹象流星似地一颗颗从人们头上掠过，炮弹嗷嗷地飞来，在人们身前身后爆炸，喊杀声震动山谷。我先头部队象一股暴发的山洪，从山

上冲下，突出了石井坑口子。但没有冲出多远就给顽军打乱了。我们后梯队和先头部队失去了联系，被阻在大康王前面的山岗上。文工队长邹少华在安置伤员时被炮弹打中牺牲了。

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在突围时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在战斗中被冲散了，警卫员王保实也和他失去了联系，牵着一匹马在四处找他。可是，漆黑的夜里，什么都看不清，只有偶尔通过炮弹爆炸的光芒，才能隐隐约约地见到人影。那时，王保实为找不到首长而焦急。忽然前沿阵地上传来“共产党员冲啊！”“冲上去啊！”的喊声，从这声音里我们分辨出有李步新，便马上要王保实迅速跟着声音冲上前去。

这个夜战却象恶虎一样吞噬了许多优秀儿女。我们在漆黑的大山里转上转下，很多同志的鞋子掉了，脚上磨得血肉模糊。同志们互相照顾着，上坡下坎，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有的负了伤，别的同志就扶着或背着他走。革命的阶级友爱紧密地联系着战斗的人们。

我们突出了大康王的山口子。黑夜中在大山里同顽军周旋，激烈的战斗使大家迷乱了方向，转了一个通夜，转得精疲力尽，也没有转出去。天快亮了，我们蒙蒙眈眈地望见前面的山坡上有十几匹马，以为是自己的队伍，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就往山上跑去。一会儿天大亮了，我们抬头一看，只见山头上全是顽军。激烈的遭遇战又开始了。在这十分紧急的时刻，我和三营副营长林高锋、教导队的教员甘仲儒掩蔽在一块石壁后面，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我当时提出冲到茂林附近的铜山一带，找地方上的党组织，就地打游击。大家一致同意，林高锋同志也不迟疑，传出口令，就带

着队伍往山下冲去。山势很陡，石头很多，处长着荆棘，同志们的衣服被磨穿撕破了，手脚也刺出了血，还是一股劲地往山下冲去。

冲到山下一座古庙旁边，部队又被打乱。突然一颗冷弹飞来，林高锋同志牺牲了。我们含着泪拿起他的枪，继续往外冲去。约莫冲出一里路的光景，冲到峡山口附近，敌人的机枪严密地封锁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子弹象穿梭一样，瞿瞿地在四周飞流。有的战士想进入丛林中去隐蔽，当时我们喊道：“同志们冲啊！冲出去啊！死不投降，死不当俘虏！”接着，大家一拥向山口冲去，但被顽军密集的火力打了回来。这时，我们只有三十多人，为了避免伤亡，就分成两个组，我和六队指导员各带领一个组，采取分组掩护、各个跃进的办**法突围。当顽军的机枪达达达的响声一停，我们就一个个地冲过去。冲出口子的同志马上掉转头来向敌人射击，掩护后面的同志冲。我们就这样突破了敌人的封锁，冲出了峡山口。**

冲出口子以后，看到顽军在两侧的山坡上都挖好了工事，如果走山路，很容易受到顽军袭击。因此，我们改变了主意，顺着田畝的大路前进。走不多远，看到右前方半里外的山岗上几棵高大的松树下，有一些人在活动，其中有几个穿着深蓝色的呢子大衣。开始以为是我们服务团的同志，大家脚步加快了。可是，当我们走到正面，仔细一看，才知道是顽军。这时，顽军的机枪已经向我们扫射过来，大家马上就地卧倒，伏在路旁的沟边上。我身边的小李同志眼明手快，端起冲锋枪就达达达向顽军扫了一梭子，把顽军的机枪射手打翻了，机枪成了哑巴。我和陈梦如、小李几个人便乘

势越过水田，向顽军猛扑过去。顽军见我们冲了过来，慌了，胡乱地扔了一排手榴弹，有一颗落到我的身旁，但是没响。我们冲上了山岗，顽军逃跑了，我们立即进行搜索。当搜索到一座小山庙附近时，李步新和他爱人马惠芳，还有警卫员王保实，突然从竹丝丛中冲了出来。李步新一见到我们，便喊道：“老杨，川军垮了，赶快冲出去！”这时，他的腰部已经受伤，仍和大家一起冲杀。

我们会合后，整顿了一下队伍。看到顽军遗弃下不少子弹，我们就拿来装备自己，然后从小山神庙后面插出去，顺着田埂，朝着章家渡河边的后山村进发。

大约走了七、八里路，正好走到顽团指挥所的旁边，于是战斗又开始了。顽军一个连从松林里斜插过来，企图阻击我们。顽军刚插出松林，队伍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李步新指挥部队迅速地迎击上去，投出一排手榴弹，炸倒了几个顽兵，打乱了他们的部署，我们乘胜杀开了一条血路，突破了重围，继续向后山方向前进。

(四)

快要过春节了，一路上，见群众的门前和院子里晒着冬米子和一些准备过年的东西。同志们虽然几天没吃饭了，肚子都饿得咕噜咕噜地直叫，可是谁也没有动群众的一粒冬米子。群众看到我们这样，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傍晚时分，我们到了离章家渡南岸十来里路的后山。这里是章家渡河的下游，河面变宽了，有二百米，最宽的地方约一里，水势急湍，在河心里形成了一座沙滩。两岸一片紫

竹林，落了叶的枫树挺立着。太阳快落山了，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我们一到河边，静溢就被打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对岸枪声响了，后面的顽军也紧紧地追了上来。两边的枪声连成了一片，子弹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打得竹叶子漫天飞舞。归巢的鸟儿被惊散了，扑腾着翅膀在天空上回旋，发出啾呀啾呀的惨叫。这时，我们已陆陆续续地聚集了百余人，被阻在河岸上，大家一时失去了主张，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紧急关头，李步新赶到了。他马上向我问道：“老杨，你看怎么办？”我说：“只有冲过河去！”他接着斩钉截铁地说：“对，冲过去才是出路！我们要迅速组织短武器冲锋强渡。你马上找几个同志，我来跟他们谈谈。”在这种情况下，一分钟也不能等待，我当即找到了保团的警卫排长、特务团指导员等几个熟悉的同志。李步新向他们作了简短有力的讲话，并指定由保团警卫排长指挥队伍。警卫排长身体魁伟，长得很结实，两眼炯炯闪光。他听了李步新的讲话后，就纵身跳到一块大石头上，举起驳壳枪向队伍高声喊道：“同志们，有短枪的跟我冲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这时，十多个有短武器的指挥员和战士都自动站了出来，组织成一支突击队，领前打开道路。这当儿，河坎上的同志们紧跟着纷纷地跳下河去。顽军的火力更猛了，十多挺机枪一齐向河心扫射过来，子弹象雨点似地打得水花直溅。有的同志因为冲得过猛，下河过急，没来得及注意水的深浅，纵身跳下去就淹没了头顶。后面的同志迅速地搀起，手拉着手，一起冲向顽军。顽军慌了，掉过头去撅起屁股就逃命。后面追来的顽军赶到河边，眼看我们过了河，就在岸上放了一阵空枪。

我们过河以后，走进了离马村约七八里的一座山旁的村子。这个村子并不大，约有二十来户人家，大多是些破瓦房子。走进村里，只看到一些女人、小孩和老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青壮年全叫国民党军抓走了。我和李步新等走到一家门口。刚进屋时，一个老太太手里端着一盏油灯，一看到我们进来，开始有些惊慌，后来看到我们态度很和蔼，才走上前来，从灰色军服的臂章上看出了我们是新四军，心里顿时明白了：这不是菩萨军吗？于是就亲切地招呼我们：“快坐下，坐下歇歇……”她一面说着，一面放下手里的油灯，搬来了几条凳子，拉住我们的衣袖，要我们坐。当她一抓住我们的衣袖，发现我们的衣服全湿了，就惊讶地说：“哎呀！衣服全湿啦，天这么冷，快生火烤烤！”她就急忙忙地跑到门外搬进来一捆柴，放下了，又去找火，殷勤地忙个不停。她用草把点着了火，就骂开了：“那些黑了心的国民党，不打鬼子，专打好人，真该千刀万剐……”大家正准备坐下来烤衣服，一个同志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来报告，说在村里捉到了一个俘虏。我想，既然在村上捉到了俘虏，这说明附近一定还有顽军。我们叫他把俘虏立即带过来，经过审问，知道是川军新七师的一个营部副官，到村上来搞粮食，被我们俘获的。我问他：“我们是抗日军队，你们川人出川也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要打我们？”他惭愧地低下了头。等一会，抬起头来向我们诉说，他们是出于无奈，完全是被迫来作战的。最后，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情报，说他们的营部就住在马村，叫我们赶快离开这里。经过了一番教育，正准备把这个俘虏释放时，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同志们迅速地从小屋子里冲出，同顽军接上了火，顽军从两侧包围过来。

我们一面打，一面向东北方向突击。

正在这时，一位老大爷气喘喘地跑过来说：“同志们！顽军围上来啦，快走吧！”说着，他一挥手：“前面不能走，后面有路，跟我来！”我们一百多人便跟着他从村后上了山，一连翻了五、六个山头，一直跑到南宝村后面的一个小村子，老大爷才回去。我们万分感激这位老大爷，向他招手致谢。

我们几个人同李步新在一起，因他身负重伤，行动不便，所以走得很慢，跟部队拉下一段距离。当我们在下山坡时，隐隐约约看到山脚下部队集中了。当我快跑下去，部队已经分散了。待李步新下来时，我们走进村子，只见一片断垣残壁，村子里的房屋大部分被敌人烧毁了。月光下，我们看到一垛倒塌的墙角里有个黑影在闪动，一位老大娘手里拿着棍子在灰烬里翻拣东西。马惠芳走上前去一看，原来是张小苟的母亲，便轻声地喊道：“张大妈，你还认得我吗？我是马惠芳。”张大妈听到这熟悉的名字，慌忙站了起来，将信将疑地打量着，当她看出是马惠芳时，便呜呜地哭着诉说：“前天，国民党兵一进村子，便逐家挨户翻箱倒柜，把东西都抢光了……”她停了一下，接着又说：“那天，村子里的人知道他们要来，都在家里收拾东西准备逃进山里，可是没想到来得那么快。国民党兵一进村子，大家感到突然，有許多人没有跑掉。他们见人就抓，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村里有三个新四军家属被活埋了。六十三岁的老党员陈老爹，被他们把胡子一根一根拔光后，^①绑到树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西屋里王二婶被顽军轮奸后，割掉奶子，扔进河里。她的十四岁女儿也被糟塌后用刺刀刺死。最后，顽

军一把火烧掉了村里的房子。我的小苟子被抓走了，至今生死不明。”说到这里，张大妈已哭得失声，我们都流下了热泪。

马惠芳一面安慰着张大妈，一面给她擦去了眼泪，然后轻声地问她村里干部的情况。张大妈指着附近的一条山洼，说，妇抗会主任就在那里。她把我们带进山沟，妇抗会主任一见马惠芳，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象见到亲人一样，眼睛顿时润湿了。我们安慰和鼓励她说：“这个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报，国民党顽固派欠下人民的血债也必须用血来还！”这时，南宝村的农抗会主任姚成玉也来了。他一见面就焦急地问：“同志，今后怎么办呢？”我们告诉他们：“这次是受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暗算，部队遭到了一些损失，但我们不要难过，要化悲痛为力量，只要我们有坚强的意志，国民党顽固派是消灭不了我们的。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会回来！”

天色已经很晚，月亮高挂天空。他们在沟边铺了一层稻草，让我们躺下休息。不一会，妇抗会主任从别处拿来了一件灰色短袄交给李步新，又拿来几件粗布长袍和短褂交给我们，很关切地说：“快换了吧，周围都到了国民党军队，你们几个人穿着军衣，行动很不方便。”我们接过了衣服，默默无言。

我们脱下了身上潮湿的军衣，换上长袍、短褂，躺到稻草上，感到格外温暖！月亮照着大山，云儿浮动天穹。李步新轻轻地招呼我一声，我移到了他的身旁，共同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没一会儿，两个主任又拎来了一些菜饭，张大妈还送来

了几个鸡蛋给负了伤的李步新。吃过饭后，大家躺在草上，思绪缭乱，心境无法安静下来。夜深了，风在山谷中呼啸，远方传来隆隆的炮声，阵阵的枪响，撕咬着我们的心！我们在默默地悼念着那些牺牲的战友，思索着明天更艰苦的战斗。

大约到了鸡叫的时候，我们起身，准备离开这里。两个主任派了一位向导给我们带路。我们本来想从这里到土塘的一个党员家里暂时落脚，可是因为一连几天的行军和战斗，我的腿肿得老粗，再加上李步新的伤口又疼，所以大家走得很慢，还没到土塘天就快亮了。怎么办呢？幸好前面有一家老百姓听到外面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家主起身从窗口向外探望，看到是我们，就开了门，轻声招呼我们进去，说道：“天快亮了，别走啦，我知道你们是自己人，就在我家住下吧！”我们内心深深地感激皖南人民对我们的关怀，便走进了屋子。

天要亮了，我们发现这户人家紧挨在太路边上，住在这里，白天很容易被顽军发觉。于是，便告辞主人，趁天色还没有大亮的时候马上转移，目标仍然是土塘那个党员的家。

我们踏着朝曦，迎着扑面的寒风，沿着小路走去。还没有走多远，我的肚子突然一阵剧痛，痛得直不起腰杆，两眼发黑，昏了过去。王保实慌忙一把抱住我，马惠芳也跟着跑过来搀着，被两人连扶带架地走了一程，才慢慢好些了。

天大亮了，终于到达了我们要到的地方。那个党员刚刚起身开门，一见到马惠芳（事变前，她在这一带做过群众工作，在他家住过），就知道我们的来意，立即把我们让进屋子，搬来板凳给我们坐。这位党员看上去约莫有四十上下

年纪，虽然显得有些苍老，但还比较结实。他看到李步新受了伤，就要他到床上躺下。李不肯，他就把他扶到床前；然后又忙着去打鸡蛋给他吃。我们又弄了一些盐水，给李步新洗了伤口，帮他重新包扎好。这天，我们就在他家里整整一天没有出门。等到天黑了，那个党员给我们找了一个熟悉情况的老百姓作向导。我们离开了他家，一直向水龙山方向进发。

朦胧的夜色笼罩着山峦，我们一行人踏着山间的小路前进。翻过了几座山头，又遇到了一座大山。越过了山岭，就看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那就是缪家村。李步新告诉我们，铜陵有位青年缪风鸣的家，就在这个村上。于是叫王保实先下去看看。王保实刚要朝山下走时，那位向导向我们摆摆手说：“别忙，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下，我下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说着，他就下去了。我们坐在半山腰等着。这时，月亮忽然被云彩遮住了，刮起了一阵冷风，我们打了几个寒噤。山上的树木瑟瑟地响着，远处仿佛传来了野兽的嚎叫。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向导回来了，他平静地说：“没事，你们下山到村上去吧，我回去啦。”我们一一和向导握手道别，他转身走了。可是没有走多远，他忽然又回转来，轻声地问我们：“同志，告诉我一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并说：“这是全村的人托我问你们的，大伙儿都在盼望着哩！”他恋恋不舍地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听到这几句话，我们有说不出的难过，同时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我告诉他：“请你回去转告大家，只要有老百姓在，就有共产党在，就有新四军在！我们的军队是消灭不了的，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他听了我这番话，非常高兴，眼里充满希望的

光芒，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山顶，沿着来路，走进丛林中去了。

我们下山进了村子，摸到了缪凤鸣的家。他当时不在，他的哥哥缪老大热情地接待着我们。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让我们能很好的休息，他把自己堆东西的阁楼清理了一下，把楼板打扫干净，铺上稻草，要我们住在上面。他看到李步新受了伤，跑到外面买了一只鸡，煨给他吃。他亲自照顾我们的生活，还经常到外面去打听情况。我们就在这里平安地住了两天，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第二天的深夜，他跑上阁楼，慌慌张张地告诉我们，外面的风声不好，国民党顽军已经注意了这个村子。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决定天亮以前离开这里。我将身边剩下的几个零钱给他，他再三推辞，不肯收下，后来我给了他的小孩子。

太阳出山，大自然的一切从睡梦中苏醒，屋檐上麻雀吱吱喳喳地叫着，山上的鸟儿唱着，我们就在这个时刻离开了缪家村。缪老大送了我们三里多路，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指着对面的路说：“没有事了，你们顺这条小路一直走。”我们就顺着他指的小路走了老远，回过头来，还看到他站在高岗上目送着我们。

后来才知道，我们几个人刚出门不远，国民党铜陵县警保队就包围了缪老大的房子，等他送我们回去时，还没踏进门坎，就被警保队逮捕了。国民党特务对他施用严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但他始终没有供出我们的去向，一口咬定自己是清早起来放牛的。国民党特务见逼不出什么口供，也就把他放了。

十八日下午，到了铜陵县舒家店冲口子的叶山冲，从此，

我们算是突出国民党顽军的重重包围和封锁。这里是敌前地区，我们找到了章啸衡同志。这时，军部特务团政委张闾初和参谋长杨采衡同志带一个整连也在叶山冲，并得知新三团二营营长巫希权同志带领了三百多人，从这里经过，到繁昌油坊嘴渡江去了。我们通过章啸衡的关系，同敌后县委取得了联系，由姚志健派了曹尚富前来送我们到敌后，准备从坝埂头渡江。因为这是日寇占领的地区，行动更为不便。沿途日寇的岗哨很多，便衣队到处巡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化装行动，有的赤脚穿草鞋，身上穿着破棉袄，手里拎着一只篮子，扮成农民的模样，有的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手里提着红布包裹，装扮成过年送礼走亲戚的；三三两两地从叶山冲经过潮成涧，到达了新塘湖。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党组织护送。我们从敌前到敌后，穿过了日寇的重重封锁，最后终于平安地到了永丰圩，与铜陵敌后县委书记朱农和陈尚和等会见了。我们就住在日寇据点附近陈村陈尚和家里。我们思索突围时一幕幕情景。当我们冲进石井坑时，中央电示：“命令全军在叶希夷军长领导下，向苏南分散游击出去。”大家认为，当时军部如按中央电示：立即“分散”“游击出去”，不固守石井坑，即使有牺牲，不致于几乎全军覆没。当大家想到这里，无比激动，对皖南人民：产生了热爱和眷恋的心情，对国民党顽固派血淋淋的双手所造成的惨痛的皖南事变无比愤恨，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

我们在永丰圩休息了几天，然后由铜（陵）、繁（昌）中心县委书记张伟烈派人到坝埂头日寇据点附近，护送我们渡江。到了北岸，在无为的江心洲和先突围出来的同志胜利地会合了。

渡江的那天晚上，月朗天青，寒风飒飒，扬子江上，白浪滔滔，浪声伴和着我们的歌声：

别了，三年的皖南啊！
暂时的分离，莫心伤。
中华民族在召唤着我们，
奔赴斗争的最前方。
新世界要在斗争中诞生，
自由的花朵只有在血泊中开放。

别了，三年的皖南啊！
暂时的等待，莫心伤。
且待天明，发出你雷鸣的吼声，
唤起千百万人民，拿起刀枪，奔向战场，
打倒投降卖国祸首……，
惩办“皖变”罪魁……

别了，别了，三年的皖南啊！
胜利在向我们招手，
革命的红旗迎风飘扬，
毛泽东领导我们胜利地前进。
今天，我们分手在黑夜，
明天相见，东方升起了黎明的曙光。

第三章 重返皖南

(一)

正当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年代，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了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我坚持抗日前线的新四军广大将士，忍无可忍，奋起抗击，终因弹尽粮绝，大部阵亡。经过浴血奋战而活着的革命战士们，掩埋好死难烈士的尸体，突出重围，胜利地渡过长江，集中到皖中根据地的无为县境。

我和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他的爱人马惠芳和警卫员王保实等同志也突围来到了无为江心洲。李步新在突围时负伤未愈，又值天寒地冻，无医无药，便住在章啸衡家里休养。从皖南突围出来、在桐东战斗中胸部负伤的吴文瑞住在章的邻居家里养伤。没有药物，我就用盐水替他们洗擦。所用的棉花球是从被子里抽出来的棉絮，纱布是用破旧蚊帐洗洗煮煮制成的。

章啸衡同志，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〇年入党。抗日战争初期，他积极组织抗日团体，动员青年参军，筹经费，搞物资，倾其家产，支援新四军。后被新四军军部委任

为长江司令。章啸衡见治伤无药，便通过关系，买来了一些药物和营养品。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李步新和吴文瑞的伤势逐渐痊愈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钟德胜主任来看望李步新，他一见到我，并征得李步新的同意，要我回部队去工作。我辞别了李步新，来到了泥汊接受新的任务。原新二支队政委黄火星要我带一部分突围出来的连长、指导员到隆兴洲，帮助任惠群、胡一平等地方干部扩建武装，建设区、乡政权。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在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对皖南失散力量，张、邓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目前除过江者外，尚应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中央同时对皖西和苏南方面的斗争方针作了具体指示。尽管中央指示内容当时没有向下传达，但从一些领导同志的言谈中，也能领略到中央决不会放弃皖南这块革命根据地的意图，因此，我们不仅深深感到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的正确，同时也热切希望能早日制定出坚持皖南斗争的具体行动方案。

那些日子，由于我们心情急切，一有空闲就常常跑到江边眺望南岸，惦念着那些在皖南和我们生死与共的首长和战友，怀念着陷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皖南人民，盼望着早日重返皖南，为死难战友报仇雪恨，把那侵占我国土、残杀我同胞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

我们盼望的时日终于到来了。三月初的一天傍晚，团部通讯员前来通知我，说是政委黄火星找我谈话，我很快赶去。黄火星见我来到，热情地要我坐下，又倒了一杯茶送到我手里，接着开门见山地说：“老杨，根据上级指示，决定

派你带一些人返回皖南，主要任务有三条：一是了解皖南敌、伪、顽情况；二是收容突围中失散的人员；三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我接受了任务，临行前，去江心洲向李步新告辞，他反复强调坚持皖南斗争、建立沿江交通的重要意义。临别时，他紧握我的手一再叮嘱：事变后的皖南，敌人会更加猖狂，斗争环境将是非常恶劣的，一定要紧紧依靠群众和地方党组织，提高革命警惕。他还给我三十块钱，作为活动费用。

途中，与巫希权同志巧遇。他是福建宁化人，曾担任过红九团连长。组建新四军后，他担任过新三团二营营长。在皖南事变突围中，他率领三百多人来到江北，被称为“突围中创奇迹的人”。我这次要回皖南，他闻讯赶来，向我说：“啊哎！老杨，你真幸运，又能回皖南去了！”象他这样在皖南出生入死，同皖南人民结下血肉情谊的人，能不向往着皖南吗！望着他那刚毅的面孔，我说：“老巫，我们一定能在皖南见面的！”

他激动地回答：“对，我一定要到皖南去，我们会见面的！”

正当我们接受重返皖南任务的时候，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将原来几个支队改为一到六师，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第三师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第四师由彭雪枫任师长兼

政委，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第五师由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第六师由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参谋长罗忠毅。同时，又命令受中央派遣去江北指挥部工作，仍留在巢湖岸边的曾希圣，就地组建新四军七师。指示下达，军威大振，群情激昂。组建七师的喜讯不仅给坚持皖中斗争的广大指战员以很大的鼓舞，而且使我们即将重返江南的同志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在无为白马洲附近的胡家瓦屋召开军人大会，由曾希圣同志宣布七师成立。七师由曾希圣任政委，张鼎丞任师长，参谋长先为李志高，后为孙仲德，政治部主任何伟。七师一成立，就办了一张油印小报——《战斗报》，印数不多。因为长江阻隔，我们在皖南很难看到。直到一九四二年，皖江区党委成立，便将《战斗报》改为《大江报》，报名还是陈毅给起的，《大江报》刊头也是他书写的。改名后的《大江报》是铅印的四开日报，发行量为五千份。报社社长由皖江区党委宣传部长周新吾兼任，舒文为总编辑。一九四五年，我去区党委参加整风学习，和舒文编在一个小组，他因为担任报社总编，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全国各战场的情况都很清楚，对于我们学习帮助很大。《大江报》内容办得很丰富，形式也很活泼，有转发延安新华社的重要新闻，有国内外反法西斯和抗击日寇的胜利消息，副刊上还发表一些文艺作品，附有插图、漫画，图文并茂，成为鼓舞沿江地区军民的战斗号角。

决定同我一道去皖南的有侦察参谋陈意达和侦察员徐文海等五人。在洲上找到交通站长崔熊，由他安排我们过江。崔熊引我们来到江岸。这里江面较窄，不过四、五华里，天气

晴朗时，南岸景物清晰可见。崔熊指着对岸一棵高大的树干上缚着的挂着一顶斗笠的毛竹竿子，说，这叫做望子，是卖猪肉的标记。望子升起表示有肉卖，望子降下表示没肉卖。那个卖猪肉的人是我们可靠关系，望子也就成了有无敌情的信号。

三月七日黄昏，对岸的望子降落下来，这是平安无事的标记。崔熊便领着我们到了江边，说南岸没有敌情，可以过江了。连我六个人穿上便衣，内藏手枪，来到江边。不料，巫希权同志早已来到江岸为我们送行。任务紧急，没有寒暄。

我们跳上木船，一老一小的两个船家，扬起风帆，向南岸驶去。夜，象一幅黑色帷幕降落下来，掩住了一切。

夜更黑了。船到江心时，掌舵的老船工说，东边出现了乌云，可能要起风，要我们在舱里稳坐不动。不一会，果然狂风呼啸，江涛奔腾，我们的心潮也随着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

深夜，我们到达南岸。按照约定的信号，江南交通站派来接送的同志，很快同我们取得了联系，便带着我们，由紫霄坝穿过日寇据点犁桥，黎明前赶到铜陵县大姚村。大姚村位于长龙山麓的西北角，紧挨东湖。与东湖毗连的有一西湖，西湖后面有一座石佛山，周围有些村落。两湖之间有小河相通，沿湖芦苇成墙。

我们住在交通员老管家里，后发现了敌情，老管立即用船把我们转移到湖内隐蔽。到了晚上，老管送我们到达铜陵县顺安镇附近五华里的铁湖嘴村子，在那里我们会见了敌前县委书记王卓、宣传委员马文杰和地方干部金德培、陶述详等同志，听了他们的介绍，知道江南正笼罩着一片白色恐

怖：革命战士被捕杀，党的组织被破坏，人民遭蹂躏，村庄被烧毁。腥风血雨，乌云蔽天。我们此刻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见面，大家紧紧地握着双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新四军又回来了！”这消息好象希望之火，在群众心中点燃起来，他们奔走相告，向亲友神秘地伸出四个指头说：

“这个，又回来了！”皖南老百姓感到又有扬眉吐气的希望了。

(二)

我们返回皖南，立即与地方党组织和地方干部一起，积极恢复和开辟沿江这块游击根据地。由于沿江地区的地理条件，一方面，日军为加强江防，以确保长江兵员和物资运输畅通无阻，便派重兵驻守；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军为对付我们，也在这一带布兵设防。针对这种情况，上级要求我们，坚持皖南斗争，必须开辟沿江，以沟通大江南北交通，达到皖中和皖南联成一片的战略目的。因此，这一地区出现了极为复杂的犬牙交错的形势。敌伪方面，日寇一一六师团（师团长武内俊二郎）驻扎在安庆。铜陵县城驻一个联队。在铜陵敌顽交界的张家冲，日寇驻一个大队、一个宪兵队和一个警察所，顺安镇驻一个中队；长龙山、狮子山、天宝乡的老鸦岭、天坪山、董家店，青阳县境的茗山冲、陈家大山脚下的驼龙村，沿江的大通、羊山矶、扫把沟、坝埂头到繁昌的荻港一线，都设有据点。伪军吴智和的兴亚大队驻在董家店、大通、羊山矶，凡是敌人控制的地区，都建立了维持会。国军方面：川军一四四师驻守在舒家店、凤凰山、下楼铺、陈山

冲、郎坑、甘家冲和丁桥一带，铜陵县国民政府设在三条冲，繁昌县国民政府设在铜繁交界的赤沙滩的八分徐村。顽方县以下成立警保队和清乡队等武装组织。

我们的力量：敌前县委有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赵老五和县委警卫员王学等七、八个同志，两条半枪组成的一支小游击队，赵老五为指导员，活动在青阳甘家冲、茗山冲一带。突围出来的原新四军一支队的连长刘和安、民运科长马俊峰和地方干部尹彬、杨林等十几个同志，有七、八条枪，从青阳的甘家冲、茗山冲到铜陵的挂岭脚的江家村，围绕着天坪山四周活动，他们总共不过二、三十人，十几条枪，活动范围仅在“东西一条线，南北一弹穿”的狭长地带里，只能从敌伪顽梅花桩一样的据点中穿插。

我们一踏上沿江这块土地，斗争就紧张地进行着。那一阵子，日寇三天两头出来扫荡，有时小股武装进行骚扰，有时化装便衣追踪或半夜摸进村庄突然袭击。顽军也很疯狂，常常到铁湖嘴一带围剿我们，没早没晚，一天出动几次，让人难摸着规律。我和王卓等同志白天到铁湖嘴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晚上将被絮装在麻袋里，肩背着行动；夜里到群众家，要按照暗号敲门。环境紧张时，我们常常夜宿在窑洞里、麦田里或草丛树棵里，有时甚至睡在大路旁的老鸭棚里。

王卓是当地人，联络关系很多，对我们活动十分有利。他有个姨父姓史，住在史家村，说是伪保长，其实是地方党组织安排的。

王卓的表弟史仇图是个少年。我们一到他家，他就跑到对面山上放哨了望。不久，他参加了革命队伍，他们家就成了我们可靠的落脚点。有一天，县委在史家村召开群众大会，

由王卓主持会议。我同赵老五到新塘湖去了解情况，边走边谈着发展游击武装的事。出村不到半华里，我在高埂上便看见前方隐隐约约的有五、六个戴着狗头帽、穿着长大褂的人，向我们走来，最前面的那个肩上好象扛着一条扁担，扁担上还挂着只篮子。我问老赵：“看，那是些什么人？”他抬头看了看，蛮不在乎地说：“哈，是我们游击队员抓汉奸回来了。”走到岔路口时，我们站在圩埂高处，从侧面向下一看，发现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的长褂下端露出了黄军裤，我立即说：“是鬼子，你快往后走，我从堤埂正面横插过去，我们要死死一个！”赵老五也看清楚了，便按照我的话马上向后走。我刚从鬼子正面堤埂插过去，走在前面的那个日寇将肩上用长袍子裹着的東西取下，把那只篮子甩得老远，那条伪装起来的扁担原来是支三八式步枪。那个日寇端枪对我们大声吆喝：“站住，站住，不要波罗波罗的！”后面日寇也扯掉伪装，端着枪叫着追上来。老赵慌忙跑下水田，我也跟着下去，迅速拔出手枪，跑到田埂的土坡上准备迎战，正在这时，村里开会的群众，听到日军的叫嚷声，便一窝蜂地轰出村子。日军见了，便掉头去追赶群众。村上的伪保甲长立即出来应付日军，我们趁机绕小道，安全转移到后村去了。

时隔不久，我又同王卓到新塘湖去开辟新区工作，住在他的老表家。一次，我们正召开群众座谈会，川军出来骚扰，日军也从鲶鱼山下来，日军一开枪，川军就跑了。日军进了村子，王卓的老表引我们到夹墙里隐蔽，然后出去同日寇周旋。他以甲长身分，把日军灌得酒醉饭饱离开了村子。

经过几次与日军的遭遇，我们初步掌握住敌人的活动规律，深深感到在这敌顽夹击的狭小地带活动不开。同县委

研究，决定转移到顺安和朱村之间的焦家铺、埂塘、羊湖、杨家垄、目莲庵、火烧坝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并选派陶述祥等同志先到那里，利用担任保长的亲戚作掩护。我们仍住史家村。有天，赵老五兴致勃勃地跑来，说：“报告一个好消息，有个老百姓送信来说，顽军一四四师一个班准备投降，并带有一挺机枪。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打算马上去接头。”我对赵老五较为了解，一九三八年初，在开辟泾县一区、担任分工委书记的时候，我就住在他的家乡田坊村。他积极参加农抗会和工抗会，带领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人们称赞这小伙子是“够种的”。我动员他参军，送他到军部教导队学习。他性情强悍，异常勇敢，就是有点鲁莽，缺乏智谋。他听来的消息，我自然不大相信，没有同意他去接头。可是，当晚他带着一个战士悄悄地走了。我不见老赵，料想事情不妙，便派人去追他，但已经来不及了。三天过去了，他们没回来，事后知道他到钟鸣被获港伪军王德芝部包围，激战半小时后牺牲了。

对于赵老五的牺牲，同志们十分痛心，而我则想得更多。当时，在敌强我弱、环境恶劣的形势下，在我们队伍里确实存在两种思想情绪：一种是求胜心切，对于险恶的情势缺乏必要的警惕，赵老五同志的牺牲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有些群众担心我们站不住脚，怕我们“象冬笋一样，出不了头”，这种思想也反映到部队里来，个别同志甚至产生悲观情绪。针对这样两种思想情绪，我们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引导大家学习和领会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的指示精神。通过学习交谈，大家不仅提高了革命警惕和斗争

艺术，而且进一步认识了坚持皖南沿江地区斗争的重要意义，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三)

一九四一年三月中下旬，七师五十五团派彭嘉珠同志带领一个连，约四、五十人过江来到南岸，加强这一地区革命武装力量。

一个夜晚，彭嘉珠和全连战士，分乘几只木船，离开了无为县的江心洲。船到江心，忽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船老大沉着操舵，战士们奋勇划桨，乘风破浪，驶过长江，在距离坝埂头不到十华里的一个小渡口登岸。

部队大部分登上南岸，坐在江边芦苇丛中，一面观察动静，一面等待后续部队到齐即迅速进发。就在这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坝埂头据点有几个日寇想捞外块，悄悄地摸向码头，去找停泊岸边的商船。他们顺着江边摸索着，却摸着坐在江边的一位战士的头。这位战士还以为别人同他开玩笑，伸出手去，碰到的是长筒皮靴，知道是敌人。他举起枪托向那家伙的头上砸去，砸在钢盔上，发出当哪声响。坐在四周的战士闻声猛地站了起来，这黑压压的人影，吓得几个日军抱头鼠窜，逃回据点。第二天，日军找维持会，说：“昨晚新四军大大的有！”

彭嘉珠率队到了铁湖嘴，和我们会合了。为了统一敌前党政军的领导，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由彭嘉珠、王卓和我组成。彭为书记，我为副书记。我们武装力量的加强，引起了敌人以及顽军注目，他们经常成连、成营地对我部进行扫荡，

妄想把我们压到新塘湖一带，然后扼杀我们。为了保存自己，打击敌人，我们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一次，顽军集中一个营的兵力到新塘湖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事先获得了情报，便分散隐蔽起来。待顽军一到，就来了个麻雀战，四面八方响起枪声，弄得他们晕头转向。这时，驻在鲛鱼山据点的日军，听到枪声，也出动了人马。我们向这两个方向猛打一阵，然后悄悄撤出。这下可就热闹了，顽军从东边进攻，日军从西边猛击，结果双方伤亡惨重。

半个月以后，彭嘉珠被调回皖江根据地工作。紧接着，七师又派何志远、巫希权、萧须知等同志来到皖南。记得那天，我们活动到顺安和朱村之间的焦家铺村子。我走进老百姓堂屋，刚刚落座，交通员带着一个人跟进门来。交通员走到我面前说：“江北来了同志！”定睛一看，吃惊不小，站在我面前的却是我常常思念的巫希权同志。他眯着双眼，笑嘻嘻地没有出声，好象在说：看，我不是来了么！我骨碌站起，伸出双臂，紧紧握住他的手，惊喜地问：“老巫，你怎么飞来了？”

他平静地答道：“没想到吧，老杨，我是来和你们一道战斗的哩。”接着，将他怎样一再请求返回皖南的经过，细细述说了一遍。

在这里，我们同何志远、萧须知等几位负责同志和工作队长丁仁一、保卫干事邵占甫以及部分战士见了面。为了加强铜（陵）、青（阳）、南（陵）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成立铜、青、南党政军委员会，由何志远、巫希权、萧须知、王卓和我组成。何志远为书记，我为副书记，巫希权任大队长，政委由何志远兼任。并确定以埂

塘、焦家铺为中心开展活动。因为这一带群众基础好，粮食充裕，地形有利，有回旋余地，同时便于向外伸展到天宝乡，与青阳北乡连成一片，可发展成为较大的中心地区。

在这期间，七师派来武装干部刘全同志（老百姓称他刘麻子）。他原是三支队特务营教导员，皖南事变突围到江北，七师要他带领一个连过江去繁昌地区，配合繁昌县委开展活动。刘全的武装连续打掉马仁、紫岚、铁岚等三个乡公所，缴获甚多，很快打开了局面，使繁昌和铜陵的斗争互相呼应，很快连成一片。一次，刘全带着警卫员小陈，去江北七师汇报回来，乘坐一只民船渡江。船行江中，正碰上日军巡逻艇开来检查。刘全寻思，如被敌人查出船上有新四军，全船群众均有生命危险。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刘全命令警卫员一道跳入江中，汹涌江涛吞没了他俩年青的生命。刘全是一位在内战时参加革命的红军战士，他工作积极，艰苦朴素，英勇善战，联系群众，保持工农红军的优良作风。

日伪顽不断侵扰袭击，使我方受到不小损失，沿江地区的战士十分愤慨，总想寻机会狠狠揍敌人。一天下午，长龙山据点下来一个小分队的日军，从焦家铺过河，向埂塘方向的大路走来。我们部队当时正住在埂塘，大队长巫希权和我们商量说：“鬼子来了，打不打？”

这是我们重返皖南，第一次遇到这么多日军。如果打好这一仗，将能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最后决定：要打，而且一定要打好！

巫希权立刻指挥部队进入附近岗地树林里埋伏。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我们的机枪、长短枪一齐猛烈开火，日军顿时死伤遍地。接着，巫希权举起手枪，一跃而起，带领部队冲

杀过去，日军慌忙逃进油菜地里。时在春日，油菜花一片金黄，日军军服也是黄色，一时难以分辨。战士们冲进油菜田，逐沟逐垄进行搜索，双方枪战时停时烈。因为尽量想活捉鬼子，我们有五、六个战士负了轻伤。皖南事变突围出来正在生病的营长鄒庆林同志，就住在焦家埠附近河边一间草棚里养病，他听到外面枪声，掏出驳壳枪冲出来参加战斗，不料被日寇暗枪把腿射伤了，鲜血往外直涌。他忍痛举枪，一梭子将那个日寇击毙。经过一场激战，除跑掉一个外，这个小分队的日军都被我歼灭。战斗结束，巫希权率领部队迅速撤离了战场。

不多时，日军据点出动大队人马，气势汹汹地直奔埂塘，结果扑了个空，敌人恼羞成怒，想寻找群众报复。老百姓痛恨日军，也痛恨顽军，对他们不打日军，专打新四军，残害老百姓，早就想叫他们吃点苦头。于是，老百姓故意说：“在埂塘攻打皇军的是“草鞋兵”（指顽军一四四师）干的。日军知情，便架起小钢炮向陈山冲猛烈轰击，把驻在陈山冲顽军一四四师的一个小连打得四处逃窜。

这是我们部队重返皖南后第一次同日军作战，打得英勇，影响也很大。这一仗，伏击了日军，吓跑了陈山冲顽军，也使我们的活动地区向陈山冲一带延伸了。我们体会到，要取得斗争胜利，站稳脚跟，必须善于利用敌伪顽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这样才能保存自己，壮大革命力量。

(四)

在我们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情况下，日伪顽加紧勾结，

来对付我们。国民党顽固派为了消灭我沿江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暗地与当地汉奸恶霸沆一气，并妄图假借日寇之手屠杀群众。日寇为了实现其“以华治华”的恶毒计划，就利用特务和汉奸、叛徒、地痞、流氓拼凑和扩大伪兴亚大队、自卫队和突击队，增筑碉堡，广设据点，搜捕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战士和地方干部，疯狂地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家属，破坏抗日群众组织，狂叫要在一个月内消灭我沿江和铜陵敌后游击队。

斗争环境又出现了艰苦的局面，正在这时，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来到这里，要求铜陵敌前和敌后县委加强领导，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做好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敌伪组织，争取两面政权，打击顽固的汉奸卖国贼；同时积极发动群众，扩大游击武装，伺机打击敌人，就地坚持斗争，迅速扭转局面。

根据李步新的要求，铜青南党政军委员会作了研究，认真进行贯彻，把注意力集中到恢复革命组织和发展武装上来。因此，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建立起来，出现了许多传奇式的事迹，至今还为当地群众所传颂。“老张英刀劈乡公所”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铜陵县郎坑冲口有个小村庄，村上有个篾匠张英，他身材魁梧，膀阔腰圆，秉性刚强，为人豪爽，虽只有三十多岁，却蓄着浓密的胡须，所以老少都称他“老张英”。他是外地人，有的说他祖籍湖北，在家乡同土豪劣绅结下了冤仇，受追捕而来到这里落户。他不仅手艺精，而且还懂得拳术，会耍大刀，喜结冤友，爱打不平。有次，他担着篾匠担子路过王村，遇见几个乡丁踢倒一个瞎老太太，要把她的儿子绑去

当兵。他顿时火冒三丈，抢上去一顿拳打脚踢，把几个乡丁打得鼻青眼肿，结果他自己被抓去蹲了几十天大牢。日寇的铁蹄踏进皖南，烧杀淫掳，无恶不作。耳闻目睹日寇的兽行，怒火在张英胸中燃烧。我们得知张英这些根底，便派丫山的地下党员何敏同志跟他取得联系，向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他领头组织抗日游击队。在党的感召下，老张英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老张英周围很快聚集起一批乡间爱国青年。可是，除了老张英使用的一把大刀外，只有几只打鸟的土枪，这怎么行呢？当大家正在焦急时，老张英哈哈一笑，伸手捋一把浓密的大胡子，胸有成竹地说：“枪弹都有，就看你们要不要？”接着，他把早已想好了的袭击丫山乡公所的计谋搬了出来，大家表示赞同。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他挑选几个精壮的小伙子，挑着几担柴草向丫山乡公所方向走去，柴草里藏着装好火药的鸟枪和大刀，刚刚接近乡公所，哨兵喊声：“什么人？”

“卖柴草的！”

“挑这儿来干什么？”哨兵追问。

“伙房要我送来的！”有个青年一边答话，一边接近哨兵，放下了担子，抽出了土枪，对准哨兵喊到：“不许动！”

哨兵见他手中握的是土枪，便举起枪来。那个青年立即扣动板机，却没有打响。这时，那哨兵把枪栓哗啦一拉，推上了子弹。正在这危急关头，老张英一个箭步冲上去，抽出那把闪闪发光的钢刀，“嗖”的一声，砍倒了哨兵。接着，他带着大家冲进乡公所，那些乡丁们还在睡梦中就成了俘

虏。缴获了乡公所的枪支，武装了这支刚刚诞生的游击队。天亮了，这个消息在四乡八镇传开了，老百姓翘起姆指，称赞道：“老张英刀劈乡公所！”

在这以后，长龙山脚下的余村在余耀祖带领下成立了游击队，狮子山脚下在张太富带领下成立了游击队，顺安、朱村、青北等地也纷纷成立了游击队。为了武装自己，我们采用各种巧妙的办法，还从顽军和乡公所那里搞枪支弹药。郎坑有个名叫陈栋的无业游民，颇有点胆量。我们就利用他打入郎坑乡公所当兵，取得警保队长的信任。有天晚上，他趁自己半夜站岗的机会，约好他哥哥把乡公所的枪背出了七条，并由他负责组织了郎坑游击队。后来，这支游击队改编调往江北后，陈栋被派到土顽那里去当兵，几进几出，又搞了一些枪支弹药。各地游击队都采取种种方法，装备自己，使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

铜陵敌后叶为枯较早建立起来的游击队也得到很大发展。叶为枯同志是铜陵叶家洲人。他出身贫苦，早年读了几年私塾，是爱国的进步青年。一九三八年，党组织派张伟烈到铜陵开展工作。他在叶家洲扎根以后，首先吸收叶为枯入党，从此，他积极地投入抗日武装斗争，着手组织游击武装。

他开始组织游击队时，只有几把马刀，几颗手榴弹，后来从水里捞出来一支断了枪托子的三八式步枪。这支游击队成立不久，就镇压了投靠日寇、鱼肉百姓的一个姓黄的奸汉乡长，从此声威大振。为了增强游击队的战斗力，叶为枯各处打听，得知永丰圩北埂王家村的王心达曾经组织过伪自卫队，有二十多条枪埋藏在菜园地里。他通过其外甥胡畏摸

清了枪支埋藏的地点，在一个深夜取来了枪支。他们得到这批武器后，真是如虎添翼，更有力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他们用“新四军第七师铜陵敌后锄奸团”的番号，深入敌巢，镇压了查啸泉、张贤驹等汉奸和叛徒，使这一带的敌伪闻风丧胆。以后，铜陵敌后县委在这支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铜、无独立连。

一九四一年五月到十一月间，在坚持沿江地区斗争中，是非常艰苦的时期，同时也是粉碎敌伪扫荡、不断取得胜利的时期，从根本上扭转了皖南事变后出现的不利形势，稳定和巩固了抗日政权，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壮大了抗日的武装力量。铜陵敌前县委和敌后县委领导的抗日斗争紧密配合，互相呼应，使铜、青、南地区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这个地区仅在半年的时间内，武装力量迅速壮大，由原来的几十人发展到六百多人。党员由原来的几百人发展到千余人。同时，我们还收容了皖南事变失散的一百多名干部和战士，除大部分护送江北外，留下一部分充实到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中去。根据当时情况，为了加强统一领导，敌前成立两个大队：一个是主力大队，由巫希权任大队长。一个是游击大队，由萧须知负责，何志远为政委，我为政治处主任。在皖南事变后不长的时间里，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武装在敌、伪、顽严密控制的皖南又得到发展、壮大，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五）

在武装斗争的推动下，我们在铜（陵）、青（阳）、南

(陵)三角地带建立了一块游击根据地。它由铜陵的顺安乡、朱村乡、天宝乡，南陵的丫山以及青阳的北乡联成一片，并向敌后铜官山一带发展。这里地方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每个区域都有区委会，各个乡都建有精干的党支部，交通要道还设有单线联系的交通站。为了巩固根据地，我们又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基层政权。第一个成立区政府的是顺安区。开始由一个姓刘的任区长，但他有点动摇，只搞了一个多月，组织上将他调到江北去了，解放战争时期，刘叛变投敌，成了叛徒。嗣后，由孔亚东担任区长，丁仁一任指导员。不少区、乡政权相继成立。这时，铜、青、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引起国民党顽军的恐慌。这个地区驻的川军一四四师系杂牌军，装备较差，粮饷不足，与国民党嫡系军队有矛盾。同时，他们与国民政府地方政权虽有联系，但并不紧密。因此，我们在开辟这个地区的斗争中，十分注意开展统战工作，向川军一四四师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并释放被我俘获的川军官兵，对川军上层开展争取工作。一九四一年秋，国民党三战区认为川军一四四师反共不力，将这个师调走，调来五十二师。五十二师属于嫡系部队，装备精良，供应充裕，是皖南事变残杀新四军的先锋。这个师开进铜、青、南地带后，很快与当地的特工人员和乡、保长紧密配合，对我进行大规模的“清剿”。

五十二师妄想一举消灭我皖南抗日武装，在土顽、敌特和地方政权的配合下，向我军不断发起攻击。我们所在的中心地区埂塘几乎天天都有激烈的战斗。我们部队的骨干和许多战士是经过皖南事变的血与火的考验，一听说五十二师来

了，旧恨新仇一下子集聚在心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报仇！”的杀喊声响彻战场上空，子弹向顽军倾泄。为了减少部队伤亡，保存革命力量，我们主动撤出埂塘，转移到天宝乡。

正在这时，我七师副政委李步新和五十六团团团长徐绍荣率领一个营过江来了，由于严密封锁消息，五十二师一无所知。当时，我部主力住在天宝乡的泉塘大村子里。五十二师连战失利，愈加疯狂，他们又以一个整营的兵力，分两路向我泉塘发起进攻，一路从郎坑直奔泉塘，一路从柴山向观音洞迂回包抄，企图围歼我军。当时，从柴山方向来的顽军有一个连。我们分析了敌情，决定派少数部队牵制从郎坑出来的顽军，并把他们引向朱村日军据点附近，然后集中优势兵力，狠狠地打击从柴山方向来犯的顽军。按照预定计划，巫希权率主力大队，配合我七师五十六团的一个营，对柴山的顽军进行合击。当从柴山方向出来的顽军进入我包围圈时，我轻重武器一齐向顽军扫射，顿时杀声一片。密集的枪声惊动了日军据点，日寇大队人马从童家店袭来。我军突然腹背受敌，便主动撤出。这一仗，歼灭了这个连的大部，挫其锐气，粉碎了五十二师对我泉塘分兵合击的阴谋。不久，由于这一带秋后发大水，部队活动受到阻碍，我七师五十六团这个营又撤回江北去了。

五十六团这个营撤走后，五十二师仍不死心，又经常向我顺安一带进攻。我们巧妙地进行游击战，把五十二师打得晕头转向。由于这一带离日军的据点很近，五十二师频繁进攻，使日军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便集中顺安和长龙山一带的日军向五十二师进攻，把它在下楼铺一带的阵地摧垮，五十

二师又损失了一个连，还被俘虏一个排。这样一来，五十二师被迫暂停对我进攻。

在反“清剿”的斗争中，铜青南游击根据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组建不久的革命武装也得到很大的锻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坚持皖南革命斗争的信心更足，斗志更旺了。

(六)

正当我沿江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得到迅猛发展、群众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调集桂顽一七六师和龙炎武的第八游击纵队数千人，分几路向我江北皖江根据地大举进攻。我七师领导决定，抽调皖南部队主力，参加保卫皖江根据地的战斗。大队人马调走后，只留下一个班和一些侦察人员，总数不到三十人，由巫希权和我负责带领继续坚持斗争。并在组织上作了调整，由巫希权任铜陵大队大队长，我为政委。

在顽五十二师加紧对我“清剿”的同时，日寇也密切配合，不断对我进行扫荡。斗争环境骤然紧张，形势又险恶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这支精悍的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穿插在敌人梅花桩式的据点中间，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巧妙地同敌人周旋于铜、青、南一带狭小的区域。有时为了迷惑敌人，一个晚上要转移几个地方宿营，发现有人跟踪，夜间常行军百余里，直到把敌人甩掉为止。我们不住大村庄，常住草屋牛棚或麦田、丛林中。没有钟表，站岗放哨，用点香记时。在大雪纷飞的夜晚，生怕哨兵站久了，冻坏了腿脚，不能行军打仗，几个负责人常常去代哨。

听到狗叫连成一条线，凭着经验准有敌情，必须立即转移。由于睡不安宁，神经敏感，处在高度紧张之中，我从那时起就患了严重失眠症。

皖南事变后的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皖南特委迁移到繁昌的朱冲，并宣布成立繁昌敌前县委，李铁民为书记，王文石为组织部长，陈爱曦为宣传部长，金涛为军事部长。当时，给敌前县委规定了任务：要坚持红花山周围的斗争，打开敌前的工作，开展游击战争。

可是这个时候，国民党五十二师连续两、三次进攻朱冲、周冲。因为日、伪、顽加紧勾结，互通情报，对我繁昌地区进行残酷的“清剿”，使这一地区遭到严重损失。我皖南特委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决定撤消繁昌敌前县委，派李铁民、金涛去组织保大圩工委，李为书记，金涛、王宏勋为委员。国民党得悉我敌前力量分散转移，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敌后。约一九四二年初，土顽情报组组长带领一批便衣特务，配合五十二师一个营，夜袭敌后大小洲。大小洲形势逆转，部署混乱，敌后县委书记苏拓夫单人出去联络部队，不幸被顽军捉去，严刑拷打，割去耳朵。苏始终不屈，顽军无可奈何，即将他押到泾县魏家祠堂，长期监禁。反复审讯，一无所得，顽军在南陵境内的八都河附近把他杀害了。

顽军在袭击我繁昌敌后地区的同时，又勾通三山伪军王世友，向繁昌敌前进攻。王世友是个道地的流氓，日寇进驻三山镇，他就在伪军反共团里当上了大队长，由于他人熟地熟，干事卖力，为日寇搞钱搞粮，还抓女人供日寇头目玩乐，深得敌人信任，成了顽军勾通日寇的一个桥梁。经过一番策划，王世友得到准确情报，突然袭击工委所在地保大圩，

金涛组织还击，因掩护同志们撤退负伤而被俘。伪军将金涛带到三山据点严加监禁，为了得到口供，敌人为他医治枪伤，许以高官厚禄，劝他投降；在引诱失败后，敌人又用尽刑具，残酷凌磨他的肉体。但金涛软的不吃，硬的不怕，表现出共产党人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英雄气概。王世友见达不到目的，就找金涛谈话，说只要他答应条件，就可以瞒过皇军，将他悄悄释放。金涛问王什么条件，王提出三条：1.要把游击队几十条枪支交出来；2.不许在三山、大小洲一带活动；3.要金涛声明不干新四军，释放以后就回家。金涛一听，真是火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当即厉声斥责道，要我们缴械投降，不干革命，我们共产党人决没有这种习惯。至于要我们撤离这块地区，那更是绝顶荒唐，一派胡言。日本人有侵略我国土的自由，你们汉奸卖国贼有甘做奴才、为虎作伥的自由，难道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还没有抗击侵略、惩办汉奸的权利吗？王世友被驳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遂决定杀害他。

金涛同志是浙江宁波人，店员出身，颇有文化。抗日初期参加革命，他随新四军来到皖南，和我们同编在战地服务团工作。皖南事变前，他同我们一道来沿江一带宣传抗日，开辟地区。皖南事变后，组织上又派他回沿江参加繁昌县委，坚持大小洲一带活动。因为在大小洲交界处有个油坊嘴，江面很窄，过江即达江北白茆洲，是个很理想的渡口。早在皖南事变前的一九四〇年，中央指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北上抗日，经过多次勘察，分析研究，规定两条北撤行军路线，选定的渡口一处是繁昌的油坊嘴到江北白茆洲，一处是铜陵的坝埂头到江北的江心洲。显然，金涛带一支游击队坚持大小洲斗争，保

护由繁昌通往江北的交通路线，这不仅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也是军部领导对他的莫大信赖。金涛来到这里，他的父母正好来了一封信，要他回家结婚，并把未婚妻的照片也随信寄来。金涛接信后说：“斗争正处紧要关头，我不能回去，不能因为个人结婚事，影响革命大事！”他继续坚持在战斗岗位上。他遵守纪律，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与老百姓谈心，帮老百姓干活，因此，那一带群众凡提到“金县委”的，人人起敬。由于他在斗争中有勇有谋，战斗时身先士卒，指挥若定，敌人一听“金涛”游击队，都是心惊胆颤，不寒而栗。敌人决定杀害金涛那天，王世友怕出意外，向日寇作了报告并得到同意，日、伪军倾巢出动，如临大敌，设岗加哨。许多老百姓闻讯赶来，因无法接近，只得暗含热泪，远远地看着金涛。就义时，金涛不让敌人捆绑，更不下跪，直挺地站在高处，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强盗，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一个行刑的伪兵慌了手脚，没有扳动枪机，敌人使用金钱另换一个刽子手，用刺刀将金涛杀害了。王世友本想将金涛的遗体示众三日，但当晚周围老百姓自动聚集赶到刑场，偷偷地把他遗体运走，后来敌人多次搜寻，都落了空。直到解放后，金涛烈士的遗骸移葬于烈士陵园墓中。

皖南事变前，繁昌县委书记罗峰和金涛一道开辟沿江地区，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革命事业，同样将自己的热血洒在这块土地上。一九四一年一月五、六日光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的枪声打响了，日寇在沿江一带也加紧对我进行“清剿”活动。那天，繁昌县委机关的江边小甲村集中几十个地方党员和负责干部，准备搞船过江。第二

天清早六时，伪军带领日寇突然袭击过来，同志们当即决定分散突围出去。当罗峰快到高安桥时，碰到旧县出来的一股敌人，被盘查后带走。罗峰的江西口音引起敌人注意和怀疑，敌人押他扛着子弹箱，循着江堤向东走去。他走到一段狭窄的江堤上，又看看前后都是日寇，料想如果被带进据点，恐怕难以脱身，他略一思考，猛然举起子弹箱向身前的日寇砸去，随即纵身跳入大江，向江北游去。被砸伤的日寇嗷嗷大叫，其余日寇惊呆了。当罗峰游到远处、冒头出水换气时，敌人的排子枪响了，罗峰的鲜血染红了滚滚波涛。罗峰是江西永新县人，牺牲时约三十岁年纪。他是贫苦农民的孩子，幼年当过木匠学徒，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炼，体魄十分健壮。他是经过十年内战和三年游击战争锻炼，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老战士，他勤奋好学，知识丰富，言谈风趣，热情奔放，具有共产党人铮铮铁骨、刚直不阿和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

沿江地区斗争环境又趋恶化，部队思想引起一些波动，新战士对于能否在这个地区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抱有怀疑，就是一些老战士对今后还要打多久也产生疑问。我和巫希权，除对付恶劣环境外，还要利用一切空隙，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向战士们讲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荣传统，讲我们重返皖南近一年来的战斗历程和开辟沿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我们还把胡明在山区坚持斗争的事迹讲给战士们听，并分析我们坚持斗争的许多有利条件，例如有比较健全的地方党组织的支持，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不需要到处借钱等等，比起山区坚持斗争的条件要好得多。这样一讲，对战士们鼓舞很大。同时，无论在行军和战斗中，我们注意关心每一个战士，

巫希权在这方面做得更为突出。在急行军中，他经常抢过战士肩上的枪，大步走在前列。到了宿营地，他经常先端来一盆盆热水给战士们烫脚，和战士们谈笑风生，使大家在欢乐中消除疲劳。远大的革命理想，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使部队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日、伪、顽的不断“清剿”，也迫使我们不断提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为了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常在夜间派出游击小组到顽五十二师驻地附近骚扰。有时，把缴获日军的炮弹用火燃烧，发出钢钢的响声，顽军以为是日寇攻来了，就吓跑了。有时，把子弹放进易燃物里，再把香点燃起来，连同装满火柴的盒子一块放进去。半夜时分，易燃物火起，熊熊烈焰腾空，子弹不断发出啪啪的爆炸声，顽军以为我大部队回来了，惊恐万状，不敢轻易出动。顽军找不到我们目标，又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就派出小部队来袭击我们。但是，顽军没有群众基础，他们小股部队一出动，群众就向我们报告。有天，我们住在埂塘，五十二师的半个班从盛家桥突然窜到焦家铺，距我们住地不到半华里。他们看到饭店，坐下就要吃喝。当地的群众一面应付他们，一面派人向我们报告。我们立即派侦察员徐文海，带一个侦察员到焦家铺，这时顽军正喝得醉熏熏的，失去警觉，枪放在一旁，手榴弹也放在桌子边。徐文海和那个侦察员见此情况，突然冲进房子，大喝一声：“不许动！”吓得顽军举手投降。缴获枪支后，就把俘虏全部教育释放。

顽军五十二师妄图一举歼灭铜、繁部队，但又摸不着情况，只好派叛徒特务赵凌波装扮成长头发满面胡子的老人，并说自己是皖南事变时被俘，越狱逃跑出来的，妄图潜入

铜、繁地区，进行破坏活动。我繁昌游击队负责人早知道赵凌波叛变投敌，为了麻痹他，给以很好的招待，然后派部队逼赵强行过江，送到无为县白茆洲皖南支队部。为了弄清他的问题，支队部又派一个排，把赵凌波押送七师司令部。在解押途中，赵知道事情败露，即向圩田逃跑，并抢夺群众的大锹，砍伤战士一名，战士当场击毙了他。

不久，顽五十二师在地头蛇的配合下，摸到我们的情况。当时，我们住在埂塘。五十二师派郎坑的一个营，分三路向我包抄过来，妄图歼灭我们。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我们边打边撤，一直撤到河西。顽军直向焦家铺扑去。这时，皖南货管局长吴文瑞刚从江北过来，当他知道焦家铺方向有顽军时，就迅速转到长龙山脚。我们正好也撤到长龙山脚下。顽军奔到焦家铺，又扑了空，并把焦家铺抢劫一空，放火烧老百姓的房屋，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一片哭喊声。顽军的凶狠残暴激起了群众的仇恨，这一带的青年纷纷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焦家铺村子有个贫农陈老水，房子烧光了，他满腔仇恨，把自己独生儿子也送来参军了。朱村、顺安的游击队重整旗鼓，很快组织起来，狮子山脚下的张太富游击队也迅速得到发展。

一九四二年春末，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铜（陵）、无（为）独立连抽出一个排，由查富德率领，同长龙山脚的余村游击队合并，编为第三中队，查富德任中队长。皖南特委黄火星派钱秋育担任该队支部书记。青北工委的游击队同朱村老丁的游击队编为第一中队，由萧少春任支部书记。以青北工委游击队为基础的第一中队，多数战士土生土长，情况熟悉，加之不少人是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有丰富

的战斗经验，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他们在那一带活动，打了不少很出色的胜仗。有一次，他们住在天宝乡的泉塘村，递步哨报告，说老鸦岭下来几个穿便衣的日寇，老远望去，有一个还扛了一把“铁锹”。得到消息，他们决定伏击。当日寇从叶家湖过河时，刚爬上土坎，一排枪就把那个扛“铁锹”的家伙击中了，剩下两个从河沟里向老鸦岭据点仓皇逃去。战斗后，部队在河边搜索时发现，被打死的日寇扛的那把“铁锹”原来是一挺崭新的捷克式机枪。这个意外的收获，使大家高兴的蹦了起来。

主力部队撤走后，我们紧紧地依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同敌人开展反扫荡、反“清剿”的斗争，士气越打越高，部队也重新得到发展。

(七)

顽五十二师扬言在一个月內扑灭皖南革命火种的狂妄计划落空后，灰溜溜地调离，川军一四四师来此接防。我们深知川军和国民党嫡系部队，内外有矛盾，可以做一些争取工作。由于对川军加强了统一战线，一四四师一度“清剿”不甚卖力。这样，我们便腾出武装，打击那些曾替五十二师卖力的土顽、地头蛇和特工人员，并在斗争中扩大武装，发展革命势力。

铜陵南面的顽丹凤乡公所的清乡队，有二十多条枪，十分反动。我们派侦察员徐文海和外号叫“疯子”的老卢去侦察，要他们在执行任务时，相机行事。第二天午饭前，徐文海和老卢押着几个俘虏，挑二十多支步枪，兴高采烈地回来了。

原来他俩到了下楼铺，就抓到一个姓李的乡丁，了解了情况，便要这个乡丁带路，天亮前到达乡公所。快到门口，哨兵问：“你是哪个，来干什么的？”这个乡丁答：“我是老李，是送信的。”哨兵一听是乡丁老李，没有戒备。随后的徐文海和老卢冲上去，驳壳枪对准哨兵，缴了他的枪。随即冲进大门，老徐大喝一声：“不许动！”那些还在睡梦中的乡丁被惊呆了，有个家伙醒过来，忙去拿枪，被眼明手快的徐文海一枪打倒，其余乡丁乖乖地当了俘虏。那个叫老李的乡丁后来也参加了顺安游击队。

离大通十里的江边，在悬崖峭壁上有个羊山矶，上面建立一个伪军碉堡，是伪军兴亚大队控制的江边据点，住有十几个伪军，头目是伪兴亚大队长吴致和的亲戚陈大胖子。这个碉堡是用钢筋水泥浇灌的，有二层楼高，无门可通，内外全用梯子上下，易守难攻，对我沿江活动威胁很大。铜官山的党组织派铜官山后面张家山我方乡长余秀荣，通过亲友关系，争取了伪军士兵余小五子。他是余家大院贫苦农民，被抓去当伪军的。余小五子利用夜间站岗放哨的机会，约定了时间，以擦火柴为暗号，与我警卫连长左克南带的一个班联络。接上暗号，余小五子把梯子放下来，战士们立即爬上碉堡，缴了伪军的枪，摧毁了这个据点。余小五子回到家乡，组织了铜官山游击队，当了队长。

为了及时传递情报，我们在泾县中村、青阳杨田、铜陵顺安等地均建立单线领导的交通站，中村交通站负责人杨玉书，事变前，原是地下党的区委书记，事变后回到家乡，受党的指派担任交通工作。他和另一位以教书作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友华多次完成了革命任务。一九四二年春末，我要他们

送一分情报去七师，杨玉书扮作农民，杨友华扮作学生，跋山涉水，走了四天四夜，绕过敌人层层封锁，终于把情报送到江北，又将上级指示带回来。

一九四二年初夏，我七师领导了解皖南斗争情况后，为支援沿江地区的武装斗争，派五十六团三营教导员何继生，带领这个营九连的战士过江来了。当时，我沿江地区武装部队已作了一些调整，将铜无独立连改为一中队，由刘英任中队指导员，查富德任三中队队长，钱秋育任连支部书记，巫希权和我分别任大队长和政委，叶为祜任大队副。七师派来的原老三团三营教导员罗爱民为大队教导员，大队建制改由皖南支队领导，地方党组织仍归皖南特委领导。

我们武装力量得到充实，便决定对常来窜犯独山的伪兴亚大队发起攻击。独山位于挂岭附近，是一座不到二百米高的小山包。驻在董家店的伪军兴亚大队约有七十多人的一个中队，常到独山四周骚扰抢劫，群众莫不切齿痛恨。我们一到挂岭江村，老百姓纷纷跑来诉苦，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伏击这股敌人的决心。第二天清晨，这股伪军进入独山后村奸淫抢掠，我们部队马上向独山隐蔽前进，由何继生指挥，以九连在独山周围设伏，形成包围圈。铜陵三中队担任主攻，从独山后村迅速向敌接近。我对这里地形较为熟悉，知道山后另有一条隐蔽小道通往竹园村，若有疏忽，敌人可能从那儿逃跑。于是提议派一支小部队去堵击，但并没引起注意，因为战斗已打响，弓在弦上，无暇讨论，只得作罢。当三中队以一个排攻击独山后村时，伪军全部抢占了独山。接着，我三中队全部总攻独山，战斗非常激烈，不到半小时攻占独山。但是，伪军除少部在突围时被我击毙、击伤外，大部分

伪军果从山后小道向竹园村方向逃遁了。大家甚感惋惜。

打击了伪军，惹怒了日寇。日寇对我进行连续三次报复性的扫荡，但每次都无甚收获。主要因为这些地方维持会基本上掌握在我们手掌里，情报比较可靠。我们甚至将一些内线安进伪军和警察所里。驻在张家冲的日寇设立一个警察所，所长姓金，是外地人。我们了解到他的底细，便通过杨家垄的一位出身翰林的开明士绅，人称向老四先生的去做争取工作。向同姓金的是同乡，他把金邀到木鱼山对河的庄屋里，一番宴请，一番忠告。我去找金谈话，交代我军政策，指明今后出路。那个金警长后来逐步靠拢我们，为我所用。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在伪警察所内和铜官山等地的伪军中秘密发展了救国会员，因此，敌人有动静，我们就能掌握。有时，日寇出来扫荡，维持会很快送来情报，并派人领敌人到别处去喝茶、吃饭、饮酒，待到日寇酒醉饭饱，胡乱转游一圈，即回据点去了。

日寇一面武装“清剿”，一面又化装成便衣或派遣特务向我游击根据地进行渗透和破坏。我们在敌人营垒中安插内线、掌握情报的同时，还发动民兵、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开展群众性的肃清敌特运动。

有次，一天清晨，驻埂塘的部队刚刚起床，哨兵就报告，说是有位老大爷领个小孩进村找我，我吩咐先让老大爷进来，老大爷刚进屋，我一看原是盛家桥的陈大爷，未等我问，他抢先说开了。

原来，他清晨在陈山冲口子的萧村拾粪，正碰上从顺安那条大道上走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一见面，小孩就问：

“老大爷，新四军大队部在哪里？我是大队部的小鬼，行军

掉队的。”陈大爷一听，感到不对劲，心想游击队常到我家，每个同志我都认得，从未见过也未听过有这么大的孩子。陈大爷灵机一动说：“小孩，你既然是掉队的，我带你到下面看看。”就这样，他把这个小孩领进了村。

陈大爷说完就要告辞。我一面派人送他去厨房吃早饭，讲了一番感谢的话，一面派班长老李去审问那个小孩。

李班长很是机灵，他马上化装成身穿黄军服、手握日本东洋刀模样的日军。当小孩一带进屋时，老李大喝一声：“你的新四军大大的！”

那小孩一看面前是个皇军打扮的人，随即说：“太君，我的不是新四军。嘻嘻嘻！”

老李又说：“你的是新四军大队都掉队的，好好说说，不说刺拉刺拉的。”随即把指挥刀架在小孩的脖子上。

这小孩受过日寇的训练，当然一点不怕，哈哈一笑，说：“太君刺拉刺拉没有格，我的为皇军做事的，从顺安镇到下楼铺，又到陈山冲侦察新四军的。”

老李听了，马上改变了口气：“啊！你为太君做事，顶好顶好的，你有什么证件吗？”

这小孩连忙把口袋角撕开，从里面拿出一张用香油浸透发着亮光的一元纸币。原来是联络暗号。

老李已知套出口供，暗暗喜悦，他随后换了便衣，回来对小孩说：“小孩，实对你讲，我们是新四军。”但这小孩直瞪两眼，连连摇头，嘴里还左一个“太君”又一个“太君”直嚷嚷。有的同志气得来火了，顺手给他一个耳光，这小孩还不改变他的声色，一口咬定我们是皇军。直到我们晚间转移到杨家垄驻地，当地群众告诉他我们真是新四军，这

小孩害怕起来，捂面大哭，才说出真实情况。

这个小孩是铜陵洲上的，被保长送进日军宪兵队受训，向他灌输武士道精神。常用大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叫他哈哈大笑；日寇还常常化装成新四军，让他去识别。经过几个月训练，日寇就派他出来刺探我们情况。结果，一进入游击区，就被破获了。

根据这小孩供认，并经过了解，小孩的哥哥张小二是我五十六团九连的战士。我们很快通知了张小二，他从部队赶来，一看果真是他的弟弟，火冒三丈，一巴掌打过去，这个小孩被打得跌出老远，哭哭啼啼跟随张小二回家去了。

我们在武装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还注意恢复和建立地方政权，顺安和朱村范围成立顺安区，从铜官山到天宝乡成立了五峰区和一些乡政权，以东西湖为中心成立了凤心区，铜陵洲上成立了沙洲区。那时，顺安区和五峰区的顺安、朱村、天宝三个乡是我们活动的中心区，青北工委所在地的茗山冲为我隐蔽的根据地，敌后的凤心区、沙洲区是我们主要兵源和财源地区。在这些地区，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和斗争特点，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民兵、农抗、青抗、妇抗等抗日团体，逐步成立一些乡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和征粮收税等工作。

为了疏通南北交通，加强联系，增加财政收入，皖东行署在我铜陵沿江地区建立临江船舶管理处，设江流工委，书记马文杰。管理处处长徐瑞卿，督导员方亮东，秘书王群英，会计林二梅、刘笑高。管理处下辖铜陵、芜东、芜南三个分处。船舶一经组织，船民们热情很高，协助我税务部门征税，就连驻大通的日本洋行头目松山也在童埠港口一次拿出六十余担盐税款。那些敌、伪、顽和奸商为了要船运货，也不

得不经常为我们代办一些紧张物资，如中西药材、布匹、食盐等等。管理处还积极检举和收集日、伪、顽、特的活动情况，运送我军政人员，做了大量有益于革命的工作。

正当沿江地区斗争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我皖南山区的党组织却遭到严重的破坏。国民党顽固派调集五十二师、新七师等主力部队，对山区实行疯狂“清剿”，妄图消灭事变时留下的革命种子。皖南事变后，原皖南秘密特委委员的胡明和洪琪等隐蔽在旌、绩、歙三县交界处黄巴亭大山中的狮子洞里，他们在那里隐居两个多月后，才同上级取得联系，决定成立山区中心县委，胡明为书记，领导和坚持山区斗争。中心县委下属几个地区：即洪林领导的泾旌太地区，吕辉领导的泾宁地区，唐辉领导的绩歙宁地区，刘奎领导的黄山地区，刘贵生领导的太平地区。

山区中心县委的武装力量，除上述几个地区一些地方武装人员外，主要是刘奎领导的一支小游击队，开始他只有一个人一条驳壳枪，但他通过地方党的关系，找到了在群众家里养伤的两位同志，一个是新四军三团指导员李健春，突围时，脖子上受了重伤；一个是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黄诚是在突围中跟随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和项英的随身副官刘厚总隐藏在泾、旌交界大山里的石牛屋后山蜜蜂洞中。二月中旬一天深夜，叛徒刘厚总开枪打死了项英和周子昆，当时睡在首长身旁的黄诚脖子上和膀子上均负重伤。刘奎、谢忠良、李志高等闻听枪声赶到蜜蜂洞，迅速将首长遗体转移到另一座大山，掩埋在石头缝里。刘奎背起黄诚，送到山坡那一边纸棚村群众徐老三家里。这以后，待刘奎找到他俩，李健春和黄诚伤势已好。刘奎等又将周义富、刘贵

生、张小牛、周明火等几个青年，组成八个人、两条半枪的一支游击队，再加上胡明处少数武装人员，共二十多人。这支队伍在中心县委领导下，首先袭击了旌德庙首顽乡公所，这一仗打得很漂亮，缴获甚多。接着，两次打掉了太平县谭家桥顽乡公所，战果辉煌。这些战斗是在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声言“皖南新四军已经肃清”的喧嚣声中取得的，影响格外广泛，意义极其深远。群众编出歌曲唱道：

皖南新四军，真是英雄将。

庙首头一仗，打得真漂亮，

三条半枪缴来十条枪，以少胜多威名传四方。

二打谭家桥，打得真巧妙，

乡丁未睡醒，飞兵已来到。

三分钟缴枪传捷报，老百姓喜得眉开眼又笑。

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后来又不断取得战斗胜利，使地方党组织得到重建和发展。国民党惊恐，调来重兵“清剿”。在长达六个月的“清剿”中，顽军以五十二师参谋长陈淡如为剿匪总指挥，调这个师一个团为主力，加上杂牌军一四四师、一四五师各一部，还有泾县、旌德、太平、绩溪、歙县的自卫队，共三、四千人，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围追、堵截、封山、搜山，移民并村，强迫自首，实行严密封锁，致使山区中心县委一度与江北失去了联系。于是，师部命我部抽派一个中队，与胡明取得联系，支援山区武装斗争。一九四二年春，我们派连长周长根带一个连进山，但沿途顽军封锁甚严，加之教导员程众（又名程慎斋，绩溪人）叛变投敌，未能坚持下来，只好撤回。周长根在山区艰苦环境中转战一个多月，身体负过重伤也难

以支持。曾记得在一九三八年秋，周是一团的侦察排长，机智多谋，作战勇敢。有一次，他带领数名侦察员到铜陵县王冲日军据点活捉鬼子。王冲日军分队队长叫山本，下山找花姑娘，他看中了伪甲长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伪甲长对山本经常糟踏他的女儿，只得唉声叹气。老周了解这一情况后，对伪甲长进行教育，并商量出活捉山本的办法。周长根带两个侦察员埋伏在伪甲长女儿的房间里，两个人躲在床后屏障里，周躲在房门后面，其余的人在大门外树棵里警戒，以防万一。正好那天山本来到伪甲长家，一踏进房门，正拥抱着伪甲长的女儿，周长根从房门后面冲出来，要抓山本。但山本非常机警，马上抽出左轮枪，一连打了六发，都打在周长根身上。都不是致命处，周并没有倒下，冲上前去紧紧抱住山本不放。这时，床后两人猛冲出来，把山本压倒在地，用绳子把山本手脚捆绑起来，用木杠抬走了。这是新四军第一次活捉鬼子，震动了大江南北，用事实说明了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人民军队。周长根因流血过多昏倒了。群众马上把周抬到团部抢救，送回军部南堡村医院治疗。我当时在军协理处工作，经常去看望他，结下深厚的情谊。更没想到，皖南事变后我们又在皖南地区坚持斗争。

周长根从山区撤回铜陵后，就调回七师师部去了。我们又从一中队选了两个精干班，大部分是青北工委的战士，再次进山。萧少春同志参加了这次进山。这两个班从青阳出发，经南陵大隔里到达泾县与太平县交界的大山中，在与泾县毗邻的太平甘村落脚，四处寻找，历经艰苦。直到秋天，洪林派人在泾县高山坪脚下的茶棵山才同萧少春等接上头。当晚，他们在高山坪后面山头见到洪林，就住在山顶的棚子

里。次日，正巧刘奎带着四、五个同志也来到这里。第三天，洪林、刘奎带着萧少春等夜行百余里，于拂晓赶到歙县一个大山头，见到胡明、洪琪等。此后，我七师师部同皖南山区的胡明所率领的游击队又恢复了联系。萧少春留下归胡明领导，在洪林活动的地区泾、旌、太一带坚持斗争。

由于江北七师与皖南山区打通了联系，一九四二年秋，胡明带领刘奎、陈洪、洪林、殷德光、刘和安等，去七师汇报工作，来去均经过铜青南地区，我们派武装护送和接迎。有次经过犁桥附近时，被日寇伏击，大队长刘和安不幸中弹牺牲。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来，斗争十分艰苦。我们坚持贯彻了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方针，节衣缩食，减少开支，来减轻人民的负担，支援兄弟部队。要求大家在鱼米之乡的江南，要时刻想到山区和其他地区兄弟部队和群众的困难。巫希权等大队领导同志带头穿上黑粗布衣裳，我同他合盖一床被，过着艰苦的生活。还把一些同志转到地方工作，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民兵建设。

此外，青北工委书记许达抱与青阳东乡的地下党员陈发周取得联系，通过青阳地下党组织，建立了通向山区胡明那里的交通线。在青阳的盘台村设立了交通站，张贵任站长。通过这个交通站可以传递情报，与胡明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山区和沿江的对敌斗争，互相呼应，互相支援。

(八)

我沿江地区军民经过了同日、伪、顽清剿反清剿、扫荡反

扫荡的严重较量之后，革命形势有了进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开始运用自如了。这样，我们除寻机开展武装斗争外，并注意镇压那些对革命活动危害极大的特务、叛徒和死心踏地为敌效劳的汉奸卖国贼。

在张家冲附近的有个小集镇——柴塘，驻有日军和伪军，还设立维持会，会长朱世科是当地恶霸地主，他小儿子朱怀旦在伪军兴亚大队里当副官，大儿子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当谍报小头目。朱世科一时成为日寇的红人，顽方的心腹，搞我情报，欺压群众，鱼肉乡里，卖国反共。对此，我铜官山和张家山的党组织曾派人警告过他，但他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将我张家山的乡长余秀荣同志杀害了。余秀荣出身贫寒，在抗日斗争中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当了我方乡长，在铜官山、余家大院、柴塘等地开展工作，同敌伪进行坚决斗争，得到人民群众支持。为替余秀荣烈士复仇，我们决定寻机镇压朱世科。

朱世科的小儿子朱怀旦荣升副官不久，又要拜堂成亲，要大办喜事，这显然是个好时机。但朱世科家隔壁住着日军，因此只能智取，不可莽撞。我和巫希权反复研究，决定选择朱怀旦拜堂成亲之日，派出精干的同志前去“贺喜”，打入内屋，除掉朱世科父子。这个任务交给侦察员徐文海同志去执行。徐文海胆大心细，机智勇敢，在长期侦察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是执行这一任务最合适的人选。有次，川军一个班到杨家垄骚扰，徐文海得知消息，便同老卢一道前去侦察。他俩到了那里，见川军把枪靠在墙边，围在一起剥狗皮。他俩各打一梭子弹，击毙两个顽兵，把枪全部缴获，其余川军逃走。为了配合惩罚朱世科的行

动，我们还找来一个杨医生，雕刻一枚国民党特工系统的公章，假制一分公函，证明徐文海的身分是：国民党特务大队长。正是朱世科大儿子的顶头上司。

徐文海头戴礼帽，身穿长袍，藏好短枪和信件，带领一个绰号名叫马虎的战士出发了。他们到了柴塘，找到县委宣传委员兼区委书记的马文杰同志，取得当地党组织的帮助，安排一些贺喜的群众，同去朱家“贺喜”作为掩护。

那天，朱家大门口，张灯结彩，笙箫管笛吹打得十分热闹。贺喜送礼的人群熙熙攘攘，往来不绝。跟随徐文海一道去的那个战士，化装成勤务兵模样，留在村口观察动静，准备接应。徐文海夹在人群中间，大摇大摆地走进朱家大门。这时，朱家客厅里宴席已开，席上早就坐满了日寇头目、伪警长、汉奸、豪绅，猜拳行令，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徐文海装作若无其事，派头十足地要门房速去通报朱世科，说要有要人等候相见。不一会，只见一个肥头胖脑的家伙走出来，满脸堆笑地问：“先生，找我有何事？”徐文海向来人略略打量一番，已经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朱世科，故意轻声又郑重地说：“里山来的！”“里山”是国民党特务和伪军接头的暗语。朱世科听到“里山”二字，忙躬下腰，点头磕脑，说：“原来是贵客，得罪！得罪！”这时，徐文海四下看了看，低声对他说：“这里人多眼杂，不便细谈。”朱世科马上把手向里屋一伸，做着邀请的姿势，说：“那么，请里面谈吧！”

徐文海随着朱世科到了他儿子的新房里，坐下来，然后把那封介绍信交给了他。朱世科接过信拆开一看，立即喜形于色，急忙欠起身子，陪着笑脸道：“呵！原来是大队长，失

敬，失敬！”他马上把小儿子从楼上叫了下来，介绍说：

“这是小子怀旦，现任大通皇协军兴亚队副官。”徐文海略点一点头，这位副官忙着敬茶敬烟。这时，朱世科让儿子留在新房，陪着谈话，自己出去，表示要为“大队长”另设酒筵。

朱世科走出去以后，朱怀旦便坐到他那红红绿绿的花床上，徐文海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彼此客气一番。徐文海开口说道：“今日喜逢贵副官荣升和花烛之期，特来相贺。”

朱怀旦笑嘻嘻地说道：“不敢当，大队长到舍下来，我们全家非常欢迎。”

徐文海接着说：“这一带新四军神出鬼没，活动很厉害，我们的行动，请贵副官和朱会长多多协助。”

“没问题，没问题。”朱怀旦连连点头说：“小弟一定尽力，愿为大队长效犬马之劳。”

徐文海又问道：“最近贵地有新四军活动吗？”

“哼！新四军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朱怀旦狂妄地说：“要消灭新四军还不是容易的事，前次‘里山’来人，我介绍给皇军长岛太君，双方已经谈好，只要国军在前方积极清剿，后面有我们带领皇军出击，这样一来，新四军纵有天大本领，也难逃出我们的手掌。”说着，他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这时，徐文海看他这副汉奸走狗相，心里作呕，气炸肺腑，便趁这位副官不注意的时候，迅速把手插进长袍，握着驳壳枪，枪机一扣，子弹从徐文海的长袍里穿出，朱怀旦的脑袋开花，倒在他那新婚的床上，丧了狗命。朱世科听到枪声，便急急忙忙朝里屋冲来，被刚刚跨出门的徐文海一枪打倒在门槛边，四脚朝天，呜呼哀哉。客厅里那群喝得醉醺醺的人听

到枪声，顿时乱成一团，桌子闯翻了，杯盘打碎了，喊的喊，拥的拥，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有的跌倒在地，有的翻墙出逃。

驻在朱世科家隔壁的日军，听到维持会长家里几声枪响，不知出了什么事，便用机枪封锁了朱家大门，乱打一气。这时，徐文海完成了任务，早已扬长而去。

镇压了汉奸，打击了敌特，日寇极为恼怒，对我加紧了军事行动。有一次，日寇集结一千多人，从四面八方敌前的顺安、朱村、天宝三个乡进行扫荡。那时，我们部队正住在埂塘村，在拂晓前，哨兵报告前面发现敌情，但雾气茫茫，看不见人影，巫希权迅速带领部队到前沿阵地。部队刚散开卧倒，敌人的枪就响了，但情况不明，听枪声好象是顽军进攻。巫希权用望远镜四面瞭望，发现侧面盛家桥方向的敌人擎着太阳旗，才判断对方前沿阵地是伪军兴亚大队。巫希权当机立断，对我说：“政委，前面是鬼子，我们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你先将侧翼的部队撤走！”他却坚守前沿阵地，沉着应战，掩护部队后撤。随着枪声逐渐稀疏，我和撤下的同志为他们耽忧。一会儿，发现巫希权带着两个通信员，顺着田埂，边走边用望远镜观察敌人。这次同十倍于我的敌人进行激战，竟无一人伤亡。敌人采取各种形式的“清剿”活动，均以失败告终。

(九)

为了向敌后发展，不断扩大游击根据地，必须确保敌前敌后畅通无阻，但日寇盘踞的顺安镇却成为我们活动的一大

障碍。我们和敌前县委反复研究，决定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办法，开辟另一条战线，以达到控制顺安的目的。

这个地区，素有“小小的铜陵县，大大的顺安镇”之称。镇中有一条由南向北的顺安河，河流将整个镇子拦腰斩断，几百年前就有三孔大石桥把镇子连接起来。桥东叫东街，桥西叫西街，中为大街，还有横街、新街和后街。

镇上千把户人家，除了几户地主和开设的同兴隆、怡和祥、德兴裕、张一太、武道隆、郑广兴、杜德泰、毕益泰等京广百货、绸缎布匹、烟酒糕点、医药五金等商店外，其余都是小商小贩和手工作坊。

镇子虽小，但它所处的地位却很重要。北面连着长江，西面紧接铜陵县城，南面直通山区，东面可达荻港、芜湖。因有顺安河、芜铜路经过这里，不仅是沿江通往皖南山区要道，还是沪、宁和芜、铜江防的要冲。一九三八年，日军在占领上海、南京之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日寇长驱直入，很快攻占了安庆、九江、武汉。为确保长江防线，使其运输物资和兵力得以畅通，敌人沿着长江两岸设立大小据点。由于敌人兵力不足，这时铜陵县城驻有日寇一个联队部，张家冲驻一个大队和一个宪兵队。大队部派了一个中队日军和伪军进驻长龙山和顺安镇。

当时，国民党军驻在陈山冲、下楼铺一带，距顺安近在咫尺。这样，日寇设据点在顺安，一方面，将顺安作为卫星镇，以拱卫铜陵城；另一方面，可以武力胁迫顽军投降，进而便于日、伪、顽勾结，合力“清剿”新四军游击队和破坏抗日群众组织。

根据上述情况，铜青南党政军委员会，对顺安地区进行了研究。敌前县委书记王卓认为，要控制顺安，坚持斗争，将原地区划分为东三区和中二区，委派陶述祥为东三区委书记，金德培为中二区委书记。由于环境险恶，党的活动则采取游击形式，始终没有扎下根子。面对这种状况，王卓多次向我们反映，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物色地下党员周赐德打进敌巢，相机行动。

周赐德祖居顺安，抗日初期，他就入了党。父亲周铁匠学得一手铁匠手艺，日子还能够维持下去。为了不受镇上地主豪绅和地痞恶棍的欺侮，周铁匠信奉天主教，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从此，周赐德常常跟随父亲进教堂，看做弥撒，听诵圣经。教堂里有一神甫，能懂日语，常教教徒会话，久而久之，周赐德也能讲一些生活上常用的日语。他矮小精瘦，言语不多，不大出头露面，从不被人们所注意。根据这些条件，派他打进敌人心脏里去活动，确实是很理想的。

当时，县委布置给他的任务是：打进内部，相机行事，搜集情报，铲除奸细，瓦解敌人，保护人民。

从此，周赐德担任起镇上的党支部书记，他领导着地下党员朱光正、谢友山、季伯川等，根据县委的要求，以他们的高度警觉和勇敢顽强的精神，深入虎穴狼窝，出入生死线上，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许多任务。

日寇占领顺安镇，很快在顺安河上建起一座桥头碉堡。碉堡约有三层楼高，全用钢筋水泥浇铸而成，十分坚固。堡内有四、五十个日寇，七、八挺轻重机枪。碉堡下面的大桥两头，架设铁丝网，岗哨森严，对来往行人搜身盘查。夜

晚，两盏探照灯不时地从碉堡窗口向外交叉探照，几里之内，如同白昼。由于顺安大桥是南来北往必经之地，所以对我们开展游击活动是一个很大威胁。为了拔掉这个钉子，我和大队长巫希权、敌前县委书记王卓经过一番研究，找来金德培、周赐德，到铁湖嘴史仇图家里，由王卓和他俩具体讨论出一个调虎离山的计划。我们在原则上同意智取敌堡的方案，其战斗任务由周赐德回镇后，按照实际情况，做出具体实施。

当时，周赐德在顺安街上与另一个人合伙开了一座糕饼小店，他在店里当帐房。日军每次到店里买东西，老周笑脸相迎，有时故意少收钱，有的干脆奉送。一遇上机会，老周就带点糕饼和香烟，去碉堡送给日军。日子长了，日军对他也就信任了。老周从日军口中得知，顺安街上维持会长盛明选是个死心踏地投靠日寇的大汉奸，他敲榨勒索，欺压百姓，还挨户挨人造册登记，一一注明情况，送交日军备查。周赐德认为，不除掉盛明选这头拦路虎，会对下一步活动极为不利，于是决定镇压盛明选。

一天深夜，老周带上汪泽波，悄悄来到盛明选的住处，老周凑近房门，学着维持会里的勤务处麻子腔调，假说太君有要事相商，骗开了盛的房门。门一开，盛明选还没反映过来，就被猛扑上去的周、汪两人用绳索套住脖颈，结果了狗命。

第二天一早，周赐德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照样早早地去店里做买卖。不一会，老百姓轰到街头，嚷着：“昨晚盛明选被新四军打死了！”碉堡上的日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乱打枪。

汉奸盛明选被处决后，日军了解不到情况，又找不到人为他们拉夫派粮，一时成了聋子瞎子。日军小头目三郎，群众叫他三子，他找到了周赐德，问：“要什么人来当会长的好？”老周为难地说：“太君，难啊，你们驻在碉堡里，顺安街上空空荡荡，没有皇军保护，谁敢当维持会长呢！”不久，保甲长们呈上一张长长的请求书，要求皇军保护。日军怕他们外走，很快撤出了桥头碉堡，全部进驻顺安街上。

日军搬出桥头堡那天，周赐德殷勤地表示愿意帮忙。小头目三郎欣然同意。周赐德找来朱光正、李季春、季伯川等几个可靠同志，替日军搬运物资，暗地计谋，相机行事。朱光正扛上一只沉甸甸的木箱，心里估摸可能是一箱弹药，便和身旁的李季春递个眼色。当他们通过顺安河时，只听朱光正哎哟一声，连箱带人掉进河心，李季春一见连忙大叫：

“不好了，良民掉进水里了！”人们围拢过来，三郎也赶到河边。这时，李季春连衣跳进水去，好大一会，把朱光正救出水面，然后又一个猛子扎下去，把那只木箱踹进污泥里。他一忽儿冒上来，一忽儿扎下去，装作在水里寻找木箱。周赐德故意在三郎耳旁咕囔几句：“太君，苦力桥上看看的不干活，今天搬不完的。”三郎一面点头，一面嚷：“良民，快快上岸的！统统的干活！”当天夜里，李季春和朱光正两人架起小船，捞起那箱子弹，送到铁湖嘴部队里去。

调走了顺安桥头堡上的日军，我们在那一带活动方便多了。不久，顺安镇上日寇换防，小头目三郎调走了，来了个军曹头衔的林田。维持会没人维持，日寇就物色一个名叫李棠的接任会长。李棠曾在特务童兆鹏的油坊里当过管事，老婆是顺安美人张淑芳。他进维持会，只是为着好拿钱，守着

老婆过好日子。过去还未发现他干过坏事，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我把李棠和副会长找到萧村，经过争取，他们表示，愿给我们送情报，不做危害人民的事。

李棠到任后，维持会用人多了，除了勤务鲍麻子和几个原人外，还要增加一些听差人员。趁这机会，我们将谢友山、季伯川、熊孟传等同志派进维持会，周赐德也当上文书，掌管维持会的大印。时值维持会要发放良民证，我们立即通知周赐德，要他设法掌管良民证的发放。这样既能掌握敌人的动态，又能利用良民证掩护来往的同志。正在这时，镇上有个汉奸恶霸王楚衡的弟弟王老四看中了发放良民证这个肥缺，他用金钱买通了林田，挤进了维持会，也干起发放良民证的事来。

情况突变，如何是好？说来也巧，有天，周赐德和王老四都在发放良民证。老周见桌上放有一支金笔。休息的时候，他灵机一动，趁人不注意，随手将金笔塞进王老四的口袋里，自己假装小便，离开了屋子。过了一会，日军发现桌上金笔不翼而飞，四处寻找，大发雷霆。周赐德进屋后佯装诧异，帮忙寻找，并声色俱厉地喝道：“谁拿了太君的金笔，快拿出来，否则要搜查！”站在一旁的王老四也搭腔道：“对，搜查！”老周就势往前一站，解开衣服，说：“先搜我。”一连搜查了四、五个人，轮到王老四。他也解开了衣服，日军从他口袋里摸出那支金笔。王老四顿时吓呆了眼，脸色苍白，双腿发抖，待他稍一镇定，口中挤出：“这，这是谁害——害——”未等说完，日军一巴掌打过去，王老四捂住青紫的脸，哇哇直叫。

赶走了王老四，周赐德独揽了发放良民证的大权。由于

他机警灵活，善于同日军周旋，逐渐得到了信任。

日寇为了强化治安，决定成立顺安警察所，并向李棠提出，要周赐德担任所长。中二区委将这情况向敌前县委作了汇报，请示办法。我和王卓等认为，可以利用此职作掩护，以便更好地开展活动。

周赐德担任警察所长以后，即将谢友山、季伯川、熊孟传、张少山、杨家祥、杨老四等几个地下党员安插在警察所里，有的当上巡官，有的当上警长或警士，并秘密成立了党支部，由老周担任支部书记。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也想染指顺安，企图同日伪勾结，一起来对付我们，便派中统特务刘国和来镇上，但这个特务刚刚踏上丹凤乡境地，我们即通过警察所很快地斩断了他伸进来的魔爪。

控制了顺安镇警察所，我们在顺安一带活动更为频繁。在镇上，我们设立了税收机构，派税务人员郇鹏同志主持税收工作。当时，我们的活动经费，不少一部分就是在日本占领区筹集的。他们的活动又引起了驻守铜陵县城的日军洪部的注意，一面严令强化治安，一面派出侦缉队长徐德发前来调查。徐德发一到顺安镇，神气十足地来到警察所，要周赐德提供情报。

一连几日，周赐德想方设法，跟在徐德发身旁巧妙周旋。经过一番东拼西凑，周赐德给他搜罗了一大堆“情报”。徐德发一见喜形于色，就准备带着“情报”回去向主人请赏。周赐德借口途中不甚安全，表示派人护送，徐德发欣然允诺。动身那天，周赐德和区委书记金德培提前到长龙山脚下胡家祠堂近旁的一户群众家里等着。谢友山、季伯川两人

腰揣手枪，准备来到长龙山脚下将徐击毙。到达预定地点，谢友山掏出手枪，在徐身后连扣三次扳机，均是瞎火。眼看徐德发就走过胡家祠堂，再走一段路，就到山上日军据点脚下了。在这关键时刻，周赐德和金德培一商量，在群众家里拿了一根麻绳追了上去，边跑边喊：“谢友山，城里进不去啦！”徐德发见所长领人赶来，顿生疑窦。老周忙迎上去，说：“刚才皇军打来电话，说是防止新四军混进城，城门已经关闭。你们往返路中如遇不测，我这个所长可吃罪不起啊！”徐德发听了，心中稍安，随即摸出一张侦缉证晃了晃，说：“凭这个，还怕不得进城！”周赐德不以为然地说：“那个玩意，新四军不会伪造吗？上个月就发现过两次哩。”金德培和谢友山几人也在一旁催促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先上长龙山，请那里的太君写个证明，或打个电话进城去。”于是，徐德发随着四人向长龙山走去。

他们走了一阵，来到一座凉亭歇息，四个人一齐向徐德发围拢过来。金德培使了个眼色，几人抽出手枪对准徐德发，喝道：“徐德发，老实告诉你，我们四个都是新四军，今天代表祖国人民，惩办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汉奸卖国贼！”徐德发正想挣扎，麻绳已套上了他的脖子。

汉奸徐德发被处决几天后，日军头子林田前来问周赐德：“你的，那个徐德发，怎么不见格？”

周赐德先是安然自若，接着惊讶地反问：“噢！是啊，几天不见他，我正想问问太君你哩？”

林田觉得，这些特工人员独来独往，他人难以管束，也就默不作声地走了。

时隔十多天，日军洪部不见音讯，又派胡小六的来到顺

安镇。胡小六是当地人，熟人熟事，一到顺安镇上，正碰上我方税收员郜鹏，心中发生怀疑，就抓郜鹏见日军。周赐德碰巧赶到，不容犹豫，上去劝道：“六老弟，本乡本土何必呢？身边缺钱，我们帮个忙。”胡小六一来没有真实凭据，二来见钱眼红，马上放开郜鹏，说：“好说，好说，至少要有这个数。”他说着伸出一只巴掌，表示要五千块。老周说：“小意思。今天我只带二千，老弟要信得过我，明天准补三千，决不食言。”当晚，周赐德将此情况向金德培作了汇报。金德培和县委几位负责人作了认真研究，认为胡小六对我威胁很大，决定除掉此害。

第二天，胡小六果真来找周赐德补那三千块钱。老周拍着他的肩膀，神秘地告诉他：“六老弟，发大财的运气到了！”胡小六又惊又喜，眼睛一亮：“什么大财？”周赐德故意看看周围，不见有人，便低声说：“朱光正骗取了一个新四军游击队长的信任，答应今晚在他家接头。我们要是抓住这个游击队长，定有大赏！”接着又说：“老弟要是愿意，今晚这笔交易，我们合伙好了！”这个财迷心窍的胡小六喜笑颜开，信以为真。

当晚，金德培、谢友山、季伯川先在街道对面等候着。一会，胡小六摇摇摆摆进了朱家，金德培也紧跟进去。朱光正和妻子朱兰英见胡小六踏进了门，连忙端出酒菜来。胡小六瞧瞧周围站着几个彪形大汉，发现情况不对头，扭头就跑，被站在门口的谢友山一把抱住。胡小六平时爱好拳术，颇有几分力气，猛地把身子一抖，将谢友山掀倒在地，妄图夺门逃走。这时，金德培飞起一脚，踢在胡小六下腹，胡小六当即仰倒在地。老金随即猛扑上去，按住他的身子，抽拳就

打。胡小六刚要喊叫，又被老金伸手捂住嘴巴，他张口一咬，老金中指被咬伤，鲜血直淌。周赐德把大门关上，大家一拥而上，有的捂他的嘴巴，有的拳打脚踢，金德培用绳索在他颈上一勒，结束了这个汉奸的性命。

一阵滚打，惊动了周围的邻居。有几个群众跑来敲门，问出了什么事情。朱光正刚要回答，门外又传来急促的格登格登的皮靴声。有个人喊：“太君来了！”金德培知道日寇来了，急中生智，一面要大家把胡小六尸体拖进灶屋，用柴草堆起来；一面对朱光正夫妇说：“兰英，你要大哭，装做夫妻吵架！”正在这时，大门被敲得轰轰直响。一打开大门，一个日寇进了屋，凶狠的眼光四周一扫，吼道：“你们，什么的？”他们先后作答：“太君，他夫妻打架的！”那个日寇看到金德培滴血的手指，忙问：“你的手指出血，是怎么搞的？快说的！”老金沉着地说：“太君，他们夫妻打架的，我去拉架，被她咬格。”在昏暗的灯光下，日寇也没看清，只见朱兰英披头散发地坐在凳上大哭，叫着：“你的，再要哇喇哇喇的，就要刺拉刺拉的！”说着转身走了。

镇压了特务，激烈的斗争仍在进行着。

顺安镇，不仅为日寇所严密控制，也引起伪和平军的垂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初，汉奸吴智和派了一个姓钱的伪军，住进顺安刺探情况。有次，我们派两个交通员挑着菜籽，装做去镇上打油，在街上正碰着姓钱的。这家伙说他在新四军时，见过这两个交通员常去送情报，当下便将两人扭送到日军据点。我们得此消息，立即派李小春送信给周赐德，要他设法救出两个交通员。

第二天，周赐德若无其事地去找日寇谈公事。此时，镇

上的日军又换防了，鬼头子叫伊藤，他见周赐德来到现场，便凶恶地用指挥刀指着被铁丝捆绑在木柱上的两个交通员，嚷着：“所长，你大大地坏了的，新四军顺安来的，为什么不报告太君的？”周赐德十分镇静地说：“什么新四兵的，我不明白格！”伊藤让翻译说明姓钱的认识这两人，确是新四军探子。周赐德故作惊讶，继而缓慢地说：“太君，这事可不是玩的，要是搞错了，良民不敢上街做买卖，太君米西米西的就困难大大的。”伊藤听了，眼珠转了几转，说：“你的所长，去调查调查的。”

老周边思索边向后街协成油坊走去。

这座油坊是特务童兆鹏开的。油坊里的师傅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在油坊里管帐的也是一般乡村里的贫苦寒士。他们是倾向我们的。

周赐德进了油坊，找到管帐先生赵老爹，问起挑菜籽的两人，赵老爹叹了口气，说：“那两人是从铁湖嘴挑菜籽来的，都是好人啰。你所长在日本人跟前干事，千万要做做好事，积积德呀！”周赐德思索片刻，说：“抓人的是那个姓钱的，赵老爹你先给我预备二百块钱，等会让那个姓钱的来取。那两人我设法营救。”赵老爹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慢说二百，二千也行！”

周赐德在街上找到了那个姓钱的伪军，两人啦呱几句，老周便把他带到一家茶社，泡了两杯香茶，边喝边谈。老周说：“钱大哥，你立了大功啦！”姓钱的假装不懂，问：“什么功？”老周接上说：“你老兄办的事，瞒得了皇帝，瞒不了太监。皇军亲口告诉我，你抓了两个挑菜籽的，究竟是什么人？”姓钱的说：“不瞒老兄，我在新四军里当兵，

常见到那两个人，这回碰了面，也活该他们倒霉！”老周说：“好运气，该你升官发财啦！”姓钱的叹口气：“哎，这玩意多担风险！升官发财谈何容易！”他指指荷包：“干到今天，还是两袋空空！”老周凑上前说：“哎呀，现成的财怎么不发呢？把那两个卖菜籽人的款子收过来嘛！”

姓钱的乐滋滋地到油坊去取款子，赵老爹故作为难，后来要他打张收据。姓钱的也就照办了。等他走后，赵老爹就把他打的收据，送到了周赐德手里。

第三天头上，周赐德见到伊藤报告说：“太君，我的调查明白明白格！”并告诉伊藤，姓钱的抓来两个卖菜籽的，完全是敲榨勒索，贪财害人。伊藤不大相信，老周便拿出那张字据说：“喏，这就是证据！”

伊藤看看收据，立即派人将那个姓钱的传到队部。一见面，伊藤冲着他骂道：“八格牙路！心大大的坏了，小偷的金票大大的有？”姓钱的莫名其妙，正想问个明白。伊藤不由分说，骂道：“你的将良民抓来刺啦刺啦的，你的将良民的金票大大的拿来的！”伊藤边骂边搜查姓钱的口袋，果然从他上衣口袋里搜出连号的二百块钞票。等到姓钱的稍明白过来，几个日寇把他拖出去，一顿棍棒落身，顿时昏死过去。次日，他龟缩到圩里老丈人家，再也不敢出来。

很快，我们两个交通员被放了出来，安全地回到了游击根据地。

此后，顺安镇上敌人开设的东亚洋行又成为我们新的斗争目标。洋行经理叫陈惠彭，是台湾人，他是跟着日寇一道进入镇上的。他当上经理，一面以低价收购本地土特产，一面以高价出售日货，从中榨取民脂民膏。陈惠彭成为日寇的

走狗，洋行也就是敌人的钱库了。由于我游击队活动频繁，同时芜湖到铜陵水路距离又远，来往货物运输显得十分困难。有一阵子，东亚洋行缺货关门，日寇催得紧，陈惠彭急得慌。有一天，陈惠彭跑到维持会里找到周赐德，神秘地说，“老周，货物全到啦，洋布、洋油、洋火、洋糖……”周赐德听他满口“洋”字，心中作呕，强听下去。他又说：“请给我一些良民证，我很快派民夫把货运回，太君正等着哩。”老周随口问道：“什么时间，在哪儿起货，这么急哟？”陈惠彭便将起货时间和地点说了出来。

陈惠彭前脚拿走了良民通行证，周赐德后脚送出了情报。当陈惠彭领着民夫将一船日货刚刚向顺安河开来，早在河边埋伏的民兵游击队立即冲上去，把洋货统统截获走了。陈惠彭见势不妙，跳进河里，游到对岸，向日寇报告了货物被截经过。

日寇头目一听暴跳如雷，立即带领十几个日兵，驾驶两条船向出事地点铁湖嘴划去，周赐德、谢友山、季伯川等也跟在日军队伍里。一进村子，日寇将村上的男女老少全部赶到稻场上集中起来，四周架设机枪，叫嚷着要老百姓报告情况，交代出是么什人抢走了物资。在这关键时刻，周赐德他们有意装出凶狠模样，问老百姓：“太君问你们，抢走物资是什么人，是不是中国兵，有多少人？到哪里去了？”老百姓领会意思，几个老人出来报告了一番。周赐德又回过头来，向日寇翻译说：“太君，刚才老百姓说了，中国兵来了好几百人，抢走东西就跑了。老百姓想出来向皇军报告，因为中国兵挨家挨户站岗看守，不许人走动，老百姓没法子到顺安来。”日寇听了也无可奈何，嚷道：“中国兵再来的，

要报告报告的。”一场即将发生的流血事件，就这样化险为夷了。

一九四三年春夏之间，我沿江地区突然发生了变化，参加我民主政权的沿江参议员崔光汉和混进我革命队伍里的陈孝顺在他们叛变前夕勾结伪军吴智和进驻顺安，控制了伪警察所，很快将周赐德抓去软禁起来，准备送到铜陵交给日寇。县委得知消息后，大队部有人主张马上派部队去途中拦截，我当时立即制止了这个冒险行动。我们根据情报进行分析，认为日寇软禁周赐德，并没有真实凭据，还有营救余地。于是，我们联络一班知名绅士，找到张家冲维持会长吴报国的儿子与顺安维持会长李棠，一则以金钱疏通，一则暗示利害以警告。不久，周赐德被放出来，但不许他离开顺安。为摆脱危险环境，我们通知他抓紧安排好其他同志的工作，迅速撤离顺安。正在这时，李棠要去荻港同那里的伪军头子鲍正刚会晤，老周带着爱人红霞，借口去芜湖看病，搭乘李棠的渔船，半途中丢开李棠上岸，回到了焦家铺根据地。我们派人将老周夫妇和东三区委书记陶述祥一道送到江北七师司令部。此后，他们一直在那里工作。

周赐德离开了顺安，敌人大肆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朱光正晚间游水渡河不幸牺牲。但顺安镇的地下党组织仍然在敌人的心脏里顽强地战斗着，而且愈战愈强，有力地配合武装斗争，在皖南革命史册上留下了传奇式的一页。

(十)

一九四二年九月，国民党三战区把川军一四四师调走，

调来一四五师。这个师和其他川军一样，虽不是国民党嫡系，但师长童希赞和副师长孟浩然均是蒋介石亲信，“清剿”十分卖力。

根据情况的变化，我们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在粉碎敌人“清剿”中，我们设法利用日伪顽之间的矛盾，达到瓦解和消耗敌人的目的。有天晚间，我和巫希权带着警卫排在范家湾宿营，黎明前向目莲庵附近村子转移。这个村子比较隐蔽，能进能退。警卫排先头走了，我和巫希权带着几个通讯员刚走出范家湾，就听到火烧坝方向传来枪声，问有的同志，他们都没留意。我感到情况异常，命侦察员迅速查明火烧坝方向的情况；同时通知先头部队，不要进村洗脸做饭，立即做好战斗准备。我和巫希权跑步追上部队，刚把部队带到村边土坎上的矮树丛中，就看到火烧坝村口大路上有一支队伍向我们冲来。天色已亮，透过田野上一层薄雾，只见跑在前面的一些人全部穿着便衣，拿着长短枪支，看来是国民党一四五师的便衣队。便衣队接近村子，呼啦散开队形，乱哄哄地包围上来。在便衣队后面，出现了大约有一个营兵力的顽军。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巫希权带着一个班战士跳进水沟，插到顽军侧翼，一刹时，顽军侧翼响起了一阵阵手榴弹的爆炸声，阵地上浓烟滚滚，顽兵死伤一片。我们随即撤到长龙山脚下，一四五师的那个营尾随紧追。为了甩掉顽军，部队迅速分散过河，到了羊湖村。这时，驻在长龙山据点的日寇听到密集的枪声，居高瞭望，看到成群的中国兵向河边蜂拥而来，一时摸不清头脑，连忙开炮轰击。同时，从张家冲出动日军一个中队向朱村插出来。顽军听到炮声，慌忙撤退。

部队到羊湖村，我们发现民运工作队副队长蒋云不见了。原来川军新七师谍报员徐云甲让蒋躲在他家里。后来，一四五师一到，就把蒋云交出，押到郎坑顽乡公所。经地方党组织营救，蒋云被释放出来。查明徐云甲搞我军情报，很快被我镇压了。

不久，部队转移到天宝乡一带。有天，我们隐蔽在离朱村日军据点不到五华里的后山村的松树林里。这时，日军出动到王家村奸淫掳掠。三中队一个班跃进到王家村附近，眼看到日寇正在大叫大嚷地追逐妇女，激起了战士们的无比愤慨。当日寇进入火力圈时，机枪射出一梭子弹，跑在前头的两、三个日寇栽倒在地。我们的侧翼部队又打倒五、六个日寇，剩下一个跑了回去。这一仗是白天打的，维持会又向日寇报告是一四五师伏击的。当晚，日寇集中了大队人马，向顽军驻地郎坑进攻，把这个师一个连几乎全歼。日寇从被俘的顽军那里了解到，在王家村附近伏击他们的是新四军，于是向我们进行报复。

一个夜里，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我们在离埂塘不到五华里的目莲庵宿营。半夜时分，路上的积雪已有四、五寸厚了，哨兵突然发现埂塘的大路黑压压的人影，向我们驻地慢慢移动。我们搞不清是日寇还是顽军，打与不打，犹豫不定。当我们发现约有七、八十个日寇时，我们才决定快撤。刚离开目莲庵向火烧坝走去，日寇已到目莲庵村子，大声叫嚷：“中国兵不要波罗波罗的！”三中队在目莲庵下面宿营，他们麻痹大意，正在休息。我要通讯员迅速通知三中队跟上撤走。查富德刚出门，一个日军头目上前把他胸前的驳壳枪的保险带抓住，老查趁势一脚把他踢倒了。那家伙随手

抽出指挥刀向查富德头上劈来，老查把头一偏，帽子砍掉地上，迅速跑出村子，跟上了大队。由于部队人多，在积雪的原野里，看上去好象是一条巨龙，在白茫茫的江河里向前滚动。日寇从埂塘一线搜索了半夜，已冻得够呛了，大叫：“中国兵不要波罗波罗的！”我同巫希权在田埂上边走边商量，认为其他方向敌情不明，只有加快步伐赶到曹家村，才能把日寇甩开，可是日军还是死跟紧随。如果日军进攻曹家村，我们准备以曹家村为依托，狠揍日军一顿。天快亮时，部队已隐蔽在马家冲山林中。日军搜索一夜，一无所得，天亮前只得撤回顺安镇去了。

那时，日寇在铜陵县城组织一个突击队，利用一群汉奸、地痞、流氓，经常深入到我中心区进行恐怖活动，残害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我们通过内线摸清他们的底细，将计就计，制服敌人。敌后县委派往坝埂头一带做地下工作的胡月亭，扮成商人在那里开展活动。坝埂头维持会长具有爱国心，比较靠近我们，胡月亭通过他的关系认识了坝埂头的日军头目，于是他就经常带着鸡和酒同那鬼头子交往。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胡月亭被那鬼头子看成好友，因此了解到不少敌伪活动情况，搞来一些重要情报。

由于，叛徒周良骥等出卖了胡月亭，铜陵城突击队窜到坝埂头，把胡抓去了。我铜陵敌后县委得知后非常着急，县委委员陈尚和找到坝埂头的维持会长，请他出面营救。于是，维持会长到坝埂头，向日寇头子说：“铜陵城突击队把太君的好朋友胡先生抓去了，说什么是中国兵的。”日寇头子表示惊讶，啊了两声没有说话。维持会长又说：“胡先生是个好良民，天天同太君干杯干杯的，是太君顶好顶好的朋友，要是

说他是中国兵，铜陵城洪部一定要责怪太君的。”这时，日寇头子猛地站了起来，表现非常惊慌。维持会长看到这句话打中了要害，接着又说：“坝埂头是太君管辖的地区，突击队不通告太君，就随便来这里抓人，太君的面子有没有格。”这时，日寇头子说：“你的顶好，到突击队那里，一块开路开路的。”

日寇头子见了突击队，大怒说：“胡先生是做买卖的，好朋友，天天同我干杯干杯的，什么中国兵？！把胡先生交给我的。”有个突击队的小头目向他辩白了几句，鬼头子大发脾气，把他痛打了一顿。这样一来，突击队把胡月亭交了出来，鬼头子把胡交给维持会长带回。

我们考虑，虽然利用敌伪之间的矛盾把胡月亭营救出来了，但是他已经暴露身分，若不很快离开坝埂头，还会发生危险，所以就把他调到了敌前顺安区工作。

一九四二年底，川军一四五师被调走，调来了川军新七师。但是，国民党三战区走马灯式地调动到皖南几个师，轮番的“清剿”都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改变策略，在武力“清剿”的同时，不断向游击根据地派遣特务，妄图勾结日伪，对我进行夹击。

有次，我们接到青阳县地下党组织打进敌人内部的许英汉送来的情报，得悉国民党三战区将要派两批特务潜入铜、繁敌后。一路从青阳城到甘家冲出发去铜陵敌后，一路由青阳城去繁昌敌后。我们得到这个情报后，加强了防范和警戒。

有天，县委机关转移到天宝乡的挂岭江村开会，警卫连在村后树林丛中设了便衣哨。当天下午一点多钟，从挂岭山

头下来一个老头，走进树林。哨兵迎上前去问他：“到哪里去？”老头说：“甘家冲甘保长叫我送信给江天行。”哨兵说：“好的，跟我来吧。”这老人给我们带来一封信。我接过信一看，内容大致是：有客人马上要到你处，你处商情如何？速复。这显然是黑话暗语。我马上对老头说：“信是给我的，回信也由你带去吧。”随即用毛笔写了回信，说明此地商情很好，客人可速来。老头带着回信走了。

我和朱农、陶述祥等带着侦察员在树林里等候“客人”光临。大约三点多钟，果然从甘家冲过来一男一女，后面跟着一个挑着箱笼的挑夫。一进树林，便衣哨走上前问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突然一问，那个约三十岁的男人十分惊慌，忙说：“我是到大通走亲戚的，这是我的老婆！”说着指了指站在旁边的女人。

“你是干什么事的？”侦察员又问。

“做豆腐的，我是做豆腐的！”他答道。

这时，在一旁冷冷看着的陶述祥走上来，劈头质问道：

“不要骗人！你瞧瞧自己，哪象一个做豆腐的？”男的接着说：“我是豆腐店的老板。”

那男人削尖的脸，留着分头，穿一件半旧的长大褂。经老陶这样一问，他也搞不清什么地方露了破绽，一双老鼠眼不禁滴溜溜地打量着自己身上。大概意识到布大褂里面的绸长衫不大象豆腐店老板的衣着吧，便连忙把布大褂扯了扯，似乎这就能把绸衫盖得更严实。看着他那般的窘态，陶述祥哈哈大笑起来。

朱农和陶述祥把这对男女隔离开来进行盘问。女的很快交代了。原来他俩并非夫妻，女的娘家在大通，婆家在太平

杜村，男的在芜湖广益教会学校上学时认识了她家的一个亲戚。这次，通过她的亲戚，那男人找到了她，给她一笔钱，叫她假冒夫妻，结伴去大通。审问那个男的时，他虽然一言不发，但却十分慌乱。

夜间，我们转移到天坪山日军据点脚下的山棚里。我找他谈话，反复说明我们团结抗日的政策，指出只要弃暗投明，我们是不会随便杀害一个青年的。约谈了一小时，他忽然叹了口气。我说，“不要叹气，你从甘家冲谁家来的，到江村又是我谁的，来龙去脉，我们都清楚，我们早就在此等你了。现在你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老实交代问题！”眼看无法抵赖，只得交代说：“我姓杜，叫杜发祥，是新七师的情报科长……”我打断他的话说：“行了，你说出来很好，今晚就谈到这里，你好好休息吧！”我叫警卫员把他安置在山棚里的吊板上睡觉，严加看守。我们睡在巴茅草的地铺上。

第二天早饭后，姓杜的把他们如何通过伪军兴亚大队勾结鬼子合击我们，以及国民党太平县和青阳县特务系统的情况细细作了交代。这时，我们才知道江村还有一个特务组织联络站，负责人是江天行。为了顺藤摸瓜，继续了解特务活动规律，暂时没有触动他们。

那个国民党新七师情报科长交代清楚后，我们给了他一些路费，把他释放了。临走时，我警告他，今后如果再干特务，我们就将他亲笔写的供词交给新七师。

我们查明情况后，在青阳甘家冲召开群众大会，把姓甘的保长处决了。正在这时，马俊丰和杨林等从挂岭到天宝乡前冲。路过泉塘时，马俊丰大腿被特务击伤，被抬到柴塘养伤，

因腿部红肿，卫生员打吗啡止痛，药物反应而不幸逝世。因此，我们狠狠打击特务和汉奸的破坏活动，严防敌特混入革命队伍。在一九四二年秋冬之间，敌前县委书记王卓和大队部副官刘武到江北开会，在江心洲返回南岸时，被坝埂头日寇抓去了，押解到铜陵县。根据上级指示，我任敌前县委书记。

一九四三年开春以后，铜青南抗日武装又有了发展，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敌前、敌后游击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因此，上级决定撤消铜陵敌前、敌后两个县委，成立铜青南县委，由皖南地委组织部长张伟烈兼任县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兼铜青南大队政委，朱农任组织部长，陈爱曦任宣传部长。许达抱为县委委员兼青北工委书记。县委下辖四个区委：沙洲区委，书记鲁吼；凤心区委，书记汤恺；顺安区委，书记胡月亭；五峰区委，书记汪明（后叛变投敌）。一九四四年以后，又发展三个区。童埠区委，书记陈中明，副书记尹彬；何湾区委，书记张良士；丹凤区委，书记周坚凯（陶刚）。

（十一）

一九四三年春夏之际，敌后凤心区的皖江参议员崔光汉叛变投敌，我部在杨家堍遭到数十倍于我的日寇的攻击，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崔光汉是铜陵敌后的大地主，国民党员。抗日战争初期，他伪装进步，成为统战对象，一度为我所用，在我“三三制”民主政权中，担任皖江行署参议员。但由于他的反动本质难移，在敌伪顽向我残酷合围“清剿”中，认为时机已

到，便通过顺安日特童兆鹏的关系，与国民党中统特务刘国和勾结起来，阴谋危害革命，成为狗彘之徒。

对于崔光汉的反常行动，我们当时就有些觉察。在他公开叛变前夕，有次我从江北开会回来，路过他家住的焦家村，准备去找设在村上的一个交通站。崔得知我们经过这里，硬是把我们拉到他家坐坐，并虚情假意地要留我吃饭、住宿。我们在他家坐了片刻，坚持要走。正要动身时，他突然说：“鬼子来了！”随我一道的侦察员徐文海非常机警，立即拔出驳壳枪，压上一梭子弹，怒目圆睁，直盯崔光汉。崔和他弟弟光国一看事情不妙，脸有惧色，连忙改口说：“不要紧，不要紧，鬼子是不会进我家门的。”我们随即离开了那里。

崔光汉为取得日寇信任，他以出卖临江办事处副主任陈益卿作为献给日军的见面礼。陈益卿被鬼子抓到坝埂头据点，惨遭毒刑拷打，英勇不屈，壮烈牺牲。接着，崔伙同童兆鹏、顺安汉奸王诚斋(绰号王三麻子)以及坝埂头汉奸陈孝顺等，带着日军在敌前敌后扫荡搜索，袭击游击队，逮捕我抗日人员。由于崔是本地人，又掌握着我们的一些情况和活动规律，对我们威胁甚大。

为了应付这突然变化的情况，我们在天宝乡叶家湖村召开了干部会议。巫希权提出要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特别是领导成员更要分散，以防万一。这次会议决定，把部队分为四支：一支深入敌后铜官山发动群众，一支到敌后东西湖一带牵制敌人，一支开辟贵池新区工作，一支留在敌前打击敌人。巫希权同教导员罗爱民、一中队指导员刘英带着大队部和一中队的部分战士，进入顺安和朱村一带。大队副

叶为祐和三中队中队长查富德分别去铜官山、东西湖地区活动。我带警卫班和部分病员，去青北工委的所在地茗山冲。县委机关由朱农、陈爱曦负责分散敌后，发动群众，同敌伪展开斗争。

我率领部分战士从天宝乡江村翻过挂岭，到了青北工委所在地。当时，青北工委设在茗山冲孙运峰家。这里地形很好，房屋后面可翻到青阳的甘家冲，翻过对面山就到铜陵的挂岭脚下江家村。孙运峰家是我们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来往的落脚点，他和他的母亲对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一到这里，就和许达抱、尹彬研究，决定去开辟贵东（贵池东部）新区。

我和许达抱、杨林、胡鲁森带领侦察班长符冬青到老鼠石山上观察周围情况，放眼瞭望，山脚下就是童埠湖，湖中心是扁担洲，长约四、五华里，宽约一华里，形似一条横放在湖心的扁担。相传，很早这一带洪水淹没农田，老百姓流离失所，一位关心民间疾苦的将军决心挑土填湖，正当他挑起满满两大筐土急步如飞地来到湖边，突然看到观音老母解手，止步不及，一下折断扁担，两截断扁担连同两只土筐飞落湖心，变成湖心扁担洲。后人为纪念这位将军，便在湖边修造了一座将军庙。我们在老鼠石山观察一阵后，来到山腰一座古庙。随我们侦察的杨林推门进庙，没料到庙里住着一个姓罗的国民党特务和他的老婆。这个特务见杨林进庙，慌忙抽出驳壳枪，随即拉开后门，边打边跑。我们立即还击，伤其腰部。当青北工委委员胡鲁森要追击时，被那个特务的老婆紧紧抱住双腿，那个姓罗的特务乘机逃掉了。第二天，我们过河到了贵东茅坦一带，在那一带活动了几天，遇到从江

北派到贵东的工作队负责人杨友华，得知吴文瑞不久要到贵东任县委书记。当时，皖江区党委和七师领导为了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以适应抗日反顽斗争，成立了沿江、皖南、含和、巢湖四个地委和所属四个支队。贵池地区属于沿江地委和沿江中心县委活动范围，林维先任沿江地委书记兼支队长，由赣东北调任沿江地委副书记的黄先兼沿江中心县委书记。沿江中心县委下属五个县委，除桐（城）、庐（江）县委，桐（城）、怀（宁）、潜（山）县委和东（流）、至（德）县委外，贵池划为两个县委，即贵桐县委，活动范围在贵池西部、桐城南部、怀宁的广济圩、东流的大渡口、八都河的南部山区，县委书记马守一，副书记陈定一，另一个贵青县委，活动在贵池东部——青阳西北部，由吴文瑞任县委书记。沿江地区斗争在林维先、黄先领导下，很快打开了局面，完成了打通七师与五师联系的重要任务。有时敌人向贵东、贵西等地扫荡，沿江中心县委机关就转移到茗山冲。这样，青北工委的茗山冲也就成为沿江中心县委的隐蔽地和联络站，使沿江和皖南地委联成一片。

我们在贵东活动了几天，又回到青北茗山冲。几天没有听到大队部活动的消息，很不放心。我一到茗山冲，就问尹彬：“敌前有什么消息，大队部派人来联系过吗？”他说：“一个星期未联系上了。”我又问：“你派人去了没有？”他说：“派了两个裁缝，但是都没有回来。”我听了非常着急，烦躁不安，在门外草地上来回踱步。突然间，侦察员周汉清从山上跑下来，上气不接下气，说：“政委，不，不好了，巫大队长范家湾牺牲了！”犹如晴天霹雳，极大地震动了我和在场的同志们。

我和许达抱要老周进屋详谈。我含着眼泪听完了老周的汇报，当晚带了两个侦察员，向范家湾奔去。

第二天清晨，我们到了铜陵挂岭脚下的江村，找到一中队管理排长陈敏了解情况，接着沿着顺安河到了木鱼山和范家湾出事现场，从隐藏在木鱼山上的大队部书记胡醒等那里得知出事的原委。

原来，头一天巫希权、罗爱民和一中队指导员刘英他们在长龙山附近伏击，打死了几个日寇。刘英在伏击战中负伤，被送到卫生所去治疗了。巫希权带着部队回到了杨家垄，准备当晚转移到天宝乡。恰巧，地委组织部长兼县委书记张伟烈从江北到铜陵，经过杨家垄，大队副叶为祐又从铜官山回到这里。他们在这里连夜找部队和地方干部谈话。散会后，天正下着雨，于是他们就在这里宿营了。汉奸王三麻子得到这个情报，第二天拂晓带着日寇从几路合击杨家垄。巫希权和叶为祐带领部队边打边撤，一直撤到范家湾河边。这时，河水猛涨，背水作战，断绝了退路。巫希权要张伟烈等坐上小木盆，渡过河去。他带着战士们顽强阻击，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当张伟烈、胡月亭等到达对岸时，敌人又冲了上来。就在弹尽的紧急关头，巫希权高喊：“同志们，游过河去，死也不做俘虏！”喊着，便带头跳下了水。

范家湾河流本来不深，我们以往行军打仗，常常涉水而过。但这时正值夏季，上游连天暴雨，洪水猛涨，象猛兽一样直冲下来，冲击着过河的战士。当他们游到河心，一个浪头把一个战士打沉水底，他一面泅去营救，一面要大家互相挽臂前进。可是一个个巨浪打来，一个个旋窝卷来，除负伤的罗爱民奋力游过河外，其余同志沉没水中。

在范家湾事件中，巫希权、叶为祐和二十八位英勇战士壮烈牺牲了。顺安区委书记罗建新和敌后负责税收工作的陈孝凯坐着木盆过河也不幸沉牺牲。我们部队唯一的一位炊事员，记不起他的真实姓名了，只知道他是福建人，三十开外年纪，操一口难以听懂的福建话，又长着一头卷发，大家都叫他“洋人”。他是红军时代的一位老战士，一直担任炊事工作。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不少当上了连长、营长，而他毫不计较自己的职务，整天乐乐和和、无忧无虑，一心扑在工作上。部队一到宿营地，他赶忙埋锅造饭；枪声一响，他就摸起武器参加战斗。在这次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落入虎口。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破口大骂，最后惨遭杀害。

面对着巫希权、叶为祐和全体牺牲的烈士们的遗体，望着那奔腾不息的范家湾河流，更加引起我们对战友的怀念，激起我们对敌人的满腔愤怒！

（十二）

“范家湾事件”发生后，巫希权、叶为祐牺牲，罗爱民因负伤送往江北疗养。大队领导只剩我一人，我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这时，铜青南县委作了调整，我为书记，朱农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陈爱曦不久调去繁昌县委工作，青北工委书记许达抱调贵西县委工作去了。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把沿江地区的斗争坚持到底。

一九四三年秋，顽一四五师和新七师接连撤换走了，川军一四四师第三次回防沿江地区。由于我们对该师有统战工

作的基础，这时我们又积极争取该师全体官兵，颇有成效，因而，我铜、青、南局势逐渐得到稳定。就在这样的斗争环境中，我们对地方统战工作加强了，革命力量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最初，有的同志对于统战工作的意义不甚理解，认为我们尽与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地主绅士打交道，就是立场不稳，界限不清。但斗争实践证明，哪里统战工作开展得好，哪里就能发展，反之，就要受到挫折，就要失败。记得，我们部队刚到铜陵、郎坑与陈山冲之间的马家村开展工作时，村上开明士绅马太元，家庭很富庶，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誉。我们获悉，他儿子是国民党派进郎坑乡公所的谍报人员，专门搜集我方情报。我们当即派人对他说：“马先生，请你转告令郎，在乡公所混个差事、搞点钱花是可以的。但听说他当了特务，专搞我军的情报，如不改正，别怪我们不容情！”马太元惊讶地说：“一定，一定！”可是过了许多时候，他儿子还是继续进行特务活动。我们又再三要马太元对他儿子进行规劝和警告，马太元总是说：“贵军的忠告，我全部转告逆子了，他坚持说并没有当特务，更没有搞情报。”有的同志听了十分气愤，说这个老家伙准同他儿子穿着连裆裤子，一块干掉算了。我们说服这些同志，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搞株连法，老头子的情况还没有查清楚，更不能过早下结论。当前，一切愿意抗日的组织和个人，包括农村中愿意抗日的地主豪绅、国民党乡保长等等，都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决不能轻易推到敌人方面去。特别是在这种新开辟的地区，更应该树立政策观念。我们对马太元继续晓以民族大义，以诚相待。有一天，他儿子到曹村搞我方情报，夜

晚溜回家中，地方党马上报告了我们。于是，侦察员徐文海走去，就从床底下把他抓出来。地方上不少人看在马太元面上，出来说情。我说，那就有劳各位去请马老先生谈谈他的意见吧。马太元说：“我没有脸去见政委，多次教育他都不改，请按罪论处，我不管。”我们把他儿子镇压了。后来，我们打下顽郎坑乡公所的时候，缴获他儿子亲笔写的许多我方情报，还有他儿子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些来往信件。我们把这些证据送去给马太元过目，他大为震惊，连连说：“不错，不错，你们有理有节，有凭有据，我心悦诚服，没有话说。这小子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从此，马老先生十分钦佩我们，逐渐向我们靠拢，他的家还成了我们的一个联络点。有几次，国民党警保队搜查我地下党员，马老先生把我们的同志隐藏在家里。顽军来了，他气冲冲走上去挡驾，说：“你们敢上我家搜查？我连儿子都赔上了，你们敢不信任我？滚！”后来，他还把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了我游击队教导员陈亨昌。看到这些情形，大家非常兴奋，都说：“党的统战政策真灵哩！”经过革命实践的教育，战士和干部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政策胜人的道理，因而对统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普遍提高。

部队活动到丹凤乡时，首先了解情况。我们听说国民党乡长易明生为人比较正直，对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反共政策十分不满，便通过章啸衡的关系，派地方干部李成良、胡绍栋去做工作，使他逐渐倒向人民的一边。在困难的日子里，他掩护从事变中突围出来的两位同志归队，并暗暗为我们提供情报。后来，国民党县政府说他有通“匪”之嫌，暗地审查，他一气之下，坚辞乡长职务，隐居在离顺安五华里

的娥山脚下的庄屋里。他虽深居山中，但并不是不问政治的隐士，我们的小部队偶尔隐蔽到他那里去，他仍然积极掩护。

为了团结对敌，战胜日寇，我们政策放得很宽，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利用的尽量利用。哪怕今天是朋友，明天是敌人，能争取一天算一天。即使对反动分子也大部分不杀，个别罪大恶极、屡教不改、对革命有很大威胁者，则坚决镇压。例如，皖南事变后首任郎坑乡长的陈述言，经过当面多次规劝，没有效果，反而配合五十二师对我“清剿”，我们把他镇压了。顽副乡长胡守富向我投诚后，任我天宝乡副乡长，一度为我所用，后叛逃投敌，向敌人提供我方情报，我们也把他镇压了。群众拍手叫好说，镇压掉最顽固分子，大多数人才敢革命。所以我们的方针是，在反动分子中，只打击个别顽固的，比较反动的，尽量争取中立；原来中立的，争取靠拢我们。象张家冲维持会长吴报国，王冲、顺安等地的维持会长，还有伪警察所长和顽方乡保长，都能在我们掌握之中。回忆起来，当时我们在敌、伪、顽反动统治极其严密的江南地区，能够打得进去，站得住脚，并且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正确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十三)

这个时期，争取川军一四四师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

川军一四四师隶属第三战区，由二十三集团军第五十军辖制。该师原是刘湘部的骨干队伍，全师有二百多挺轻重机枪。每营有六挺重机枪，每团有机炮连，武器装备在川军中

比较好。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为扩展嫡系，乘机兼并，将刘湘所部诱骗出川，一四四师也未能幸免。

一九三七年冬一四四师出川后，开赴郑州，旋调新乡，继而转江南赴太湖，首战上兴埠，被日寇击败，奉命撤经郎溪、广德，退驻南陵三里店。次年春，又受命反攻芜湖日寇的精锐部队，在白马山一战，伤亡过半，许多士兵冬穿夏衣，在雪地中御敌，沿途溃退，大批伤员啼饥号寒，惨不忍睹。

皖南事变前夕，一四四师驻太平县境，接电昼夜进驻泾县茂林，密令对新四军实行堵截围剿。事变发生时，该师师部受到我突围战士的袭击，并且有不少战士就是从他们防线上冲出去的，所以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斥责一四四师反共不力，怀疑该师师长放走了项英，逼得该师师长神经错乱，挂印而去。这引起内部争权夺位，矛盾加剧。该师中下层官兵，不少人来自青年学生，原本怀着抗日报国热情参军，如今察觉受骗，幡然醒悟，不愿再为顽固派反共卖命，纷纷悄然解甲离队。留队的士兵锐气大减，思念家乡，精神空虚，长期局促于皖南一隅之地，薪饷层层剋扣，生活待遇低劣，吃不饱，穿不暖，还处处受着嫡系部队的窝囊气，心中更是不满。他们一有机会就去经商发财，甚至置办家业，以留后路。听说有个团长还买了一座“金盆照月”坟山，连祖坟也从四川迁到江南来了。

我们全面分析了川军官兵的处境，经常散发《告川军同胞书》，我们在马家村召开区、乡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对付敌、伪、顽的具体斗争措施，提出“争取川军，打击土顽，坚决与日伪作斗争”的口号。并采取各种方式，争取川军摆

脱国民党顽固派的控制，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我们政策开放，对于川军派人到根据地经商，让其自由往来。经过敌占区的，我们为了保护商人的安全，还派民兵护送。这样，不仅增加了我们的税收，还收集到顽方的情况，尤其能够买一些需用的物资，其中主要是枪支弹药。有次，一个肩挑小贩打扮的人，挑着一担草纸，径直来到我郎坑口的税收站。税收员问他从哪儿来，做什么生意，他一边擦起衣襟揩汗，一边打量税收人员，操着一口四川话，放心地说：“我姓范，杨政委知道我。这个货是送大队部的，别人动不得！”税收员把他送到总队部，货担一打开，草纸是挖空了的，里面藏着武器零件。战士们把零件装在一起，原来是一挺崭新的机枪。通过做生意，沟通了争取川军的渠道。不少川军中下层官兵同我军多次接触，加深对新四军的认识 and 了解，有的投奔我们，走上革命道路。

在战场上，我们对川军采取捉了就放、再捉再放的策略。有次，我们攻打顽丹凤乡公所，乡公所隔壁住着一个班川军。我们事先不了解情况，结果打了进去，抓到四个川军士兵。带回部队后，我们热情地请他们吃饭，谁知一看饭菜，四个人哭了起来。原来在他们那里有个旧习惯，犯人被杀前有一顿好菜饭，以为饭后定被杀头。看他们吓成那个样子，我们就和蔼地陪他们吃饭，边吃边讲道理。我们从全国抗战的形势谈到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从过去川军五十军和我新四军合作抗日的一段往事谈到我们对川军的期望。饭后，我们把枪支发还他们，还给了一些钱，送他们回一四四师。这件事震动了川军，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驻在郎坑的川军要进攻董家店的日寇，派谍报员通知我们让路，我们

就从泉塘撤到天宝乡的焦冲观察动静。天刚刚亮，阵阵密集的枪声，董家店据点的日寇被赶跑了。但川军取胜后，立刻一窝蜂去抢东西，日寇一个反攻，打得川军措手不及，败了回来。我们认为，川军敢打鬼子，精神是好的，就写信给予鼓励，还把从日寇那里缴获的一支三八式步枪以及几只钢盔、铝锅送去，让他们拿去报功请赏。他们感激不尽，马上回送了我们一些枪支弹药，并在川军中到处传扬：“新四军真够朋友！”

一天夜里，我们决定收拾设在三条冲的顽铜陵县国民政府，部队很快打了进去，并歼灭了警保中队的大部。当时一四四师在三条冲附近住了一个营，山头上棚子里住一个排哨。他们听到枪声，明知我军在攻打顽县政府，却装聋作哑。直到战斗结束，他们才派人下山来对我军说：“同志，你们要走了，不走不好办，我们交不了差。”我军撤走后，他们的轻重机枪乒乒乓乓地响个不停，曳光弹满天飞舞，好象欢送我军凯旋一般。

顽县政府为了集中力量向我军反扑，把陶城、丹凤两个乡公所和一个区政府集中到舒家店，成立了联防队。我们决定除掉它。部署完毕，部队分三路进攻，侦察员从水沟进去，袭击顽区长的住处，一中队打丹凤乡公所，三中队打陶城乡公所。可惜我们事先不知道那天晚上顽县长也带着一个排住在舒百万家里。我们把日寇那里缴来的手榴弹一炸开，发出钢钢的响声，顽县长以为是日寇射来的钢炮，连忙带着警保队，拚命往后山逃窜。顽区长听到门响，便从窗口逃走了，驳壳枪放在床头被我缴获。这一仗，我们缴到几十条枪，把顽铜陵县政府赶跑到何家湾去了。当时附近驻有川

军，也不闻不问。

全歼顽铜陵的区乡联防队后，我们控制的范围扩展到郎坑、下楼铺、四方湖、盛家冲等地。这些山地变成我们活动的中心，减少了后顾之忧。一九四四年春季，由于我们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武装发展了，地区也扩大了。

(十四)

国民党军队内讧远远没有了结。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对一四四师采取极为毒辣的手段，一方面，驱使他们到前线作战，以削弱其实力；另一方面，对其上层军官明升暗降，削其实权，或者调出受训、走马换将，或者拉拢收买、培植亲信，甚至罗织罪名，加以处死或暗杀。直到一九四四年，国军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对立双方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原来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离职后，长官部为了控制和吞并该师，派遣少将高参柏良赴任师长。但在全师资历较高、具有野心的四三〇团团团长张昌德，拢络和联合四三一团团团长李志千和四三二团团团长黄克立等高级将领，拒不服从命令，公开抵制柏良上任，甚至策划在柏良上任途中铜山岭设伏，阻击柏良。顾祝同闻讯后大为恼火，决心将这支刘湘旧属彻底瓦解兼并，遂令五十军调一四四师到石埭整编。这时，张昌德已行师长职权，他通过长官部密友探清底细，顾祝同原计划在石埭将该师番号撤销，改编为预备队，然后收缴全部武器，再将官兵化整为零，补充到各个部队中去。张昌德立即召集会议，将得来的整编消息公诸于众。官兵闻听，众皆哗然，一致拒绝调遣，旋将全师兵力集中于章家渡，沿河构筑

工事，摆出决斗姿态。顾祝同见事机泄露，难以挽回，遂令新七师从榔桥西进，驻徽州的一四七师北上，驻宣城的五十二师南下，驻南陵的“挺二”纵队东压，又调一四五师、六十七师、一〇八师、一四八师和一九二师的陶广部，计九个师的兵力，大举围歼张昌德部。

张昌德面临重兵，自知不敌，从何家湾边战边向铜陵丹凤乡仓皇退走。正处危急之际，张昌德退到四方湖，马上通过

口中不住说着“局势紧张，局势逼人”的话。见此情景，我简单扼要地向他指出，部队不能退守此地，因为这里前有追兵，后有日寇，地面狭窄，难于回旋。我劝告他说，如今之计，只有速将部队转向钟鸣，再由繁昌的黄浒到油坊嘴过江北去，才是唯一出路。至于过江后怎么办，可以从长计议，局势好转还能打回来。张昌德显然领会了我的意图，但他面有难色，说是情况紧急，五十二师已经截断了钟鸣到黄浒的去路。我又婉转地建议，可以取道贵池，向川军一四八师靠拢，争取得到同情和支援。张昌德不加思索地表示赞成。我当时考虑，如能到贵池，我沿江支队在那里，可以慢慢说服他们过江，棋还是一步一步地走为好。说后，张昌德即从埂塘村转天宝乡，在挂岭脚下的江家村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去从大计。会议开得很长，争论不休，不得要领。结果五十二师从埂塘方向追击上来，会议不了了之。我与陈亨昌当时也在那儿，建议集中火力，坚守柴山与泉塘一线。他们接受建议，用几十挺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猛轰顽军，使阻击战取得胜利，并在泉塘一线击毙了五十二师的一个团长。五十二师加紧监督，新七师、一四五师轮番从挂岭侧面的柴山展开正面进攻，同时一九二师又从丫山插到青阳的甘家冲，袭击侧翼，形成钳形攻势。我们见局势严重，便由陈亨昌带领部队撤出这个地区，我和警卫排长徐文海带领警卫排，就地转移到青北工委所在地茗山冲，并派出两名侦察员跟随一四四师师部行动，随时与我联系。在青北工委，我和尹彬研究了当前形势和应该采取的对策。当我转到茗山冲的第二天，一四四师在柴山的战斗中失利，因而全部转到茗山冲，师部住在曾家村。

这时，我七师接到了我们对于一四四师与国民党三战区发生内讧的情况汇报，政委曾希圣鉴于这场战争势必对沿江形势产生很大影响，因而一方面，指示江南地方党和部队采取必要的措施和部署，以便对付骤然变化了的情况；另一方面，派张伟烈等到铜陵与我们联系，进一步开展争取川军工作。因为没有和我们联系上，便用电台指示沿江支队与我们取得联系。并派贵东大队大队长黄少臣到茗山冲来，和我们共同进行争取一四四师的工作。黄少臣同志原是川军一名下级军官，后弃暗投明，参加革命，他对川军内部很熟悉，所以协助我们工作十分有利。我几次到一四四师师部，郑重地向张昌德转达我七师领导对他的希望，并且陈述利害，动员他及早行动。我建议他派一个团，由我们配合袭击青阳丁桥的一九二师，但张昌德怕把部队散出去收不拢，没有采纳。对于何去何从，张昌德此时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他所关心的，主要是依靠同乡和帮会关系，拢络住全师官兵，以便保存实力，在敌、伪、顽以及新四军的矛盾交叉中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见他显出左右为难的态度，我便严正而诚恳地对他说：“我们新四军以国家民族为重，说话开诚布公。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希望你患难相共，团结抗日。除此而外，我们别无所图。何去何从，请你三思！”他连忙表示决不投降日寇，但同时又说，军官们意见不一，事情有些难办。当时，川军内部确实争论激烈，有些情况我们也已察知。川军四三一团团长李志千系土匪出身，是个见钱眼开、有奶是娘的人物。他那个团配有机炮连，在一四四师部队中战斗力较强。他坚决反对过江，说什么一四四师在皖南事变中打过新四军，过江后肯定会遭到报复。又说，新四军那种艰苦

生活，他们无论如何吃不下饭。在他的影响下，张昌德转为消极。可是，我们不知道李志千已暗暗与日寇谈判成功。李志千找到曾在他团里当过连长的吴洪年，同汉奸吴智和联系上了，然后又带领政工科长陈海如去接头。吴智和当即荐举一个山东人陈梦涛当翻译，第二天吴智和带领陈海如、陈梦涛和一个姓孙的卫士，在董家店会见日本军官小关。小关欣然接见，一面向南京侵华总部报告，一面把一四四师的一些随军家属押在董家店日寇据点附近，放一个营在那里看守，作为人质。日寇那时正从南京、芜湖调集部队开往湖北，进犯宜昌、沙市等地，威逼蒋介石投降，因而过往铜陵的日军常达几千人之多。李志千与日寇谈判成功后，日寇立即出来助战，袭击抢占挂岭的一九二师。一个五十开外、鬓发斑白的日寇头目，称为白毛太君的，在这次作战中被打死。于是，日寇大举进攻，进行报复，一九二师撤到青阳的木镇、丁桥一带。当一四四师转移到茗山冲的第二天，我又到它的师部去。正好发现张昌德派师政治部那个科长陈海如到董家店去。我问陈到董家店有何贵干，他说四三一团有家属在那里，去看看。我见情况有变，便与黄少臣商量，一面抓紧弄清情况，尽量争取一四四师；一面还要加倍提高警惕，谨慎行事。为了防备万一，我向张昌德要通行证。他拿出几十张自己的名片，亲自加盖私章，交给我，说：“这就作为通行证吧。”其实，一四四师中下层军人，特别是士兵，都普遍倾向我们，许多人公开要求到新四军去。我们通过哨兵的时候，只要说明自己是新四军，他们都很客气地让我们走进走出。到第三天早晨，我到张昌德那里打个招呼，准备到李志千的四三一团探听虚实。我在司令部逗留一会，看了一下对

面的朝阳山，那里过去是日寇的据点，山那边是塆上村，侧面是甘家冲。我问张昌德，“朝阳山上有多少人？”他说：“一个营。”我说：“要是敌人用短武器，以丛林掩护冲上来，你顶得住吗？你至少要安上电话，加强通讯联络，万一敌人进攻，随时可以增援。不然，敌人夺了制高点，司令部就会被压垮。”我走后，一九二师果然派一个团，用短武器进攻朝阳山，一四四师一个营被打垮了。由于有电话联络，他们及时派出四三〇团，由副团长率领冲上去，才把顽军打退，夺回了朝阳山制高点。四三〇团副团长负了轻伤。事后，川军很感激我们。

我到四三一团去，团部住在高一四四师师部不到五华里的戴家村。这个村子背后有一条小路通董家店。我们在途中碰见李志千带着警卫连上师部去。他一看到我们，便下马寒暄一番，看样子他是去找张昌德，商量下一步如何行动。我来到四三一团团部，见到团副，他透露了一点真情，说他们有一个营在董家店看守一四四师全部家属。我看他讲一口非常标准的川话，便问他：“你是四川人吗？川军远离家乡，不就是为了抗日救国吗？”他说自己不是四川人，是江苏人，但表示十分敬佩我们。不一会，他接到司令部电话，随即告诉我：“鬼子要来，请你回避一下。”我立即带警卫员唐刚和侦察班副班长符冬青等上山，在半山腰一个庙里隐蔽到三个晚上，观察动静。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马上派唐刚，通知尹彬注意隐蔽，把大队部的同志转移到敌前，与教导员陈亨昌取得联系，并要徐文海将警卫排转移到贵东去。当时，我还不知道陈亨昌已转移到江北无为去了。我们留下的同志准备必要时经扁担洲过童埠湖到贵东。

天刚亮，侦察员到戴家村了解情况，获悉昨天来了十几个日寇，当天就回去了。显然，日寇是在威逼一四四师投降，但张昌德究竟作何决策，还没有最后摸清楚。我冒了一点风险，重新回到茗山冲，到这个师师部作最后一行。我们到了那里；见到张昌德和他的秘书长。这个秘书长年龄三十多岁，是个大学生，一口四川话，后来才知道他是贵州人。他坦率地对我说：“杨政委，事已至此，再难挽回，我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教诲，我们今后在铜、青、南、繁相见！”我见大势已定，便要尹彬和青北工委的同志隐蔽到山上去，其余同志尽快地转移到贵东。

当晚，我们仍住在茗山冲。第二天早饭后，我和黄少臣各带一名警卫员动身离开，我们由茗山冲路过戴家村，听哨兵说张昌德在四三一团团部，便进去打个招呼。我一进李志千团部，看到他们刚进早餐，桌上放着一只小鸡，还有日本人送的凤尾鱼罐头。我随口说道：“这凤尾鱼好吃啊？”随即感到失言，便转了话题，对张昌德说：“我们的部队在老鼠石山一带活动，现在我们到那里去筹集一些粮食和猪、禽、蛋支援你们，明后天返回。”张昌德知道我们是不会再回来了，但表面上再三表示感谢我们，他一直把我们送上大路，对我说：“杨政委，再见！”

刚上大路，老百姓跑来说，杨同志，今天日寇可能要来。许多群众自告奋勇要护送我们。我们辞谢了乡亲对我们的关怀，另行派人探路。当时，我了解一四四师的士兵到大通去，路上碰着日寇，说是一四四师的，日寇根本不盘查。因此，我叫吴凯和我们拉开几十步距离，走在前面探路。吴凯原是一四四师投奔过来的，熟悉情况，所以这次一道来做

争取工作。我们商定，如果遇到日寇，就自称是一四四师的，到大通“开路开路的”。我们在后面听到话声，可以迅速转到两侧山上去隐蔽。哪知吴凯在前面被日寇抓住吓呆了，一言未发。日寇摸他头和手，说他是中国兵，把他送到童埠湖边上的许家村伪军据点去了。许家村伪军分队长和吴凯是老乡，就把他放了。他出来后，即过湖回到贵东去了。当时我们不知道出了事。我领头走到离戴家村半华里狭谷转弯处碰上了日寇。老远就听到日寇叫：“你，哪里开路开路的？”我一手插在衣袋里握紧手枪，一边伸出手大声回答：“我的一四四师，大通开路开路的！”我立即停了下来。日寇边走边说：“大通开路开路的，挺好挺好！”日寇到了我面前，问有没有小路，我说没有小路，只有大路，跟我开路开路的。我发现他们胸前符号有个“井”字，侧目一看，没有伪军跟着，显然，这是日寇的尖刀班，我立即大声说：“你的太君永井，我的明白明白的。”日寇高兴地说：“永井太君，你的明白格，挺好挺好！”我回过头低声向贵东大队长黄少臣以及警卫员唐刚等说：“你们退过桥去，看我的动作，要死只能死一个，你们可以跑掉！”但他们硬是站在桥边顶着不动，守护我，不愿离去。战争年代，同志间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是多么深厚啊！正在危急关头，几十个挑着箩筐的老百姓成群结队走来，一直插到我和日寇之间停下，把日寇同我们隔开了。我乘机招呼黄少臣和两个警卫员，赶快穿过人群，向后面走。离日寇约一百米了，我大声向日寇喊道：“你的休息休息的，不然，嘎崩嘎崩的，不行不行的！”日寇洋洋得意地在田埂上坐下来。我们从容地说：老子上山了。我们告诉一四四师四三一团的哨兵，说日寇来

了。但回头一看，张昌德正在戴家村的空地上向部队训话，很明显，他在动员迎接日寇。可是，他们怕日寇缴械，也把部队散开了。我们绕到日寇后面。从老百姓那里了解到，这次日寇来了一千多人。我们到了童埠湖边的何家村，找到交通员何启明，由他找到一条小船，我们乘船渡过童埠湖，到达贵池的茅坦乡，与吴文瑞会合了。他一见面就说：“你出来得好，七师已来电报要你们撤出。电报未能送进去，我们正耽心着呐！”

一四四师终于公开投敌，被改编为“皖南独立方面军”，在日寇监视下回到繁昌、南陵驻地。但是，很多下层官兵逃离出来，奔向我们，走上革命大道，有的后来成为我军出色的指挥员。这大概与我们做川军的争取工作有关吧！

（十五）

贵东的童埠湖，湖水澄澈，波平如镜，四周密匝匝地长着繁茂的芦苇，每当芦花怒放，厚厚的苇墙上随风荡漾着一片毛茸茸的芦花，远远看去，好象大朵的白云浮动在湖光山色之间，显得特别好看。童埠湖水产丰富，渔民天不亮撑着小船下湖，午后回来，船舱里总可泼喇喇地蹦着银光闪闪的大鲜鱼。更有一种江南土产——菱角，用晒干的菱角米熬粥，吃起来满口香甜，别有风味。但是，在旧社会，渔霸土豪敲骨吸髓，横行乡里，湖山再好，也无法造福于人民，尤其在当时，敌、伪、顽时来侵扰，渔霸趁火打劫，当地渔民辛辛苦苦打来鲜鱼，卖不出价钱，一年倒有大半年靠菱角菜、蒿草心和芦笋充饥。贫穷联系着疾病，这里还是血吸虫

病猖獗的地方。

我们转到这个地区，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组织抗敌协会和民兵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尽力解除群众的疾苦。

为了不增加群众负担，我们这支小部队非常艰苦，时值炎夏，我们多半是以菱角菜和蒿草心为主食，若要改善伙食，战士们驾着小船，下湖捕些鱼虾加餐。购买粮食和食盐之类必需品有困难，我们还向吴文瑞处借了二十万元法币。然而，利用这难得的战斗间隙，我们抓紧给战士上政治课和文化课，给战士们讲解面临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我还自告奋勇教大家唱国际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部队一边开展群众工作，一边开展军政训练，同时关注着周围的斗争形势，大家似乎忘记了生活的艰苦，充满着昂扬奋发的精神。

一九四四年初秋，我们由吴文瑞处返回茗山冲、挂岭脚一带，同这里的群众又见面了，群众中流传日寇散布的谣言：你们的太君杨明，已经刺拉刺拉的了！现在，群众见我们平安归来，惊喜交集。

接着，撤到江北整训的三个连部队也回来了。皖南支队临江团参谋长谢长华率领一个营部队，来加强铜青南地区的斗争，我们的兵力增强了。临江团部队在三条冲附近的水龙山构筑工事，不断打击国民党来犯的一九二师和挺二纵队，使根据地有了巩固的后方，那时县委机关住在舒家店。此外，一四四师投敌后，退回到南陵、繁昌一带，铜陵敌前形成了很大的空隙。”我们抓紧有利时机，迅速发展武装，打击敌人，扩大根据地。这个时期，由于地方党的加强和民兵的发展，主力和地方民兵配合得更为紧密，斗争的方式也更加灵

活多样了。

舒家店冲口子叫叶山，紧靠流潭圩，在圩里有座小山叫鲶鱼山，连着荻港。日寇在那里设有据点，驻着一个分队。日寇头目川岛常常下山奸淫掳掠，并强迫群众上山修工事。一天，日寇又下来抢劫，只留下一个生病的日寇在山上。民兵发现有一门迫击炮，便乘机把炮扛跑了。川岛回到山上，连忙要维持会派人找我们，愿意出钱买炮。我们说不要钱，要五挺机枪。日寇看这一手不行，就采取乱抓群众的方法要挟我们，满以为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把炮还他。我们立即要维持会出面，给日寇的上司铜陵县联队部写报告，说这班皇军下山搞东西，被新四军上山把炮缴去了，这事同老百姓根本没有关系。川岛太君找不到新四军，却抓走了不少老百姓。这些老百姓都是大大的好良民。这个报告，使日寇上司暴跳如雷，立即撤回了这个分队，释放了群众。不几天，那个川岛就被他的上司在铜陵县城“明正典刑”了。

铜官山区委书记陶述祥调走后，由邵麻子负责。他机智勇敢，起了作用。他们在矿工中发展党组织，在伪军中秘密发展救国会会员，并动员矿区工人搞炸药、雷管、弹药、电话机以及其他电讯器材，运往江北。还动员一百多名工人参军，概由交通员杨家林护送和联系。后杨家林有次在张家山从炮弹中取出炸药，发生爆炸，不幸光荣牺牲。老邵经常到离铜陵县城不到五华里的扫把沟日寇据点去侦察，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他发现日寇虽然表面上戒备森严，其实外强中干，如从背道奇袭，完全可以拔掉这个据点。经过研究，我二中队的精干武装进行奇袭，迅速攻进据点。缴获了一门钢炮和几支步枪，但却不见日寇的人影。日寇逃到哪里去了呢？原来，

狡猾的敌人早已在碉堡下面挖了一个暗堡，他们见新四军神兵天降，马上溜进乌龟壳里去了。在我主力和地方民兵的连续打击下，日寇龟缩在一些孤立的据点中不敢轻易行动。

对于顽军，我们在下楼铺附近歼灭了国民党铜陵县清剿大队，击毙大队长崔英，在青阳永圣桥，歼灭国民党特务武装李孝严部三十多人。在我皖南支队临江团部队过江后不久，国民党调来了挺二纵队。这支顽军有三个团，完全是特工部队。他们每次从三条冲附近的水龙山向我进攻，都被我临江团杀得大败而逃。挺二纵队见水龙山攻不进，便偷偷地绕开我临江团防线，转向郎坑一带进犯。我们得到情报，迅速从南陵的丫山打出去，迂回袭击它的后尾。在丫山附近，顽军用重机枪封锁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有个从一四四师起义来的一位战士，受过正规训练，枪法准，用枪榴弹把顽军的重机枪打哑了。部队一个猛冲，吓得顽军退回何家湾去。不久，国民党把挺二纵队调走，另增派一九二师进驻南陵。这个师一个团驻在何家湾，丫山附近的六里丁驻有一个连，经常骚扰百姓，颇为猖狂。何家湾区委书记张良士作了周密的侦察，了解到这个连顽军分别驻在河的两岸。由大队长袁观林和临江团谢参谋长各带一个连，分头同时发起攻击六里丁河东河西的顽军，二十分钟战斗结束，全歼一个连，缴了三挺机枪、六十多支步枪。这是我们重返皖南后第一次全歼顽正规军一个连的新胜利。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铜青南根据地愈加巩固和扩大。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铜青南县委作了调整，我任书记，张世杰任副书记，朱农为组织部长，萧陈人为宣传部长，他调繁昌后，李可夫为宣传部长，陈尚和为委员。上级

决定为加强江南地区的政权建设，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开始成立铜、青、南办事处，张世杰同志任主任。同年九月，在皖南成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铜陵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由县委副书记张世杰兼任，县政府有正规的公安、司法、行政、财政、教育、税收、货管等科局，分管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沈兰村为公安科长。县以下建立七个区政府，领导成员和办事机构都设制齐全，顺安区区长王卓，五峰区区长陈策，凤心区区长陈××，沙洲区区长陈××，何湾区区长王××，童埠区区长陈中明，丹凤区区长查×。这些区长，除王卓、陈中明随军北撤、陈策留下坚持皖南斗争外，其余几人在困难环境中，有的自首、有的叛变革命。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根据地生机蓬勃，各方面工作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区乡党委和支部进一步健全，在中心区域，有的还以保建立党支部。武装方面，除县大队和县警卫连外，区乡都有警卫连、排，各地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组织普遍得到发展，特别是群众性的参军运动，更是热火朝天，仅铜官山一处，就有三百多工人、农民参加了主力兵团。地方工作方面，减租减息等各项党的政策得到贯彻。后来，皖南专署在狮子山寺庙旧址上创办了“皖南中学”。广大群众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了生活，欢天喜地。每逢战斗，或者大部队路过，老百姓争先恐后慰劳部队，支援前线。攻打六里丁的时候，当地群众一个晚上组织了一百多付担架，有一个姓陈的雇农头天结婚，第二天也参加了担架队，还抱来了结婚用的新被条。这一仗，我方没有伤亡，担架队抬着战利品凯旋而归。群众杀猪宰羊，扶老携幼，慰劳子弟兵。姑娘、小伙子载歌载舞，到处响起一片胜利的歌声：

十月里的桂花哟十里香，
中国出了哎那个共产党。
共产党领导咱百姓，
领导咱百姓打那小东洋；
打那小东洋打那小东洋。
打败那东洋哎求解放！

.....

不久，皖南支队支队长梁金华率领临江团和铜青南大队进攻何家湾顽军。何家湾当时是国民党铜陵县政府所在地，除县警保中队外，还有一九二师一个营。晚上，部队悄悄开到何家湾附近，临江团侦察排首先摸进去，解决了顽军的哨兵。部队跟着冲进去，守军问我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回答：“自己人！”直到接近顽军，侦察排长大喊一声：“缴枪！”战士们扑上去，把前沿守军的武器缴了个精光。

正在这时，驻在附近祠堂里的一九二师的营部和一个连发现情况不妙，赶忙紧闭大门，向我开火。我们留下少数人对付警保队，其余部队马上散开，包围了祠堂，我一连和三连担任主攻。但是，顽军凭借屋高墙厚，负隅顽抗，轻重机枪雨点似地向我扫射。祠堂周围是一片开阔地，毫无隐蔽，对我攻坚部队十分不利，相持很久，也没有攻进去。守军把大门关着，我们用手榴弹炸，炸不开，用机关炮轰，以为机关炮是美国货，一定管用，哪知轰了几下，炮坏了。

提起那座机关炮，还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哩。机关炮是从一架美国飞机上拆卸下来的。那时，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盟国参战，作为盟国的美利坚合众国，派了飞机来中国参加抗日。大约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分，美国十四航空大

队飞行员约翰，驾驶一架P51型战斗机，轰炸日本的安庆机场，机上携带两枚小型炸弹，在俯冲投弹扫射时，因飞机遭地面火力射击受创，不能继续升高，被迫在附近的旱地上降落，约翰随即离开飞机逃离。约翰走到十多公里处的山地，遇上正去救援的我沿江游击队。游击队员们一会儿指指他，一会儿指指机场的方向，向他点头微笑，伸出姆指，表示对他的善意和钦佩，使他那恐惧心理消失。游击队带着他穿山越岭，晓行夜宿，经过三个白天，四个晚上，将他送到七师领导机关，受到曾希圣政委接见和谈话，七师一面向延安总部请示汇报，一面让他在根据地休息、参观。一个多月后，延安总部来电称，说美军派驻延安的联络组，要求送他回美国。七师立即派出师参议室参谋王敬之，担任翻译人员，专程护送他过江来到皖南。当时，我们县委机关驻在舒家店，特意在当地殷实之户舒百万家里举行了较为隆重的欢迎约翰的茶话会。茶话会开得十分愉快、热烈。约翰通过翻译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介绍了他个人和家庭情况，以及他执行任务时飞机受伤坠落逃脱的经过。在他讲述美国国内情况后，特别盛赞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和新四军将士的艰苦奋斗和牺牲精神。两天后，派人护送，将他交给一九二师转三战区，再到美国设在昆明空军基地总部，送回美国。

事隔一年后的一九四五年初夏，一架B24型轰炸机飞临繁昌荻港上空，轰炸停泊在那里装运铜官山铜矿石的日寇运输船，因俯冲轰炸的高度太低，飞机触到舰艇上的无线电天线，以致飞机不能再升高。改变航向朝北飞行，终于受伤掉在长江中。我泥汊区地方武装人员将跳进水中的美国飞行员约翰逊打捞上岸，送到我皖南铜繁办事处，然后仍和约翰一

样，经一九二师送到昆明美军空军总部，返回美国。机上的那座机关炮被我皖南支队从水底捞上来，送进七师军械制造修理厂进行改造，把原来的双管炮筒改为单管，留在皖南支队使用。我皖南支队支队长梁金华率领临江团来皖南沿江活动时，便将这座机关炮随队带来。原想与敌人作战时大显一下神威，但由于操作不熟练，轰了几炮，成了哑巴。于是，我们集中机枪火力，猛射祠堂墙壁，一下子轰开一个斗大的圆洞，透过圆洞可以看见里面顽军慌乱的样子。一连连长杨林因久攻不下，心情焦急，站起来手拿着驳壳枪向洞口观察，不幸胸部中弹负伤，经医治无效牺牲了。天亮之前，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支队部正在考虑重新部署作战方案的时候，侦察员报告一九二师两个营增援来了。鉴于部队已经疲劳，我们就主动撤走了。

这一仗虽没有攻进祠堂，但毙敌众多，并将国民党铜陵县政府从何家湾撵到南陵县最南端的大格里去了。

从此，铜青南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伪、顽的两面夹击被彻底粉碎了。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坚如盘石，不断壮大，成了继续向敌占区扩展的巩固基地和可靠后方。与此同时，沿江江南各小块根据地同样迅速发展，铜青南地区，向东和繁昌、芜湖、宣城地区，向西和贵池、东流地区，连成了一大片，整个皖南抗战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十一月，皖南地委和皖南支队领导机关从江北无为白茆洲过江迁到铜陵舒家店，并把临江团改为主力一团，铜青南部队和繁昌大队编为主力二团。除江北以外，我军在皖南就有了两个主力团。不久，皖南地区成立了专员公署，专员是

江靖宇。因舒家店作为地委和支队部所在地，我们县委和总队部迁到雷家湖附近山洼里，又把区的武装上升到县，另外成立了铜青南总队部，第一任总队副是傅家盈，后为敖得胜，在抗战胜利前夕，总队副是曾火生，总队长由县长张世杰兼任，政委由我兼任。总队以下设大队。当时，大队长是张玉田，教导员是刘英，这个大队调主力团后，又成立了新的大队，大队长是查富德，教导员是钱育秋。一九四五年新年来到，正好铜官山地区游击队夺得日寇在铜官山矿区的一批奶牛和山羊，根据地军民杀牛宰羊，会餐联欢，大家斗志昂扬，互相勉励，决心以更大规模的战斗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十六）

一九四五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路线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使侵华日寇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正当这时，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又驱使五十二师，配合独立三十三旅、挺二纵队、江苏保安团队一万多人，由苏浙皖边区指挥官刘秉哲指挥，向我苏浙军区进犯。我苏浙军区在粟裕亲自指挥下，进行了反顽斗争，给予进犯之敌严重打击，经过激战，歼灭顽军大部，缴获轻重机枪两百多挺，大小炮数十门。在这次反顽战斗中，特别可以告慰皖南事变的烈士的是：当年号称王牌的顽军五十二师，在一九四五年五月间，于浙西孝丰附近的韩章村北向我进犯时，被我王必成、江

渭清所率领的一纵队强烈反击，全歼五十二师两个团，击溃两个团，击毙该师一五四团团团长张俊清、副团长殷广金，并活捉了副师长。血债要用血来还，国民党顽军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此后，我百万雄师胜利渡过长江，五十二师从南京向杭州溃逃途中，于广德东南山区被解放军全部歼灭。那时，阴险凶残的原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充当了国民党二十八军军长，部队被歼灭后，化装逃到上海，企图向台湾逃跑，但被我军活捉。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法西斯宣告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这给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敌伪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在作战中投诚反正的人数迅速增多。一些日本下层军官和士兵认识到法西斯战争的不义性质和巨大危害，毅然投身到反法西斯阵线中来。在铜青南地区也有一位这样的反法西斯战士，这就是前日军伍长国政宪郎。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住在青阳县陈家大山脚的驼龙村据点的日军伍长国政宪郎带着我们散发的宣传品——敦促日军投降书，率领三个日本士兵，扛了一门迫击炮，他自己怀揣一支手枪，悄悄离开驼龙村据点，急速地向我根据地行进。不料，日军洪部很快发觉了，于是命令各个据点鬼子倾巢出动，沿途设卡，到处搜捕，当晚三个日兵被逮回，第二天押送铜陵联队部，惨遭烧死。国政宪郎隐蔽在大路边上一丛茅草里，侥幸获免。日寇撤回据点后，国政只身奔到青阳丁桥我根据地附近。丁桥的店门口南面有一座小山，叫老鼠石山，树林很是茂密。老鼠石山前

面，有一个童埠湖。山脚下不远处有座将军庙。湖上来往木船都要在这个码头停泊。国政宪郎白天在老鼠石山眺望四周，夜晚就蜷缩在树林丛中，一有船只靠岸，他就从山上下来，到将军庙码头，询问船老大和来往行人，重复那几句老话：“你的有没有新四兵的？”群众见他非军非民，中国话夹着日本音，手提着短枪，搞不清他的来历，总是回答：“不知道。”他一听这话，很感失望，于是苦苦哀求：“我的米西米西大大有的。”拍着肚皮表示饿了。有些群众见他面有饥色，深表同情，便送点食品给他。这样，六、七天过去了。有天，童埠区委书记陈中明、副书记尹彬得到群众的报告，说是老鼠石山上有个日军，天天打听新四军。正好我到童埠区检查工作，得知这情况，便和区委商量，通过维持会的翻译曾之美，去将军庙打听有无此事。翻译到将军庙一站，果然灵验，国政从山上下来了，他问曾之美：“你的有没有新四兵的？”曾答：“新四军大大的有，在山里山里的。”曾向他要枪，他坚决不肯，表示要见长官。曾要带他走，怕他有顾虑，告诉他新四军顶好顶好的，不会杀害你的。国政宪郎高兴地说：“我的大大明白明白的。”

童埠区委设在青阳县北乡的茗山冲，陈中明在这里接见了国政宪郎。当国政确认眼前便是他寻找已久的新四军时，他激动地双手举过头，虔诚地献出了自己的手枪。

在铜青南总队部，国政宪郎和总队部的领导人见了面。他是一个标准的日本人，矮胖的身材，又圆又大的脸庞，两道浓眉下面嵌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络腮胡髭刮得干干净净，下巴一片铁青，厚嘴唇、阔嘴巴，不时笑咧开来。他能说一些日常汉语，也认识一些常用汉字，他告诉我，他今年二十

多岁，中学毕业后，被日本当局强征入伍，受了三年军事训练，让他充当机枪射手，他的枪法比较准确。他介绍了他的经历：曾在铜陵部队当过喇叭长，后到驼龙当伍长。当他提到家里有一个老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时，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痛苦，悲痛欲绝，失声大哭。我们把日共领导人在延安发表的文章拿来，同他一起阅读：“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违反日本人民意志的。这是非正义的战争，注定要失败……全体日本军人只有向中国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读了这一节时，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们安慰他，交代我军政策，问他有什么要求，并告诉他，等胜利后，送他回国和亲人团聚。他说，我明白明白的，你的新四军大大的好，真正的为中国穷苦人打仗，我的参加新四军顶好顶好的。

我们答应了他的请求，把他放在总队部，同警卫战士一起生活、学习，从此国政宪郎便成为一名人民战士了。他情绪很高，整天乐乐和和，快快活活，和战士打成一片，既当先生又当学生。战士们同他混熟了，为了喊叫顺口，就叫他“国政”，把“宪郎”二字抹掉了，后来不少人只知道新四军有个“国政”，全称反倒生疏了。他跟战士们学打草鞋，缝补衣袜，学习中国话，他做战士们的军事教员。早晨，他第一个起床，跑到空场上操练武艺，等战士们到齐了，就教刺杀，练投弹，爬土坡，跳障碍，都是亲自示范。每次出操回来，他常常是一身泥土，遍体汗水。每遇公差出勤，他抢先参加，苦活累活，他带头去干，砍竹木，搭山棚，他放下锯子，就拿起斧头，忙得不亦乐乎。就连柴米油盐，他也关心，经常下厨房。有天傍晚，战士们都在驻地自由活动，

突然发现国政不见了，疑团难解，派人四出寻找。正在这时，暴风雨来了，山里更加阴暗，大伙儿都认为寻找无望，懊丧地回来了。没想到，国政挑着一担柴草直往厨房走去，只见他浑身湿透，活象从深潭中钻出来的水人。再看看那担柴草，根须俱在，泥土尚存，显然是他的柴刀砍钝了，柴草是连根拔出来的。他放下担子，面对迎上来的战士，咧开大嘴，憨厚地笑了。

那时，游击队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我怕国政一时吃不了这个苦，按照规定，便吩咐厨房加个菜，每餐多炒一碟他喜欢吃的炒鸡蛋。这也是一个优待国际友人的政策。他开始没发觉，过了几天，他对自己单独用餐感到怀疑，悄悄地去查看战士们的集体伙食。这才发现了秘密，原来战士们吃的都是一些蔬菜。他跑去问炊事员，他和战士为什么吃的两样，炊事员说是首长叫加的。国政又问首长吃些什么，炊事员又说：首长和战士一个样。这下他来火了；怎么也不吃，记得炊事员对他下命令：一定要米西米西的！他放下筷子说：不行不行的！两人相持不下。这时我正好赶到，一询问方知底细。我看国政一副生气模样，坐在一旁，硬是不吃饭，只好叫炊事员撤去一碟炒鸡蛋。这样一来，他看看我，咧嘴笑了，端起饭碗，狼吞虎咽吃起来，吃得是那样香甜。

国政烟瘾很大，没有香烟就改用竹子做黄烟斗子，没有烟叶，就拣些干树叶子卷成烟卷，一抽起来，烟雾升腾，他自己也呛得眼泪鼻涕流淌满面，战士们见此光景，总要引起一阵哄笑。在困难时刻，国政下决心戒烟，把烟斗折断发誓再不抽烟。一次，我们袭击了伪军一个据点，缴获了一些“小刀”牌香烟，有个通信员故意逗他，说：“国政，‘踏百格’

大大有的，米西米西顶好的！”国政开始不肯抽，说抽了没有面子咯，但经不起小鬼有意挑逗，小鬼说躲在屋拐旁抽，人家不知道，没关系。国政便悄悄抽起“小刀”牌香烟来。这个通信员看国政真抽烟了，出来大喊大叫“国政又抽烟了”。这一来，弄得国政脸刷地红了起来，连连说：“面子没有没有咯。我发誓不再抽‘踏百格’的！”从此，再不见国政抽烟了。总队部得知这一情况后，教育通信员不要和国政开玩笑，应向国政学习，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

游击队转移频繁，有时一个晚上要转移几处，国政到了警卫连，开始不习惯这样的战争生活，又怕跟不上部队行动，晚上睡觉，他都是不解背包，和衣而卧。有的战士对他不很放心，当他一躺下，就重重地把他敲醒，严肃地说：“国政，你这样不行不行的？”国政起初莫名其妙。仔细揣摩以后，有点明白了，他大发脾气说：“你的怕我波罗波罗的。我的要波罗波罗的，就不会来来的，你的不明白，首长明白咯。”他要与那个战士来见我讲理。第二天清晨，我到警卫连看望国政，他们同我谈到昨晚的情况，我对国政说，你昨晚发脾气了吗！国政连忙说，没有没有，是开玩笑的。我当即安慰地说：“国政，我们是相信你的，大家怕你睡着受凉，生病不好，我们这里没有医院，才要你脱衣解背包睡觉。”他听了这话，去找那个战士手拉手儿，高兴地笑着走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同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我皖南抗日军民立即全力以赴，向敌伪据点展开进攻，积极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大反攻。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盼望

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消息传来，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士激动得热泪盈眶。国政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赶忙把日共领导人文章中一段话的上句和下句用手按住，中间显示出“日本投降了”的词句，手舞足蹈，兴高采烈，不住地喊着“日本投降了！”他和大家一起分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喜悦。

但是，蒋介石为了独占全国抗日军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赢得的胜利果实，竟然发布命令，不准我军受降，并命令各地敌伪继续抵抗我军的反攻；同时，又命令顽军积极向解放区推进。面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同志们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消灭拒降日伪军的命令，加紧围攻敌伪据点。顺安据点的日军在我们部队前去受降时，拒不缴械，还向我们开枪。我们立即包围了据点，国政宪郎爬上电线杆，接通电话，向鬼子官兵喊话：“喂，投降吧！我是铜陵联队部的喇叭长，叫国政宪郎，我投降了，新四军待我很好，还要送我回家。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才是唯一的出路……”可是话筒里传出日寇“巴格牙路”的声音，并摔掉话筒，国政很机敏，说敌人发脾气了，要开炮了，赶快散开，但他自己仍在不停地喊话。结果，敌人果然开了炮，一股敌人冲了出来，一溜烟朝铜陵县城逃去。我们歼灭了一部分敌伪军，胜利进入顺安镇，顺安人民喜气洋洋地迎接我们这支子弟兵，人们的欢呼声象春雷一样，在晴朗的天空里震响开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抗战胜利了！胜利了！”

.....

九月二日，日寇正式签字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秋日江南，红枫如火，野菊似金。根据形势的发展，我坚持皖南斗争的抗日战士为履行重庆谈判的协议，奉命撤出江南，渡江北上。当我们离开这片曾经洒过鲜血的土地，告别骨肉相连、同生共死的父老乡亲的时候，一种依恋的情感不禁油然而生，巫希权、叶为祐、陈益卿、刘和安、马俊丰、杨林、罗建新、陈孝凯、孙太然以及许多现在不复记得姓名的战友和群众的面影，一一清晰地浮现脑海之中。多少有名和无名的烈士，在铜、青、南的土地上，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啊！他们用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革命的史册！看着一队队威武雄壮的战士们，我清醒地感到：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战斗并没有结束，新的严重考验还在等待着我們。

第四章 深入敌后

(一)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蒋介石一面加紧内战准备，一面玩弄和谈阴谋。我党中央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积极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并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的爆发。为此，我党在重庆谈判中表示：可将我党领导的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到陇海路以北以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

一九四五年九月底，皖南新四军部队奉命北撤。为了接受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上级命令所有部队及区、乡以上干部一星期内撤到江北。时间紧迫，来不及做思想工作，但广大指战员及地方干部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没几天时间，就迅速而秘密地撤出皖南，渡江来到无为县白马洲。在皖南沿江地区，南、繁、芜留下王文石、艾必发、毛和贵等四十多人。铜、青、南留下两个武工队，一个是张良士处，武工队长姚生、指导员朱生带一个排有三十五

人。原青北工委尹彬处，留下的武工队十多人，队长张亚东。他们的任务是，通过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镇压和破坏，保护党组织和新四军家属，并准备长期坚持斗争。铜陵、繁昌两个大队以及两个县的区乡警卫武装撤到江北后，整编为皖南支队三团，团长没有配备，副团长姓余、参谋长李二农、政治处主任曾火生，我为政委。

我团开进无为县二垄，刚刚宿营，皖南支队政委黄耀南派人要我速去。我赶到支队部，战士们早已进入梦乡。他热情地让我坐下，拿出华中局电报给我看。电报大意是：要在皖南留下五个连的兵力，组成一个小团，坚持皖南斗争，干部配备和经费给养要尽量满足。

坚持皖南地区的革命斗争，这是根据当时政治军事形势所作出的重要决策。重庆谈判进行期间，蒋介石就秘密颁发《剿匪手本》，“剿匪”命令和其他反共文件，并在我撤退后的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湖南五个解放区增派国民党军队进占。在广东、湖北、河南、苏北、皖北、山东、河北等地，国民党正规军已有七十余师开到解放区及其附近，进攻我军或准备进攻。针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暴行，党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这种形势下，华中局命令这支部队回师皖南，坚持斗争，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看着手中的电报，想着面临的形势。黄耀南开口问道：“老杨，你看留谁好呢？”我说：“部队都过江来了，地方干部也过江到巢湖边上，连人都难找到了。”他紧接着说：“返回皖南的部队，明天就要过江，否则，国民党广西军过来，封锁长江，过江就麻烦了。”我说：“现在只有动员三

团三营营长查富德和教导员钱秋育带两个连回去。”他说

“那你就赶快回去办吧。”我赶到三营营部时，天已大亮了。

当时，打败了日寇，分散在敌后打游击的干部战士会合到一起，犹如百川归海，汇成一支革命洪流。大家都希望从此跟随大部队走遍全国，去打大仗。查富德、钱秋育的心情同样如此。听我传达了华中局的电报和支队部的命令后，他俩感到很突然，但随即毫不犹豫地表示：只要革命需要，坚决服从命令！

我奔忙了一夜，便留在三营吃早饭，我边吃边想：查富德是搞军事的，钱秋育是搞政治工作的，都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回去恐有困难。我再三考虑，决定自己回去。于是，我把饭碗一放，马上给支队部写了封信，表示自己愿意回去，并要求全面执行华中局指示。警卫员带着我的信，骑马向支队部奔去。

黄耀南同志接到我的信后，立即和支队参谋长骑马赶到三团驻地。他们翻身下马，就对我说：“老杨，华中局已批准你带两个连回到皖南去。”

我微微一笑，说：“华中局回电哪会有这样快呀！这次是我提出回皖南的，但在兵力上可要按华中局指示办啊。”

参谋长不耐烦地说：“就给两个连，不要苛求了。”

有的同志听了，在一边嘀咕说：我们回去是为坚持皖南的斗争，什么“苛求”不“苛求”的？难道你们真的执行华中局指示吗！本位主义太重。我劝解一会，当即要大家离去。

黄耀南在旁听到了议论，连忙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但仍坚持说：“就按两个连吧，要抓紧时间，迅速过江。回去后

改为人民自卫军，和胡明取得联系。我们三个月就会回来的。”回去的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可以挑选，并答应给一千块光洋和几十斤烟土。

见此情况，我没有再多讲了，马上写了一封信，由黄耀南送给已走到巢湖边上的朱农、陈爱曦等同志，要他们速回（为了争取时间，黄耀南并给转移到巢湖边的地委机关发了电报）；并动员组织股长陶刚（周坚凯）、宣传股长马文杰随部队南返。南返部队实际兵力，从三团三营调一个连和警卫连的大部，从二团三营调一个主力连，共计二百九十七人，加上地方干部和警卫人员，共计有三百多人。连同北撤时留下铜、繁、青三县的武工队和地方干部，约四百多人。

十月四日，天高气爽，江风拂面。我们先派供给科长张建南化装成商人，过江到铜陵的十里场筹集船只，部队随后出发。经泥汊到石板洲，时已半夜，部队就地歇宿。大家心情兴奋，毫无倦意，一齐席地而坐，等待来自江南的消息。忽然，夜色笼罩的大江南岸燃起三堆通红的火光，这是张建南发出的安全讯号。不一会，江水哗哗响处，张建南率领着二十几条木船靠岸了。战士们进入船舱，扬帆向南岸进发。

皖南事变中，我同李步新等突围到江北皖江根据地，旋即奉命重返皖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现在，我再度奉命南返，想到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和皖南人民的期望，我的心潮不禁和江潮一样汹涌澎湃……

（二）

我们原打算驶向西边靠岸，有情报说，姚沟驻上了广西

军，我们便悄悄转动船头，折向十里场靠岸。当晚，我们宿营在铜陵县大姚村附近的山东圩，一面观察动静，一面派人找地方干部了解情况。六日，部队绕过顺安来到陈山冲。当地群众和干部眼看着部队北撤，都不知何日才能见面，这次我们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惊喜交集。

朱农、陈爱曦、陈尚和同几个警卫员共七个人，经无为江心洲过江到达坝埂头，很快赶到陈山冲。他们带来了地委指示：由王文石、朱农、陈爱曦和我组成沿江中心县委，我任书记，王文石为副书记，朱农为组织部长，陈爱曦为宣传部长。

当时，苏浙皖和皖江解放区的新四军主力均奉命北撤，留下坚持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部队有三支，一支是以胡明为首的皖南山区中心县委领导的约三百人的黄山游击队；一支是我沿江中心县委所领导的沿江游击队；还有一支是苏浙皖边区部队，包括一个主力营，若干武工队，共九百多人。苏浙皖边区工委书记兼部队政委为陈立平，司令员熊兆仁，参谋长倪南山。三支部队各自独立活动。一九四五年十月到次年二月，皖南山区情况比较缓和，山区中心县委抓紧有利时机，积极进行群众工作，相机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长期坚持的良好基础。但一九四五年十月，蒋军三战区主力开向苏南，进驻各大城市，控制京沪杭一线，以川军新七师及其他杂牌军共两万多人，向我苏浙皖边区发动大规模“清剿”。由于工委主要领导干部坚持斗争的方针任务和斗争方式缺乏明确认识，甚至离开了部队，致使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失去联系，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遭到严重损失。有的地区因领导者麻痹，留下的连队大部被打散，领导人被敌人逮捕。熊兆

仁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收容人员，联络各分工委，以太涌工委为基地，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保存了骨干，巩固了地区，打击了敌人。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苏浙皖地区部队总计保存下二百多人。

一九四五年十月，沿江地区处于暴风雨前夜，局势正在剧变过程中。因蒋军三战区主力开赴江苏，这时沿江地区敌军主要有：国民党一九二师，原驻防日军一部，伪独立方面军两个师三千多人。在蒋、日、伪军支持下，各地反动政权迅速建立，逃亡地主和国民党特务进入皖江根据地，积极组织反动地方武装，捕杀我地方干部，残害我军家属，强迫群众自首，倒租加租，反攻倒算，极为嚣张。我军北撤时，沙洲区区长胡平被敌人捉去，在犁桥惨遭杀害。面对严峻的形势，沿江中心县委于十月十日在铜陵县雁门萧村召开了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

在雁门萧村会议上，中心县委综合情况，分析形势，讨论和确定了坚持沿江斗争的方针任务和行动部署。大家一致认为，沿江一带，由于我们部队北撤，国民党军队抢占大城市，忙于接收，使铜、繁地区一度变成真空地带，但这是暂时的现象，估计一个月内还是平静的，一旦待他们接收完毕，了解我们南返情况后，就会向我们扑来。

沿江地区暂时不可能作为坚持皖南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因此决定争取时机，积极作好反“清剿”斗争准备。会议提出坚持皖南斗争的方针为：坚持隐蔽斗争，加紧积蓄力量，积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迅速与胡明打通联系，背靠山区，面向平原发展。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决定：（一）在集中领导、分散坚持原则下，将沿江地区划分为两个县级单

位，一是铜（陵）青（阳）南（陵）县委，由朱农、陈尚和、陶刚、尹彬组成，朱农兼任书记，带领一部主力就地坚持。二是南（陵）繁（昌）芜（湖）县委，由王文石、马文杰、王安葆等同志组成，王文石兼任书记。会上王文石提出该地领导力量薄弱，要调一个主力连，但未能同意，所以决定派马文杰任南繁芜县委宣传部长，并负责部队政治工作；同时排长姚克礼带一支精干部队，充实该地武装力量。三是泾（县）青（阳）南（陵）地区，其主要任务是建立隐蔽的游击基地，成为与胡明打通联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跳板。会议决定由陈爱曦率领警卫武装，先进军到青阳、泾县边区的宾山、厚岸等地，开辟主力部队进山的通道。这一点，对以后作战略转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部队化整为零，以武工队形式，分兵发动群众，并确定联络地点，规定每个领导干部都用化名，以便保守秘密，迷惑敌人。（三）鉴于皖南支队仅留给我部不到两个月的经费，一旦情况变化，给养困难，因此决定以武装配合，迅速恢复政权组织，进行征粮收税，筹集粮款物资，建立隐蔽据点，以备局势变化。为适应斗争形势，区乡政权采取单线领导关系，区乡长一人，特派员一人，通过政权建设武装，必要时就地打游击。这时建立的隐蔽基地，有铜陵县的大天坪山周围的杨树冲、茗山冲，五峰区周围的涧北冲、戴家村、羊山的十里长冲，繁昌县的红花山、小羊冲等地区。在紧要关头，这次会议统一了地方干部和部队的思想行动，是胜利开展和坚持皖南沿江地区游击战争的关键性会议。

会后，我们全力以赴，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加紧进行对敌人作斗争的准备。

我们首先统一整编了所有留在沿江地区的部队。为了适应全国政治情况的变化，以民变武装出现，来麻痹敌人。把部队改称为“皖南人民自卫军”的番号，成立自卫军总队部，查富德为总队副，钱秋育为政治处主任，我为政委。为了便于部队在统一指挥下灵活机动地坚持分散斗争，以武工队形式，分兵发动群众。我们为了缩小目标，把连队编为区队，每区队两个排约五、六十人。整个部队以南返的主力连为骨干，将包括北撤前留下的王文石、张良士、尹彬等各部武装，统一合编为第一、三、五、七、九、十一等六个区队。一、三、五区队为总队主力，七区队担任青北工委武装，九区队担任中心县委警卫武装，十一区队担任南繁芜县委武装。整编后，立即在干部中开展整风学习，在战士中进行形势与任务教育。同时，又拨了一批公款公粮，解决部队家属的实际困难，减少战士对家庭的顾虑，致使沿江部队在孤悬敌后的严酷斗争中没有发生过逃亡。做好以上工作是重要的条件。

紧接着，我们抓紧恢复和整顿地方组织，对地方党员和干部进行革命前途教育。因为北撤仓促，事前来不及对地方党和基层干部进行妥善安排，所以部队撤出后，不少地方同志思想混乱。有人提出“为党牺牲”的口号，准备一死了之；有人准备“解甲归田”，拿起锄头种庄稼。他们见到归来的部队，惊喜之余，又怀疑这样一支小部队能否坚持下去。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很难立住脚跟，打开局面。为此，我们在铜陵县顺安区的程山埠村召开了铜青南地区党员、干部会议。会上，我们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强调指出：我军的局部撤退是暂时的。针对蒋介石破坏《双十协

定》、加紧内战准备的倒行逆施，我党坚决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我们奉命返回皖南，就是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配合解放区的斗争，直到夺取全国胜利！我打个比方说，当前的斗争，好比山里人起大早走夜路，虽然天黑路险，容易摔跤，但势必越走天越亮，咬紧牙关挺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会上寂静无声，大家静听着，思索着，决定自己何去何从。我见大家这样认真地听，进一步说，目前，每个同志面前有三个去向，两个前途：一是到江苏六合集中，那里有收容机构，会把你们送到解放区去；二是坚持皖南游击战争；三是远离此地，到亲戚朋友家隐蔽待命，组织关系留在这里，以后审查没有问题的仍恢复党籍。这三个去向是革命的前途。反之，脱离组织，赖在家里，束手就擒，甚至叛变投敌，将来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惩办。这是死的前途。最后，我介绍了胡明坚持山区斗争五年多的生动事例和经验。大家听了这些，情绪渐渐活跃。当场，陈策等表示愿意随部队进山打游击；郭文模表示愿意随章啸衡去南京、镇江一带，搜集敌人情报；孔亚东表示仍到江北桐城隐蔽；还有人表示愿意留在家乡，坚持斗争。对此，我们作了妥善安排。郭文模、章啸衡愿去南京做地下工作，便由朱农为他们安排了一船大米和五万元法币，作为活动经费。为了适应新的斗争需要，除各区、乡特派员外，其余干部均到部队集中，以防局势突然变化。

我们也认真做好伤病人员的教育和安置工作。北撤前，我军在皖南设了一个留守处，有保健员五人、伤病员四十多人，准备移交给国民党卫生部门。后来情况变化，便把他们

分散安置在铜陵丹凤区群众家中，有的伤员说，受了伤，部队就不要了。十月八日，中心县委在朱村乡马家村召开会议，对伤员进行说服和解释，动员能走动的一律归队；不能动的重伤员，则发给路费和安家救济粮，遣送回家休养，或疏散到当地可靠群众家里隐蔽起来。不少同志，如副连长叶文琪等，就是这时回到了部队；不能归队的同志也弄通了思想，效果很好。

我们以极大努力进行了迎接艰苦斗争的物资准备。首先是筹集经费。我们将北撤前存在这里的粮食全部变卖，价格是一块光洋一石，对穷苦人半卖半送，并用公粮收回原皖江解放区发行的大江币一百八十万元。其次是添制被絮，赶做服装，置办鞋袜，补充和改善部队装备。

在一片紧张的繁忙中，皖南人民和子弟兵的鱼水情谊更深了。凡是驻有部队的村庄，到处是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群众象当年对待新四军那样，热情地接待我们，自动组织起来，日夜为我们赶服装，做军鞋，变卖粮食，筹集经费。他们还把精心调养好的伤病员送归部队，祝福我们多打胜仗，早日解放全中国。

(三)

在皖南人民的热情帮助下，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但是，武器弹药缺乏，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我们检查弹药，发现战士所带的子弹大都是原先部队生产的土造子弹，其中弹药是用土硝制成的。我叫几个战士打给我看，结果射程不过几十米，就扑通落地了。我们决心自力更生解决这个

问题。

十一月下旬，国民党主力一九二师住在何家湾的一个营在铜陵土顽配合下，勾结日伪独立方面军千余人，分三路向我顺安中心地区不断进犯，从此国民党反动派在沿江地区发动的“清剿”开始了。我们决定给予坚决回击，惩罚了敌人。

据侦察，在不远的伪军兴亚大队的一个“洋行”里，储存有军用物资和弹药。但抗战胜利后，伪军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工具。象吴致和、崔光汉这样的汉奸，在铜陵一带仍然神气活现，出没城乡。为缴获枪弹，教训汉奸，并打乱敌人的部署，查富德率一个连兵力，对“洋行”进行袭击，但遭到日伪军顽强抵抗。为减少伤亡，我们改变战术，将部队拉上石佛山，诱崔光汉出笼。伪军果然出来了，敌我双方一阵对射，激战几个钟头，相持不下。这时，查富德派一个排兵力插到敌后，袭击犁桥，迫使正面之敌慌忙败退。在犁桥构筑碉堡的伪军也仓惶逃回县城。我们连续发起几次攻击，虽然打击了伪军和汉奸的嚣张气焰，但打的都是消耗战，缴获不多，弹药却消耗不少。

正在这时，我驻马家冲哨兵报告，冲口有几个挑着洋油瓶的人，口口声声“要见杨政委”。我要哨兵把他们带进屋子，一看，竟是川军五十军的刘副官带人挑着几挑子弹找我们来了。我见来的是老朋友，忙说：“啊，是刘副官！”刘副官接着说：“杨政委，我们上星期扛了几挺机枪到万支岭，听说你们走了，我们就返回去了。以后，听说还有部队留在铜、青、南地区，所以这次挑几挑子弹来试试看，果然碰上你们又回来了。”我们热情地招待他们，至于他这些话是否确实，我们就不去理会了。

这几个挑夫进入堂屋，放下担子。刘副官利索地打开美孚牌洋油瓶，亮出了崭新的美造子弹，说有一万多发，我们欣喜万分，但在表面上还控制着这种喜悦之情。没想到，在抗战时，我们对川军做统战工作，现在还起作用哩。过去，川军每次卖枪弹给我们，都不要钞票、大洋，只要烟土。我要供给科长张建南取出十几斤烟土给他们，并留他们住宿。第二天，这几个川兵拿着烟土高高兴兴地走了。

不久，繁昌县横山桥一个川军军官也带着几个挑箩筐的挑夫来找我们。那时，我们正转移到锅冲，准备进山。恰巧，他们在甘家冲碰到我们的侦察员，被带到我们驻地。这人过去也常私运武器卖给我们。他们把箩筐上的一层大米倒出后，从夹层里拿出三支崭新的驳壳枪和三千发子弹，我们同样用烟土回敬。

记得过江时，支队领导给我带上一些烟土，有的战士还发牢骚，直到现在，他们才领悟到其中的奥妙。

我们意外地获得这么多弹药，真是如虎添翼，大家无比高兴，战士们子弹袋里装满了崭新的子弹。换下的土造子弹，就放在群众用的缸里，埋进土坑中，待以后再取。部队进山到泾、旌、太时，我们拿出五百发美造子弹，送给当地游击队。

时值冬令，天气寒冷，但我沿江部队经过整编，扩充了队伍，大大改善了装备。战士们穿的是一套新的棉灰军服，每人发两套单衣，背着皮制子弹袋都是鼓鼓的。部队已筹足半年的经费，当时，共筹集伪法币五百二十多万元，银洋二千六百多元。每个连排以上干部都背着一些光洋和法币，以备分散活动时使用。除主力部队外，还以地方党员为骨

干，组织了六个脱产的区小队，共有八十多人；并普遍恢复了民兵组织，有五百多人。这时，部队士气很旺，对坚持皖南斗争充满信心。但在这转变关头，也有少数人动摇，甚至叛变投敌，象五峰区区委书记汪某、区级干部刘某叛变投敌，都落得可耻下场。

同时，陈爱曦率部队到青阳盘台，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并与泾、旌、太地区交通员朱大解匠（朱义南）联系上。为加强这一地区武装，我们又增派姚生、朱生、张良士带一个警卫排到达盘台。至此，我们抢在国民党全面“清剿”之前，从各方面做好进山准备工作。因此，国民党川军四十四军一到贵池、铜陵进行“清剿”，我们能够进行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战略性转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国民党在芜湖召开了一次皖南地区参议会，公开污蔑皖南人民武装为“孤匪”，要求省府派主力部队来皖南“清剿”。国民党总的战略意图是，想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先把坚持江南的人民武装歼灭，然后集中力量进攻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四六年二月，敌以川军主力四十四军的一五〇师、一六二师配合土顽，首先向我沿江部队发动大规模的“清剿”。

当时，我们决定集中兵力狠狠打击顺安镇国民党警保中队，然后率部队进山。部队从盛家冲、四方湖赶到吴大竹园时，村里的群众跑光了。我到吴大爷家门口，从门缝向里看，只见吴大爷在颤抖中的豆油灯下侧耳听村上汪汪犬吠声，神色紧张。我轻轻地连叫数声：“吴大爷开门！”老人家小心地拉开门，仔细地打量我，这才恍然大悟，一把抓住我的手，惊喜地说：“哎呀，还是你呀，杨同志！”顺手把我

拉进屋内，急切地说：“冲口萧村已到了大队敌人！”我马上派侦察员到冲口侦察，不多久，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四川军一个团团部已住在陈山冲口的萧村。显然，国民党反动派抢占城市完毕，大部队陆续开进皖南。敌情发生变化，我们马上将部队撤回到四方湖。天已下雨，越下越大。部队冒着倾盆大雨，连夜经郎坑后面的半山李，进入青阳县锅冲。

锅冲是我们规定联络和集中的地方。这里有十多户人家，大都是江北来的客户，比较贫苦，倾向革命。地形呈窝形，有三条小道，右通铜陵郎坑，左通南陵县丫山，中间通向青阳甘家冲，四面没有村庄，有回旋余地，是一个很好的隐蔽地。我们派人到天宝乡，找到了五峰区区委特派员陶刚。他报告说，他从俘虏口中得知，川军四十四军军部进驻贵池县城，所辖一五〇、一六二两个师兵力，在沿江设防，其中一个师师部率一个团驻铜陵县城，所属其他两个团，一个进到柴塘、张家冲、长龙山一线，另一个进到陈山冲萧村到顺安一线，敌人妄图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将我刚刚返回皖南的人民武装一举消灭。愚蠢的敌人岂能料到，在其完成包围态势之前，我们的队伍已巧妙地 from 敌军空隙中撤离沿江地区，向着山高林密的黄山区挺进了。

在主动转移时，沿江中心县委根据保存力量、坚持斗争的方针，决定由朱农率领三区队，坚持铜青南地区。因我们行动时朱农尚在敌后，为了接应他们，所以留下警卫连长左克南，率一个排在半山李、锅冲等候。十二月中下旬，朱农率三区队来到盘台，在宾山一带建立中心区，领导了泾青南地区斗争。在铜青南边区之茗山冲、锅冲周围，则留下陈尚和、陶刚、尹彬以及徐世达等，率领一支三十来人的游击武

装，坚持当地的斗争。

(四)

十二月中旬，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部队急行军八十多里，从铜陵的锅冲到青阳县杨田乡万支岭的白马塘，次日拂晓前到达盘台村。我随即到青坑会见陈爱曦，了解先头部队情况，研究与黄山地区游击部队会师问题，并决定留下二十多人的武装，由张良士、姚生负责，要他们与宋农取得联系，坚持这一带斗争。

黄山游击部队是一支经过长期战斗锻炼的革命队伍。皖南事变前，胡明、洪林、洪琪等奉党的指示，留在皖南山区坚持斗争。他们与突围出来的刘奎、被捕后越狱出来的唐辉等一起，以胡明为首组成一支十几个人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艰苦斗争中成长壮大，到日寇投降时已发展到一支约三百人左右的武装。其中泾（县）、旌（德）、太（平）洪林部七十多人，泾（县）、宁（国）、宣（城）吕辉部三十多人，机枪一挺；绩（溪）、歙（县）、宁（国）地区唐辉部近百人，机枪一挺；黄山周围刘奎、李健春部三十多人；中心县委机关干部、战士、后勤人员共三十多人。这些游击队的活动地区，包括青弋江以南和黄山周围的山地，尤其是黄山和天目山之间一块较大的地区。这支游击部队的特点是，坚持蒋后游击战争有五年历史，富有隐蔽斗争和反“清剿”的经验，与群众关系密切，但是比较分散，没有建立较大的主力部队。

我们在盘台逗留数日后，从泾县的厚岸经太平县新丰过

河，到水东下游，来到南榕一个小山包上。这里，有个李老头是洪林的联络点。第二天晚上，我们到达洪林活动的一个根据地铜山，正好胡明、洪琪等也到了。一九四〇年，我在茂林、铜山、小河口、水东一带做群众工作，那时洪林搞地方党工作，我们部队在那里发展的党员，如小河口的崔光先等同志，后来都介绍给他了。胡明、洪琪和我早在新四军军部服务团时就经常见面，经常会面，在一起拉家常。这次久别重逢，大家感到分外兴奋和亲切。

战士们听说胡明同志来了，都纷纷围拢过来，注视着他。在皖南事变后，我们就常常用胡明坚持皖南山区斗争的事迹来教育和鼓励战士；而山里老百姓又把胡明当作神话人物传颂。因此，在战士心目中，胡明被看成“三头六臂”的人物，然而站在大家面前的却是一位穿着草鞋和白棉布袜、腰间插着一根旱烟袋的和蔼可亲的负责同志，大家都很尊重他，亲近他。

第二天，正是一九四六年元旦，胡明和我们到了洪林的根据地——樵山，我们沿江部队同坚持皖南山区斗争的同志在这里胜利会师了！战士们欢呼雀跃，沉浸在喜悦之中。胡明当时为山地中心县委书记，他们有一部电台，同华中局可直接取得联系，对全国斗争形势都有所了解。会师后，全体干部战士集中在樵山的茶叶亭开大会。会上，胡明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他讲了全国斗争形势之后，又着重讲了皖南斗争形势和他们的经验，连如何搭盖山棚、烧饭不让冒烟、走路不留脚印等等，都详尽作了介绍。刚进山的战士听了倍受鼓舞。

部队会师时，山区的革命群众前来慰劳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许多群众围着我们部队的国政宪郎观看，几个小孩和

妇女在人群中指指点点，说“你看，鬼子、鬼子”。国政听了十分恼火。他恨透了“鬼子”这个不光彩的称号，啪地一下把饭碗摔个稀巴烂，愤愤地大嚷：“什么鬼子鬼子的，我的新四军大大的！”我们把群众劝走了，说明国政已经参加了革命，是我们军队的一名战士了。从此，群众尊敬他，他更加热爱群众，同群众交上了朋友。

胡明提出：为广泛开展皖南游击战争，原山区部队与我沿江部队宜以黄山为界，分头发展黄东、黄西两大区域。他要我们首先发展黄山以西的泾（县）、太（平）、石（台）地区。当时胡明、洪林对我进山部队支持很大，派排级干部俞炳菊作向导，引导我部进入太平县龙门的王家山。

这时，我沿江部队已取消皖南人民自卫军番号，恢复新四军的名称，成立了沿江总队部，部队番号为新四军沿江总队。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我进山各部即分别向泾、太、石边境的黄西地区发展，并已开辟龙门、秧溪河一带。因我主力胜利跳出沿江地区，国民党在皖南沿江地区发动的第一次大“清剿”宣告彻底破产。

（五）

沿江部队和山区部队会师后，遵照华东局指示，山区和沿江两个中心县委合并为皖南地委，由胡明、刘奎、唐辉、洪琪和我组成，胡明任书记。一九四六年二月，胡明通知我从太平龙门赶到黄高峰的五会山参加第一次皖南地委会议。会议开了几天，分析了国民党在皖南的军事部署，研究了坚持皖南斗争的方针和策略。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我们担负的斗

争任务，地委决定采取隐蔽坚持，积蓄力量，相机发展游击战争，进而发动群众，壮大力量的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确定了开展民主运动，发展武装，发动群众，巩固老区，开辟新区等工作任务。会议决定：我转进皖南山区的沿江中心县委领导黄山西部山区直到沿江地区的斗争，部队番号仍为沿江总队；原山区中心县委所属游击部队则在黄山以东直到青弋江地区活动。从此，皖南游击区成为统一的整体，我沿江部队和兄弟部队一道开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皖南三年游击战争。

会上，胡明拿出一分华中局在国共和谈后发来的电报，大意是，根据和谈精神，我江南游击武装要改编为国民党警保队那样的地方武装，人员要大量精简复员。看后，我不禁想起闽南事件：一九三七年底，闽南一支一千多人的精干武装，在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时，由于对国民党缺乏警惕，结果全部被国民党广东军余汉谋缴械，十几位领导干部惨遭杀害。至于皖南事变，我们更是记忆犹新了！蒋介石对革命人民从来都是心毒手狠的；国民党在皖南加紧“清剿”的军事部署表明，现在已经谈不上改编和精简部队了。为避免造成思想混乱，我们决定不能向下传达。

这次会议的缺点在于，对敌人全面“清剿”来势之速估计不足。一九四五年底以后，国民党加紧内战准备，蒋介石急于赶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歼灭苏浙皖游击部队，以解除后顾之忧。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敌以四十四军一五〇师、一六二师为主力，向我沿江部队发起第一次大“清剿”。因我主力进山，敌人围歼阴谋破产。一九四六年三月，敌人集中了一五〇、一六二师全部及新七师一部，配合安徽省保五团

全部及旌、泾、太、石、青、宁、绩、歙、休、黟等十个县土顽武装，共有万余人的兵力，对皖南地区实行第二次大“清剿”。敌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皖南人民重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我从绩溪回龙门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敌四十四军四四九团驻守秧溪河、乌石垄，阻止我军向太石边区挺进。为了迎接新的斗争形势，我们加强了各游击根据地的组织领导。在沿江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县工委有：南繁芜县委，书记仍由王文石兼任；铜青南县委已转移到泾青南边界的宾山地区，所以改称泾青南县委，书记仍由朱农兼任，副书记陈尚和；在黄西山区，成立泾太石工委，书记由陈爱曦兼任；由泾青南县委中另成立铜青南工委，由陈尚和任书记，以茗山为中心，仍与泾青南县委保持联系。

我们进山时留在泾青南地区的张良士，因主力转移后独自回铜陵盛家冲了解情况，不幸被捕遭敌杀害。

张良士裁缝工人出身，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亲自打进铜陵县张家冲的日寇维持会，营救被捕的同志。张良士参加革命后，他的老伴带着孩子，度日艰难，常以乞讨为生，却非常关心革命工作，常常为我提供情报。等到孩子长大一点，张良士又将他唯一的儿子张进送到革命队伍。皖南事变时，张进被捕，不久逃出，回到母亲的身边。张良士知道此事，又亲自将儿子送归部队。

后来得知，张良士这次刚到铜陵盛家冲，正碰上四十四军“清剿”。他在当地百姓掩护下，躲进一座祠堂的阁楼上。一个保长得知他回到盛家冲，配合顽军，设岗封锁，大肆搜索，张良士不幸被捕。他被押送到郎坑据点，敌人严刑拷

打，逼他自首，但他坚贞不屈，痛骂国民党反动派，当场被杀害了。就义时，他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三月初，敌人首先集中兵力“围剿”我转进山区的沿江主力部队。我们分析了敌人的意图和战术，决定以保存力量，粉碎“清剿”，争取立足，创造长期斗争的基础为基本方针，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

先由陈爱曦率部到竹龙岗搭盖山棚，建立隐蔽地。有公开的活动地区和灰色地区，以狡兔三窟教育干部、战士，只有这样才能站住脚跟。随之将主力部队分为三支：一部留在泾太边区的厚岸、龙门等地；一部到秧溪乡的芦圈，向太石露边区发展；我和陈爱曦率领总队部上了竹龙岗。我们隐蔽活动了一个多月，只有竹龙岗靠湖深潭的方村一户人家和小坑、茶叶圈韩大毛子了解我们的住地。一天深夜，雨大风狂，天色墨黑。茶叶圈韩大毛子突然冒着风雨赶来报告：住秧溪河的敌军出动了！拂晓前，敌四十四师的一个连首先发起进攻。我们边打边撤，向竹龙岗右侧的高山转移。敌人扑到我驻地后，见不到人影，放火烧了山棚，迅速溜走了。

山路陡峭，浓雾障目。我在攀登陡壁时右臂脱臼，接来接不上，只得忍痛前进。下山时，孙刚等用肩膀顶着我向下滑，滑了个把小时，来到一条小河沟。陈爱曦要我躺下歇一会，他们先到前面摸情况。谁知一歇下来，更觉疼痛。我仰面躺在沙滩上，强撑着活动活动手臂，不想“啪”的一声，关节复位了！我高兴得一翻身跳起来，马上向狮鸣坑方向走去，边走边想：这次战斗教育我们，在扩大游击区同时，应该建立游击根据地，才能有立足点。

(六)

狮鸣坑后面的牛栏圈有两条小道，一条通黄泥垵，一条通子塘圈。子塘圈只有戴保元叔侄两家，是很好的隐蔽地。它的对面便是宋家圈。这一带背靠黄山，西望九华，群山巖连，森林稠密。我们决定在宋家圈搭盖山棚，以便向外发展，建立中心区。

这一带属于太平县秧溪乡，是国民党的“模范乡”。国民党在乡设区党部，保设区分部（上陂保就有两个区分部）。子塘圈冲口的小坑，村里有国民党小组。居民不论贫富，大都是国民党员。我们进山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地方，有的同志对开辟这个地方表示怀疑。我们便教育干部，不管什么地方，贫苦山农决不会同骑在他们头上的地主、山霸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走一条道，只要做好工作，依靠政策胜人，一定能打开局面。

首先，我们动员所有指战员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一天晚饭后，我和陈爱曦带着警卫员，出了冲口，先到了不远的剪刀山。这里住着贫苦的山农戴伍苟一家，非常偏僻。我们进屋后，戴伍苟一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说明来意后，戴向我们反映了一些情况，表示愿意帮助我们送信和联络附近一带的群众。第二天，我们又到了离戴家将近一华里的叶禄林家。这家一位老人年过五旬，孤独一人，住在一间矮小的山棚里，很快与我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个性爽直，对革命积极热情，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叶老头。夜晚，他时常和我们一起睡在地铺上，亲如家人。后来，在反“清剿”

最困难的时期，他经常挑着木炭，翻山涉水，到石台县城，探听石台和秧溪河的敌情，并把木炭换成粮食挑回来，给我们吃。有了这样的“根子”去串连，群众逐步发动起来，进而在周围建立了立脚点和交通线。

接着，我们开展宣传工作，对敌发起政治攻势。当时，国民党在政治上极端虚弱，因而特别需要依赖反动宣传的欺骗作用。在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新区，各方面人士对我党的政策不够了解，疑虑颇多，因此，大力宣传我党反对内战的坚定方针和有关政策就成了当务之急。我们利用从新丰乡公所缴获的一部油印机，印发传单，秘密付邮。其中有著名爱国人士何香凝先生写的痛斥蒋介石和陈诚背弃《和平建国纲领》的文章，我们以皖南新四军沿江总队部的名义写的《告皖南国民党人士书》、《告皖南青年书》、《告四十四军同胞书》等等。这些文章，特别是《告四十四军同胞书》，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以及利用内战消灭异己的阴谋，号召川军官兵不要充当蒋介石的炮灰。在川军和皖南沿江以及黄西各界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我们大力开展反蒋统一战线工作，分化瓦解国民党政权。首先争取了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的上陂保保长李梦全和青帮头子马长生，他们主动邀集了二十几个绅士、保长到马长生家聚会，陈爱曦化名王科长，我化名张科长，参加了聚会。会上，我们揭露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重申我党的自卫立场，要求他们不做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情，并郑重指出：今后不论谁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事，我们决不会忘记他们，但对与人民为敌的人，也决不宽容。我们以苦竹桥保长

杜发祥为例，说明我党政策。杜发祥原是国民党新七师情报科长，一九四二年潜入铜陵县根据地，企图勾结日伪歼灭我部，被我们捕获。我们看他年青，表示愿意改恶从善，教育释放了他。不料他口是心非，回到家乡，当上保长，继续搞特务活动。不久前，竟无视我们的警告，向杜村乡长杜世学提供情报，策划对我伏击。因为杜发祥罪大恶极，屡教不改，被我三连捕获，并公审处决了。我们宣布，我们决不会杀国民党员和自首分子，希望他们同我们合作，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和残害人民的罪行。我们讲话后，李梦全、马长生及原国民党区员周梦溪等人立即站起来发言，一致表示衷心和我军合作，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他们还说：“贵军对杜发祥的为人真是了如指掌，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令人佩服。这家伙怙恶不悛，死有余辜！”

会后有人反映，秧溪乡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孙良乾比较反动，我们查明情况后，秘密逮捕了他。这家伙畏罪怕死，一个劲地磕头求饶。我们警告他：如果愿意重新做人，立功赎罪，就要订立《爱国反蒋公约》，他很快写好一式三分，签字捺上手印。主要内容是：一、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为建立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斗；二、帮助新四军筹粮筹款送情报；三、不做危害新四军的事情；四、不危害人民利益，不欺压人民群众等。释放他前，我们严厉地说：“如果口是心非，为非作歹，就把你亲笔写的《爱国反蒋公约》寄给国民党县党部。事实证明，这是控制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好办法。以后，我们南进皖赣边区和浙赣线时，每到一个新区都照此办理，收到了相当大的效果。对一般的特务分子，采取多捉多放，教育释放，使其改邪归正。查富德打郭村乡公所时，

捉到姓林的特务，经过教育释放后，他就不干了。

接着，我们又把上陂保的国民党的组长统统召集起来开会，叫他们讨论：泥腿子为什么要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党有什么好处？他们说：国民党区分部召集我们开会，把户口册拿出来，宣布成年人都是国民党员，无非是叫我们出“费子”（出钱），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又问：我们来了怎么办？他们说：新四军来了好呀，替穷人办事，我们决不干对不起你们的事情。会上，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教育，讲清我们的政策，并宣布我们决不会杀害自首分子和国民党员，被强迫参加国民党的一律不算。

通过一系列工作，情况愈来愈有利了。为了铲除发展中心区的最后障碍，我们发起了一场驱逐乡长的斗争。

原秧溪乡乡长胡炳南是县长黄示的同乡，倚仗县长的权势，作恶多端，非常反动。我们动员李梦全、马长生串连方友仁和一批正直的青年和当地士绅、保长联名，告发这家伙贪污粮款、霸占他人财产等罪行，要求将其撤职查办；同时，保荐当地人士方友仁接任乡长。国民党政府看到原乡长确实无法再干下去了，只好屈从这些要求。

对于方友仁，我们事先进行了调查，他于一九三八年在石埭崇中读书时参加党组织，当时在学校读书时叫方荣寿，以后脱节跑到重庆，进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一九四五年毕业后回乡住闲，在士绅中很有影响，但没有做过不利于党的事情。他担任乡长后，我又用张开南的化名写了一封信，派人给他送去。信的内容有三点：一、赞许他的为人正直和三个月来为群众、为地方励精图治的一些业绩；二、分析当前形势，用三国中关云长“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典故开导他；

三、约他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见面。

他知道我们对她非常了解，十分感动。他接信后，马上请求见我们。我和陈爱曦在李梦全家秘密接见了她，对她进行了革命前途教育，并要求她：一、给我们递送情报；二、帮助开展上层士绅的统战工作；三、给我们订一些书报刊物。以后，她确实按照这些要求去做了。她给我们订了国民党的报纸，特别是订了上海出版的《群众》杂志，使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解放区的整个斗争形势。不仅如此，他们还秘密组织了民主政治工作委员会，由秧溪小学校长孙荣顺和方友仁担任正副主任，帮助我们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九四七年春夏，秧溪河一带开展分粮斗争，方友仁积极支持，并为太石工委变粮食筹法币二十多万元，以解决太石部队转移时的困难。在他的影响下，乡干事谢方舟经常为我们送情报，后来参加了部队。乡警保队长谢愚耕也被争取过来，夫妇双双参加了革命部队。一九四七年，保二团清剿时，他夫妇在石台铜坑英勇牺牲。

一九四五年底以后，经过几个月努力，我们牢固地控制了这一带的局势，胜利建成以秧溪河为中心的根据地。当时，敌四十四军一五〇师师部驻太平，所属一个团住焦村、铜罗坦，一个团驻绩溪，一个团驻秧溪河。虽然敌军近在咫尺，我们却能及时了解敌情，又能对敌封锁消息，因而白天也可以公开活动了。

(七)

敌人以重兵“围剿”寻歼我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的计划

一再落空，转而部署兵力，分地区进行驻剿。这样，我沿江、黄西各部主要抗击一五〇、一六二师的主力，黄东绩、歙、旌地区唐辉部主要抗击一六二师的一部，宁宣地区吕辉部主要抗击新七师一部，皖南地委机关及洪林部主要抗击保五团等部。为了巩固秧溪河中心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封锁包围和分兵驻剿的阴谋，我们命令朱生率领三连，在太平的龙门、泾县的厚岸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查富德率领一连插到敌人背后，连续打掉乌石垄、郭村两个乡公所。他们出击后，又回到中心地区的芦圈休整。

一九四六年春夏间，政治交通查效华从上海来到我宋家圈总队部，带来华东局国区部长曾希圣的信件，令我开辟七井山的石井里、大洪岭等地区。大洪岭位于祁门县以北五十里处，属黄山山脉，上七里下八里，悬崖绝壁，云吞雾罩。总队副查富德奉命率部到大洪岭，一看是座光山，人烟稀少，又是祁门经石台到贵池殷家汇的通道，无法建立根据地，于是分兵两路：钱秋育带一个排去七井山和贵石边界的杉山庙，查富德率另一部由美溪翻山到柯村活动。

当时，国民党在石台、太平等地建立了严密的特务网，各县设有肃反专员，区乡有中心小组，实行法西斯统治。那时，我们部队多在夜间行动，狡猾的特务就在小路、岔道口放上枯树枝、瓦片，或撒上石灰，牵上丝线，部队走过去瓦片踩碎，丝线绊断，他们看出去向，立即跟踪追击。有时，特务藏在桥下放暗哨，根据过桥脚步声，数出我们的人数，马上调兵袭击。敌人还通过强化保甲制和实行连坐法，严密控制群众，使部队粮食短缺，以野菜竹笋充饥。特别是敌人常常放出瞭望哨，专门观察我们生火造饭时的炊烟，一

经发现，立即派兵前来袭击。因此，我们只好把三餐改作两顿，清晨，趁着蒙蒙山雾生火造饭，然后，将火种深埋在灰堆里，留作下餐造饭之用。在改为一日两餐后，有个战士怕受饿一餐吃了九碗。陈爱曦见了，用浓重的铜陵口音风趣地说：“一餐九碗，两餐就是十八碗。正常每餐三碗，三三得九。这么个吃法，会把人胀坏了”。查富德一部进入大洪岭，粮食断绝，危急万分，战士们挖来大量竹笋，用面盆和水煮食，因无食盐，一人吃了几碗，顿时胃里作呕，口吐清水，难受至极。我们的部队到贵、祁交界的牯牛降时，一到那里，保甲长就把我们住在各家的人数合计上报，敌人迅速弄清了我们的兵力。部队在这样的环境里活动，十分艰险。

钱秋育部刚到沙杉庙，石台县警保大队由特务头子孙绍康率领跟踪上来。这里有座寺庙，当家师实系国民党特务中心组长，他外穿袈裟，内衬毛衣，戴有手表，以吃斋念佛为幌子，欺压山民，糟蹋妇女，充当敌人的耳目。一天夜晚，钱秋育他们正在做群众工作，敌人寻踪追来，部队立即转移出去，但因连长阮成余穿的是白褂子，敌人集中火力射击，阮中弹牺牲。

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部队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坚持发动和依靠贫苦山民，在沙杉庙地区，首先发展和培养了萧坑贫农陈泰和。他家五口人，每年要缺几个月的粮食，却把包谷、米、面送给我们吃，自己吃南瓜，并把仅有的一点菜油也送给伤员。他到梅村，来回跑了六十多里，给我们买了几斤米，不叫苦累。我们有粮时，给了他家一些，他没说什么，默默收下，但他将粮食埋藏起来，等我们部队困难的时候，又拿出来给部队吃。他还积极向我们反映情况。经过

教育和考验，他被吸收入党，从此以后，他的革命热情更高了。他对家里人说：自己的地荒了，少收一点没关系，部队的事情要紧；他对群众说：新四军整天为我们吃苦，我们决不能叫他们饿肚子；他对我们说：如果他被敌人捉去，除非被打死，要他叛变自首根本办不到。连长阮成余牺牲时，他夫妻痛哭了起来，悲愤地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死的，我们要为他报仇！我们镇压了山霸徐德坤后，他向群众说：徐德坤曾讲过，总有一天要叫萧坑的老百姓死在他手里。徐德坤要我们的命，新四军要了他的命，就是救了咱们老百姓。

在陈泰和的带动下，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敌人的保甲制和特务网统统失去了作用。在这基础上，钱秋育继镇压山霸徐德坤后，又在第二次进军沙杉庙时，将那个伪装当家师的敌特公审枪决了。群众扬眉吐气，革命热情更加高涨。这样，钱秋育部在这一带站稳了脚跟。

查富德到柯村一带开展工作。一天夜晚，部队在东坑宿营，遭到四十四军住乌石垄的一个营奔袭。他们仓促应战，沿着水沟边打边撤。当时，国政宪郎随军行动。他正在打摆子，一听敌人来了，立即端起三八式步枪，趴在前沿。他枪法准确，一枪一个，阻击敌人，掩护部队突了出去。子弹打完后，连支书带着他和总队部通讯员藏到后面的巴茅山上，山上的叶子象锯子一样，割手割脚，人在山上不能跑动，所以敌人搜山时他们被俘了。

冲出来的部队仍然不断与敌人遭遇，机枪手徐振兴一人抱起一挺机枪，边打边跑，掩护着同志，保护着机枪，顽强战斗一天，被誉为战斗英雄。经过两昼夜的艰苦行军，回到秧溪河的牛栏圈，住在黄泥垅洪老大那里。我们见面后，知

道东坑战斗牺牲和受伤了几位同志、被俘八人，背包物资损失殆尽，心情非常沉重。

对于国政宪郎的被俘，我尤感痛心。一九四五年夏天，国政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中逃跑出来，携带一支短枪，向我们投诚，参加了新四军。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提起送他归国的问题，可是他表示要和中国人民一道战斗到革命胜利。他说：“政委，你就让我留下吧！我的第二祖国——中国使我获得了新的生命，让我为他的新生战斗到底吧！”以后，他又坚决要求随同我们重返皖南，转战各地，成为皖南游击队中的一名国际主义战士。

国政随同查富德，在总队通讯班里生活和学习。整天在行军中过日子，大家开玩笑地说：行军锅在肩膀上，宿营地在脚板上，开饭还要管打仗。国政随着部队爬山涉水，历尽艰辛，从不叫苦，他看人家穿草鞋，也用葛藤学编草鞋穿；有时脚磨破了烂了，就干脆打着赤脚跑路；有时脚被石子戳破，或被茅草割开了口子，鲜血淋漓，他也舍不得穿上我们发给他的那双结实硬梆的大布鞋。在国政他们的活动地区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有次，交通员老刘谈到国政艰苦斗争的情况，我们很惦念他，我便将自己穿的鞋取出来，让老刘捎给他，并写了表扬他的信。国政接到信和布鞋，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不禁流下热泪，但他一定要把布鞋送回我穿，直到被俘，那双布鞋还保存在他的背包里。

记得一天清晨，我在国政他们驻地周围瞭望，看见对面山坡上坐着一个人，正捧着书本阅读。我慢步走近前去，原是国政宪郎。他掩起书页，腼腆地说：“政委，我能不能当个共产党员？”我说：“能，国政，你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

共产党员，成为国际主义战士，为全人类解放做出贡献！”他激动无语，只顾点头。满山遍野的映山红开放了，万道霞光照着花丛，显得格外鲜红。国政随手采摘一束映山红，走到我面前，深思地说：“现在也应该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了，待到中国解放，中日友好，我一定要把映山红移到日本去，也要把樱花栽到中国来！”怎么也没想到，时隔不久，他竟在国民党军的袭击中被俘了。

同时，被俘的连支书叛变投敌，当了特工队员，带领敌一五〇师把芦圈的基本群众戴海水抓去，以后戴跑了出来，他说：国政被俘后，表现非常坚强，敌人叫他带路，他执死不肯，说“不明白的”，敌人问他新四军有多少人，他说“我的一个来来的，一个去去的！”敌人无法，用扁担打他，几根扁担打断了，他既不招认，也不哼一声，并对戴海水说：“你的不要说话说话的”，意思要他不要乱讲。国政这种宁死不屈的事迹，广大军民知道了深受感动，群众称赞说：“共产党真有办法，把一个日本人也教好了，变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我一直在打听他的音讯，直到全国解放，始终没有查明下落，十有八九是被敌人杀害了。

我们要这支队伍转移到厚岸乡的金坑休整。看到同志们情绪低落，我们首先进行形势教育，激励士气。接着，大力表彰国政和徐振兴的英雄事迹，并着重指出：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是为着解放全国人民，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走到革命队伍里来的。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失败和挫折是难免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国政和徐振兴同志在失利时英勇顽强，这才是好样的！然后，大家总结了东坑战斗的教训，认为，主要是思想麻痹，地形不利，又

没有及时掌握敌情。通过整训，部队重新以昂扬的斗志进入包村、厚岸一带，发动群众，打击敌人。

厚岸乡交界的水东乡乡长徐建新，在皖南事变前是我泾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水东区委书记，后被俘自首，当了乡长。我写了封信，要他重新回到人民怀抱，支持革命工作。他接信后，立即赶到包村见我，并告知我们，四十四军已派部队到新丰和包村之间的丹山周围“清剿”，要我们离去。我们随即回到秧溪乡小坑中心根据地。

事后获悉，徐建新自那以后坚决不再干乡长，并与徐承立组织武装，重新参加革命。一次，他们用土枪配合三连朱生在中村附近的苏岭，对四十四军作战，徐建新不幸牺牲。

一九四六年夏，敌人在皖南的全面“清剿”达到高潮。时值雨季，山洪断路，山上人多粮少，给养困难。一连指导员蒋云带一个班到龙门筹粮，在湖深潭过河时，因洪水冲断土坝，除管理排长孙志武被洪水冲到岸边，被树桩挡住，爬上岸回到龙门外，其余同志均不幸牺牲。

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党的群众路线和统战政策充分发挥了威力。一次，保四团三营营长吴麟瑞派张副官到秧溪河侦察，他与当地士绅、国民党区员周梦溪是同乡，所以径自来周家。那时，查志强恰巧也在周家，碰上了张副官。周梦溪夫妇忙作介绍，说老查是他们的亲戚。张副官信以为真，把保四团三营要到秧溪“清剿”的计划说了出来。老查获悉后，迅速返回宋家圈，于是我们从容安排了对策。部队转移时，警卫班小战士把部队养的一头百多斤重的肥猪也转移到山坳里隐藏起来。敌人如期而来，插到子塘圈，把基本群众戴保元抓去带路，老戴领着敌人从崇岭出去，兜了一个

大圈子，把敌人累得半死，一无所获，回到秧溪乡公所。方友仁马上招待吃喝，并和周梦溪等人乘机向吴麟瑞说：“我们说过嘛，此地太平无事！”经过三个月的较量，我沿江部队已发展到二百七十多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敌人对沿江和山区的围困驻剿被彻底粉碎，我沿江部队主力继续发展壮大。

（八）

在一九四六年三到五月的大“清剿”中，我沿江中心县委所属之南繁芜地区和泾青南铜地区利用敌人的空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我在泾县厚岸乡的金坑休整部队时，马文杰和王安葆从南繁芜前来汇报该地区的情况。自主力进山后，因县委组织部长艾必发、区特派员毛和贵叛变投敌，形势急剧恶化。南繁芜县委交界的五华山周围，为了与中心县委取得联系，他们派出排长姚克礼寻找我们，但他中途被捕牺牲，自此南繁芜县委和我们失去联系。王文石在焦急中偶尔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江苏淮阴被我军占领的消息，便派张叫花子前往苏中解放区寻找上级。张叫花子原名张元守，他幼年丧父，随继父李三瞎子到处飘零，衣着褴褛，被人习惯地呼为张叫花子。他入党后，长期担任地下交通，皖南事变中曾和戴翠堂两人掩护新四军军部特务团政委张闻初、参谋长杨采衡及其所部一个连安全渡过长江。张元守接受任务后，马上装作小贩，把信藏在夹箩里，挑着一担篾货动身。沿途灾民不断，他的盘缠全部周济了穷人。最后身无分文，沿途乞讨，真的成了叫花子，过封锁线时，他被敌人抓住，但不管敌人如何拷打、

利诱，他始终傻呼呼重复几句老话：“我儿子在国军当兵，我是来找儿子的。”敌人无计可施，把他放了。他继续前进，到淮阴找到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完成了同上级恢复联系的使命，并给县委带回了关于当时斗争方针与任务的指示。县委在原系马文杰活动地区的五华山周围建立中心区后，根据华中局指示，积极开展武装活动与宣传工作，迅速恢复了南繁芜边区的连柏、平沟、新林等四个乡的工作，并由马文杰率领一支精干的小武装，前往开辟南芜平原地区。当时，敌独立方面军从繁昌等地集中到芜湖整编，南繁芜地区只剩下土顽武装。马文杰等抓住战机，首先率部插到繁昌边远地区。那里的竹丝港、黄基渡、金家阁三乡，地处南繁芜三县交界处，比较偏僻，驻城敌人鞭长莫及。经过周密的调查和计划，马文杰率领人数不多的游击队，连续打掉竹丝港、金家阁、戴公山等三个乡公所，有力地配合了山区游击战争。南繁芜县委武装原系沿江总队十一区队，经过三个月战斗，发展为包括县委主力武装和新发展起来的南芜游击队，以及由独立方面军起义人员改编组成的“重光部队”三部分，共一百四十多人的武装力量。

在泾青南铜地区，朱农于一九四五年底率三区队转移到宾山地区，很快与我们留在那里的姚生所率二十多人会合，在朱农领导下，铜青南县委以宾山为中心，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并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挫败了敌人的“清剿”，很快打开了局面。县委转移到宾山地区后，留在铜青南地区约三十人的精干武装在陈尚和、尹彬领导下，以茗山冲一带为中心坚持游击战争，与泾青南中心区彼此呼应。但我们有的同志对抗日战争转变到国内战争的新形势没

有足够的认识，在对敌斗争方式上仍采取抗日时期钻地洞的办法。例如，铜青南有一支武工队，在工委同志率领下，深入铜陵凤心区查家圩活动，由于叛徒出卖，在地洞中被敌包围，全部被俘，损失长短枪十支。

在主力部队进山时，警卫连支书查斌带着一个班，到铜陵郎坑一带活动。因与总队部失去联系，同志们以为他们被敌人杀害了，非常悲痛。哪知查斌等在孤立无援、敌人密集的环境中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克服了重重困难，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不久，他们打听到铜青南工委所在地，突然带着一些新战士和缴获的武器，出现在同志们面前，大家乍一重逢，又惊又喜，激动不已。

在沿江部队各部取得反“清剿”斗争胜利的同时，敌一六二师四八四团于泾太石地区配合敌一五〇师的四四九团“围剿”我沿江部队主力的计划破产后，旋即转向黄山的绩歙边区，寻歼我地委机关和唐辉部队。四月十二日，敌四八四团配合保五团等共约十八个连兵力，分三路包围我地委机关所在地黄高峰，警卫武装机动灵活，沉着应战，打死打伤敌人十多名，在战斗中无伤亡；但因背电台的同志和炊事员在战斗中离开部队，被敌俘虏，所以损失人员四名、电台一部。地委机关突围后，安全转移到宁国板桥地区，敌人围歼的阴谋遂告破产。在此以后两个月反“清剿”斗争中，地委机关以及坚持在旌泾太的洪林部队和坚持在黄山一带的刘奎部队，均没有受到损失。在电台损失前，我们从电台听到叶挺同志坠机事件，大家都表示万分悲痛。

在一万多敌人的三个月全面军事大“清剿”中，皖南革命力量渡过了决定胜败存亡的关键时期。这次反“清剿”斗争

的胜利，奠定了皖南游击部队在逼近南京的苏浙皖地区长期斗争的基础，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开辟敌后第二战场准备了条件。它对于加速渡江战役以至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具有战略意义。

（九）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七、八月分，华中解放军六战六捷，歼敌六个旅又五个交警大队，共五万六千多人。国民党被迫将四十四军和新七师全部撤出苏皖地区。四十四军整编后，先后调往苏北战场。皖南敌军除县警保队、土顽外，其主力只剩下十三旅和保五团（即后来的保四总队），以及从皖北调来的保三团、保六团等，因而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巨大变化。

黄山以东游击部队各部利用有利形势，取得一系列胜利。六月底，唐辉部首先打下孙村乡公所，并奔袭攻克昌化县石坞敌区署；九月洪林部打下水东乡公所；十月，吕辉部消灭宁国行动队特务武装，并打下宁国板桥、旌德十一都乡公所。

当时，我沿江部队所承受的压力却很大。敌一六二师从山区开到芜湖后，即配合土顽对南繁芜进行“清剿”。在太石边区，敌四四九团从秧溪撤走后，又有一个团驻进了太平县城。为了创造新局面，沿江中心县委六月在泾青南中心区宾山召开会议，总结三个月的反“清剿”斗争，并决定：泾青南部队、泾太石部队在巩固和扩大中心区的基础上，迅速打通与南繁芜的联系，并主动向西南的祁石贵广大地区发

展，打下沟通皖浙赣的基础。会后，我向西南发展部队分三路出动。泾青南一部由孙林、叶光华、孙举东向九华山周围发展；泾太石边部队由查富德率领一部，向黟休祁方向的五溪山周围发展；由钱秋育率领一部向石贵方向的杉山周围地区发展。这些部队翻山跨谷，跃进数千里，一路摧枯拉朽，打击国民党乡保政权，开创了以敌后向西南大发展的跳板和支援南进部队的基地。

在开辟新区同时，各游击根据地也得到巩固和发展。六月，泾青南部队打下青阳杜村乡公所，袭击了青阳石堰桥警保队驻地。八月，转泾西全歼了厚岸乡公所三十多人，缴机枪一挺、步短枪二十多支，威震敌胆。厚岸乡查村大恶霸地主查世汉跳出来组织地主武装，扬言数月内彻底消灭游击队；并花了大量钱财，通过安徽省国大代表在芜湖买了两挺机枪和许多弹药，派二十来个警保队员护送回厚岸。泾青南部队通过青阳地下党组织，探知敌人将于某日经由青阳，我军在杨田埂、万支岭附近的山头上埋伏。敌人带着许多枪支弹药，洋洋自得而来，眼看再转过几个山坳就要到家了。这时，只听半天里一声枪响，游击队冲杀声震动山谷。战士们从两侧山头上压下去，那些警保队乖乖做了俘虏。清点缴获，计有两挺机枪、一支驳壳枪、三十二支步枪以及许多子弹。

在南繁芜地区，敌独立方面军被改编后，重新开始“清剿”，同时敌一六二师也投入大量兵力。七月，南繁芜游击队队长王木秀和副队长刘某所带那个班，在竹丝港狭小水网地带，遭到三路敌军包围。我军强渡突围时，毙敌十六名，击伤八名，但我方被水淹死两人，被俘四人，损失枪七支，

并且发生三名从顽军过来的队员叛逃事件。接着，敌人集中大量兵力驻剿我五华山中心区，游击部队无法立足，被迫外跳。这时，泾青南游击部队与王文石取得联系，我们便让王文石等率骨干力量，转移到秧溪河中心根据地，休息数月，养精蓄锐，回到繁昌地区，很快扭转了局面。

一九四六年秋，新成立太石工委，由马文杰、查志强、张建南、梅展南组成，马文杰为书记。那时工委领导锄奸肃反斗争，镇压了国民党特务中心组长陈立中等反动分子，并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将基于民兵上升为脱产的游击队，派地方干部汪应龙担任游击队长。因此，太石边中心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

同时，我们派陶刚担任黟休祁工委书记。他们贯彻积极进取方针，主动打击小股敌人，游击武装很快扩编为一个中队。

一个秋日的傍晚，我在泾县厚岸做统战工作，青阳交通员杨斌、陈青赶到金坑通知我，说是上海来人，在杨田埂陈发周家等我见面，我赶到陈家时，已是午夜了。在一间书房里，已经有一个人在等着了。只见这人西装革履，戴一副墨色眼镜，显得很有气派。等到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人，他连忙摘下眼镜，冲着我说：“老杨，不认识了么？”我细细一看，原来是余华同志，早在江北无为根据地的时候我们便熟悉。抗战胜利后，余华被派往上海开展皖南方面的统战工作，他还派余起、黄土方到山区给我们送过药品。他说，这次奉命前来传达华中局对于皖南地委的《七一指示》的。因为沿途盘查，所以他通过陈发周的叔父，中纺公司总工程师陈维稷，弄了一枚中纺公司的徽章，装扮为公司职员

来到皖南。

我握住余华的手，兴奋异常。在夏季反“清剿”战斗中，地委电台被敌破坏。后来，洪琪秘密前往南京，到梅园中共办事处找到董老，又设法搞到一部电台，由地下交通钱老板雇船运到青弋江上游，再由王文石带一个排，护送到太平樵山。在此之前，我们与华中局的联系一度中断。因此，我们盼望华中局指示，如同久旱盼甘霖一样。

因不便留宿，我连夜赶回驻地金坑，天已大亮。次日，余华坐了轿子来到厚岸石兰村，在革命老人舒石美附近村子住了三天。他传达《七一指示》，表彰了皖南部队的功绩，详细分析了全面内战爆发之际的全国形势，特别是皖南地区的形势，全面阐述了皖南党组织和游击部队面临的革命任务和斗争策略。它强调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全面内战，已把百分之九十的兵力调到东北、华北、华中解放区周围以及大城市与交通线上，大江以南广大区域非常空虚；国民党为了进行内战，又必然无限制地加强对江南人民的剥削压迫，从而激起广大群众的更大仇恨和反抗。在这样的形势下，皖南党组织和游击部队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展革命力量，开展积极、宽广、胜利的游击战争，并集结比较强大的主力，创造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革命政权。

《七一指示》象一股强大的飓风，吹过苏皖大地，各地游击战火更加熊熊燃烧起来。

十月间，熊兆仁、倪南山在苏浙皖地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后，率领苏浙皖游击部队骨干三十多人，到达皖南地委机关所在地太平樵山地区，与胡明会师，从此，苏浙皖和皖南两大地区联成一体。十一月，皖南地委在泾县濂坑召

开会议，胡明、刘奎、唐辉和我（洪琪去南京搞电台未回），苏浙皖游击部队主要领导干部熊兆仁、倪南山等均出席了会议。会议认真贯彻了《七一指示》，研究了苏皖地区的斗争形势与任务，决定由过去“隐蔽坚持，积蓄力量，相机发展”的方针转变为“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创造主力，积极开展胜利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方针，并正式成立皖赣军政委员会，由胡明任主席兼政委，熊兆仁任司令兼军事部长。

为了遏制我军的发展，安徽省保安副司令张湘泽指挥保四、保三总队和各县土顽，又向我发动“清剿”。由于兵力不足，敌人鼓吹“政治清剿”，叫嚷“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竭力加强特工活动，摧残群众，强迫自首。我游击部队采取“以打击还打击，以进攻对进攻”的方针，内线外线同时作战，迅速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清剿”。三月中旬以后，黄山以东游击部队彻底打垮敌人对于绩溪岭北和绩宁昌边区的重点“清剿”，唐辉、王诚信等部放弃了山棚，下山住进村子，公开活动。我沿江中心县委积极壮大和建设主力连队或大队，沿江部队发展为七个主力连，除中心县委警卫连外，朱农、陈爱曦、查富德处各两个连，加上其他工委游击中队，形成了一支十分活跃的革命武装。在地区发展上，铜青南地区由青阳的茗山发展到铜陵的铜官山、水龙山、凤凰山等地，与南繁芜新开辟的繁昌新林、南陵工山等地联结起来；泾青南地区从宾山周围，扩展到南陵三里店，青阳的陵阳、青坑、九华山，泾县的中村、白贡里、田坊，贵池的刘街、梅街等地；泾太石地区以秧溪、龙门为中心，发展到离太平县城仅十余华里的甘棠、饶村、辅村、沟村、新丰、曹村，

泾县的厚岸、包村、查村，石埭的二都、七都等地；黟石太地区则恢复了李健春原活动的休黟地区；并在石太开辟了宏翠乡、余溪、陶源等地，总计大小已有五十五个游击区。在工作开展上，各地均建立起民兵武装和各种群众革命组织，并根据群众普遍缺粮的情况和迫切的要求，开始在中心地区进行抢粮斗争，分掉了秧溪河乡公所国民党仓库的几百担粮食，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十）

一九四七年三月，皖南地委在旌泾太的樵山荷花坑，召开地委扩大会议，除洪琪、唐辉外，其余地委成员和熊兆仁、倪南山、洪林、吕辉等均出席了会议。会上，胡明代表地委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胡明、我、熊兆仁分别作了《皖南老区六年游击战争》、《坚持皖南新区游击战争》、《坚持苏南地区斗争十六个月》等三个总结报告。会议要求各地区彻底贯彻《七一指示》，迅速转入大发展阶段，并对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等作了具体部署。会议决定成立黄西工委。为了集中和创造主力部队，决定刘奎所部黄诚、黄致远、周汉卿三十多人，与我沿江部队合并，改为黄西总队，由刘奎任总队长，查富德任总队副，钱秋育任政治处主任，我任政委。沿江中心县委改为黄西工委，由刘奎、朱农、陈爱曦、王文石和我组成，我为书记。四月间召开黄西工委会议，除王文石未到会，其他同志均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贯彻了地委会议精神，还讨论了打石台县城。黄西工委下属县工委有：南繁芜工

委，书记王文石兼。泾青贵工委，亦即原泾青南工委，书记朱农兼；泾石太工委，书记陈爱曦兼；石太工委，书记马文杰；黟休祁工委，书记陶刚。活动地区分布于南、繁、芜、铜、青、贵、泾、太、石、黟、休、祁等县广大区域，当时统称黄西地区。地委三月会议以后，全区游击战争转入大发展时期。各游击部队不仅在军事上取得很大胜利，并将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由绩溪九华乡和太平南安分粮斗争开始，掀起了全区几十万人轰轰烈烈的大分粮运动，使国民党区、乡政权迅速瓦解，革命政权开始建立，民兵、农会普遍组织起来。

这一时期皖南主要战斗有，泾太石的陈爱曦部的太平龙门伏击战，唐辉部的宁国墩战斗，绩溪、宁国、昌（化）部队的绩溪县杨溪战斗，胡明、熊兆仁率路东路西各游击队攻入绩溪县城战斗，黄西查富德部打下石台七都乡公所战斗，泾青贵朱农部解决青阳东石乡土顽战斗，铜青南陈尚和、徐世达部队打下铜陵朱村乡公所战斗等，特别是绩溪战斗取得了我游击部队首次打下一座县城的重大胜利，震动了京、沪、杭，暴露了蒋后统治的空虚脆弱。在黄西地区，首推龙门伏击战影响最大。

在泾太石地区，因我部活动范围逐步伸展到离太平县城仅十多华里的饶村、辅村、沟村等人烟稠密地带，直接威胁太平县城。太平县政府极度恐慌，决定集中力量，偷袭我龙门根据地。住在县城的国民党省参议焦鸣鸾先生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是国民党左派，与我安徽党组织负责人柯庆施、梅南轩有过很深的交往。抗日战争时期，他与我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联系密切。我们

进入山区后，他很快与我们联系。四十四军向我“清剿”时，他曾派侄儿焦能良到秧溪乡的小坑，把敌人的“清剿”计划送给我们。焦鸣鸾获悉敌人的阴谋，立即通过进步士绅胡大侔，给陈爱曦送来情报，陈迅即通知大队副左克南前往增援，并作了严密的战斗部署。

太平县警保大队长牛炎手下有十大弟兄，多系行伍出身，骄横蛮悍。其中一个姓许的把兄弟充任机枪班长，特别狂妄。为此，陈爱曦、左克南选调神枪手和投弹手，组成突击班，由连长丁铁牛负责解决机枪班。

部队在蒋家坑埋伏了三天，毫无动静。第四天拂晓，狡猾的敌兵悄无声息地开来了。走在前面的是敌尖兵班，只有五个人，走过河岸，踏上小桥。接着，那个姓许的班长带着机枪班，趾高气扬地走过来，后面是密集的大队人马。此时，只听信号枪响，我突击班如饿虎扑食，一跃而起，猛冲下去。刚冲到河边，敌人已在路侧的菜园内卧倒，紧跟着机枪达达地横扫过来。丁铁牛把手一挥，掷弹手大展神威，成串的手榴弹飞向敌群，敌大队和机枪班被隔离开来。同时，刘章甫等几人翻滚着逼近敌人。刘章甫凭借一棵大树隐蔽，一枪把机枪手击毙，夺过机枪，向着敌人扫去。接着，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在山头上和茶棵里埋伏的战士呐喊着从四面冲向敌群，很快就结束了战斗。

在清扫战场时，计毙敌三十几人，全歼一个排，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二十多支、手榴弹二百多颗、子弹几千发。但是，我来找去寻不着牛炎的尸首。原来，他见势不妙，早已带着两个贴身卫兵溜下河沟逃跑了。战士们感到非常惋惜，有的跺着脚说：“唉，可惜没有逮到这条‘牛’！”

这是我们进入泾太石以来战果最大的一仗。正忙采摘新茶的群众得知游击队打了大胜仗，奔走相告，一片欢腾。有的杀猪，有的宰羊，有的老太太炖上一只老母鸡或者煮上几十个五香蛋，肩挑手提赶来慰劳子弟兵。部队连晚召开庆功会，奖励立功战士。

经这一仗，我军士气更加高昂，地方绅士望风慑服。那个时期，我们为了壮大声势，激励群众，发展胜利成果，曾在谭家桥等多处组织文艺演出，演出的节目有解放区传来的《小放牛》等等，也有指战员自编自演的歌曲、说唱、戏剧，如《姑劝嫂》等等。在谭家桥首次演出时，舞台设在村口的祠堂里面，锣鼓刚刚敲响，祠堂就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家扬眉吐气，有说有笑。节目从午后开始，一演就是两、三个小时。事先我们在要道口上布置了严密的警戒，驻在汤口的近在咫尺的保四团缩在据点里不敢动。后来，华东局曾山听政治交通员余起说起游击队在谭家桥演戏的情况，夸奖群众工作开展得好。

此时，泾太石工委率领的游击队扩大为两个中队。同时，黄西总队部直属武装整编为两个主力连：一个连在石太边区工委所在地，另一个主力连由查富德、钱秋育率领，继续向黟休祁方向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十一）

一九四七年五月底，地委接到华东局三月八日指示。《三八指示》将《七一指示》精神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指出我军全国性的战略反攻三、五月内即将到来，蒋管区要积

极开展各种斗争，配合大反攻，夺取全国胜利。根据皖南有利形势，命令地委充分利用大发展的良好时机，大胆地放手地开展游击战争，开辟第二战场。为此，应建立和加强一、两个主力游击部队，创造根据地，并向赣东北和天目山推进。六月，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三八指示》，决定从黄西总队抽调一个主力连和泾旌太、皖浙一部，创建司令部直属主力营。要求各地大力发展武装，创建各级主力，并加强群众、党建、财粮、锄保及政权建设工作。接着，地委发出《关于发动群众，进行抗租、抗债、抗粮的指示》，以此作为秋季中心工作，在武装斗争配合下，将一九四七年的全面大发展推向高潮。

我皖南游击部队的大活动大发展，打击和动摇了极其脆弱的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威胁其南京巢穴。因此，安徽省政府拼凑了绥靖督导团，由省府委员林中奇指挥，再次对我发动全面“清剿”。然而，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巨大变化，敌军不得不采取分区联防手段，主要依靠保安团队、县区武装以及特务奸细活动。我军则针锋相对，打击来犯之敌。六到九月，反动头子林中奇疲于奔命，敌主力保四团成了“跑死团”，而我各游击部队则在胜利的反“清剿”斗争中继续大活动、大发展。

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到十七日，皖南地委在太平县龙门召开分片会议，由孙宗溶传达华东局指示，并布置在一九四七年春夏间分粮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分粮斗争。会议期间，胡明、熊兆仁、倪南山带来主力连，刘奎和我带来黄西总队第一连，加上陈爱曦的第三、五两个连，在龙门集结了四个主力连。正在这时，太平警保中队进驻龙门镇，企

图报复我们龙门游击队。大家认为，敌人送上门来，却之不恭，应该吃掉它。

敌兵龟缩在龙门镇祠堂里，凭险死守。我各路队伍由倪南山指挥展开强攻，围困敌人三天四夜，太平县政府根本不知道。第三天下午，我们命令连长丁铁牛，当晚一定要拿下碉堡。熊兆仁风趣地说：“拿不下碉堡，你就不是铁牛了，而是一头不能耕地的老牛了！”丁铁牛应声答道：“坚决完成任务！”当晚，战士架起长梯，爬上祠堂屋顶。敌群中有个叛徒刚端起机枪，就被我击伤，栽倒下去，机枪成了哑巴。此时，我后续攻击部队搬来大量柴草，围在祠堂四周，浇上煤油，内加辣椒粉，放火燃烧。刹时之间，烈焰冲天，浓烟滚滚，熏得敌人涕泪满脸。这时，我一连派出几名战士去碉堡前喊话劝降，均为敌击伤或击中牺牲。接着，我们找来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他和碉堡内队长是拜把兄弟，由他高喊自己名字，敌兵停止射击。他进入堡内，并晓以利害，敌兵见无路可走，答应投降。我们趁此机会，一阵冲锋号响，我游击健儿如同万箭离弦，直插碉堡，敌警保中队全部缴械投诚。缴机枪一挺、长短枪五十多支。

龙门战斗以后，群众斗争情绪更为高涨，分粮斗争如火如荼地普遍开展起来。

所谓分粮斗争，有的地方叫作抢粮斗争，就是发动群众夺取国民党政府的粮库，开仓济贫，还粮于民。这是迅速发动群众的极为有效的斗争形式。因此，分粮斗争已成为大发展的动力。在上陂小坑地区活动的时候，曾开展过这种斗争。一九四七年春夏间，黄西工委开始在太平、泾县、石台、青阳、南陵等县方圆数百里范围内，发动几十万群众开仓分

粮，震动了江南半边天。

太平县南安有国民党的两个积谷仓，储粮千担以上，马文杰决定在南安开仓分粮。当时，国民党第八专员公署专员程中一带着贵池警保大队，坐镇石台，窥伺秧溪河，因而我们这次行动宜在晚间进行。可是，马文杰作了动员后，一些同志兴奋异常，耐不住性子，吃过饭就动身了。接着，马文杰和医务干事梅展南、游击队长汪应龙带一个基干民兵班，动员十多个村庄的几百名贫苦农民，挑箩背筐，携着麻袋，浩浩荡荡向南安进发。

我得悉他们提前行动，感到很不放心，当时主力部队运动到太平的郭村方向去了，只有一连指导员侯胜带着少数警卫人员留在总队部。我连忙派侯胜带一个机枪班奔赴南安，同时写信通知刚回芦圉的刘奎、查富德，赶快带部队前来掩护群众分粮。等到吃晚饭时，刘奎他们还没有回来，我放心不下，便带着两名警卫员、一名司号员，跑着赶到南安。到那儿一看，到处是喧闹的人群，大家正忙着搬运粮食。我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无法找到马文杰。正在焦急。忽然看到小坑游击队长汪应龙，我便问他警戒情况。他说，马文杰和梅干事到上边村子去了，侯胜带人到河边警戒去了。我问他：你们的岗哨怎么放在墙拐上？又问他：对面那条小路是什么地方，放哨没有？他说：“对面那条小路是三都来路，没有放哨。本来重要位置都布了哨，但哨兵没有坚守岗位，自动撤回分粮去了。”我吃惊地说：“三都的来路正是石台敌人袭击我们的道路，怎么能放松警戒呢？”

就在这天傍晚，贵池警保大队从石台出动了。原来，马文杰和群众来到南安的时候，将积谷仓的看守人员逮住

了。但其中有一人是地方干部陈松林的内弟，所以被具保释放了。不料这家伙趁机溜出了村子，跑到广阳向敌人报告，并引着贵池警保大队偷偷向南安袭来。

天色渐暗，上弦月升起。我带着警卫员汪光标、孙群、司号员陈根源急忙向村边走去。村外小河上有座木桥，我们刚走到桥上，赶在前面的汪光标说：“不好，对面山上敌人来了。”我举目一看，对岸西面河边果然有一溜人影，月光照着敌兵的铜帽徽和钮扣闪闪发亮。我们悄悄折回，待到了人群中，便布置群众赶快离开。不一会，敌兵接近桥头，我叫司号员陈根源赶快吹冲锋号。小陈仰起脖子嘟嘟地吹了起来。他灵活得象头小鹿似的，一忽儿跳到东边吹，一忽儿跑到西边吹。敌兵听到号声，又看到村边屋后活动着许多模糊的人影，被吓得趴倒了。等到他们醒悟过来，我们已经撤出村子，沿着山坡小道撤回上陂。

这次分粮收获很大，影响深远，但也受到一些损失，群众中有两个人受伤，还被抓去两人。马文杰和梅展南在掩护群众撤退时，走到桥头与敌遭遇，梅展南腿部中弹负伤，马文杰和警卫员李贵英用短枪反击掩护，并由通讯员徐石权背着老梅跳下水沟，跑到上游隐蔽起来。次日天亮，小徐赶回部队报信，我们便派人把梅展南抬回来。

我们接连不断进行分粮斗争，开仓济贫，群情振奋，盛况空前。马文杰部数月内发动群众四千多人，分光国民党库存公粮一万五千多石，斗争波澜波及石台县离城五里处。我们还利用了秧溪乡警保队长谢愚耕的关系，解决了秧溪河乡公所全部武装。陈爱曦部七月初发动龙门地区群众几百人，抢了太平甘棠仓库的粮食；七月下旬，再次发动群众数千人，分光

甘棠仓库全部粮食。接着，在泾西及太平的董家湾、查林、厚岸三区大搞分粮斗争。八月初，斗争发展到太平宏翠乡、石台城安乡等地。一个月内，泾太石地区在分粮斗争中扩军百余人，民兵发展到二千多人，并建立了几支脱产基干民兵队伍。随之，各地建立了政权。龙门、新盛两乡首先成立乡行政委员会，接着，泾太边区县级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由陈策任主任，太平周围乡镇全部被我控制。国民党太平县政府军政人员吓得龟缩在城里，不敢涉足农村。芜湖的国民党报刊惊呼：“太平赤化了！”

一九四七年夏秋间，为了贯彻向赣东北发展的战略意图，黄西工委迁到五溪山，以宏潭、美溪一带为中心，建立大块根据地，发展太、休、黟、石、祁地区的游击战争。

七月龙门会议以后，鉴于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在各地游击部队普遍壮大的情况下，地委对黄西地区的组织系统作了新的划分：在黄山以西、石台以南，仍组成黄西工委，由刘奎、陈爱曦和我组成，我为书记。下辖泾太石县委，书记陈爱曦兼；太石黟祁工委，书记钱秋育；黟休歙工委，书记陶刚。并撤消太石工委，马文杰调回五溪山。在地委九月会议后，钱秋育率一个主力连向西发展。原黄西工委的南繁芜县委，由王文石（书记）、陈作霖、王安葆组成。铜青贵县委，由朱农（书记）、陈尚和、尹彬组成。这两个县委从黄西工委划出，归地委直接领导。

我们率部转移五溪山时，这里的上陂保区分部书记曹金坤以及曹家庄的保长孙先波均参加革命。我们还通知方友仁、周梦溪等人隐蔽下来，或跟我们转移。但他们对国民党第八专署专员程中一存有幻想，没有转移。程中一得知我主

力转移，趁机偷袭小坑，焚烧民房，并把我侦察员杜世英的哥哥杜叶春抓去杀害了。事后，方友仁到石台见程中一，被关押起来，扣上“通匪”的罪名，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受到迫害，直到解放前夕才被营救出来。

黄西总队进入五溪山地区，马上取得休宁县兰田战斗的重大胜利。兰田是休宁北乡大镇，是敌人对付我歙、休、黟游击部队的重要据点，计有多公所武装和休宁自卫队共五十多人，碉堡两座，其附近南塘乡公所另有敌兵一个班。我们集中主力三个连及歙、休、黟游击队三个班，由刘奎、查富德和我指挥，对敌发起攻击。事先，我们通过内线，将兰田乡长余克忠、南塘乡长丁学礼找来见面，做了工作。然后，我一连由丁学礼带路并喊话，缴了南塘乡公所武器。查富德带两个连，由余克忠带路到兰田，突然包围敌分队长住处，由余喊话，逼他命令敌兵缴枪。但分队长在房里拖延时间，后他的右手被击伤，才被迫缴枪。这次，全歼敌一个分队及两个乡公所武装，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五十一支、弹药物资一部。战斗中，我们动员民兵一百多人以及群众数百人。解决战斗后，群众奔走相告，庆祝胜利，慰劳子弟兵，并一鼓作气，进行分粮斗争，扩大战果。这次战斗震动了屯溪，打破了敌人在石、太边及歙、休、黟边的“清剿”计划。接着，我们连续对周围基层政权广泛发起攻势，并在加强民兵、农会、党团建设的基础上，普遍动员群众，开展抗丁、抗税、抗粮斗争，并成立了石台县人民政府，由钱秋育当县长。五溪山又成为黄西地区的一个中心根据地。

同一时期，皖南各游击部队分头下山，主动出击，摧毁泾县、太平、青阳、宁国、旌德、绩溪、石台、黟县等地县

以下政权百分之六十以上，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在皖南的统治基础，整个皖南游击战争跨入了新的胜利时期。

(十二)

一九四七年六月，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鲁西南歼敌九个半旅以后，千里跃进，直插皖西，于八月底进入大别山，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振长江，瞰制中原，牵制了敌人南线总兵力一百六十

晨，傅秋涛、江渭清、王槐生等率领一部分突围战士到达宁国县境内的打虎山一带，突然遭到四十师一个团的几次袭击，部队伤亡更大，王槐生、通讯参谋杨羽林、三营营长范连飞因负重伤不能行动，便交给当地群众掩护养伤。他们在山洞养伤期间，因叛徒告密，被敌军抓去，英勇牺牲了。傅秋涛带着部分指战员插到青石岗过夜，第二天拂晓，纵队部的一个副官叛变，领着大批敌军将驻地围住，他们拚死向外冲杀，结果队伍被冲散了，傅秋涛和江渭清也失掉联系。几次战斗后，只剩下傅秋涛、陈裴然、孔诚、汪克明、汪其祥、吴继安、戈白章、韩云等八人。傅秋涛见情况十分危急，为便于突围，即和夫人陈裴然商量，将女儿安排在附近一位老乡家抚养。傅秋涛带领身边几个同志，从宁国、郎溪、宣城、东坝等地突围出去，到一九四一年二月下旬，才到达苏南溧树港，找到了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旅部。半月后，江渭清带领二、三十人也突围到了这里。

那次我专门邀约几位同志去看望傅秋涛的小女孩，当我们来到门外，小女孩马上走过来，一见我们，又说又笑，十分逗人喜爱。我们问她：你知道你爸爸吗？她看看我们，眼珠转动几下，说：我知道，我爸爸是师长。我们拉住她的小手，说：你可不能随便讲你爸爸是师长啰。她看看我们，点了点头。我们转身向抚养小女孩的那位贫农老大娘表达了感谢之情。直到解放后，傅秋涛才将小女孩接到北京去上学了。

会议结束后，大家各自奔赴战斗岗位。我和罗白桦带着警卫武装，白天赶路，插过郎桥河，朝着丕岭方向走去。走了一个多小时，不觉来到星潭。这儿有条河，我们过木桥，

快步登上丕岭，仰视顶峰，一时感慨系之，悲愤交集。丕岭，这个八百米高的驼峰形的山峦，曾是血与火的战场。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夜晚，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大批军队，在这里向我奉命北上抗日的新四军将士，首先射出了第一颗罪恶的枪弹。我军自卫还击，反复冲杀，许许多多英勇战士在敌人屠刀下献出了宝贵生命，山坡浸透着他们的碧血，深山埋下他们的忠骨。事隔六年了，青山依旧，丕岭仍耸立在皖南群山之中，然而，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人民革命解放事业大反攻局面开始了。我依恋地离开丕岭，一种重温故地、怀念战友之情油然而生，顿感革命任重道远，不由加快步伐，奔向新的征程。

回到五溪山，认真贯彻了地委九月会议精神。九月会议对新形势下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抓紧当前大反攻的有利时机，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高度集中主力，普遍发展地方武装，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造中心根据地，扩大活动区域，以求迅速发展力量，有力地配合全国大反攻。根据这一方针，地委把开展以抗租抗债、反霸直到土地改革为内容的群众斗争，以及高度集中主力，配合全面反攻和加强根据地建设，作为三大主要任务。同时，对各方面工作作了部署：在集中和建设主力部队方面，地委三月会议期间，由黄西总队和黄东游击部队洪林、唐辉部抽调武装，与地委警卫武装及苏南转来的部队合并，建成了苏皖边区司令部特务连；六月地委会议后，又从黄西和洪林、唐辉部抽调部队，将司令部部队充实为两个主力连，并建立警卫武装，形成营建制。这次会议决定，再由黄西地区抽调三个连（朱农、陈爱曦、查富德处各抽一个连

后，各工委又将警卫排扩充为主力连)，将司令部主力重新整编为两个营六个连，成为一个小团，计六百多人，机枪十四挺，长短枪三百五十多支。另有一个警卫排，三十多人。年底前，要求把主力发展为两个团。在地方武装发展上，要求县一个营，区一个连，乡一个排，村有基干队，并普遍组织民兵自卫军，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在党群工作和政权建设上，决定年底前中心区普遍开展反奸、诉苦、清算运动，进行土改；整顿和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县、区、乡、村各级党的领导机构；普遍建立县、区、乡、村四级“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立财粮机构，确定税率（中心区百分之十，边沿区百分之五），征收粮税。

会议期间，得知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直插大别山的消息，大家无比兴奋。但地委对于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的战略意图并不了解，以为大军马上就要过江。于是地委决定：由我率领黄西总队和黟、休、祁游击队，进军贵池沿江地区，目的是打通与刘、邓大军及皖西根据地的联系，破坏敌人的江防，迎接大军渡江。地委将所属各部的地区的划分和发展方向，统一作了调整：决定黄西工委由刘奎和我开辟沿江的青阳、贵池、石台等地区，原黄西工委的泾青南与南繁芜合并为一个县委，朱农为书记；泾宁宣与宣宁地区合并为一个县委，王文石为书记。原泾旌太县委洪林地区和原黄西的泾太石县委陈爱曦部合并，由洪、陈负责。地委九月会议，在军事斗争方针上，强调高度集中主力，有力地配合全面大反攻；在群众斗争方针上，决定以普遍开展清算斗争进入土改；在根据地建设方针上，决定创造大块中心根据地，并向西发展，打通与江北的联系；在领导方法上，强调组织

上的集中与行动上的统一（要求五分钟打通思想），以及机械搬用解放区急性土改的经验，特别是对地区的划分，不经全体委员研究讨论，或事先征得同意，随意乱划，如此等等，根据当时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这一切都是不适当的。

会议不久，敌人以更大的兵力进攻我涌溪、板桥地委机关所在地。坚持在泾宁宣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吕辉率领一支小部队，插到旌德十一都一带和泾宁交界的山区展开活动，以便吸引敌人，减轻对涌溪坑的压力。一天早晨，吕辉部队在旌宁边区的腊子山上，伏击从宁国方面前来围攻的一个排敌人，消灭敌人大半，剩下几个敌兵四下逃命。吕辉带领战士兴高采烈地打扫战场，冷不防，被隐藏在草丛中的一个敌人击中而光荣牺牲。吕辉同志原来是新四军三支队的文化教员，在皖南事变时被捕，当时他仅十九岁。后来，在敌人押解途中，他和几个侦察员逃跑出来。几经转折，他终于找到了革命队伍。为了让他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山区中心县委决定要他带几个同志去开辟泾旌宁宣地区，他三进三出，从失败到胜利，终于站住了脚跟，创造了一大块游击根据地，打通了苏南和新四军六师的联系，他和陈洪、彭海涛领导的宣城部队接上了头，还去苏浙军区见到了粟裕司令员，回来时，带上粟裕赠给皖南游击队的两挺机枪。吕辉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迅速成长为一位具有足智多谋和出色指挥才能的党的领导干部。

也就在这个时刻，约在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南繁芜工委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统战对象，曾经对革命起过作用的地方人士也受到打击，这就将一些能够争取或靠近革命的对象，

推到敌人方面去了，很快引起敌人的大规模“清剿”。孙宗溶、王文石、陈尚和等率领一批干部和武装人员到繁昌的黄连山一带检查工作，传达地委九月会议精神。碰到敌人“清剿”刚撤出，住在南陵县的小张家山，就被尾追的南陵县常备队和四乡联防队二、三百人包围。他们迅速分成两路突围，陈尚和在突围中不幸牺牲。陈尚和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在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泾青南县委副书记和铜青南工委书记。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对于开辟游击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都作出了贡献。尚和牺牲的噩耗传来，我们无不落泪。

铜青贵地区由周光斌带的两个警卫班在石获山被围，被俘三人，伤亡过半。在盘台、龙门等地的武工队，在敌人大清剿中，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许多情况表明，当时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因为我们对党中央战略决策了解不够，对战争的进程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造成了损失。但是，随着上级指示的下达和情况的变化，地委很快调整了斗争方针和行动部署。九月会议主要方面还是好的，这就是集中了一部分主力，并强调发动群众，壮大力量。这对以后粉碎清剿和组织南进，都具有意义。

会后，我部加快准备，集聚部队。为了在主力转移前能歼敌一部，使敌不敢妄动，以便给继续坚持黄西地区斗争的游击部队奠定跨越京屯公路向南发展的基础，同时也为了解决西进部队的冬衣与经济问题，我们决定攻打黟县京屯公路上的渔亭镇。战前，我们调集两个主力连，配以黟休祁武工队，并组织民兵七十多人、群众千余人搬运国民党仓库物资。战斗中，驻守乡公所的敌人拚命抵抗，但迅即被我攻

克。这次战斗，计缴获枪二十多支，手榴弹、子弹及物资许多，法币三千多万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渔亭战斗后，我们遵照地委决定，率部自五溪山出发，长驱西进，直指贵池江边。这时，刘奎征得我们同意后，回地委工作去了。十月，部队进入贵、石边杉山地区，趁敌未及防备，打下石台七里乡公所和贵池阳坑乡公所。旋又以两个主力连，配以武工队一部，打下贵池高坦乡公所及碉堡两座，歼敌自卫队一个分队与乡公所武装数十人，共计缴枪五十多支，俘虏二十多人。战斗中，敌自卫队两个分队前来增援，被我打垮，毙敌多名。这些战斗，在新区壮大了我军声威，鼓舞了群众情绪，对于打开贵池局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我们派五溪山贫农刘长富过江，到了大别山的岳西县，与桂林栖取得了联系。桂很快复信说，江北就要派一支小部队过江，准备支援我们一部电台。这两点，后因情况变化，均未实现。

西进部队长驱数百里，声势浩大，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对部队也是一次锻炼。马文杰、钱秋育进军贵、石交界的刘街时，捉到一个国民党县参议员，教育他说，刘、邓大军渡江南下指日可待，只有识时务，才能找到光明前途。那个参议员被释放后，到处宣扬解放大军先头部队已经过江，一时造成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刘、邓大军已兵临长江北岸，而阳坑、高坦等地又靠近江边，所以西进部队的军事行动过早地刺激了国民党江防之敌。尤其在我军袭击贵池殷家汇后，驻守江防的敌六十三师师长李宏达和皖省军管区少将参谋龙实武于惊恐之余，慌忙调集六十三师一部，配合贵池八专区保安大队及贵、石两县地方武装，大肆对我进行“围

剿”堵击。我部战士面对十数倍于我之敌，沉着应战，开始未受损失，并于游击运动中进击丁香树乡公所，取得胜利。然而，终因敌众我寡，同时该地地方反动势力强固，部队遭到的困难越来越大。在实际斗争中，我们认识到迎接大军渡江的条件并未成熟，于是当即机动改变方向，转而向南发展。我们首先以马文杰、钱秋育率一部武装向南前进，后又派左克南带警卫武装，会同马、钱部经贵池的詹波进入祁门、东流、至德边区高山和马坑一带。鉴于九月会议的决定，我仍率一部武装，在贵、石边杉山地区坚持斗争。部队为展开西进战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我部西进期间，即一九四七年九、十月间，皖南各游击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均有很大进展。

一九四七年的七月间，泾旌太地区洪林、陈爱曦部攻克泾县重镇茂林，歼敌七十多人，缴获机枪二挺、长枪二十一支。泾县县长吓得举家搬到南陵，泾西南乡除黄村外无敌踪影。茂林被我占领一个多月，建立了民主政权，部队发展二百五十多人，民兵发展近二千人，农会、妇会相继建立。继此以后，又歼敌四十六师机炮营的大部。缴炮两门、机枪数挺。一九四七年的十月下旬，在水岭战斗中又歼敌八十八师一个营，缴轻重机枪十挺、炮两门，取得胜利。在泾青南地区朱农部解决青阳的木镇联防队一个排，缴长、短枪十七支。在皖浙边工委地区，熊兆仁率司令部武装与唐辉部第三次打进绩溪城，缴枪九支，俘敌十多人，烧毁碉堡一座。不久，该部又巧取大石门碉堡，争取绩溪伏岭、下岭南联队队长胡铁涛，率领二十多人火线起义，于是便控制了绩溪全县广大地区。皖浙边工委戴吉祥部神出歙县南乡，以迅速动作，连续扫荡和

歼灭了敌人五个乡公所，共缴枪二十九支。在泾宁宣地区，王文石部袭击南陵的青弋江镇以及南何村、化古乡、奴村等敌据点，共缴枪四十多支。到十月底，整个皖南游击部队发展到三千多人，战斗力与战斗经验、战术水平均有很大提高。

在群众斗争方面，根据九月会议提出的斗争方针和中心任务，这一时期主要是：第一，抗租抗债斗争，从八月中下旬在中心区发展起来后，九、十月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最高点。许多边沿区甚至敌据点附近的农民也自动起来拖租拖债。第二，反霸清算斗争，一九四七年七月后，则普遍得到发展。九月地委会议决定，以反霸清算、诉苦复仇斗争进入土改为中心任务，所以这一斗争开展得更为广泛和尖锐。第三，十月以后，开始在宁国板桥一个村的范围内试行土改。从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开始分配土地，计划十天分完。一月八日，敌十三旅进行大“清剿”，进占板桥，试行土改遂告夭折。第四，九月会议确定在中心区普遍大量发展党员和每保建立支部方针后，全区党组织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党员数量发展到将近二千人。同时，农会、工会、妇女会、儿童团、贫农团等群众组织也有极大发展，农会会员达数万人。第五，九月会议后，各中心区相当普遍建立了乡、村两级民主政权，部分地区建立了县、区政府。政权一般采用统战形式，主要任务是开展财粮工作。这对保证部队供给起了很大作用。第六，由于形势的发展，敌人内部发生恐慌、混乱和分化，因此有利于开展敌军工作、情报工作及城市工作。但在群众斗争大发展中出现的主要偏差是：有的地方抗租抗债，没有照顾小土地出租者的利益，把所谓“命田”的租也

抗了，甚至农民相互出租的田也抗了租。因为没有强大的巩固的游击根据地，试行土改也是不符合皖南游击战争实际的。由于缺乏经验和照搬照抄解放区搞急性土改的经验，有的地区打击面过宽，损害了中间阶层的利益，把中间势力推到敌人方面去了。因此，在敌人清剿中，使地方党组织和部队遇到了更大困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谁夺取了中间势力，谁就会胜利；反之，就会失败。在锄保工作中，个别地区对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掌握得不够。在反霸清算斗争中，有的地区甚至提出“以烧对烧、以杀对杀”的“左”的口号。这些问题是暂时的、次要的，但影响所及，却增加了部队反“清剿”斗争的困难，甚至有的地区造成严重损失。

十月底，华东局在接到皖南地委关于九月会议的报告后，迅速来电指示：“皖南游击队目前不在于调动江北之敌，配合江北反攻，而在于发展壮大自己，发展方向在敌人不够重视地区及薄弱之处。”并指出：“敌有立即‘大清剿’的可能，速作准备，并向南发展。”不久，再次来电指示：“在目前形势下，暂不宜强调组织上集中及行动上统一，更不宜将武装力量高度集中，否则，不仅会束缚各地区武装斗争的机动灵活与独立自主的发展，而且还便利敌以集中对付我们的高度集中。同时，目前敌人正在加强封锁长江，……皖南暂不宜向沿江作公开的游击活动，暂时也不要企图与大别山打通，否则，会引起敌人加强封锁，对南北联系及今后大军渡江均属不利。”地委下达华东局指示后，我们在杉山地区总结了西进的教训。我们认为，地委九月会议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没有认识到刘、邓大军南下后，敌人势必拚命加紧巩固江防，因此西进带有盲目性，致使部队脱离

由心相探始粉百用 孤宏返入 長冷林珍 左新反半乃立

大行动，组织四支较大的南进部队，插到敌人“清剿圈”外线和脆弱地区去：一支由倪南山率领，兵力是地委主力两个连，向皖浙赣边的婺源前进；一支由唐辉率领，兵力是由唐辉所部和地委主力一个连组成的皖浙总队，向皖浙边的淳安前进；一支由我率领，兵力是黄西总队，向皖赣边的祁门、东流、至德、浮梁前进；除以上三支皖南部队外，苏浙皖工委钱敏的部队也开始从广德、宁国以及浙江孝丰向天目山前进。在整个皖南和皖浙赣边区，一方面敌人“清剿”与我之反“清剿”，一方面是我各路部队主动进军浙赣线，开辟东南第二战场，敌我双方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态势。

在我黄西部队西进时，地委决定以黄西地区的太、石、黟、休、祁、歙边建立皖南中心根据地，直属地委领导。一九四八年夏，又成立新的黄西工委，以罗白桦为书记，陈爱曦为副书记，陶刚为委员。这时，我已全部进入贵池地区，以杉山为根据地，南下祁、石、贵、浮，开辟南进新阵地。

起初，先头部队分为两支，钱秋育率一支，开辟祁、至、浮地区，马文杰率一支，开辟祁、石、贵地区。时值严冬，天寒地冻，北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呼啸而来，丛山峻岭披上了冰雪的铠甲，攀登格外困难。部队终日在高山雪地行军作战，加上粮食不济，饥寒交迫，备极艰辛。在这些人烟稀疏的高寒地带，战士们穿的是夹袄裤，我穿的是夹衣单裤，而且常常外有雨雪，内有汗水，弄得浑身上下没有干的地方，一停下脚步，便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寒气透骨。一到宿营地，就砍树烧火堆烤火。有时，群山被白雪盖得严严实实，白光耀眼，不辨道路，人走在山道上，会呼隆一声，跌下山涧的冰水里。有时，遇到敌人重兵“清剿”，为了不留下足

迹，我们便走水沟，冰水刺骨，冰碴划在脚上，如同刀割。常常有人踩在冰块、石子上滑倒，扭伤脚脖，不能行走，其他同志便扶着坚持行军。部队在行军作战中，常以干粮，就着山泉和雪水充饥，即使宿营时，也是以包谷楂煮野菜作为主粮。夜晚，每人背一把大松树芯，作为照明之用。松树芯浸透油脂，点灯照明，浓烟滚滚，但大风吹不熄，大家都称赞这是“山腊烛”。

生活艰苦尚在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带地处皖赣边界，交通闭塞，地形复杂，土匪、山霸、反动道会门，形形色色，盘根错节，多如牛毛。部队进入这些地区，山上有土匪，山下有追堵之敌，村里有地主武装，加上遍及各地大刀会的袭击，环境异常险恶。因为是新区，这里既无党组织，又无群众基础。在这样艰苦复杂的环境中，部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觉悟和坚强的吃苦耐劳精神。

有一次，大队长左克南率一支小部队在彭龙嘴进王村活动，遇到敌人“清剿”，转到牯牛降。他们冒着大雪爬上峰顶，恰遇大雪纷飞，夜幕降临，于是背靠背坐在雪窝里过夜，没水喝，用枯树枝烧着，用磁杯化雪水，每人喝点水解渴。见他们迟迟不归，大家都担心他们冻僵了。然而，当他们翻过牯牛降与一连会合后，得知要打詹波乡公所，顿时把冻饿疲乏忘个干净，一鼓作气，配合一连打下了乡公所。乡长陈尚书是个反动家伙，他听说新四军来了，早已逃之夭夭。记得当时钱秋育还就此写了一首诗：

詹波出牯牛，餐风卧雪丘；
四军从此过，“尚书”永不留。

为了振奋士气，宣扬南进的伟大意义，这年十一月，我

署名徐向南作词，钱育秋谱曲，创作了一首《沿江进行曲》。歌词写道：“沿着高山，沿着平原，在这次大反攻的前夜，我们要猛烈地向前发展！加速蒋贼的毁灭，遍插解放的旗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人民翻身而坚决斗争！前进，前进，前进到浙赣线！……”转战途中，战士们充满豪情的歌声，载着胜利的讯息，传遍了四面八方。

部队以分散的活动方式，辗转奋战，几进几出，逐渐站住了脚，开展了一些地方工作，但由于力量分散，未能取得更大战果。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我们将工委后方人员全部从杉山的龙须坑转移到祁、石、贵的历山，与马文杰，钱秋育会合，发展祁门的历口、彭龙和石台的赤岭、雷湖地区的工作。当时，驻在太平的保二团和宏潭的一个营，经常跟踪袭击我雷湖游击队。左克南带领一连到历山活动，遭到袭击，牺牲两个同志。查富德和唐刚决心出敌不意，惩罚敌人。他们带领一个排到横船渡活动后，折向七井山某高地宿营，保二团三营跟踪赶来，冲向高地。这时，查富德等早已悄悄转到山脚下张南坑埋伏下来。敌副营长和一个副官骑着高大的战马，率两个连赶到。一进入伏击圈，我机枪当即开火，各种长短枪猛烈射击。经过激烈战斗，我仅以两个排兵力，将敌两个连打得溃不成军，丢下两门迫击炮、两匹战马和大量武器弹药，落荒逃命。这一仗，我伤亡两人，但杀伤敌人多名，其中毙敌连长一名，击伤敌副官以下七、八名，俘敌四名，缴战马两匹、枪支弹药若干。可惜战斗结束已经天黑，我未能仔细打扫战场，第二天，迫击炮等物资被敌取走。尽管如此，这次胜利，对于粉碎敌人的追剿，对于发展青贵石边区的斗争，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刚从江北调来的保二

困在皖南第一次受到严重打击和杀伤，致使敌军从疯狂变为沮丧，嚣张气焰大为收敛。在“清剿”中受到损失的群众却得到了鼓舞。

十二月下旬，为了统一南进工作的领导，地委决定成立前进委员会，由熊兆仁、余华、倪南山、罗白桦和我组成，熊为书记。熊兆仁率主力部队到宏潭的外坑，通知我去开前委会。遵照华东局指示，各路南进部队全线展开行动。我黄西总队决定集中力量，继续向祁、至、贵、浮的皖赣边区进军，并以较大规模的战斗，开创新的中心根据地。

会议期间，我们听到张南坑战斗的捷报，非常振奋。会后，我带警卫班赶回杉山根据地，正逢敌人六十三师一个团进山“清剿”。于是折回宏潭，途经七井山脚下，遇到芮振东、孙群等同志，以及九华山猎户队、地方税收干部，共几十人。我要芮振东带郭洪生、吴来顺等为尖兵，搜索前进。走到美溪河口，与敌六十三师遭遇。原来，此时熊兆仁的主力部队从宏潭村早已转移了。我们队伍中许多是非战斗人员，有部队的，也有地方上的，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由于地形不利，加上担任尖兵的吴来顺中弹牺牲，郭洪生等过堤坝后冲散，尖兵发现的情况未能传给后续部队。待我到美溪河口的桥头，用望远镜看河对面的宏潭村有无动静时，后面的小山坡出现戴钢盔的敌人，我马上要警卫班卧倒向敌人射击，一面要部队迅速向后撤。由于美溪河口的山涧道路狭窄，后续部队被堵，一时无法后撤，有的跳水过河，有的冲上光山。我指挥张连带的警卫班、孙群带的机枪班全力掩护撤退，终于冲过河，爬上山坡还击。在这次战斗中，遭到很大损失。查志强和警卫员梁效明冲过河后中弹牺牲，窦长民等

六位同志均牺牲于美溪河口。

部队从九华山、七井山转战数月后，进入祁、石、贵三县交界处的牯牛降地带。牯牛降是座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大山，在其周围十多万亩面积的范围内，群峰耸立，地域性气候突出，多云、多雾、多地形雨，还有很多珍稀动植物，加上奇峰怪石、烟云飞瀑、多姿古松等，自然景象十分瑰丽。在战略上，这里不仅地势险要，便于回旋；西向可以经东流、至德、浮梁，南向可以直捣赣饶的鄱公山，东向可以沟通黄山地区，正是我军南进的理想根据地。我们当即把工委机关从杉山迁到牯牛降地区，在这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坚决反击国民党军的“清剿”，狠狠打击国民政府的基层政权，并在武装斗争支持下，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地方党组织建设。

在内战时，红军来这里活动过。一九三四年八月，皖南太平、石台柯村发生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太平西乡、石台南乡七、八十里范围内搞得轰轰烈烈。三个月后，方志敏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皖南，这一地区决定成立皖南红军独立团。不久，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太平县谭家桥遭到七倍于我的国民党军的围攻，受到严重损失，皖南地区革命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北上先遣队离开皖南后，江天辉带侦察连、余文先带一部分红军和赤卫队，转移到贵池、秋浦、东流地区高山一带活动。一九三五年八月，举行农民大暴动，成立江南特区苏维埃政府，组建江南红军独立团，皖南革命烽火重新熊熊燃烧起来。蒋介石急忙调遣安徽省保安旅、安徽独立营和还乡团一万多兵力，围剿以高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达四个月之久。红军因弹尽粮绝，先后撤

出皖南根据地，从牯牛降返回江西，坚持了皖浙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因此，这一带的群众对我军有一定的认识，但因为红军撤退后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所以又表现得顾虑重重。根据这一特点，我们采取行动重于宣传的办法，首先在军事上打一些有把握的胜仗，鼓舞群众的情绪，随即以实际行动，关心群众，帮助群众生产，密切军民关系。在这基础上，逐步组织群众开展“三抗”斗争，清算斗争（清算对象主要是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地主）和反“清剿”中的反奸淫、反掳掠、反烧杀、反移民斗争。为了粉碎并村移民的反革命策略，我们在群众中提出保家、保祖坟等口号，以合法斗争配合非法斗争、武装斗争。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结合清算，开展借粮、分粮斗争。在群众斗争中，我们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发展贫雇农小组、农会和地方党组织。经过一系列艰苦努力，牯牛降地区又成为我南进部队的中心根据地。

（十四）

牯牛降东侧山坞中的历溪坞，三面绝壁，唯冲口一条通道，退可以据险隐蔽，进可以四出进击，特别是有道路可达东流、至德、浮梁等地，机动性强。于是我们把这里作为隐蔽地，站稳脚跟，大规模向皖赣边发展。鉴于这一带土匪、山霸、刀会占山为王，横行无忌，是国民党的得力帮凶，我军首先对土匪、山霸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祁西东口乡有个土匪头子王义兴，手下有六十多人，多系当地籍，混在群众中，很难分辨，国民党军几次想吞并他

们都未办到。我们致书王义兴，对他们迫于生活聚众绿林表示同情，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接受谈判。随后，马文杰作为我军代表，与他们达成三条协议：一、王义兴立即撤出我游击根据地；二、并保证任何时候均不得骚扰我军或残害群众；三、我军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降伏这支土匪武装，对镇抚其他小股土匪产生了很大影响。

祁东沙湾有一支被国民党改编的土匪中队，一百多人，武器很好，还有短枪班。匪首吴春生已经成为国民党的鹰犬，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奸淫掳掠。经过周密侦察，我和大队长左克南率领一连，与黄西工委二个连相配合，在离大坦五里的枫树埂伏击匪徒，击毙匪首吴春生，歼敌五十多人，俘虏九人，缴获冲锋枪、驳壳枪、步枪共二十多支。因土匪行进中距离拉得很长，其后尾部分逃脱了。经过这一仗，我军声威大振，祁门县的警保中队迅速从祁西南的闪里镇撤回保县城，土匪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我们乘胜将祁西南乡公所全部拔除，歼灭历口乡公所，缴枪十多支。

对于罪恶昭著的恶霸地主，我们坚决打击。在祁西新安洲地方，我部消灭王振南反动地主武装数十人，缴枪十多支、弹药物资多担。我们听群众反映，贵池县源头李大恶霸李锤玉，系国民党贵池县参议员，其弟李怀玉为警保队长。他依仗权势，组成武装看家队，构筑碉堡，私设刑堂，杀我干部。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曾从佃户家强买童男童女，为其父母殉葬，下葬时痛哭呼唤声惨不忍闻。我们率部活动到源头李，战士们饱含仇恨，强攻李家地主庄园，全歼反动地主武装，缴长短枪十五支，并活捉李家兄弟，当场处决。当地群众奔走相告，称颂我军功德。

对于一般地主分子，当了乡保长的，我们捉到后便教育释放。平里有个保长，争取过来后，成为我们进入祁南查湾等地渡口的联络点，由他安排好竹排，保证了部队来往时安全渡河。有次，侦察员到祁西南的渚口抓一个乡长未捉到，结果把他姨太太生的儿子抱来了，后交给炊事班老班长扶养，每天给他吃一个鸡蛋，一个多月养得又白又胖，还教他唱革命歌曲，那个乡长开始派人来探望，回去的人谈了这种情况后，他全家放心了，经过谈判后，这个乡长把枪交出来，表示投诚。他的姨太太看到她的儿子养得又白又胖，又会唱歌，感动得流下眼泪。群众都称新四军真有办法。

不久，我插到杉山后面的龙须坑，萧坑的党员陈泰和送来情报说，国民党第八专员汪幼平带领贵池警保大队，袭击龙须坑，部队已到梅村。次日拂晓，查富德派一战斗小组先占领对面山头，由于疏忽，这个小组就放在半山腰，使敌人抢占了山头制高点，敌人从山头上冲下来，烧毁了山棚，封锁住山口要道，我们被逼进一条狭小的山涧里。我一面命令左克南带一个班阻击，一面指挥战士们一个一个突出山涧，抢占高地。当我刚刚跨过山涧，敌人机枪一阵猛烈扫射，子弹打在对面石壁上，一颗很大的石块飞砸过来，打进我的面颊，顿时脸上动脉大出血，鲜血流淌不止。唐刚带一个班把我护送到附近树林中躺下，我用手指使劲抠出钻进皮肉里的石块，因流血过多，昏迷过去。醒来时，查富德他们撑把大伞遮住我，我在迷糊中才依稀知道天下毛毛雨了。我以为自己不行了，便把干部找到身边，交代说：“万一我不行了，你们也别难过，干革命总是有牺牲的。你们一定要带领战士，执行上级指示，向南进军。困难是暂时的，胜利一定会到

来！”我说了这几句话，大家眼泪都流淌出来。查富德凑近我耳边，说：“政委，你脸色惨白，主要是流血过多，等想法子把血止住，一定会好的。安心养息吧。”他们赶紧搭山棚，留下警卫排守护我。左克南先带着一个连，到牯牛降东侧的大历山，与马文杰、钱秋育会合了。他们得知我流血不止，写了一封信送来给我，大意是说：当时突出山涧时，没有把你掩护好，没有尽到责任，很对不住首长。我立即亲自写了回信，说：我的血是人民的血，人民需要流它就流它，为革命总有一天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望你们团结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因为没有止血药品，卫生员余竟成、金峰林和同志们很着急，后来余竟成把仅有的一瓶碘酒倒进伤口，将半边脸烧得漆黑，但却止住了血，再弄点猪油涂涂，伤势居然平和了。人民群众给我送来了温暖。陈泰和家把仅有的两升年饭米，送来给我熬粥吃。他家仅有一只下蛋换油盐的老母鸡，也送来给我补养。我内心感激，伤势稍愈，立即重新投入战斗。

一九四八年一月，我部从历溪坞根据地出发，翻过牯牛降大山脉，挺进祁、浮交界之良禾口。它的后山有个山村，住十几户人家，属江西浮梁管辖，是插花地带。

部队经过几天雪地行军，不顾劳累，深入群众做发动工作。当地群众十分关心我们，纷纷报告：这一带刀会遍地，其头目与国民党相勾结，相当反动。由此，不少同志想到抗日战争时期，我皖南支队刘金才部一个营，在繁、芜之间的大圩埂同反动刀会打过一仗，但因打刀会没有经验，伤亡很大。面对眼前陌生的情势，不少战士流露出忧虑情绪。

我们立即动员部队说：刀会头目已成为国民党的反革命工具，必须与之斗争，不能动摇。刀会有许多骗人把戏，戳穿了一文不值。根据调查，我们告诉大家，那些坛主、点传师常常当众作法，吞服硃砂，烧香念咒，扬言大仙下界，刀枪不入，并要国民党士兵对着他们开枪。结果只听乒乓响枪，不见一人伤亡。老百姓信以为真，往往被裹胁入会。其实，这些家伙与国民党军早有勾结，射击他们的子弹都是卸了弹头的。听到这里，战士们哄堂大笑，消除了疑虑。我们又交代了政策和战术，作好了战斗准备。部队一律住大瓦房，周围道路设障碍。

我们派人到附近的刀会交涉，要他们接受谈判。但刀会头子高坐神坛，说：“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走你的独木桥。”双方对峙了一个时期，未发生冲突。我由良禾口回到历溪坞，紧接着，传来消息，至德县马坑刀会向我军发起攻击了。

时值元宵节边，钱秋育、王克祁久不见刀会有什么动静，放松了警惕。那天下午，周围村庄响起咚咚鼓声，战士们高兴地说：“今年过年真热闹，处处敲锣打鼓玩花灯，我们也要去看看热闹哩。”大家跑出屋子一看，才知道是刀会擂鼓从后山插下来了。一个坛主双眼紧闭，嘴唇微动，口中念着咒语。会徒们手执大刀长矛，发出怪叫，蜂拥冲来。部队遭这突然袭击，来不及准备，丢下背包，手拿着枪，一气冲出，跑到对面山上。一个炊事员正在厨房做饭，未及逃脱，被刀会连同背包一并掳走。刀会怕我们反击，集中在堂子里。晚上，我都把冲散的同志集中起来，发现少了一个炊事员。大家在山头上开会，认为刀会没有什么了不起，主要

是自己思想麻痹了。大家决定攻打这个堂子。入夜，钱秋育、王克祁带着部队，去刀会住地，首先把堂子的大门的铁环用麻绳牢牢栓住，然后喊话，勒令他们放回炊事员，送回背包行李，但他们不理。战士们在外面打了一枪，还没有动静；又用冲锋枪打了一梭子弹，刀会头子起来，点蜡烛烧香，擂鼓准备迎战。王克祁端着冲锋枪，用长梯爬上屋顶，揭去瓦片，看到炊事员被五花大绑捆在柱子上，会徒们舞刀弄矛，准备杀害炊事员，又见那个坛主闭目合掌，怪声叫着：“众徒儿，迎接大仙降凡！”王克祁在屋上高声说道：“众会徒听着，你们快快放回炊事员，送还背包，如若不然，立即扫平刀会，决不留情！”说罢，一束手榴弹摔下去。会徒们呼爹叫娘，急忙把灯火扑灭，向外逃跑。大门打不开，他们把厨房的后墙推倒，冲了出来。战士们用冲锋枪一梭子打倒几个，把堂头子和刀会会徒全部俘虏，彻底打垮了马坑刀会，缴刀三百多把。一传十，十传百，影响所及，威振四方，一些刀会头目领着会徒，躲进深山。

这时，我们在历溪坞听到谣传：“新四军在马坑被刀会消灭了。”我们分析不可能，立即要查富德带一个连赶到良禾口。他们到马坑与钱秋育会合后，听王克祁介绍了作战经过，大家非常兴奋。但祁门良禾口的几个坛主是地主豪绅，非但不思悔改，还把堂子搬到山上，决心与我为敌到底。我们组织几次搜山，一下子抓获十多个刀会头子，召开一千多人大会，说明政策，揭露刀会欺骗阴谋。有几个头子在会上继续宣扬迷信，企图蒙蔽群众，顽抗到底。我们当众拉出一个坛主，让他口念咒语。当他把咒语念完，一战士开枪射击，那家伙应声倒下。同样再拉出第二个，第三个……剩下

的刀会头子吓得面如土色，磕头如捣蒜，口称：“新四军老爷，饶我一命吧，我们全是假的，是害人骗人的。”其他会徒都一齐跪下。从此，浮梁、祁门一带的刀会土崩瓦解。

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部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刀会、山霸等各种反动势力的“围剿”，开展了地方群众工作，扩大了武装力量，并在南进基地上建立了人民政权，与熊兆仁所率主力部队打通了联系，进而以牯牛降为中心根据地，把祁、贵、黟、至、太、石、休、婺等小块游击根据地联成一片。

一九四八年秋，我部进驻祁西蒲岭。朱农从铜青贵率领唐启发、王隆武、王德科等五十多人的武装来到皖赣地区。接着，孙举东的部队从九华山滴水崖撤过来，九华山的猎户队由队长胡克明动员参加了主力部队。猎户队是我党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武装。一九三九年，新四军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我民运工作深入群众，宣传抗日，猎户队从此在铜陵、青阳、南陵、贵池等地区发展起来。他们征集猎枪、土炮以及富户的步枪装备自己，平时为我军担任便衣哨、递步哨等等，战时负责坚壁清野、战场勤务，并配合部队作战。久经战斗的洗礼，到解放战争时期，猎户队已成长为一支坚强有力的地方游击队。解放后，在铜陵县谷雨山上修建了一座巍峨的纪念碑，上书：“血溅黄花怀烈士，泪挥谷雨悼英魂”，那就是人们对猎户队烈士们的永恒纪念。

为了迎接伟大的革命新形势，我们在蒲岭开展了一次党内整风。当时，在我们四周县城和一些大的集镇驻有国民党重兵，对我们虎视眈眈，随时都有扑向我们的可能。在恶劣环境中，我们生活又是十分艰苦的。但是，听到了从解放区

派回的同志口头传达军队三查三整的精神，我们如获至宝。根据当时我们的理解程度，立即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现在回忆起来，我们的同志对党的赤胆忠诚，对革命事业坚定的信念，对同志的真诚相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那次整风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是极其深刻的。蒲岭整风前后进行了九天，一开始，对前一阶段斗争形势和党内外（军内外）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并充分发扬民主，深入开展讨论，接着以“三查三整”为中心，根据以往的整风经验，提出了整风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并做了全面布置，这就是：一、整风的重要性及其意义；二、整党与整风的区别；三、党内存在的组织、思想、作风严重不良现象和领导上的责任和错误；四、如何整风及其方法；五、整风中的几个典型实例；六、对整风的态度和认识。那次整风的方法步骤，令人尤为难忘。我们首先建立学习委员会和学习小组，认真学习毛泽东和任弼时关于整风讲话精神，紧密联系实际，采取典型示范办法，由点到面进行整顿。要求先从连（包括区一级）以上干部整起。只有帮助领导干部提高了认识，端正了作风，才能领导部队胜利前进。全体党员干部既严肃认真，又心平气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治病救人方针，不许无中生有，不搞无情打击，一切立足于教育，而不是抛弃同志。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四查运动，除了查思想、查作风、查阶级，还要查腰包，即要求一切缴获要归公，清除个人主义、居功自傲、贪污腐化及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强纪律性，增强团结和统一，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为争取革命胜利、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生观。通过蒲岭整风，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继续克服了党内存在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状况，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纪律，为促进部队革命化建设、为尔后部队向南进军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和思想的基础。蒲岭整风效果的显著，意义的深远，在皖南革命斗争史册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蒲岭整风后，正式成立了皖赣工委，由朱农、马文杰和我组成，我为书记。皖赣工委下设三个工委：浮至祁工委，书记赵平（钱秋育）；青石贵工委，书记杨友华；祁石贵工委，由张建南、左克南、冯文波（马文杰）组成，冯为书记。

我和马文杰率部以历溪坞为基地，不断出击。我和马文杰在历溪坞山口的石洞门口搭了棚子，石洞里住上警卫部队。这时正是雨季，雷雨交加，电光闪闪，有时棚子被风雨刮漏了，用所剩的一块油布堵漏，用脸盆盛着雨水，但大家谈笑风生，讲故事，拉家常，倒很乐观。战士汪飞等豪情满怀，用绳索攀上历溪坞山崖，在石壁上刻下“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大字标语，多年后仍赫然可见。同时，朱农和马文杰率王克祁部打到祁南石灰山。我们到祁南时，他们还请来老艺人演了婺剧给我们看。陶刚率部从黟县、休宁打到祁门南乡，熊兆仁部队进至祁门、休宁和婺源交界的大小陀川，祁门全境为我所控制，县城成为一座孤城。祁西留曹汉清就地坚持。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前委会议之后，各前进部队先后向指定地区出发。除我皖赣地区外，皖浙赣、皖浙边区的开辟工作同时胜利发展。

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委因黄西地区形势开始变化，决定由倪南山率领以汤田金为连长的一连和丁铁牛为连长的五连，向休、婺边的鄞公山前进。当时，七专区保安副司令孙立钧正在黟县地区“清剿”，倪部前进后，敌立即转向倪部进攻，在鄞公山打了一次消耗仗，我无伤亡。倪部转向婺东的开化方向行动，一天一夜打了六个乡公所。部队活动一个星期后，即转向浮梁、祁门边区之倒湖，经过祁南转回黄西。这就是皖浙赣地区的第一次向南进军。这次南进计战斗八次，打掉九个乡公所、一个保公所，共缴获步枪三十三支，扩大了革命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打下了第二次南进的基础。由于生活艰苦、政治工作有弱点，这一时期有十来人开了小差。

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熊兆仁、余华、倪南山率领一、三、五连，第二次向南进军，成立皖浙赣边工委。这次进

渡镇公所、昌溪乡公所的武装三十多人，击溃保四团一个连，打开了局面，巩固了地区，扩大了部队。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皖南地委决撤消前委。同时，除四个工委外，又成立黄东工委和樵北工委。由于机构和人事变动频繁，不利于坚持斗争。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的战略攻势，华东局命令马长炎、高立中带领一支数百人的干部队伍，来到江边无为唐晓光的活动地区，计划过江，深入皖南，开辟赣东北。他们先派陈木寿、陈洪，率领一个加强连，自无为白茆洲渡江到繁昌油坊嘴上岸，进入繁昌县境。

这个加强连基本上是由班、排、连以上干部组成的，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他们踏上南岸，便打掉两个乡公所，纵横奔袭，如入无人之境。但他们迟迟未与铜、繁地方党联系上，又未迅速进山，结果敌十三旅很快跟上了一个营兵力。陈木寿率部迎敌，英勇奋战，打得一营敌人溃不成军，缴获五、六挺机枪和一些步枪、子弹。接着，敌十三旅一个团包围上来，陈木寿等全体战士虽然英勇顽强，终因寡不敌众，大部阵亡，只有陈洪等十八个同志因为原系铜、青、南部队的，熟悉皖南地形，突出重围，经南陵、青阳进山，后来找到胡明。陈木寿等牺牲，先遣连失利，华东局派遣的干部队南渡的意图未能实现。

一九四八年秋，地委决定成立沿江工委，由孙宗溶、陈洪、陈爱曦、李友白、许达抱、施月琴组成。孙宗溶为书记，陈洪为副书记。

这时，我皖赣总队武装整编为三个主力连和一个警卫武装，共计四百五十多人，步枪三百五十多支，短枪五十多

支，机枪六挺，冲锋枪五支。另三个工委，均有数十人不等的武工队。因此，这一地区进一步巩固，我们活动的区域与黄西、皖浙赣业已联结起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同年底，地委决定，取消前进委员会，苏浙皖部队在苏皖武装司令部统一指挥下，分属皖浙支队（政委兼支队长唐辉、副支队长程灿），苏浙皖支队（支队长常喜生、副支队长张晖、政委钱敏），沿江支队（支队长陈洪、副支队长李友白、政委孙宗溶、副政委陈爱曦）。皖浙赣共四个支队。

苏浙皖边区，自熊兆仁、倪南山率骨干力量三十多人进入皖南，与胡明会师。同时，华中局派钱敏到苏南，重建苏浙皖工委，书记钱敏，副书记孙章录，委员有朱春苑。工委直属武装部队为苏浙皖支队。从此，苏浙皖边区正确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地方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武装斗争也取得了战绩。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省保安队一个新兵连，住在张渚南部岭下界长岗岭村的一户地主独立楼房里，每天清早徒手出操，枪支全挂在住房中。当时，地主家有个长工，系我秘密民兵，将情况报告支队。支队很快集中三十多个武工队员，带了三挺机枪，趁敌出操时，一举突袭了敌人楼房，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一百多名，缴机枪六挺、六〇炮一门、各种枪支一百多件。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苏浙皖支队又在宁国墩打了一次漂亮的战斗。敌一个自卫团住守在万家桥，四周筑有五座坚固的碉堡。支队集中主力部队，将敌人碉堡团团围住，实行隔离封锁，不让敌人逃跑，不让敌堡间互相联络。在进行一次强攻后，将敌自卫团长和一些军官家属集中起来，向碉堡上喊话，劝敌投降。支队的政工人员开展阵地宣传，限敌谈判投降时间。敌人开始不理，不把

游击队放在眼里，并在碉堡上叫嚷：几个地方毛猴，全是土家伙，我们不怕！支队领导同志喊：我们是解放军正规部队，再不投降，全部消灭你们！这一喊确有效果，碉堡上一阵惊慌，一阵沉寂。一会，敌自卫团长说，你们把武器让我看看，我才相信是正规军！孙章录立即命令连指导员殷阿昆拎上一支崭新的德国造手枪，在敌堡下晃了几晃。敌自卫团长一见，马上命令部下敞开大门，全部缴械投降。苏浙皖地区经过两年多的斗争，不仅恢复了原有地区，而且活动地区扩大发展一倍以上。在解放前夕，部队由两个班发展到两个主力营，每个分工委有一个连的武装；每个县有武工队和地方脱产人员共有数十名。

第五章 转战皖赣

(一)

一九四八年底，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取得了辽沈战役彻底胜利以后，平津和淮海两大战役也即将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全国胜利形势鼓舞下，皖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出现了大好局面。这时，由于根据地扩大，皖浙赣、皖赣、黄西三个地区已联成一片。皖南地委决定：将皖浙赣、皖赣、黄西三个地区的工委合并成为皖浙赣大工委，由熊兆仁、罗白桦、余华、倪南山和我五人组成，熊为书记，余华为副书记，罗白桦为组织部长，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休宁县的大连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大家对华东局和地委关于三个工委合并的决定表示坚决拥护，同时，为了加强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完成南进任务，避免平均使用力量和分散力量，会议还作了相应的决议：在大工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以下几个县工委，黟休祁工委，由苏帅仁、黄致远、周汉卿三同志组成，苏为代书记，后为书记；祁休浮工委，由马文杰、姚政等同志组成，马文杰为书记；婺休工委，由陶刚、鲁枫、左克南三同志组成，陶刚为书

记，浮乐婺工委，由汪定波、张玉萍、汤田金三同志组成，汪定波为书记。在部队方面，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倪南山任支队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查富德为副参谋长（以后兼独立团长），钱秋育为政治部副主任（以后兼团政委），蔡振邦为团参谋长。同时，为了开辟浙赣线，打通五夷山，成立了浙赣线前委，由倪南山、朱农和我组成，我为书记。

在一切就绪之后，“打到浙赣线上去”的命令下达了！我黄西、皖赣、皖浙赣三支部队，会师于祁婺边区，组织一支浩浩荡荡的南进大军。在新的胜利的形势鼓舞下，我们每一个南进健儿的心都激烈地跳动着。在动员会上，我们报告了最近全国战场的大好形势和这次进军开辟新区的重要意义，要求全体指战员：“为完成向南发展、打通浙赣线的光荣任务而斗争！”战士们在动员大会上都表现出狂欢的心情，保证在南进中不怕艰苦、遵守纪律、互相帮助，坚决完成战斗任务。留守在后方根据地的同志们演出话剧，欢送南进的健儿。广大群众日夜赶做军鞋，预祝这次南进成功。面对着这一派热烈动人的情景，皖浙赣工委组织部长罗白桦激情满怀，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在我的那本保存至今的笔记本上赋诗一首：

皖南人民三英豪，挥师南下指赣饶，
飞马扬鞭驰万里，归师欣会乐陶陶。

一九四九年元月初，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我们率一个主力营和一个警卫排，离开婺源县东北角山区的大连村，浩浩荡荡地向浙赣线上挺进。一路上，狂风呼啸，寒气袭人，但怎么也阻挡不住南进健儿的决心。在行军中，战士们放声歌唱着《沿江进行曲》：

沿着高山，沿着平原，
在这大反攻前夜，我们要猛烈地向前发展。
加速蒋贼的毁灭，遍插解放的旗帜。
我们要生长力量，配合全国反攻，
消灭蒋匪扩大解放区，展开胜利的游击战争。
挺进挺进挺进向扬子江，我们要进到皖浙赣。
我们是革命的健儿，我们是工农的武装。
我们要团结在党的周围，向胜利发展向解放前进！

这雄壮的歌声响彻山谷，给长期在反动势力压迫下透不过气来的群众以莫大的鼓舞。

部队在南进中翻过一座座巍峨的大山，远看就象一条巨龙在崎岖的山路上滚动。每当我们在村庄休息时，群众都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团团围拢，送茶送水，生火做饭，热情地招待子弟兵。一些年迈的老人，站在一旁，以惊奇的眼光望着我们，好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军纪严明的部队。当他们听到宣讲员讲解全国新的胜利形势和我党的政策时，那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喜悦的微笑。记得一个姓张的老大爷一把抓住我的手，兴奋地说：“你们真好，革命胜利了，我们这些穷人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位老大爷的眼神里，饱含着南方人民对子弟兵的殷切期望！

元月九日，部队到平坦，十日到焦里，并在这里休息一日。十二日，部队远离了根据地，抵达婺源县西坑乡的大严坑了。这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向东南翻高山可到浙江的开化县，向正南则进入江西的德兴县境内。婺东的江湾离大严坑约三十里，一九四七年冬，倪南山率部第一次南进时，曾在这里打过一仗，但连续不断地遭敌围堵追击，不久便转回婺

(源)、休(宁)边境地区。现在，江湾则成为我们南进的跳板。为此，我们留下孙举东、胡和日，率一支精干武工队，深入到大严山的周围，去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向开化县以北及德兴县东北发展，并与我皖浙赣工委保持联系。还派史来水率武工队，以少华山为依托，在海口和新建一带活动，同孙、胡武工队衔接呼应。以后，这些武工队不断壮大，象钢刀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腹地带——饶(上饶)、开(化)、德(兴)、玉(山)地区。

部队在大严坑吃过晚饭，于十二点钟，整装向正南方的德兴县新建乡进发。这一带四面都是大山，丛峦迭嶂，我们行进在大严山脊，放眼望去，山后面虽有些树木，但长着一望无际的枯草，在山的凹地有几间破草房，甚为荒凉，象征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一幕凄惨景象。翻过了重重叠叠的高山，走了五十多里，已是深夜了，但悬挂在空中的弯弯的月牙，依然照着部队在寂静的丛山中继续前进。离新建乡只有六华里时，侦察员从前面跑来，报告说新建乡有敌情，于是部队立即停止前进，战士们磨拳擦掌，决心打好南进的第一仗。

(二)

我们迅速找路旁群众了解敌情，老百姓听说我们是新四军，非常兴奋地说，新建有乡公所和警保队，并自告奋勇替我们带路。

当部队进袭到新建时，天还未亮，村庄里一片沉寂。警保队住在一个大祠堂里，漆黑的大门紧闭着，门口连哨兵也

没有。祠堂一侧有个房子还亮着灯，有几个人影在灯下晃动，几个战士突然冲进去，原来这是乡长的家，几个赌徒正在打麻将哩。这个乡长被带出来，浑身发抖。我们的同志命令他去喊开乡公所大门，他又是喊又是敲，好大一阵子门才被叫开。一个连连打着哈欠的乡丁揉着眼问道：“谁呀，深更半夜的！”乡长哭丧着脸说：“新四军来了，缴枪吧！”这个乡丁正目瞪口呆时，战士们已冲进祠堂，把睡得烂熟的警保队员一个个抓了出来，共俘虏三十多人，缴了二十多支枪。在我威武的战士面前，这些平日横行乡里的乡丁、警保队员十分恐惧，全身颤抖着。我们要乡长写了“爱国反蒋公约”，并对俘虏宣传我党政策，然后把他们释放了。

乡长供出德兴县县长范振亚带的一个中队武装在海口的情况。于是，我们决定支队部和一个连留守新建，其余部队由副参谋长查富德率领，奔袭海口区公署和县武装。战士们虽然一夜未睡，但精神十分饱满。部队出发时，前哨排把缴获敌人的黄制服穿起来，化装成赣保第一团。行进约十里路，经过九都村，向导报告说，有一个县参议员家住在村子里，他家还装有一部电话机子。我们立刻派出几个战士，赶到县参议员家，见他正在向海口摇电话。战士们冲进屋内，把这个县参议员抓了起来，随即把电话线截断。这个县参议员的口供，又进一步证实县长范振亚现住海口。

约上午八时许，部队逼近海口。这是一个有千余户的大镇，来往行人很多，颇为热闹。化装成保安团的我前哨排，大摇大摆地踏进海口街道，每一个战士都很镇静。到了区署门前，哨兵问：“哪一部分的？”战士们沉着答道：“赣保一团的！”卫兵连忙敬礼。前哨排战士不加理睬，直奔门

内，后续部队跟上来，缴下哨兵的枪。化装成敌军军官的一连指导员庄亚农，走进县长办公室，对身上穿着黄色呢军服、约五十岁的县长，很有礼节地说：

“报告，我们首长请你出去！”

“你是哪一部分的呀？”县长抬起头来，望了一眼，不介意地问。

“我们是新四军！”

县长一怔，连忙站起，马上堆满笑容地连声说：“啊，新四军！久仰！久仰，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说着，就随庄指导员走出办公室。查富德要他下令警保中队投降，他很快叫来警保中队队长，命令他们全部缴械。

自大严坑到海口有九十多里，这种远距离的突然连续奔袭，是出敌意料之外的。在海口不费一枪一弹，便俘虏了县长、区长、县政府秘书科长以及下级官兵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六十多支。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把那县长押回新建村，我们安排他单独住一个地方，由张建南监护，朱农先去做争取工作。许多战士都在学着那县长的姿态，说：“久仰，久仰！”“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我在新建村的一间大房子里和这个县长谈话。他脚穿草鞋，头发斑白，说话慢条斯理。据说，这一带群众对他反映还好。他说他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抗日时担任过师长，他所在的那个军的军长要提拔他任副军长，蒋介石不批准，他一气之下就不干了。为此，蒋介石在重庆还找他谈了话，发给五万元的安抚费，但他坚持要解甲归田，就这样回到老家江西。由于他懂些军事，国民党在德兴县暖水乡成立德兴、玉山、上饶三县边防指挥部，硬把他抬出来任指挥官

兼德兴县县长。在谈话中，他赞不绝口地称我们是“闪电式的奔袭”，并诚恳地说：“贵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二十多年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部队了！”接着他又若有所思，发出一番感慨：“过去黄埔时期的军队也是这样，现在国民党军队坏透了，所以他们是不能打仗的。”我向他讲明当前的形势和我军的性质及政策，劝他参加爱国反蒋的统一战线。他很受感动，还说周恩来同志是他的上级，并问及周恩来的健康。然后，他回到住处，写了一份“爱国反蒋公约”，大意是：本人愿参加爱国反蒋统一战线，为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后面写了几条协助我军的具体条约，并在结尾时写道：如有不轨行为，当受天诛地灭。他把这份公约交给我时，还虔诚地跪在天井里对天盟誓。

范振亚被我释放后，就被国民党江西当局召到南昌去了。他在南昌有一些影响，在那里他谈自己如何被俘、如何得到优待、如何被释放的经过以及新四军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既往不咎等等情况，一时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因为他资格老，尽管江西当局十分恼火，但也无可奈何。后来，国民党省政府找他谈话，想调他去别地当县长，他说要当县长仍去德兴县，否则就解甲归田。国民党江西当局只得让他仍回德兴当县长。

活捉县长范振亚的消息震动了皖浙赣边区，经过群众绘声绘色的描绘，加进一些神奇的色彩，传遍四周每个村镇角落。但是，对范振亚如何处置呢？战士们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有的主张释放，进一步扩大我军的影响；有的认为他是个反革命分子，主张押回根据地惩办。我和倪南山、朱农等用这个典型事例，向战士们宣传党在新区的政策，使大家进

一步理解“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以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尽可能地争取革命的同盟者，结成广泛的爱国反蒋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

元月十五日，部队由新建到达暖水，一路上我们用担架抬着县长范振亚。当我们踏进暖水时，因为这一带群众过去受反动派的恫吓和欺骗，对新四军怀有偏见甚至敌视，长期流传“新四军来了，乡、保、甲长都要杀头”的谣言，因此，暖水乡乡长带着乡警保队早已逃之夭夭。县长范振亚立刻写封亲笔信，把逃进山里的乡长找了回来，要乡警保队缴枪，并说：“我当县长的都没事，你们怕什么？”这样，又缴获二十多支枪。在暖水住了一天，我们把县长范振亚释放了。当他走到离暖水三十里时，住婺源的赣保一团两个营及浙保安团一个连已到了德兴县城，准备向暖水方向前进。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送信给我们，要我们迅速撤离暖水。这一事实，使许多同志进一步体会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当晚，我们离开暖水，向怀玉山东侧的枫林街方向转进。

(三)

部队离开暖水，次日进击怀玉山的大门——童家畈，接着一路横扫樟村街、枫林街等乡公所，部队所到之处，警保队望风逃遁。当我部到童家畈时，赣保一团已由海口到暖水，但发现武工队后又慌忙折回，待查明情况，两三天后才敢进驻童家畈。赣保一团虽衔尾不放，但这时敌地方武装处在整个溃败动摇的形势下，失去作战勇气，兵力集中而不敢

分散，行动迟缓而又不积极，不敢正面阻击，只敢采取迂回跟踪。我部进入怀玉山后，赣保一团就滞留在童家畈，不久转到横街，过阴历年去了。

怀玉山一带，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是方志敏领导的红色根据地，许多地方成立过苏维埃政权。自方志敏率部北上抗日，打出浙赣，进入皖南，几经转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遭到失败，方志敏也在怀玉山麓的垄首被俘，不久在南昌英勇就义，但这里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仍在坚持斗争。李步新、江天辉、刘毓标等领导的皖赣特委和游击武装，在怀玉山、鄣公山一带广大地区坚持斗争，革命力量得到发展。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李步新、江天辉代表特委，去南昌找到项英、陈毅，汇报了斗争情况，请示时局转变后的党的方针政策。李步新、江天辉从瑶里出发，经婺源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释放了在押的一些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他们到了南昌，没住几天，陈毅就和李步新、江天辉来到祁门石灰山，指示将这一地区的游击队在石灰山集中，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新四军在南昌宣布成立，李步新、杨汉生又去南昌参加会议。根据上级决定，撤销皖赣特委，改为皖浙赣省委，以李步新为书记，江天辉、陈时夫、朱辉、熊刚等为委员。原特委领导的这支五百多人、四百多支长短枪的武装部队，除留一部坚持原地斗争外，其余全部开往岩寺，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三营”。因此，这里革命力量减弱，国民党军反扑很凶。当我们来到这个地区，感到情况有些异常，敌人为搞白色恐怖，残酷镇压群众，苛捐杂税繁多。诸如什么壮丁费、保甲费、夫子费等等，多如牛毛。乡保长乘机大肆进行敲榨勒索，逼

得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许多人被迫逃进深山老林。我们经过少华山的金沙时，在深山里面就看到一个约二十多岁的头发蓬松、面黄肌瘦的青年，他为逃抓壮丁已整整四年没有下山了。听说我们是当年的红军部队，他一下扑上来，握紧战士们的手，流出辛酸的眼泪，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玉山县西坑的刘老太太，年逾花甲，身上穿的棉衣却还是出嫁时做的，被麻线缝得象盔甲一样坚硬，看不到一点点棉花，在寒风中冻得直打哆嗦。这种凄惨的情景真是比比皆是。

部队进入怀玉山脉，始终坚持发展的方针，紧紧抓住放手发动群众这个中心环节，沿途派出许多宣传员，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到处张贴标语和安民告示，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开展“三抗”（即抗抽丁、抗征粮、抗苛捐杂税）、反恶霸、诉苦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那时，我们到处贴的安民告示都是四句对子，如：本军奉命南征，解放人民，纪律严明，老少勿惊……。落款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司令员方志承、政委杨明。当时，倪南山化名为方志承。当地群众见到安民告示后，奔走相告，异口同声地说：“方志敏的兄弟打回来了！”许多群众还激情满怀地讲述着当年方志敏在这里闹革命的情景。一位老大爷流着热泪，逢人就说：“方志敏是‘圣人’呀，是一个清秀的书生。唉！他为我们老百姓牺牲了，真可惜啊！”由于这里群众基础比较好，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接着，我们开仓济贫，使群众能为其切身利益而积极起来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对红军实施“围剿”中，野蛮地推行移民并村，使这一带村庄集中、群众集中、粮食集中。因此，在这里开仓济贫很容易造成浩大的声

势，特别是设有国民党大粮仓的樟村街、童家畈、大叶乡等地，开仓分粮的场面更为壮观。群众一听说要打开国民党的粮仓，分发粮食给农民，便成群结队，挑着箩筐，随部队一道出发，浩浩荡荡地来到粮仓。我们首先召开动员大会，扼要地讲明开仓分粮的意义，接着部队撤向周围警戒，群众便蜂拥而上，真是人山人海，热闹轰天，情绪高涨。号称玉山县第二街市的樟村街开仓分粮四千多担，分到粮食的达六千多人。我军尚未到达的一些地方，群众自发地开展分粮斗争。枫林乡的国民党征集的粮食由几个上层分子分散储存，当地群众扛着扁担、箩筐找上门去，一个绅士企图阻挡，被群众一顿痛骂：“你是什么东西？我们挑的是国民党的粮食，也是我们自己的粮食！”大家一拥而上，很快就把粮食挑走了。

开仓济贫的政治影响是空前的，使我军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在新建和暖水等处开仓分粮时，照顾从浙江开化山区来这里买过年粮的群众，让他们尽量地多挑走一些。他们在返回的路上，沿途进行宣传，使这个消息象长翅膀似的，很快传遍方圆百里的每个村落，极大地鼓舞了群众。许多地方的群众天天站在村外，盼望着我们，有的老太太还烧香祷告，祈望部队早一天打到他们那里。有的地方相继发生民变，他们拿起土枪刀矛，自发地进行抗丁抗粮的斗争。在已经开仓分粮的地方，群众情绪更是高昂，纷纷组织起保家队，用群众性的武装来保卫斗争中获得的胜利果实。青年踊跃参军也掀起热朝，有一个连在四天之内就扩大了一个排的兵力。在很短的时间内，经过开仓分粮斗争，这一带群众革命斗争风起云涌。

与此同时，我们抓住这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反蒋统一战线工作。对一些地方上层人士和乡、保长尽量做争取工作，向他们宣传全国的形势和我党的政策，主动同他们交谈，以稳定各阶层人士的情绪。有的说：“德兴县县长你们都放了，我们还有什么顾虑呢！”有的称赞道：“贵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令人敬佩！”并纷纷订立爱国反蒋公约，保证不替敌人带路探消息，敌人来了就报告，协助人民解放军筹集军粮等，积极参加反蒋统一战线，从而有力地摧毁了这一带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

（四）

元月底，部队刚刚进驻玉山县枫林街时，永清乡的七、八保民变武装就派来两个青年和我们联系。一个叫洪小山，是个贫苦的小知识分子；一个叫刘大洪，是个壮实的农民。他们急切地告诉我们，为了抗丁抗粮，他们以土枪刀矛为武器，同乡公所打了几仗，已坚持两个月了，要求部队马上支持他们。并一再恳切地说：七、八保的人民象鱼盼水一样，盼望着大军早日到来。我们热情鼓励和招待了他俩，并留下洪小山进一步了解情况，要刘大洪先回去告诉七、八保的群众，部队很快就到。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对完成南进的任务的信心更足了。

部队在枫林街稍事休息后，就向永清乡七、八保进发。进入七、八保时，沿途群众欢声雷动，热泪盈眶，热烈地迎接自己的队伍。在这里，我们看到许多青年背着土枪，扛着梭标、长矛，有的腰间还插着磨得锋利的大刀，走起路来，个

个精神抖擞，真是一支威严的农民武装。他们的负责人洪天寿，是个精明强干的农民，他热情地把我们带到自己家里，向我们报告这里最近的一些情况。在我们到达枫林街时，永清乡的乡长派乡警保队队副和两个老百姓为代表前来“劝和”，并进行恫吓。他们把那个警保队队副杀了，把另两名老百姓捆起来，关押在附近一间房子里。洪天寿问我们如何处置。我们了解情况后，明确地告诉他，这是反动派企图瓦解群众斗争意志的阴谋。要提高警惕，要在群众中戳穿这种阴谋。对那两个受骗上当的老百姓则应教育释放。

第二天，洪天寿陪同我们察看抗击乡警保队的阵地。在村外山水河边的每一条大路上，都用石子筑起一道五尺多高的障碍，俨然象过去山寨一样，每天派十多人放哨、守口子，戒备很严。乡警保队多次向他们进攻，都被他们用土枪、石块击退。不久前，他们发动一千多人，把乡警保队住地围得水泄不通，使乡警保队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轻易进犯了，从此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当晚，在我们的支持下，他们对乡警保队发起进攻，缴获步枪八支和一匹马，俘虏副乡长等十多人，其余仓惶逃走。

这种反蒋抗暴的群众自发斗争，在少华山的西坑、磨盘山周围、紫湖口一带不断爆发。上饶也发生过民变，一度攻下饶北的石人、望仙、郑畈、和济四个乡公所，缴获四十多支枪，后因敌人“围剿”和收买而失败。在蒋管区，这样的群众自发武装斗争此起彼落，它预示着国民党政权正处在崩溃和灭亡的前夕。

在爆发民变的地区，我们从部队抽调精于武装，组成武工队，留在地方，同群众一道坚持游击战。在磨盘山一带留

下芮振东率两个步枪班，以荃首、十八都为中心，北向暖水、南向上饶发展。在永清乡七、八保留下二连连长李荣贵、连指导员刘永、警卫排长汪光标率两个步枪班，以永清乡为中心，在怀玉山、少华山之间活动，并向浙江开化县以西壕岭、华埠方向及玉山城边发展，作为打通闽浙赣的一个新的跳板。部队撤离后，这些武工队紧紧依靠群众，独立自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一次，李荣贵、刘永、汪光标的武工队活动到少华山脚下的紫湖口，遭到赣保一团的袭击。曾在铜陵永丰圩搞税收工作的胡永安，年过半百，未能脱身，被敌包围在村子里。敌人搜索发现他，他宁肯战死也不当俘虏，最后饮弹自尽，在赣东北洒下一腔热血。

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一地区的武工队同民变武装融为一体，很快在少华山、怀玉山一带建立了多处游击区，使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并四处袭击小股敌人。上饶的国民党报纸惊呼：“共军活跃在怀玉山上！”

（五）

南进部队进入浙赣线后，在为时不到一个月内，从婺源县西坑的大严坑起到玉山县永清南北约二百里，东西自德兴县的白沙关起到浙江开化县边境止约二百多里，以长驱直入之势，穿插跃进于崇山峻岭之中，推进到浙赣线边沿、离铁路不到三十里的玉山县横街，这里距离福建武夷山脉不过百余里。为了稳步发展，我们就在铁路线以北的磨盘山、怀玉山、少华山周围之八个县地区开展活动。

在这期间，先后扫荡了四十多个区、乡政权，把磨盘

山、少华山、怀玉山周围广大区域连成一片，被我控制和新开辟的地区群众达二十多万人。为了适应这一地区对敌斗争的需要，在浙赣线前委领导下，于三县交界边区和巩固的中心区，相继成立了婺德开工委、少华工委、怀玉工委、大茅工委，还建立了二十多个区、乡政权，并在这些地方普遍成立了保家队、抗丁队、递步哨等群众组织。不久，又成立了饶开德玉行政办事处，由工委书记朱农兼主任，进一步推动这一地区的政权建设。

同年二月底，我婺源部队在攻克甲路以后，浮乐婺县工委在甲路召开了第一次全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婺源县人民政府，选举洪海涛为县长。接着，在叶村召开婺休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婺休县人民政府，选举陶刚为县长。

浙赣边区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敌人更加恐慌。他们急忙调集赣保一团为主力，拼凑各县联防机构，集结兵力，布置“清剿”，妄想实现其“肃清后方，巩固江防”的企图。二月六日上午，当我部队主力从九都北进海口时，驻横街的赣保一团突然奔袭九都，接着向北对我进迫。浙江保安团两个中队也插入白沙关、杨林一线，配合赣敌对我堵防，妄图造成南北夹击之势。当日傍晚，我部转回离九都十里的港头宿营，我们住在一个新战士家，他的父母进来告诉我们说，赣保一团已赶到新建，并派人前来侦察。我部驻扎的这个村庄周围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地形不利，于是部队昼夜继续向暖水方向转移。沿途坡陡路滑，身边又是一丈多深的山沟，战士们举起熊熊燃烧的火把，沿着崎岖的峭岩行军，远看宛如一条火龙绕着山岭游动。

二月七日凌晨，部队才翻过一条大山沟。为了迅速摆脱

敌人，我们改变行军方向，转移到李宅。经过一夜行军，战士们十分疲劳，就在李宅休息片刻。吃过午饭，部队集合即将行动时，后山突然砰地一声枪响，赣保一团前锋已占领部队集合场地的后面山头。李宅正面是开阔地，两侧都是松树山。为掩护部队从正面开阔地冲过去，倪南山和查富德各带一部冲上两侧山头上猛击敌人，团参谋长蔡振邦从一个战士手中夺过一挺机枪，率一个班战士迅速跑过开阔地，卧在对面水田里用机枪还击。当我带一个班最后撤出时，只听老蔡大声对我喊道：“政委，快冲过去，敌人向山下冲过来了！”话还未落音，密集的子弹就在脚下嗖嗖直响，打得尘烟直冒。我快步冲上对面土坡，卧倒射击。在这次激战中，我一连指导员庄亚农和一排长负伤，但毙敌连长一名，伤敌十多名。我们甩掉敌人，直奔玉山和德兴边界的岭头山。

在岭头山，我们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制定反“清剿”的行动方针。为迫敌分兵把守，以便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或歼灭之，我们决定将部队分两支活动，一支以少华山、怀玉山的暖水、李宅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向大叶、玉山城方向逼进，并与各武工队联系，同婺源联成一片，领导中心仍放在这一地区；另一支向德兴县南部的大茅山、绕二乡一线活动，作为较大的战略支点，牵制上饶敌前进指挥所，调动玉山县童家畈、樟村街之敌，使敌捉摸不透，顾此失彼。在策略上，我们确立赣敌为主要打击对象，暂不刺激浙敌。我部分兵积极活动，四处寻找敌弱点进行打击，不断地对敌进行偷袭、伏击。进入德兴以南地区的我部三连，先后向绕二及横丰的篁村乡一带进击，共缴获步枪二十九支、手枪一支、枪弹五百三十多发，俘虏正、副乡长及士

兵二十一名。我部一连活动到玉山中村、王家畈，杀得赣保一团闻风而逃。由于两处配合行动，追敌尾首难顾，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在反“清剿”斗争期间，我中心区域的德兴的十四都、十七都、十八都、土地坑、分水、李宅、暖水、陈家湾、姜坑、垄首，以及玉山的金沙、西坑，岭头山、黄家圩、怀玉山等地群众都行动起来了。每个村都搭好山棚，实行坚壁清野，敌人一到，群众就上山。流窜在我中心区域的赣保一团到处扑空，又连续遭到武工队、保家队的袭击，弄得草木皆兵，疲惫不堪，以致不敢进村住宿，只好在山上搭棚野营。有次，敌人到了暖水，没有饭吃，就抓了几个小孩和老太婆，押在前头，颤颤惊惊地冲进村里，四处搜索，没找到一粒粮食，便恼羞成怒，把群众家里洗劫一空。他们到了紫湖口，更是兽性大发，奸淫妇女，一个未满月的产妇也未能幸免。敌人的残暴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各地保家队纷纷拿起武器，各工委先后都成立了警卫连同敌人进行拚死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提高了战斗素质，不断发展壮大。

在此同时，婺源根据地军民，在熊兆仁、余华等领导下，不断向皖赣边区皖保二团发起攻击，并将主力移到婺源西南及婺（源）、乐（平）边区活动，以牵制敌人，配合我南进的反“清剿”。他们继婺西镇头店胜利后，跃进德兴西北，控制德兴河一线，距我大茅山北麓只有三、四十华里。二月底，他们重创婺警保大队后，又在甲路争取了该大队的齐昌中队起义。当日下午，正当我军准备在甲路召开祝捷大会时，皖保二团得到这个消息，敌副营长带两个连兵力，自清华向赋春运粮途中掉转头来向甲路奔袭。熊兆仁立即指挥

连长丁铁牛和刘章甫等率领三个连，埋伏在离甲路五华里的山坡上，远望敌人黑压压的一片，朝甲路奔来。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密集的子弹向敌群倾泻，并连续打退敌人几次冲锋。在黄昏前，部队向敌人发起猛冲，除皖保二团的那个副营长带一个班逃掉外，敌人两个连全被歼灭，缴获机枪九挺。丁铁牛在这次阻击战中身先士卒，腹部受重伤，后被送到婺休根据地治疗。这一仗速战速决，打得十分漂亮。

我南进部队紧紧拖住赣保一团，减少婺（源）、休（宁）根据地压力，并向浮梁、乐平等地发展。熊兆仁等率部在婺源牵制并打击皖保二团，有力支持我南进部队。我军南北呼应，密切配合，在粉碎敌人“清剿”斗争中，使皖浙赣边区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六）

一九四九年三月间，我大军渡江迫在眉睫，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敌人内部面临土崩瓦解。浙赣线之敌已作撤退布置，士无斗志，观望应变，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我南进部队乘机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了饶、开、德、玉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后，接着，挥戈到江山、常山等县边区，辗转跃进，四处出击。

部队向浙赣线伸进，直指闽东北，形成对闽浙赣的五夷山的犄角之势，给予浙赣线南北的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国民党统治区群众从一些报纸的报道中也获悉这些消息，感到十分兴奋。当时，有的进步刊物还刊登文章，介绍我们南进部队纪律严明，开仓济贫，爱护人民，帮助群众，以及我党在

新区的政策；揭露了国民党保安团到处奸淫掳掠，欺压百姓，以致造成民变蜂起的状况；并指出国民党军队人心涣散，士无斗志，已到了兵败如山倒的境地。这些进步刊物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散发，对唤起群众投入到爱国反蒋斗争中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天，有一家住玉山县的浙江大学的学生，带着刊登着《共军活跃在怀玉山上》文章的刊物，同我部取得联系。这个青年热忱地希望我们对他们办的刊物提出指导意见，并提出和我们见面的要求。我们答应他的要求，随后同他谈了一些全国战场的形势，说明敌人的有生力量已基本消灭，被迫退守江南，但长江并非天险，江防线又长，更主要的是国民党已失去民心，大军渡江的日子不远了。这个青年学生听后，激动地谈起他们如何开展爱国、和平、民主运动，以及同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的一些情况。临离别前，那位青年久久地仰望着怀玉山雄伟的山峰，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部跃进浙赣线的消息也传到了上饶集中营。抗日战争时期，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三战区关押爱国志士的魔窟。皖南事变后，这里又成为折磨被俘的新四军干部的人间地狱。一提起这座人间地狱，同志们胸中怒火燃烧，愤怒非常，恨不得马上拿下上饶，营救集中营里受难的战友们。当时，国民党报纸透露了我部活动的消息，并重金悬赏：活捉支队长方志承、政委杨明者，各赏一千万元。集中营内的同志从报纸上知道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的番号，以及挺进浙赣线的消息，受到了鼓舞，开始了紧张的越狱准备工作。

从上饶集中营内首批越狱来我部的是二野某团政委张元

义所率的六位同志。他们经过充分的筹划，选择出来挑粮之机，向怀玉山方向出逃，到了德兴县的垄首，便打听我们部队的驻地。当地群众向我驻守在垄首的部队报告说，有六个穿着黄制服的人要找解放军，我们立即派侦察员把他们接了过来。张元义等回到党的怀抱，兴奋地流出热泪。我和支队的其他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告诉他们目前的形势，要他们好好休息。他们把集中营内的情况详细向组织上作了汇报，并提出恢复他们的党籍，要求立即投入新的战斗。半个月后，又有十六位同志、其中有一个叫刘参谋的，越狱逃出，在上饶县大东坞找到了部队。不久，第三批有十多人，其中还有一位女同志，又越狱而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上饶集中营越狱的就有三批，共三十多人，找到我南进部队。由于他们在狱中惨遭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于是我们分批把他们护送到婺源根据地休养。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部队接近闽东北，正当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接到地委转来粟裕指示，令我南进部队停止向武夷山进发，立即挥师北上，配合野战军发起的渡江战役。这个命令传达后，部队上下一片欢腾，战士们欢呼雀跃。我们这支在浙赣线转战千里、杀得敌人胆颤心惊的南进部队，迅速集结于武夷山北麓，肩负着人民的期望，转向扬子江进发。

第六章 迎接渡江

(一)

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胜利地向前发展，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进抵长江北岸，准备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

奉命南进的皖浙赣支队，千里转战，从皖南沿江和山区，打到浙赣线，直指闽东北的武夷山下。此时，我部接到皖南地委二月七日的来信，信中指出：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为大军南下多做准备，做好一切有利于大军渡江的工作。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并指出，一、目前皖南正处在大军即将渡江南下与全区即将获得解放的形势下，因此个别小块地区开辟发展的意义已不太重要，我们的力量主要是转到加强与深入巩固现有地区，尤其是沿江地区；二、目前虽不强调地区的发展，但对于进步力量（党、武装、群众）的发展仍需加强；三、皖南解放在即，应避免一切不应有的损失，如情况紧张时当采用一切办法保存力量，不打消耗战，不打硬仗。我南进部队不再向东向南发展，应立即回师，以解决皖南守敌，配合渡江战役。

皖南地委在一月八日和二月七日的指示信中一再强调，
一、加强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对内加强政治动员，为完成当前解放全国的伟大任务；二、加强对敌军事斗争，展开积极的武装行动，积小胜为大胜，并注意去做敌军工作，利用一切关系争取敌军起义；三、加强地方工作。地方工作的方针，不论巩固与发展，都应围绕与配合七军渡江任务而开展。四、关于加强财粮供给等工作。要

敌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所以决定配合我婺源县大队，去攻打黄堪清自卫大队。

黄堪清的父亲黄告芳是婺源县参议员、当地有名的恶霸地主。他依靠父亲关系，当上了自卫大队长，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的武装，枪支齐全，弹药充足。不久前，他的第一中队长齐昌已率部起义。他带着其余两个中队四出活动，到处骚扰。我游击队写信告以全国形势，劝其放下屠刀，缴械投降，但黄堪清执迷不悟，继续顽抗。当黄堪清带领两个中队流窜到章木村时，婺源大队便把他们团团包围起来。黄堪清无法逃脱，即占据一座高大楼房并烧毁周围民间房屋。在楼房四周埋下手榴弹和地雷，仍负隅顽抗，但敌据点对面不到三十米处有一间楼房，他们还没来得及烧毁，即被我县大队占领，作为攻击敌人的前沿阵地。战斗进行了几天几夜，无论正面强攻，或者佯攻偷袭，都没有攻打下来。倪南山和我亲去婺源大队，实地观察了一番，和大家当场作了研究。有的提出，可用长竹竿，将手榴弹铁盖揭开，拉出引线，挂在竹竿铁丝上，然后送进房屋内，钩动引线，使手榴弹爆炸；有的则认为，这种办法不牢靠，不如在吃饭的方桌上铺湿絮，当作土制坦克掩护冲击，可能成功。但我们怕这个方案没把握，反而会造成重大伤亡，于是，我回忆起另一攻坚方案，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何家湾战斗中，我们攻打一九二师一个连驻守的大祠堂，曾集中机枪扫射一点，硬是打开了一个墙洞的办法。最后，大家认为这办法是可行的，便决定采取这个攻击方案。

傍晚，我和老倪回到住地刚刚坐下休息，不到二十分钟，查富德派侦察员送来了胜利的消息，查富德指挥部队，利用

敌人据点对面的楼房窗户，集中几挺机枪，向敌人占领的楼房猛烈扫射，把墙打塌。三连连长唐刚率领战士用梯子冲上去，将敌人两个中队压到楼下，全部消灭干净，缴获机枪两挺、步枪六十多条，黄堪清也被当场活捉。但唐刚从楼上往下冲杀时，腰部却摔伤了。

我部正攻打黄堪清的时候，保二团得到消息，便派一个营前来救援。但敌人已经十分明白，我皖浙赣支队已今非昔比，不是当年的小部队了，而是拥有千多人的大军了。保二团在甲路被我歼灭两个整连后，派出增援部队，再也不敢横冲直撞，一路上只是胆颤心惊，畏缩不前。当我们派出的几个侦察员向敌先头部队摔出几颗手榴弹时，他们闻之丧胆，掉转屁股，逃进据点龟缩了。

消灭了敌婺源自卫队，活捉了黄堪清，胜利消息传开，群众竞相称颂，我们走到哪里，哪里老百姓都杀猪宰羊，犒劳慰问，群众敲锣打鼓，张贴标语，欢迎南进归来的子弟兵。

第二天，在婺源甲路召开了公审黄堪清大会，部队一千多人，群众有四、五千人参加，场面十分热烈。公审大会由倪南山担任审判长，莒菴山的妇女和一些被害群众在台上控诉。审判长在会上宣读了黄堪清罪恶以后，就地执行枪决。数千军民高呼“打倒黄堪清”、“枪毙黄堪清”的口号。会上，我们作了形势报告，谈到了全国出现的大好局面。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上起九江下到江阴，进抵数百里长的长江北岸，指日可下江南，江南人民重见天日的时刻已经来临了。群众闻听此情，激动万分，高呼“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其热烈气氛，令人兴奋。

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趁此机会，我们和婺源县委书记

洪海涛商量，共同研究当前的任务，帮助他们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筹集粮饷，赶制军鞋，动员青年参军，建立民主政权，为迎接大军渡江做好准备。在婺源地区留下马钧、金峰林、潘金祥等十多位同志。此时，皖浙赣工委书记熊兆仁已率两个连回到皖南地委，去安排配合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了。

(二)

阳春三月，江南的春天早来了！和煦的春风吹开了山花，吹绿了坡坡岭岭，到处是花香鸟语，群莺乱飞。我南进归来的战士，他们的心同大自然一样，充满着朝气和活力。

我们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婺源境内的一个小村子里作了短暂的休整。部队刚一住下，从景德镇和婺源城里来了大批知识青年要求参军。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将这些青年留下，编成民运工作队，让他们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就地开展革命活动。

休整期间，我们对全国政治、军事形势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认为敌我双方经过三大战役，敌人主力部队已完全丧失，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原想以长江作为屏障，负隅顽抗，但史称“守江必守淮”，现在淮河早已解放，敌人长江防线也必然徒劳。

据根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一面做好整军工作，一面对回师皖南的各项任务作了统一部署：一、配合渡江大军，堵击南逃之敌。原准备破坏敌军南逃必经之公路、桥梁，后因情势变化，上级指示一律不予破坏，留作我军追敌之用。于是决定我部兵分两路，歼敌残部。一路由查富德率领独立团

的一部，进军黟、休、祁，截击由贵池向祁门逃窜之敌，一路由倪南山、余华和我率支队部和主力团，直指皖南山区重镇屯溪。二、学习中央有关政策，做好接收城市的准备工作，确定了接管城市的干部配备，拟就了军管会的布告，并且着重教育部队要保护人民财产，严防敌人破坏任何建筑设施。三、开展争取和瓦解敌军工作。我们以皖浙赣支队的名义，给驻守皖南屯溪一线蒋军的大小头目发出了劝降信，并派张振英去屯溪，开展对敌军的策反工作。

在这期间，我们根据皖浙赣工委指示，在斗争区域和人员配备上都作了一些调整，将坚持婺东地区的陶刚撤回，随支队行动。朱农率警卫部队，仍留少华山的紫湖口一带活动。饶、开、德、玉工委，增加孙举东、侯胜为委员。当时留下的武装改为饶、开、德、玉大队，朱农任大队长兼政委，叶文祺任副大队长，侯胜任副政委，大队下属两个连和四个武工队。同时，我们要求工委同志巩固少华山地区，并向磨盘山拱峰方向发展。敌人得知我主力部队回师皖南，便派赣保安旅余旅长带一个团又一个营兵力进驻童家畈，发动“清剿”。饶、玉、德、开工委领导下的全体指战员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取得了胜利。

三月底，我们离开了婺源，进入皖南境内。我们在婺源时缴获了一台美制的四用收音机，能收到我方邯郸电台的广播。当听到新华社发表消息时，大家激情满怀，无比喜悦。收音机还能听到国民党政府时而发出打气鼓劲的叫声，有时连国民党军队相互联络讯号也清晰可闻。广州方面问：“老板，老板，现在行情如何？”南京方面答：“形势不好，江北炮击！”战士们听了，不禁哈哈大笑。

我们将收听到的我军胜利捷报和国民党军队的败局，用钢板蜡纸，刻成油印报纸，广为散发。并以皖浙赣解放军名义，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将传单送到国民党军政人员手中。

其后不久，我们这些政治攻势起到了料想不到的效果，对于渡江战役给予很大帮助，也减少了大军南下的阻力和障碍。查富德率领的独立团一部，配合苏帅仁领导的黟休祁游击队，直向沿江挺进，接近石埭县境。敌自卫队方培芝带着部队在城安镇构筑三个碉堡，自恃坚固难攻，对我采取讨价还价的态度。一九四八年春，我们曾派汪飞，利用与方培芝拜把兄弟关系，去做争取工作，未果。这次，苏帅仁利用他弟弟苏毅薰和方培芝的同学关系，送去了一封劝降信。方培芝和苏帅仁原是一个地方人，他听说苏帅仁随新四军过江到了北方，怀疑劝降信是冒名之作，便派一个排长路树春伪装成老百姓模样，来探听虚实。此人认识苏帅仁，一见果然是他，连忙深深一揖，口中连呼：“大先生，大先生！”苏帅仁当即要他回去，正告方培芝，要他们及早来归，将功赎罪。不然，上校联防主任荣准的下场就是榜样。苏帅仁还告诉他，打荣准的只是我们的小部队。现在，皖浙赣支队司令部已经开进皖南。那个排长一听此言，更加惊恐，当下把藏在腰间的手枪取出，连说：“首长，我先缴枪，我先缴枪！”苏帅仁没有收他手枪，让他归队好回话。那个排长回到自卫队，讲述了全部情况。方培芝见大势已去，随即联系七都、横船渡一带乡公所，全部投诚，共有三百多人，拉到大洪岭脚下，进行改编，成立独立营，至此，石埭便成为一座空城，为我部向沿江进军打开一条通道。

(三)

我们在军事上采取强大攻势的同时，争取和平解放皖南重镇屯溪，也是我们重要策略之一。当时，在力量对比方面，敌以宣城为中心成立第七绥靖区，以张世希为司令，辖有第二十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八军、第七十三军及独立二三八师（均先后进驻皖南），以拱卫其南京外围与加强皖南江防。同时还成立第四绥靖区，以刘汝明为司令，辖第五十五军、第六十八军也进驻皖南。除正规军队外，尚有敌七绥署所辖三个地方纵队、两个交警总队以及地方武装，上起九江下到南京一段江防线上，总计约有十五万兵力。我皖南仅有四、五千人，不及敌人十分之一，且分散各地，能够集中使用的兵力就更少。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我们一面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顽敌之一部，象在甲路伏击保二团一个营和全歼黄堪清大队那样的打法；一面利用过去的统战关系，展开和平攻势，争取和瓦解敌军。

在皖南，我们的统战工作是很有基础的。早在抗日时期，新四军进驻皖南，就一直注意统战工作。皖南事变以后，我们坚持皖南斗争，仍然保持和国民党一些上层开明人士的接触。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为了加强白区工作，华东局又设立国区部，曾希圣为部长，李步新为副部长，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上海工作组，由方向明任组长，吴文瑞任副组长。不久，吴调皖南工作。原来七师派在沪、宁、芜地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也划归上海工作组领导，以便更好地去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民主进步力量，策动敌军官

兵起义投诚。国区部派到皖南来的人员，在皖南地委统一领导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皖南地委一面命令部队加紧军事行动，一面让国区部派来的同志，携带地委负责人的函件和传单，分别送到驻守在皖南的一些敌军政要员手中，敦促他们弃暗投明，起义来归。

在青阳，由许达抱做争取瓦解工作，并通过地下党员、担任国民党青阳县集训队队长的陈文堃同志，拉出集训中队举行起义。

许达抱是青阳人，抗日战争初期，就在青阳一带做党的工作。他在青阳县常备队里，发展了当时任副班长的陈文堃为秘密党员。后来，许达抱担任青北工委书记，便通过地下党员陈法周，一直同陈文堃保持单线联系。抗日胜利后，许达抱随军北撤，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八月，他同金德培、刘永从桐城渡江到茗山冲，找到皖南地委，分配到沿江工作。在解放前夕，许达抱做陈文堃工作，争取尽快起义。

陈文堃忍辱负重，在常备队里干了十几个春秋，以他的精明能干，博得国民党县长的信赖，并以他的一副仪表，获得县长姨太太的暗暗羡慕。这样，陈文堃被提升为中队长。他利用这一特殊身分，进行秘密活动，在排、班里，发展了一些秘密党员。

一九四九年，春风送来了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地下交通站又送来许达抱的亲笔信件，陈文堃欣喜若狂，真想一下子回到党的怀抱。但他竭力克制着自己，表面镇静自若，暗地里找一些党员，分析形势，做好起义准备。那时，对情况还不很了解，个别党员不主张马上起义，待大军渡江后再说。陈文堃将各种意见向我们报告后，皖南地委及时而果断

地命令他立即率部起义，不得拖延时日，并立即派李友白和许达抱亲率一个连前去接应。

三月二十八日夜晚，陈文堃通过党员积极分子，秘密串连了大多数官兵，周密检查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然后，佯称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把队伍带往约定的地点——青阳东南面的陵阳。队伍走了一夜，到达离陵阳不远的杨梅村，天已大亮。那里有座祠堂，许达抱率领的部队已先抵达，陈文堃命令全体官兵就地休息，带领部下开进祠堂会餐。此时沿江支队副支队长李友白和沿江工委委员兼青泾县县委书记许达抱带领的一连接应部队，集合在祠堂外面大唱革命歌曲。常备队里一些不知情由的官兵，这时才如梦初醒，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在解决石台、青阳两地敌人的地方武装后，虽然开辟了一条进军沿江的通道，但当时国民党的政府调集重兵防守沿江一线，使我沿江部队难以接近江边；同时，由于敌人封锁船只，断绝长江交通，我们搜集的敌人情报也更难递送到江北。这一切，均亟待解决。正在这焦急时刻，四月六日，我江北指挥部派遣的渡江先遣大队，冲破敌人封锁，到达了南岸。

亚冰、慕思荣率领的渡江先遣大队，是我三野九兵团二十七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作出的果敢行动。其目的是为了有准备、有把握地打好渡江这一仗。在我军主力渡江之前，派一支部队先遣渡江，执行战役性质的侦察任务，查明敌江防布置及江南敌后纵深情况，并以实战中破除“木船不能渡江”的看法，提高部队渡江的信心。同时，在我大军渡江时，以积极动作，直接策应主力渡江作战。渡江先遣大队

共有三百多人，是从军侦察营和几个师中抽调出来的有战斗经验的指战员组成的。为了加强领导，大队成立了临时党委，由八十一师二四二团参谋长亚冰（章尘）任党委书记兼大队长，³³军侦察科长慕思荣任党委副书记兼副大队长，军侦察营副营长刘浩生和教导员车仁顺为党委成员。先遣渡江大队选择敌江防薄弱环节的蒋军八十八军两个师结合部，下自繁昌以西的十里场上到铜陵的夹江口为渡江地段，于四月六日夜晚二十一时半和二十二时，分成两支箭头，先为偷渡，后被敌发现即强登南岸。先遣渡江大队在江南转战几日，于十日晚约九点钟，在向导何道纯带领下，由南陵县戴公山的地下党员罗玉英和南繁芜游击队叶显金等同志的掩护配合，来到南陵县板石岭徐冲，与中共繁昌县代理书记王佐（阮致中）和县委委员、行政办事处主任、南繁芜游击总队队长杨鹏（王安葆）取得了联系。这以后，先遣渡江大队与沿江党组织、游击队互相配合，发动群众，筹集粮草，为大军制作军鞋，剪断敌电话线，破坏敌通讯联络，并通过地下党和敌军内部，搜集大量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送到江北。

当时根据敌人沿江各兵团部署是东重西轻，南京以西防御力量较为薄弱，而且江面较窄，皖南又有我游击武装活动，极有利我渡江突击。总前委决定中路集团提前一天实施渡江，主要是为吸引敌人注意力，有利东、西集团渡江，以及渡江后能迅速会合。四月二十日夜，我中路集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了长江天险，首先登上南岸，攻占铜陵县的顺安镇。二十一日，我东、西集团军全线发起攻击，胜利地渡过了长江。

我西进沿江的查富德部配合沿江部队，取得了胜利。倪

南山和我率皖浙赣支队主力，日夜兼程，挥戈东指，直下屯溪。

屯溪是皖南一座重要城镇，它四面环山，清澈见底的新安江水，从镇旁流过，东下杭州。北有公路通芜湖，南过马金岭就到浙赣铁路，西面公路直通景德镇，交通便利，是沟通皖浙赣三省的交通枢纽。在军事上，它确是扼守皖赣两地的要冲。国民党自从失去了江北，即将安徽省会迁来这里。因此，屯溪一时成为安徽的政治、军事中心，当然也是我军攻打的主要目标。

根据敌人在屯溪增设重兵防守情况，我们除积极开展和平攻势外，并注意首先解决屯溪外围守敌。

驻守在绩、旌、歙地区的国民党保五旅，是一支拥有相当实力的地方武装，我皖南地委首先做他们的策反工作。

保五旅下辖四个团，旅长王汉昭是新桂系一个倾向进步的青年军官，与新桂系中的各方人物有广泛联系。在国共合作的抗日初期，他与我党在大别山工作的同志常有往来，我党派郑汉去部队做王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王汉昭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暗地里已听从我党指挥了。方向明通过南京一位姓阮的联络员与王面谈，派陈天任转告王汉昭，要他把部队开到当涂驻防，待机行动。但不久，王汉昭到芜湖，找到了方向明、石原皋、范治农等同志，说是自己的保五旅驻守当涂，国民党视为杂牌部队而不信任。因为他与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常有联系，引起南京卫戍区芜湖指挥所的怀疑，遂派六十六军驱逐他们出当涂县境，并请示下步如何处置。方向明当即告诉他，要他把部队拉到皖南，听从胡明指挥。王把部队拉进皖南绩溪驻防，地委派郑汉、李民、顾永康进住保五

旅，协助起义工作。这样，保五旅全体官兵开进皖南山区，在我百万雄师胜利渡过长江后，地委命王汉昭率部起义。王汉昭便于四月二十二日，在绩溪发出通电，宣布起义。

在芜湖，国民党“安东”号率舰起义，又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安东”号是指挥舰艇，共辖二十多艘军舰，舰长兼指挥官名叫唐涌根。这只舰上青年军官严时信，任安东号航海官兼第四江防区指挥部参谋，他很早就想摆脱国民党，寻找革命道路，在蒋家王朝行将覆灭的前夕，他冒着生命之危，到南京通过其表兄耿家舒（地下党员），找到了国区部的工作同志。国区部派方向明等同志与其洽谈，并具体帮助他安排行动计划。方向明代表我党组织告诉严时信，一、要设法调走舰长唐涌根，由严自己掌握实权；二、要稳住所有军舰，按兵不动，待机起义；三、不要向渡江船只开炮。如果炮击，弹着点要落在江北空旷地带。

严时信接受任务回到芜湖，设法把唐涌根调离安东号，自己掌握了指挥实权。二十日夜晚，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时，国民党第七绥靖区指挥部命令安东号率舰北驶阻击，严时信未予理睬，不执行命令，绥靖区指挥部立即追查严的责任，严时信以没有接到海军总部的命令、不能擅自行动为由，搪塞过去。紧接着，七绥靖区又转来海军总部和国防部命令，命其阻击从北岸渡江的人民解放军，严时信将生死置之度外，借口安东号机件发生故障，没有驶出港口，他还及时地将敌人军事计划、兵力变化和逃跑动向，用密电发报到皖南地委胡明那里，然后又由胡明转报江北指挥部孙仲德。一直到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攻占芜湖南岸，安东号及其所属舰只，安然而完整地到了人民解放军手中。

这一期间，我军回师皖南，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国民党驻守皖南的部队，在我强大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势下，无力抵抗，纷纷起义。这就有力地配合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发展。

(四)

四月中旬，我们接到华东局来电，得悉大军渡江在即，于是命令部队兼程前进，夺取屯溪，为大军南下扫除障碍。

我先头部队进抵休宁县上溪口。驻守该镇的敌土匪司令张振达、张文模以两个连武装控制山岭隘道，妄图顽抗。我们一面包围该敌，一面根据地方同志提供的线索，派兵逮捕了土匪司令的家属，要其敦促敌人投诚。迫于形势，张振达、张文模迅速率部来归。

解决上溪口之后，我军马不停蹄，扩大战果。在江西打下紫湖口乡公所时，我们缴获了一匹小红马。马很强悍，只服我骑。这时，我骑上这匹马，上下联络，非常方便。

我们在夜间离开上溪口，向万安方向前进，部队由石田进入汪金桥时，忽然，尖兵发现迎面有支队伍零乱地向南开来，我先头部队当即将其截住。一问，原来是卓群所部休宁自卫大队和休宁区乡警保队企图南逃，我们立即命令卓群前来谈话。

一会，卓群来了，说：“贵军散发的传单和劝降书，我收到了。我们决定投降，请求指示。”我们仍退回石田，把休宁自卫大队就地整编。陶刚率部解放了休宁县城。

收编卓群部后，我们进军万安。四月二十日大军渡江前夕，我部已逼近屯溪西郊。警卫连长何绍轩带领警卫连和部

分改编部队，进入屯溪外围的八村农场，对屯溪实行封锁，并张贴休屯军管会的布告，主任余华，我为副主任，大军渡江后即撤消。

在屯溪方向的敌守城部队，除原有兵力外，还有安徽省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的一个主力团，另一个是由地方武装改编的保安团。整个城防由方师岳指挥，但兵败如山倒，他们企图向浙江开化南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采取强大的

散发传单和劝降书，给守城官兵指明出路；一面又派张振英进城继续做争取工作。

张振英化装成商人进了城。他首先去找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秘书长的程中一，但程早已躲避起来。他打听到原国民党安徽省参议长江彤侯仍然住在离屯溪五里远的隆阜镇上。抗战时，张振英和江彤侯就有过来往，互相认识，他决心去江家一探。

对于不速之客的张振英，江彤侯见了，先是一愣，然后以不屑一顾的态度，靠在躺椅上，问道：“啊，你来啦，不是听说你当共产党去了吗？”张振英坐下，郑重地说：“是的，我早就是共产党。现在，我们部队就在周围，眼下就要攻克屯溪。”江彤侯不以为然地说：“方师岳率数千之众，固守山城，你们有几个兵，能攻克吗？”

张振英说：“至于兵力，这是机密，不能奉告。不过，吃掉方师岳残部，我们的兵力还是绰绰有余的”。

江彤侯在躺椅上坐下来，惊讶地啊了几声。

张振英规劝说：“江参议长，过去你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还不拿你当外人，请你转告方师岳，要他快下决心，抉择前途。为了全城生灵不受涂炭，也为了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我们力求和平解放屯溪。方师岳现在还握有兵权，是南逃，还是献城起义，这是生与死的选择。在这严重关头，还要请你去劝说劝说。过去，方师岳当上保安司令是你保荐的；今天，把他从死路上拉回，这个好人还是由你去做。”

江彤侯脸上流出汗水，但他仍故作镇静地说：“好说，好说。我同共产党往日无成见，今日无怨仇。我愿马上去一趟。不论成功与否，下午给你回音。”

当天下午，江彤侯回话说，方师岳要求同我方代表面谈。张振英当即带侦察排副排长方哲夫等，又到屯溪市内的黄山饭店，同方师岳见了面。方问张振英代表那个部队来谈判，张回答说：“我是皖浙赣支队的代表。”

方师岳提出部队改编问题，张振英说：“一切问题同我上级谈，我只告诉你：放下武器，保障人身安全。”

方师岳说了一声好，就把自己手枪取出放在桌上，说：“从我缴械。”其实，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再加上方师岳是方星的族侄，尽管当时方师岳有犹豫，但对方星提出的具体要求已默认了，并由内线撮合，做了起义的准备。江彤侯又来当说客，事成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张振英将情况报告我们，当时，余华、倪南山和我商量，通知方师岳来万安镇晤面。

方师岳准备来万安时，他要求我部暂时不要进城，因为市内还有刚从太平县开来的保安团，加上一些流亡学生，秩序很混乱，怕我受降部队和他们发生误会。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方师岳将守城的部队约三千多人，全部调往屯溪对面的阳湖和上溧阳集中，听候改编。尔后，他才通知我先头部队开进城内。

四月三十日，我部继续向屯溪移进，半途中缴获了敌人一辆汽车，侦察员张祥根坐上汽车返回万安。不一会，他又乘车回来报告说，万安到了国民党一个师，差点和我们接起火来。但经过联系，才知道大军已经渡江南下，开进万安的部队原来是二野十二军的一个师。

当天，我支队参谋长张元义命令先头部队控制屯溪大桥，占领屯溪市后面高山上的碉堡。我皖浙赣支队全体指战

员穿着各色各样的服装，持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步伐矫健，队形整齐，威武雄壮，开进屯溪，给国民党统治了几十年的屯溪带来了无限的生机。饱受敌人蹂躏的屯溪人民扶老携幼，万人空巷，走上街头，欢迎人民子弟兵。那些早就渴望解放的贫苦群众以及历尽艰险的地下工作者眼噙热泪，脸露欢笑，与战士们拉手问好。当天我皖浙赣工委和支队部就住在屯溪市的“中国银行”。

刚进屯溪，熊兆仁也到屯溪找到我，说上级来电，据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张义纯率领残部向南溃逃，命我率领一团兵力火速追击，待我整理部队准备出发时，有消息传来，张义纯残部已在婺源就歼。原来，一九四九年初，张义纯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他把这个烂摊子迁往屯溪，当时连同皖南行署人员也不到二百人。他们从南京领来的金圆券不断贬值，几乎无法维持生活。直到四月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芜湖、铜陵、贵池等地相继解放，省府官员们慌了手脚，忙召开会议研究对付办法。民政厅长张威遐提议向南昌撤退，张义纯不服气，借口地方治安，不肯马上撤退。会后，张威遐说：“你们不走，我明天就走了。”直到解放军逼近祁门、屯溪，张义纯迫于形势，才率残部向婺源逃窜。他们未到婺源县，解放军已先一日到达县城。张即领残余保安部队转向皖赣边境，行抵浙江江山县以北的地区，被人民解放军五兵团歼灭，张义纯及所有官兵被俘。敌九十六军少数残兵败将逃到婺源县境，见到武工队和民兵，便纷纷放下武器，束手就擒。严田村群众用一根木棒俘获六个全副武装的敌人，至今传为佳话。

在此期间，查富德率领的独立团和苏帅仁等率领的

游击队，向沿江靠近，遇上敌一个军溃逃，当即占领高山的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在激战中，二野三兵团十一军军长曾绍山部，从殷家汇赶到，前后夹击敌军，歼灭其大半，其残部向南逃窜。之后，我部协同十一军尾追到祁门县城，与坚持祁门斗争的马文杰率领的部队配合，聚歼该军的逃敌。我独立团和曾绍山的十一军在此胜利会师。后来，十一军政委鲍先志在《红旗飘飘》十五期上撰写的《雄师渡长江》一篇回忆文章中叙述了当时会师情景。

我部进入屯溪当天，约在上午十点钟光景，由岩寺方向开来一支穿黄军服的部队，大路上尘土飞扬，前进中的军旅士气高昂。我守碉堡战士向空中鸣放数枪，却不见反响。经过联络，才知道是我军三兵团的十二军先头部队。这样，屯溪军民各界，热烈欢迎南下大军进入屯溪市。

五月一日，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我皖南部队和二野三兵团的十一军、十二军全部开进屯溪市区和市郊，真是三军兴会，盛况空前，只见全城欢腾，人声鼎沸，“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嘹亮，响彻九天，千军万马都沉浸在无比喜悦和幸福之中。

五月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皖南游击队三千多人，在歙县县城召开会师大会，陈锡联、熊兆仁、胡明相继在会上发言。人们欢呼歌唱，庆祝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

这样，皖南全境宣告全部解放。皖南区党委和皖南行署在屯溪市成立，谢富治任区党委书记，牛树才、胡明、马天水任区党委副书记。魏明任行署主任。我部当时由溪屯撤到龙湾整编，根据上级指示，将我皖浙赣支队分为三个部分，

由倪南山带领部分干部战士去江西浮梁，担任浮梁军分区司令员；熊兆仁任皖南军区副司令员，他带去的部队编为军区警卫团；我带两个主力营到池州，成立警卫第五团，查富德任团长，钱秋育任政委，我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池州是我熟悉的地方，曾记得，我在新四军搞民运工作时，来过这儿；皖南事变不久，一九四一年三月，我奉命重返皖南，来过这儿；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奉命三返皖南，来过这儿。现在，几经战争风雨，全国解放，我又回到这儿。一时间，我的思绪真象扬子江的万顷波涛在心头翻滚；在这块土地上，我和我的战友们，经历了艰苦的岁月，洒下了热血和汗水，也分享着胜利的喜悦，瞻望那光明的未来。

我遥望那浩瀚的长江，不禁想起了苏东坡《赤壁怀古》的诗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些革命先烈的英名，象江河行地，千古长存；他们未尽的事业，象滚滚江涛，奔腾东去，永不止息！

编 后 记

为了编好《皖南星火》的书稿，编者随作者杨明同志去了泾县，参加老同志审稿会，同时参观了有关地区，接触了同作者一道工作和作战过的干部和群众，并随时对书稿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在这期间，作者再次听取了一些老战友的意见，对已经过两次较大修改的书稿进行补充和修饰，有时伏案到夜深。现在，编者读完并编好了这部书稿，确有几句话想说。

据协助编写此书的王治家同志说，作者经过漫长和磨难的岁月，才写出了这部书稿。早在一九五九年，作者就着手撰写皖南斗争的文章，后在十年内乱中，写成的部分稿件同作者遭到同样的厄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者又振奋精神，一方面委托有的同志去各地查阅和搜集资料，一方面自己到皖南以及其他地方访问战友和群众，最后写成了这部书稿。

作者从新四军军部工作直到迎接大军渡江的十二年间，先后在皖南、皖浙赣一带担任过基层工作直到党组织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工作，经历了进驻云岭、皖南事变、重返皖南、坚持地下斗争以及抗日胜利后转战皖浙赣、迎接大军渡江、解放屯溪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作者以自己经历为主要线索和个人斗争生活和见闻为主要材料，作者自己和委托其他同志访问了三百多人次，其中有当时的领导者，如谭震林、

李步新、胡明、熊兆仁等同志，也有战友和部下；查阅资料和访问笔录达两百多万字。由于作者具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和这样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又由于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所以，这部回忆录较系统而全面地反映皖南地区两个历史阶段艰苦和曲折的斗争。这个难能可贵的优点，便提高了它的历史价值。

书中关于党和军队紧紧依靠群众、认真做好统战工作——包括与国民党军的友好相处、日军国政宪郎的投诚、大刀会的被改造和愚顽头目的被感化、地方国民政府一些人员的为国效力的一些篇章，其中秘密巧妙的地下斗争和灵活多样的战斗场面，都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是十分灵验的。谁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谁就会取得胜利；否则，就会碰壁而遭到挫折。这种挫折也有所反映。因此，它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具有相当高的教育意义。

作者在皖南地区十二年的斗争生涯中，经历了公开的和地下的，沿江城镇和偏僻山村的斗争环境，参加了许多战役或战斗的筹划和指挥，所以，能够写出顺安镇地下斗争的变幻莫测的故事，刻画出地下工作者智勇双全的生动形象；能够写出环境极其险恶的牯牛降出奇制胜的战斗场面和饶有趣味的斗争艺术。这些实能给人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值得向读者推荐。

编者

李步新、胡明、熊兆仁等同志，也有战友和部下；查阅资料和访问笔录达两百多万字。由于作者具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和这样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又由于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所以，这部回忆录较系统而全面地反映皖南地区两个历史阶段艰苦和曲折的斗争。这个难能可贵的优点，便提高了它的历史价值。

书中关于党和军队紧紧依靠群众、认真做好统战工作——包括与国民党军的友好相处、日军国政宪郎的投诚、大刀会的被改造和愚顽头目的被感化、地方国民政府一些人员的为国效力的一些篇章，其中秘密巧妙的地下斗争和灵活多样的战斗场面，都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是十分灵验的。谁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谁就会取得胜利；否则，就会碰壁而遭到挫折。这种挫折也有所反映。因此，它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具有相当高的教育意义。

作者在皖南地区十二年的斗争生涯中，经历了公开的和地下的，沿江城镇和偏僻山村的斗争环境，参加了许多战役或战斗的筹划和指挥，所以，能够写出顺安镇地下斗争的变幻莫测的故事，刻画出地下工作者智勇双全的生动形象；能够写出环境极其险恶的牯牛降出奇制胜的战斗场面和饶有趣味的斗争艺术。这些实能给人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值得向读者推荐。

编者